

中国共产党 江苏省宿迁历史

第一卷 (1927—1949)

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 第一卷, 1927—1949 /
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20.11

ISBN 978-7-5098-5535-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党史—宿迁—1927—1949 IV. ①D235.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6549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王世英(特约)
复 审: 韩冬梅
终 审: 姚建萍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l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25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8-5535-5
定 价: 45.00 元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

第一卷（1927—1949）编委会

主任：李 钦

副主任：孙正龙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仓中华 尹邦柱 王保君 张克军

李国成 李明建 陈志胜 罗绪永

赵 勇 赵连军 徐山红

主 编：孙正龙

副主编：赵连军 张克军

编 辑：周赛赛 李 智 顾 倩 张椿涓

陶月明

编辑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第一卷（1927—1949）记述的是 1927 年至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宿迁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二、本书所记述的地域范围是今宿迁市所辖的三县二区，包括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宿城区。宿迁市是 1996 年成立的设区市。为避免与历史上的宿迁县混淆，凡是指今宿迁市所辖区域全境的，一般称“宿迁地区”，在某些情况下也省称“宿迁”，比如书名“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中的“宿迁”，以及“宿迁人民”中的“宿迁”等，即指今宿迁市全境。凡是与沭阳、泗阳等县并称的“宿迁”，均指“宿迁县”。一般情况下，不表示今宿迁市全境的，均明示为“宿迁县”。

三、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淮阴人民革命斗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和宿迁、沭阳、泗阳、泗洪四县的革命斗争史、革命斗争大事记，以及《淮北抗日根据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徐海蚌地区红十五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版）等。

目 录

第 一 编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和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3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对宿迁的影响及中共党员的早期活动	3
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宿迁的影响	3
第二节 中共党员在宿迁的早期活动	5
第三节 声援五卅运动	7
第二章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及初期活动	9
第一节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	9
第二节 中共宿迁组织的初期活动	14
第三章 土地革命行动计划在宿迁的实施	20
第一节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师	20
第二节 泗阳和沐阳的武装暴动	24
第三节 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及其意义	27
第四章 革命低潮时的斗争和党的深远影响	29

第一节	革命低潮时的斗争	29
第二节	党的深远影响	36

第 二 编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章	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43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	43
第二节	日军入侵的暴行	45
第三节	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48
第四节	党组织的重建	54
第五节	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	61
第六章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67
第一节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67
第二节	刘少奇指导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74
第三节	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	79
第四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84
第五节	镇压土顽和反动地主暴动	91
第七章	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94
第一节	淮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扫荡”“蚕食”	94
第二节	淮海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扫荡”“蚕食”	108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顽军的破坏和摩擦	115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军工作	122
第五节	创建和发展军工生产	134

第八章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39
第一节 党的建设	139
第二节 政权建设	151
第三节 军事建设	158
第四节 群众运动	170
第五节 财经建设	180
第六节 大生产运动	192
第七节 文化教育建设	200
第九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09
第一节 开展局部反攻	209
第二节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215

第 三 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221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221
第二节 惩奸反霸与减租减息	224
第三节 战胜灾荒与发展生产	226
第四节 开展土地改革	229
第五节 调整机构与区划	230
第十一章 奋起自卫和恢复解放区	234
第一节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	234
第二节 宿北战役	238

第三节	敌后坚持和反“清剿”斗争	242
第四节	湖上斗争和重返淮北	247
第五节	解放区的恢复	254
第六节	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259
第十二章	宿迁人民迎解放	272
第一节	宿迁全境解放	272
第二节	全力支援前线和江南新区	273
第三节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77
后 记	281

第 一 编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和 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3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五四运动对宿迁的影响 及中共党员的早期活动

第一节 五四运动对宿迁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而爆发的。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3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活动。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

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宿迁地区后，宿迁人民积极响应和声援。境内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演讲游行，张贴标语，

宣传抵制日货，要求严惩卖国贼，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热潮。一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陆续传入境内，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进一步激发了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热情。在革命潮流影响下，他们利用庙宇、祠堂等兴办学校，开展新文化运动。

5月上旬，宿迁县崇实中学学生首倡，召开全县公、私立学校代表会议，成立宿迁县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县学生开展爱国运动。同时，位于城区的崇实中学、培贤女中、钟吾高小、文昌高小、女子高小以及艺徒、商立、闽侨等校的学生，还建立了宣传、演讲、总务、抵制日货等专门组织。5月19日，在学校师生的推动下，宿迁县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城西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四运动大会。学生联合会在会上介绍了五四运动的情况，各界代表纷纷登台演讲。崇实中学教师孙光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摘下草帽，厉声说：“这是日本货，不能用。”并拿出自带剪刀，剪断草帽上的缎带，将草帽扯碎，猛掷于台下，全场热烈鼓掌。一时间，“坚决抵制日货”“严惩卖国贼曹、陆、章”“誓死收回山东一切权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大会致电中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吁请拒绝和约签字，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队伍高唱钟吾学校音乐教师秦席之谱写的歌曲：“欧和失败生死关，青齐丧利权。倭奴狂喜我心酸，国民尽赧颜。四万万人发冲冠，长城壮宿迁，魏胜、刘江、项羽还，重整旧河山。”当天，部分学生将县城东大街大同杂货店的日产白砂糖抛撒于街面，焚烧了日新书店的日本图书，又准备焚烧永和布庄的洋布。后经各界代表与学联协商，为避免商人损失，规定各商号将现存和外埠定购尚未到栈的日货统一登记造册，由学生联合会加盖印章，方准出售，售完为止，不准另进新货，否则一律没收。根据学联统一部署，城区学生深入关口、码头、东大街、教军场等闹市区宣传演讲，查禁日货。同时，钟吾、文昌等学校派出学生分赴各市镇，配合当地学生向民众进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宣传，并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把爱国运动推向广大农村。虽值暑期，学生们仍坚持不懈查禁日货，所获违禁商品，均交商会保管候处。

5月30日，泗阳县各界人士6000余人在县城召开大会，提倡国货，焚烧日货，演文明新剧，活现北京政府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人丑态。同时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31日，又召开了3000余人爱国演讲会。泗阳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司柳溪在会上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占领山东半岛的罪行，带头高呼“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坚决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坚决反对日本占领青岛”“要用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整个会场慷慨激昂。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司柳溪的8岁女儿司晓南正上小学，也随父参加会议。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感染，回到家里就把会场情景讲给她母亲听，还追问家里有没有日货。她父亲从房里走出来，指着她头上的红纱带说：“这就是家里唯一的日本货。”司晓南一听，马上就把头上的红纱带扯了下来，点火烧掉了。6月8日，泗阳召开国民大会，通电支持北京爱国学生。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境内广大师生经受了实际锻炼，提高了爱国意识，增强了社会责任感，这为他们确立志向、选择道路奠定了基础。沭阳县的吴苓生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后为今宿迁市境内第一位共产党员。宿迁县崇实中学姚尔觉（睢宁人）、私立培贤女子小学学生苏同仁等，都因“行为过于激烈”而被开除，后来都走上革命道路，姚尔觉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苏同仁成为徐海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第二节 中共党员在宿迁的早期活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同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

“共产党小组”，到年底，又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接着，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组织选派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24年至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这一时期称为大革命时期。

自1924年下半年起，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宿迁青年回到家乡，在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及市民中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苓生等人。

吴苓生，字松仙，在党的秘密工作时期，曾用过吴丽石、力石、立时、榛、赵云容、卢一之、张金德等化名。1899年生于沭阳颜集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1年，在沭阳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镇江中学，因在学生中宣传自由、平等、民主，领导并参加反对学校封建教育的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后去北京，考入汇文中学。1919年在汇文中学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3年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暑假，李大钊代表党组织介绍他去苏联求学。1924年初，吴苓生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家乡沭阳及宿迁县和海州、徐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他与沭城进步青年李嘉林、王洁予等组织“共进学社”，编辑出版《共进周刊》，宣传国民革命思想

和进步主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不久，吴苓生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哈尔滨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历任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北满地委书记、东北三省特派员、满州临时委员会组织部长兼农委书记、满州省委组织部长等。1928年冬，吴苓生在奉天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29年春出狱，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0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于山东济南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又有一些中共党员回到家乡，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中共党员在宿迁地区的这些早期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使广大知识青年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前途，使宿迁人民进一步觉醒和振奋起来，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5月30日，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领导罢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到公共租界时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继而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宿迁地区的青年学生、爱国教师纷纷走上街头，募捐钱物支援罢工工人。泗阳青年学生孙耀宗在县城带头和青年学生一起抵制日货，募集资金，声援上海罢工工人。在镇江读书的李嘉林等沭阳学生组织沭阳县旅沪同乡会，到上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外地教书的沭阳人毛汝楠等特地回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6月4日，泗阳县在城南召开各界1000余人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6月19日，沭阳县教育界通电声援沪案、汉案（即上海五卅惨案、汉口“六一一”惨

案)。6月23日，宿迁县参事会、县议会、商会、教育会、义务教育期成会、教育局、童子军联合会、初中校、职业校、商立小学、私立怀仁小学、县一女校、县一小等联合发布通电。电文说：“五卅惨案，全国痛心。务希各界同恤诚，力伸公愤，藉保国权，同人誓为后盾。”6月30日，宿迁县检查团将所查日英的洋布、洋纱等货物运到土圩南边的乌龟滩销毁。各机关团体、学校派员监视，围观群众约数千人。检查团负责人讲述五卅惨案经过，报告本县各仇货检查组织及查缴情况，当众公布查获日英商品数目，经监察人员清点核对，集中焚毁。一时间，烟焰冲天，掌声雷动。会场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永远不买日英货物”等口号。直至货化灰烬，人始散去。

五卅运动后，宿迁地区一批知识青年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本质，不少人到外地求知求学，寻求革命真理。1926年秋，泗阳县进步青年黄怀义、孙耀宗、王东野（又名王沛）到上海寻求革命道路，后经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介绍，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11日，黄怀义参加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英勇顽强，不避艰险，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三昼夜，不幸牺牲，年仅21岁。黄怀义烈士是宿迁地区已知的烈士中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

第二章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及初期活动

第一节 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年8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派遣重要力量，分赴全省各地，整顿党的组织，广泛开展农民运动。江苏省委把宿迁地区的宿迁县、沭阳县、泗阳县列入农民运动计划之中。这一时期，中共宿迁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

一、中共泗阳组织的建立

1927年3月，在江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安帮回到家乡泗阳洋河。洋河镇商业较发达，酿酒业有悠久历史，教育、文化也较有基础。胡安帮以洋河镇为基点，发展了沈长和、苏海龙、夏书勇、龚寿甫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洋河镇成立一个党小组，取名为“中共江西党小组”，胡安帮任组长。同年9月，胡安帮回江西后没有音信，其他成员脱离组织，党小组自动解散。江西党小组是宿迁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

1927年6月，中共党员、淮安人陈治平，因国民党右派反共“清党”到泗阳县警察局隐蔽，在县城发展金寿春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孙耀宗从黄埔军校回到家乡，也在泗阳县城开展建党活动。孙耀宗以“读书会”为名，广泛结交青年。9月，与在泗阳中

学读书的裴干元等人联系，在泗阳中学组织“反蒋同盟”，鼓励青年深入农民工人中，准备二次革命。不久，省委特派员何孟雄到泗阳召开报告会，有20多名“反蒋同盟”成员参加了会议。

此前，孙耀宗动员魏其楚（又名魏翘南）、徐钟彦等人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武汉去寻求革命真理。7月20日左右，魏其楚等到武汉。因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魏其楚只得在同乡会内暂住，恰好遇见宿迁县人蔡德甫。蔡德甫是由党组织派到武汉学习的。他很热情地照顾魏其楚，并找书刊送给他看，其中有《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蒋逆铁蹄下的东南》《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8月，魏其楚和蔡德甫一起回家乡。9月，他们绕道徐州，魏其楚由蔡德甫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陈亨洲要他回泗阳发展团组织。魏其楚回到泗阳县城后，积极开展建团活动，发展了严震寰（又名严柏华）、张广业等加入共青团，建立了共青团泗阳县第一个支部，属徐州团组织领导。

10月中旬，孙耀宗介绍袁恒升、祝名山等人入党，并在县城与陈治平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泗阳县第一个党支部。12月，省委派曹壮父（化名陈资始）到泗阳，开展秘密建党工作。在曹壮父指导下，孙耀宗、魏其楚等人积极工作，泗阳县党、团组织发展很快。此时，洋河镇建立了党小组，发展了10名党员。

1928年1月中旬，何孟雄到泗阳指导建党工作，决定将泗阳县的党、团合并。1月28日，中共泗阳县委员会在城厢孙耀宗家中成立，孙耀宗为书记，严震寰为组织委员，魏其楚为宣传委员。不久，王东野从黄埔军校回到泗阳，任县委委员、秘书长。中共泗阳县委建立后，县委决定以委员家乡住地为立足点开展工作，孙耀宗负责县城，王东野负责东河滩一带，严震寰负责新集、袁集，魏其楚负责李口，祝名山负责曹庙一带工作。严震寰在家乡新集、袁集等地发展3个支部，成立了中共南湖区委。10月，洋河有党员18名，成立中共洋河区委，李恩先任书记。除以上两个区委外，县委直接领导的有静山小学、新庄、罗圩、魏庄、胡湾、河滩、城里等7个支部。据1928年年底统计，全县有党员123名。

1928年3月，中共淮阴特委撤销，泗阳县委直属省委领导。10月，中共淮盐特委成立，辖泗阳、沭阳等县。魏其楚调任淮盐特委特派员。12月28日，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决定，中共淮盐特委改组，汤汝贤任特委书记，孙耀宗调任淮盐特委军事委员，王东野接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杨述贤补为县委委员。到1929年秋，泗阳县委下辖东南、洋河两个区委，一个河东特支，泗中、县城北门两个支部。全县发展到14个支部，另外有3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93名。1929年11月，孙耀宗被泗阳党组织推选为代表，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与上海学生、工人一起，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行经霞飞路口，被法国巡捕逮捕，关押6个月。出狱后，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到淮盐特委任特派员，先后参加金锁（今属泗洪县）、宿迁县汤群墙的农民暴动。1930年上半年，泗阳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县委成员进行了调整，王其德任农民部长，杨继非（又名杨富田）负责青年工作，严震寰到东南区指导工作，准备发动农民暴动；成立城区区委，谢楠任区委书记，下设3个支部，1个中心组；又增加河东、众兴两个特支。

二、中共宿迁组织的建立

1927年6月4日，宁方北伐军白崇禧部攻占宿迁，国民党建立政权和县党部，并成立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胡俊三、刘抱一、蔡少衡、管伯良、蔡克尧、杨玉铎6人（均为中共党员），以及在九江军校学习的中共党员陆品山等，遵照上级指示，先后由武汉回到家乡宿迁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8月，寇先瑶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宿迁县建党。途中，适遇直鲁联军反攻占领宿迁，寇先瑶折回上海。先期回到宿迁县的中共党员多数随国民党宿迁县政权撤往江南，蔡少衡、管伯良等仍留在宿迁县、泗阳县一带活动。8月下旬，蔡贡庭在上海由张原石、王芝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命回睢宁、宿迁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不久，蔡少衡在洋河高小发展宿迁县东大兴^①

^① 今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

马庄人马仑入党。12月16日，在北伐军再次攻占宿迁县之际，蔡贡庭仍出任宿迁国民党政权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兼工会主席，利用工作之便，委派蔡少衡、管伯良分别担任大兴集、洋河农民协会负责人。他们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

马仑入党后，弃教回乡，领导农民运动。接着，蔡少衡在大兴集马庄又发展马良之、张用琪等入党。马仑、马良之、张用琪等先后发展马怀启、朱凤章、马成忠、孙培善等15人入党。1927年年底，建立中共宿迁县第一个党支部——马庄支部，马良之任党支部书记。此时，蔡少衡到苏圩发展苏乙山入党，苏乙山又发展苏俊庭、朱辉等10余人入党，并建立中共苏圩支部。管伯良在管堤、洋河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中共洋河支部。陆品山在耿车、陆后园发展一批党员，建立中共陆后园支部。1928年初，陆品山等人又在耿车的东西张庄、东西杜庄发展王绍武、张梓扬、谢雨田、张凤章、张金汉等人入党。稍后，王绍武又发展二三十名党员，建立了中共耿车支部。

1928年2月，蔡贡庭、蔡少衡、马仑三人在宿迁县城的贛学^①开会，研究成立中共宿迁县委。3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同意，中共宿迁县委在大兴集马庄成立，直属江苏省委领导。马仑任书记，委员由胡俊三、马良之、蔡少衡、管伯良等5人组成。10月，宿迁县委改属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11月，汤涤非由上海回宿养病，此间，他在管伯良建立的管堤支部基础上，又在吴沟、马园、洋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吴沟、马园、叶庄等支部，并成立中共洋河区委，计辖9个党支部，167名党员。在县委成立之后，陆品山、王绍武等人在耿车地区积极发展党员，成立陆后园、耿车、佟圩、八堡等党支部，并建立中共耿车区委，下辖4个党支部，党员74名。至1928年，全县先后建立大兴集、洋河、耿车、埠子等4个区委36个党支部。全县共有党员604名，是徐海蚌地区党员最多的一个县。1929年3月，发展到6个区委38个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780余名。党

^① 今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所在地。

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县各地。主要集镇都有党的组织。国民党县党部、警察局、学校也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成员。

三、中共沭阳组织的建立

1927年2月，沭阳人孙德培、谢仑仙到武汉参加国共两党合作的党务训练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二人回到家乡沭阳，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真相。

同年冬，沭阳县李恒郑庄人、共产党员郑传诰从上海回到家乡，在附近陈庄小学教书，秘密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在教师中发展秦习斋、郑项志等人加入共产党。年底，在陈庄小学建立中共陈庄小学支部，郑传诰为支部书记。支部有8名党员，隶属于中共涟水县委领导。支部成立后，以《沭阳新声》^①为阵地，揭露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的罪行，传播革命思想，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次年，《沭阳新声》被国民党查封。该支部虽然活动范围不广，只限于陈庄一带，但对沭阳东部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1928年夏，东海党组织派董建华等人到沭阳东乡进行活动，与陈庄小学党支部书记郑传诰取得联系后，商议建党事宜，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此时，分布在沭阳各地的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建立了一批党组织。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中共沭阳特别支部。特支直属江苏省委领导。1928年10月中共淮盐特委成立后，沭阳特支改隶中共涟水县委领导。1929年3月，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的中共东海中心县委成立，沭阳特支又转隶其领导。随着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1929年11月，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撤销沭阳特别支部机构，建立区委组织，共设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城区5个区委，直属东海中心县委领导，共有34个党支部288名党员。不久，徐海蚌特委指示东海中心县委，成立沭阳县委组织。1930年2月6日，沭阳党组织于北龙王庙召开区委书记扩大会议，成立中共沭阳县委，选举产生县委领导机构，由徐通甫任县委书记，徐增修、宋沛然、茆佃才、胡寿彭、于殿桥、徐乃余为县委委员。

^① 由李嘉林、刘葵中、吴谷峰于1927年秋创办的小报。

县委下辖东、西、南、北、城 5 个区委，共有 56 个党支部（小组）519 名党员。

今泗洪县境内时属安徽省泗县。1928 年 3 月，党的地下工作者郭子化（化名李省吾）由江西庐山牯头岭到泗县，不久到今泗洪境内的梅花赵庄、金锁镇白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先后发展党员 270 多人，建立了赵庄、白庙、西朱庄、沙庄、朱集、侯窝、大树梁、乱彭庄、程嘴、朱湖、青阳 11 个党支部。

第二节 中共宿迁组织的初期活动

一、动员支持刀会暴动

刀会是民间封建迷信组织，也是农民自卫组织，清末时传入宿迁地区。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地方为防匪保家，多安堂兴会。青壮农民十分之六七都参加刀会，吞符念咒，习武练功，成为一时风尚。刀会在剿匪治安以及防止散兵游勇骚扰地方诸方面，都曾起过良好的作用。

1928 年 3 月中共宿迁县委建立后，在发展农民协会的同时，加强对刀会工作。少数会首被吸收加入共产党，部分会众参加农民协会，但多数刀会领导权仍掌握在中、小地主手中。他们在反抗国民党苛政上，能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一致。宿迁县刀会数千人曾两次入城示威，要求当局取消苛捐杂税，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伤亡各 20 余人。此后，县警队在古城庵、黑鱼汪、高坎头一带采取报复行动，焚烧刀会活动场所，枪杀会众。各地刀会相约进城报仇。其时，中共江苏省委派员到宿迁县，要求宿迁县委利用刀会举行暴动，占领县城。遵照省委指示，县委书记马仑将大兴地区 20 个党支部和农民协会数千人改为刀会，聘请刀会师傅教习刀法咒语，连夜赶制红、黄兜袋和大刀，武装会员，同时派遣县委委员朱凤章与各路刀会联络。

1929 年 3 月初，宿迁县各乡刀会数万人围攻县城，中共党员沈

光智打着“农民自卫团，解除农民痛苦”的大旗，引导大兴地区刀会赶到县城参战。驻军见刀会势大，以未获“进剿”令为由连夜撤走。国民党宿迁县长童锡坤困守孤城，于5日夜带着县警队逃往徐州。刀会入城后，派员警戒各地，维持治安。马仑与众会首联系，建议共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并派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因会首刘士龙、张汝高等不愿采纳马仑的意见，马仑遂率大兴地区会员撤出县城。在县城刀会暴动影响下，埭子、大同、义勇、皂河、邵店、窑湾等地刀会也纷纷采取相应行动，捣毁当地机关、学校，搜捕有关人员。

因童锡坤出走，国民党宿迁县政权中断。同年4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派刘昌言出任宿迁县长，上任后，即通告禁止刀会活动，并通缉会首。14日，刘昌言率省警队配合驻军孙仲猷团捕杀窑湾会首薛干臣。16日，驻军以借道未遂屠杀皂河会众及无辜男女47人，烧毁民房数百间。19日，国民党宿迁县公安局局长汪公义率警队配合驻军再次到东乡“剿捕”刀会。刀会在老官庙迎战。中共党员马良之、刘兴举、张有万也率领所掌握的刀会参战。刀会从东关口突破运河防线，攻进圩廓，占领闹市区东大街财神庙、鱼市口、财神阁3座炮楼制高点。刀会纪律严明，对居民、店户秋毫无犯，市民、商人主动为刀会提供食品。

4月20日，国民党中央军政部何应钦、朱培德签发命令，电令岳维俊新编第一师及谭曙卿独立第四旅各派部驰往宿睢边境“会剿”刀会。同日，省警队千人赶来增援官军。刀会苦战两昼夜，伤亡惨重，被迫撤往运东。省、县警队乘机出击，在永庆乡追杀会众200余人。刀会暴动遂为国民党当局所镇压。此后，刀会转移至宿迁县南乡埭子、洋河、归仁及东北乡宿（迁）沐（阳）边境集聚。

7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以“清剿”刀会为名率省保安团到宿迁“督剿”刀会，组织团练清乡查户。地主豪绅乘机报复，东平乡团董陈开俊等以共产党组织刀会攻打县城的罪名，控告马仑等人。缪斌率保安团逮捕大兴小学中共地下党员和马仑的父亲马成义等10余人。马仑、秦雅芬、蔡贡庭等中共宿迁县委领导人闻

讯出走，于7月中旬转赴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工作。至此，宿迁县的中共地下活动处于低潮，持续半年之久的刀会暴动被平息。

泗阳县委建立初期，把争取陈润之领导的小刀会作为工作的重点，计划通过争取小刀会暴动拉起武装。小刀会的行动触犯了地痞流氓、豪绅地主的利益，为反动政府所不容。1928年10月，国民党泗阳县政府以“私设公堂，违抗法令”等罪名，秘密逮捕陈润之。陈润之领导的小刀会被镇压下去之后，泗阳县委检讨工作，根据淮盐特委指示，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加强县城及众兴镇的工作；深入南新集及洪泽湖边，加紧组织农民；沿洪泽湖边向东发展，与淮阴党组织取得联系；注意组织洪泽湖边的水巡队；乘小刀会会首被捕的机会，去争取小刀会中广大贫苦农民；整顿西乡原有的散漫组织与徐属地区联系。

二、组织领导农民运动

宿迁地区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在贫苦农民中间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土豪劣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宿迁县委成立后，大兴集一带党组织发展很快，各乡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并进行抗捐、抗税、抗债和反霸、说理等斗争，取得了胜利。1928年前，国民党原先规定地方董事、中小地主占有300亩^①以上土地的，须交纳绅户捐，不足300亩的免捐。1928年3月，当局拟将绅户捐改为普通捐，不论穷富一律按地亩交捐，这就加重了穷苦人民的负担。宿迁县委闻讯后，发动农民协会会员利用逢集在大兴举行千人大会，反对把绅户捐改成普通捐。会后，上千名会员举起红旗，扛起大刀标枪，列队游行，沿途高呼“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国民党县政府慑于农民协会的强大威力，不得收回成命。6月，县收捐委员坐阵大兴催收捐税，农民协会代表与之评理，并用烟袋将收捐委员打伤。收捐委员扬言回县控告，在回县途中又被揍了一顿。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大为震惊。

^① 市制1亩约合666.67平方米。

宿迁县委书记马仑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庶母诨名杨三，个人占有土地 100 多亩，收租、放高利债，盘剥贫民，有些人家被剥削得倾家荡产。农民协会成立之后，马仑首先想到的是革命必须从自家革起，才能取信于民。于是，他要求父母自动减让租息，结果遭到一顿斥骂。农民协会会员孙德祥，因交不出欠杨三的 120 块大洋的“驴打滚”利债，找马仑诉苦。马仑和县委委员马良之等人研究决定，发动四乡农民协会会员，开展一次抗租抗债斗争。1928 年 5 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农协会会员和赤色群众约五六百人涌向马仑家大门前的打谷场上，围成一个大圆圈。这是中共宿迁县委举行的第一次抗租抗债斗争大会，斗争对象是马仑庶母杨三。大会由县委委员马良之主持，马仑第一个登台演讲。他讲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任务，又讲了减租减息的道理。正当贫苦会员揭发控诉杨三剥削罪行时，马仑的父亲马成义气冲冲地来到会场，咆哮如雷地指责农民协会说：“什么农民协会？分明是儿子斗老子的会，我不赞成！”会场顿时沉寂下来，眼看形成僵局。马仑当即向空中鸣放两枪，大义凛然地说：“减租减息是上级指示，违抗就是违法。”接着，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我人认得人，枪认不得人！”马成义只得退出会场。大会通过将孙德祥欠杨三的 120 元利债全部取消，并勒令杨三当场交出契约借据。杨三不敢违抗，答应免息减租。马仑当众宣布：“不论何人，过去所放的利债，今后一律本利无归。”群众拍手叫好，斗争取得胜利。同年夏天，耿车地下党领导小陈庄农民开展抗租斗争。大地主董凤坡等纷纷逃入县城躲避，而派租头臧东五代催租粮。农民协会乘夜将其刺伤。当年农民租粮颗粒未交，斗争取得胜利。埠子地下党领导减租斗争也取得胜利。

大兴恶霸地主、保董马成谦和他的儿子马良凯，凭借权势与农民协会作对，残酷剥削农民。宿迁县委组织农民代表，由马良之带领找马成谦算账。马成谦气势汹汹地说：“无账可算，要算到县政府算去。”马良之组织农民协会会员联名控告马成谦十大罪状。县政府传讯，马成谦不敢到庭，农民代表把他扭送到县里。中共党员蔡贡庭以宿迁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身份，向司法机关提出公诉。于是，

马成谦之子马良凯被拘捕下狱，马成谦在地方上的保董职务被罢免，并赔偿农民协会两支枪、100块银元。事后，农民协会选马俊斋任保董。这次斗争之后，大兴周围的一些保董受到很大震动，害怕农民协会抓他们的辫子，有事就主动找农民协会商量，婚丧大事、土地纠纷等事项都请农民协会会长协助调解处理。农民协会的威信空前提高。

1928年冬，大兴小学教员、中共党员任义才问马仑：“外县农民的事我们管不管？”马仑说：“天下的农民是一家，怎能不管！”于是，任义才就把他表兄王步云在泗阳穿城地主家做长工、年底不给工钱的事说了。马仑拍案而起：“地主老财竟敢这样欺压农民！”当即通知大兴、三庄、陆集、丁嘴等地的农民协会会员，聚集近千人，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带着大刀、镖枪，扛着木叉、扫帚，前往穿城找地主单明志说理。单明志闻讯，惊慌失措，一面托人向农民协会求情，一面在集上的菜馆饭店打炕饼、烧鱼肉招待农民协会会员。经过谈判，单明志当场付给工钱，并向王步云赔礼认错。这次斗争对地主震动很大。大兴地主宋景之不敢向农民催租逼债，还花钱请客，托人向农民协会说情。

1929年，泗阳县发生春荒，饿殍遍野，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而县长万秀岭贪赃枉法，增捐添税，加重农民负担，从而激起民愤。中共泗阳县委组织发动县立高等小学师生及农民群众示威游行，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示威游行队伍进入县城后，贴标语、喊口号，直冲县政府。万秀岭吓得从后门逃跑。第二天，泗阳县委又发动东河滩农民千余人在体育场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贪赃枉法的万秀岭”等口号向县城前进。万秀岭只得同意取消新增加的捐税。不久，万秀岭被迫下野，离开泗阳。在江苏省委的组织发动下，泗阳县委还发动东南区群众反对征工筑路。国民党泗阳县政府建设局长陶兴文决定修筑县城至南新集公路。他强占民田，沿路征工却不付工钱。泗阳县委组织东河滩至李口一带群众80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从东河滩出发，直奔泗阳县城，高呼“打倒陶兴文”“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强占民田”等口号。县政府吓得紧闭城门。斗争

达到预期的目的，县城至南新集的公路最终没有筑成。

1930年春，沭阳灾情严重，农民缺衣少食，难以度日，国民党县政府置农民的疾苦于不顾，反而加重捐税，增收钱粮。中共沭阳县委在全县开展抗捐抗税、不交钱粮争生存的斗争，贴标语，散传单，宣传“穷人团结起来，坚决抗捐抗税”“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各地农民闻风而动，迅速组织起来，驱逐下乡催钱粮的国民党官吏，吓得他们不敢下乡。中共东区区委还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向豪绅地主、富农分粮或借粮斗争，马厂的东南庄、单庄、邱庄、小徐庄、小丁庄，李恒的高庄，太平集附近的大小垛庄、小单庄等地先后发生分粮或借粮斗争。由中共东区区委直接领导的东南庄等的借粮斗争，影响深远。

沭阳县委还积极在学校中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教斗争。1930年春，埝头崇德小学师生在党支部书记吴让领导下，深入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抗租抗税抗捐斗争。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在学校安插侦探，培植反动势力，打击革命师生，破坏学生运动，并企图开除林镜仁、韩秀启等师生。进步师生在党支部领导下针锋相对，举行罢教罢课，迫使校方让步。同年4月，沭阳乡村师范学校教师，在中共城区区委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手拿红绿小旗，沿途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揭露反动当局在教育上的丑态，要求增加教师津贴，进行罢教斗争。城区所有学校教师积极响应，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进行罢课斗争。国民党政府在众怒压力之下，被迫接受要求。城区教师索薪斗争的胜利，对全县影响很大，也为党在城区开展革命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

1930年5月1日，沭阳县委利用马厂街集会的机会，由县委委员宋沛然等领导，组织中共党员和群众数百人，高举扁担，罢市游行。宋沛然当众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团结一致，抗捐抗税抗租。示威群众击退了前去镇压的国民党马厂乡保安队，迫使国民党马厂乡乡长当众答应废除多项苛捐杂税，斗争取得胜利。后被称为“马厂街八百条扁担大游行”。

第三章

土地革命行动计划在宿迁的实施

第一节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三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八七会议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九十月间，江苏省委决定在全省造成暴动形势，领导全省农民暴动，夺取政权。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在苏北酝酿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

1930年1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给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给各县的指示》指出，江苏各县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红军，是最近迫切需要的工作；徐海区内的各县（南宿州、宿迁等地）已有相当的农民武装组织，亦必须很迅速改编其组织，使自卫队、游击队等成为建立红军的基础；集中农民的一切武装组织，而编为红军。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久又制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并把江苏列为争取首先胜利的主要省份之一。6月13日，江苏省委发出第23号通告，即《关于反

军阀斗争运动的通告》，要求徐海、通海两区在以徐州、南通为中心的地方布置暴动，要求徐海区“要极力在士兵暴动和农民暴动中创造红军”，同时要求抓住最成熟的县，如泰兴、如皋、宿迁、泗州等布置县政权的夺取。此后，组建红军活动在宿迁地区开始进行。

6月中旬至7月上旬，省委巡视员阮啸仙到达徐州，主持召开徐海蚌特委会议，听取特委情况介绍。此时，徐海蚌特委决定，在徐海蚌地区组织工农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计划第一师在砀山、萧县、永城等地活动，第二师在徐州、铜山、丰县一带活动，第三师在宿迁、泗县、睢宁一带活动。7月14日，为加强对各地的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领导，中共江苏省委先于全国各省，将党、团、工会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李立三兼任江苏总行委书记。次日，江苏总行委即在上海专门召开“徐海问题讨论会”，决定将徐海蚌特委改组为总行动委员会，阮啸仙任书记。在江苏总行委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徐海蚌特委改为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全力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进行组建红十五军活动。

宿迁县南部与泗县、泗阳交界，被看作是个“四不管”的地方。同时，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区，又有洪泽湖这个天然屏障。虽然这里封建地主势力强大，但彼此各不相顾，而且农民受剥削压迫沉重，反抗性强，容易发动。同时，宿迁县和邻近的宿县地下党的基础比较雄厚，有利于组织和动员群众。因此，江苏省委特别重视组建红十五军第三师，并把宿迁县作为重点暴动区域和红三师的重点活动区域，计划和宿县联手组建红三师。省总行委和徐海蚌总行委的设想是，先在宿县举行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东进，与宿迁、泗县、睢宁的队伍会师后共同组建红三师。

此前的5月，李干成赴宿迁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县委创建红十五军第三师，并策划了马园等暴动。马园一带的地主以买枪防匪为名，要农民出钱，引起农民不满。李干成便与这里的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动农民与地主开展算账斗争，以此为前提组织马园等地的夺枪行动，迅速组织起一支50多人枪的武装，决定在宿南、宿东同时

举行暴动。6月初，李干成领导组织洋河佃农开展麦收斗争，不交夏粮，取得胜利。不久，江苏省军委李宁到宿迁，在佟圩召开宿迁县委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宿迁、泗县等地联合暴动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联合行动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宿迁、泗县地区的暴动工作。会上，李干成宣布决定，以埠子、大兴为宿迁暴动中心区，通过暴动夺取政权，收缴枪支，组建红军武装，会同泗县暴动武装共同创建洪泽湖根据地，并策应各地暴动。

会后，李干成带领县委一班人根据宿迁的实际斗争形势，深入到广大农民中去，帮助建立群众的革命组织，适时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党的组织，努力使宿迁的农民斗争扩大与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阶段。针对宿迁县暴动武装力量薄弱的状况，县委研究决定：一、将马仑组建的40余人队伍和埠子区委委员苏俊廷掌握的一支私人武装统一由联合行动总指挥部指挥，由苏宜年任大队长；二、积极引导农民武装自卫组织，将以雇农、贫农以及乡村手工业者为基础的游击队伍转变为红军；三、吸收农民武装旧武器，如大刀、长矛之类，对于富农、地主的武装采取借或强制借甚至收缴的办法。与此同时，李干成还带领县委同志到洋河等区做好兵变工作，要求以洋河的300人公安队首先发动，夺取县城。

7月初，泗县县委委员郭子化在今泗洪境内的青阳镇北部、金锁镇西南的白庙圩学校召开党总支会议，许采苓、许宝庭、许宝霞等支部书记参加，传达行委指示，布置武装暴动。具体计划是：训练学员学会打枪，筹借枪支弹药，准备红军到来时在小孙圩、白庙子两处暴动。计划确定后，郭子化便由许采兰陪同去黄家沙滩寻找朱铜匠（即朱凤章）。朱铜匠为宿迁县委委员，负责宿迁、泗阳、泗县三县交界地的党的工作，对宿南、泗北一带的地理人情非常熟悉，行委决定由他担任这两县农民暴动的联络工作。郭子化离开白庙后，因小孙圩传言有人要去夺枪，有枪者都欲带枪逃跑。许宝庭等决定立即下手。7月11日早晨，小孙圩青壮年都下田干活了，圩里空虚无备，许宝庭、许宝霞、王金芝带3支短枪，化装成割草的进入圩内。圩主孙祥的儿子孙德益见势不妙，拔腿就朝圩外跑，被许宝庭

从背后一枪打死在圩门外边。接着，暴动队员许宝林、许宝领、许采虹、乔小蛮子、卓小成、孟双成等十几人，迅速拥进圩内，将圩里的枪支和大烟土统统收缴，得枪 11 支。许宝庭等 20 人带着 12 支枪，随即奔赴黄家沙滩，去找郭子化。郭子化同意他们将队伍拉到宿迁，同那里的农民武装会合，等弄清泗县情况后，再定白庙子的工作计划。许宝庭等 20 人到宿迁会合。

7 月中旬，按照上级指示，宿迁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李干成任行委书记，汤涤非任行委总指挥，蔡贡庭为行委秘书。同时成立军委，徐怀云、赵雪门、马仑、汤涤非等为军委委员。根据上级指示，宿迁县与泗县等地联合举行暴动，并成立红十五军第三师，宿迁县行委书记李干成为政委，泗县行委书记丁超伍为师长，由朱凤章、沈光智、苏宜年分任大队长。县行委研究决定：在宿迁南部的洋河、埠子和运东大兴一带同时举行暴动，夺取政权，收缴枪支，扩大红军武装，会同泗县暴动队伍，共同创建洪泽湖根据地，并策应各地暴动武装，伺机攻占徐州。

7 月 22 日，鉴于中共耿车区委委员佟锡金对暴动怀疑动摇，并拒绝将其枪支交给军委使用，军委决定将其处死，收缴其部分枪支。不久，军委负责人带队伍到埠子汤群墙活动，突遭王存江土匪武装包围袭击。马仑、徐怀云、赵雪门等 15 人壮烈牺牲，其中包括从小孙圩到宿迁会合的孟双成、卓小成、王金芝、乔小蛮子等人。

8 月，为组织宿东、宿南同时暴动，宿迁县行委在大兴马庄北松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蔡贡庭主持会议，李干成作动员报告，指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只要把斧头镰刀旗子一举，群众就会跑来跟我们干”，并以各地少数人发起暴动胜利为例，鼓励大家打消顾虑，积极准备暴动。

9 月，宿迁县行委继续领导红三师举行洋河暴动。指挥部先设在洋河北叶庄王兴汉家炮楼上，暴动开始时，指挥部移至吴沟。汤涤非任总指挥，蔡贡庭任秘书，协助李干成起草暴动宣言（内容是仿照长沙暴动的告示）和暴动计划，并草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热烈欢迎工农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等标语，

还赶制了一些红旗。9月5日，洋河逢集。各党支部率领农民协会会员，混在赶集群众中涌入镇内，从四门进镇后，沿途高喊口号“荒年不纳粮”“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洋河十里长街沸腾起来了。正当陆先礼率队在洋河圩内亮刀示威时，国民党区长管伯良（原为地下党员）将其诱捕，获悉暴动计划后，采取了防范措施。午后，国民党卫队赶来镇压，暴动失败。组建红十五军第三师的活动至此结束。

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各地暴动遭到镇压。但在红十五军组建过程中，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地主豪绅，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从而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全国特别是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并为其后全民族抗日战争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泗阳和沭阳的武装暴动

1930年下半年，宿迁地区的泗阳、沭阳县委也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中共泗阳县委成立后，就积极组织暴动。同年2月18日，江苏省委派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张永和与张士操到泗阳指导工作，准备暴动。7月，张永和给省委《泗阳报告（准备暴动）》中说：“现在泗阳县城东、南、西三乡都准备暴动了。武装的数目有三百余支枪受党的指挥。”9月3日，泗阳县委给省委《报告泗字第一号》上分析了泗阳民众的成分：“……以小资产阶级为最多，赤贫农次之，豪绅地主占百分之五、六，赤贫者革命情绪热烈，小资产阶级因受苛捐杂税的剥削，也怨声载道，试图反抗，不过能力薄弱，不敢发作罢了。”同时，对敌方情况也作了分析：“反动政府有保安大队一队，城中住有公安局，各乡各市有公安局分局、支局，但因士兵警士都是招募的，对于反动派倒不十分忠实，只有乡村中的豪绅地主武装充足，统治严紧。”泗阳党组织的暴动准备工作为后来一系

列斗争打下了基础。

江苏省总行委成立后，省以下各地党、团、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相继合并，均相应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本地武装暴动和总罢工的指挥机关。7月中旬，淮盐区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简称淮盐行委）在淮阴正式成立，下辖的淮阴、淮安、涟水、泗阳、盐城、阜宁6县均成立县行委，其中泗阳县行委书记为王沛。淮盐行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全区农民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行委作出《关于在淮盐地区组织八一总暴动的决议》，将全区暴动日期统一为8月1日，因为八一是南昌起义纪念日，同时正值青纱帐四起季节，便于掩护；再则全区统一行动，可以加强各县间的相互策应，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行委决定暴动后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淮盐独立师，江苏省委特派韩训瑞担任淮盐红军独立师师长，万金培兼任红军独立师政委。后因暴动失败，计划未能实施。

1930年7月20日，泗阳县二区（东南区）发生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沈庆成征集“游击队捐”的武装斗争，即“李口暴动”。沈庆成是李口乡八堡村的大恶霸。这年春荒，泗阳县委在东南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征工筑路和向地主借粮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以“防匪”为名，委任沈庆成成为6个乡的游击队中队长，镇压群众运动。沈庆成就任后，假借维护地方治安，征收“游击队捐”，乘机搜刮民财。由于征捐数量大，处于饥寒交迫中的农民无力负担，对沈庆成非常不满。7月19日，泗阳县行委发动群众，举行反对征工筑路游行示威，痛打了筑路监工员。沈庆成和国民党泗阳县公安局接到报告后，准备对群众进行报复。鉴于此，泗阳县行委召开紧急会议，在征得淮盐行委特派员同意后，决定提前暴动，主动向敌人进攻。

7月20日上午，泗阳县行委组织东河滩、龙门、南园、高刘庄等地农民1000余人，手执大刀、长矛和长短枪，以反对征集“游击队捐”为中心内容，以“打倒沈四吹（沈庆成绰号）”为口号，以党员为骨干，以小刀会“亮会”为名，向李口集进军。沿途高呼“反对苛捐杂税”“打倒沈四吹”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队伍行至李口集与新袁集交界处的谭坝村，遭国民党泗阳县公安局长许新猷率兵阻拦，双方成对峙状态。许新猷使出缓兵之计，提出双方派代表谈判。许新猷假意作出让步，答应向县政府呈请减免捐税，暗中却作布置。谈判后，在暴动队伍向北转移途中，许新猷命令伏兵开枪，双方展开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农民武装被迫溃散。当天下午，许新猷率兵抄了泗阳县行委委员、东南行委书记杨述贤等人的家，逮捕暴动骨干若干人，李口暴动失败。

7月22日，国民党泗阳县政府下令通缉泗阳县行委书记王沛及委员杨述贤、金寿春等7人，并把第二区划为赤化区，派出军警对东河滩进行“围剿”。王沛等人暂时隐蔽，泗阳县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0年7月，沭阳县举行了新河暴动与沐城暴动。7月16日，在沭阳县行委与西区行委的领导下，爆发了新河农民武装暴动。事先，县行委与区行委制订了暴动计划，拟分三路攻打新河、施圩、孙圩三家恶霸地主，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暴动当天恰好新河街逢集，上午9时许，在西区行委书记胡寿彭的率领下，百余暴动骨干化装做买卖的样子，在集市上活动。他们冲进新河恶霸胡经国的圩子，当场将胡经国击毙。不到半小时，暴动队伍就缴获长枪十余支、短枪两支，并将胡经国家中的衣服、财物分给农民。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第一次在新河街飘扬。贫苦农民眼见恶霸被共产党除掉，自己又分得地主家财物，人人喜上眉梢，心情舒畅。新河暴动震慑了敌人，附近地主武装前去救援，见农民队伍声势浩大，只好逃跑。攻打施圩、孙圩的两路队伍，因暴动那天雷雨交加，没有听到新河的枪声，同时由于叛徒告密，施圩的恶霸已经逃走，原计划未能实施。新河暴动虽取得暂时局部性的胜利，但暴动队伍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立脚不稳，暴动队伍就撤到地处偏僻的庄庄（今属新沂市），在庄庄竖起红旗，仅坚持两天，即遭反动武装袭击，暴动人员散失。

按徐海蚌总行委的暴动总计划，新河暴动后，沭阳县行委又在8月1日组织了沐城暴动。为加强暴动领导力量，上级派武同儒担任

县行委委员，协助行委书记徐增修实施暴动计划，并确定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城区暴动队伍的负责人和负责联络的交通员。暴动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南关一染坊内，各区联络点设在沭河岸边一棵大柳树下的几只小船上。计划五个区 2000 人枪（东区 1000 人，其他 4 个区共 1000 人）参加暴动。7 月 31 日，县行委委员茆殿才带领东区 100 余名暴动队员，身藏短枪，赶到南关集附近。南区暴动队员已把枪插在柴捆内，用船运到沭河大柳树下；西区、北区到的人较少。各区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活动。但是，在前一天晚上，国民党沭阳县县长黄次山已经从叛徒口中得知有共产党员活动，下令警备大队查获，未达目的，却在回城路上抓住了武同儒等 5 人，他们身上藏有党的秘密文件及宣传品。7 月 31 日晚，国民党沭阳县警备队学兵连中的一个班长（系中共地下党员）又被捕叛变，供出学兵连中的共产党员及沭城八一暴动计划。黄次山得知后立即召开警备队军官紧急会议，决定抓捕学兵连所有成员，并宣布解散学兵连。县警备队内其他中共地下党员见此情况，连夜出逃。徐增修、茆殿才等得知武同儒等人被捕及学兵连内线暴露的消息后，于 31 日夜率队撤出沭城，暴动计划未能实施。

沭城暴动失败后，国民党沭阳县政府加紧反动统治，血腥镇压革命，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两天中，共有 20 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和群众被捕。8 月 3 日深夜，武同儒、江守元等被杀害。这次暴动，沭阳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法开展活动。沭阳革命转入低潮。

第三节 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及其意义

宿迁地区农民暴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壮举，拉开了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共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农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群众团体，壮大革命队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跟党走，闹革命，求解放，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暴动的失败说明了革命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革命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暴动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一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盲目行动，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地暴动是在“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太大，导致暴动失败。二是缺乏群众基础。暴动前虽然做了一些群众工作，但是还远远不够。在举行暴动时，都是党员和少数党外积极分子在孤军奋战，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更谈不上其他革命力量的配合。微弱的力量暴露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又没有广大群众作为后盾，显然是不能站稳脚跟的，更谈不上胜利。三是缺乏严密计划。单凭领导人的一腔热情，仓促上阵，盲目行动，给敌人组织“围剿”赢得了时间。加之缺乏经验，保密不严，情况不明，失去天时地利，结果，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指挥失灵，自惊自散，导致失败。四是暴动的指挥者缺乏军事经验。不懂得农村游击战争与城市斗争的区别，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暴动队伍大多是临时聚集，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暴动发生后，领导者对其发展、巩固成果以及可能失败后退路等无妥善决策。五是叛徒的告密，对暴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尽管暴动失败了，但是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一是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使地主不敢再向农民逼租、要债。二是党员干部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在武装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暴动失败后，有的转入地下，有的转到外地，继续坚持斗争。被捕的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这批骨干成为革命火种，分布各地，为燎原大火增光加热。三是播下了革命种子。共产党员浴血奋战和革命道理的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来的对敌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做了组织准备。

第四章

革命低潮时的斗争和党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革命低潮时的斗争

1930年下半年，宿迁地区各地农民暴动相继失败，各级党组织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境内早期革命转入低潮。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左”的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继续号召各地暴动。1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共江苏省委重新改组。1月30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各中心县委委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以反对“立三路线”为名，提倡游击战争。同月，江苏省委将徐海蚌特委一分为三，设徐州、海州（东海）、长淮（蚌埠）3个特委。宿迁县委改属徐州特委领导，沭阳县委划属海州特委领导。2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对淮盐工作的决议》。省委决定取消淮盐中心县委，其干部分到各县加强工作，并指示淮盐各县党组织必须“彻底改造各县的党”，首先改造县委领导机关，吸收工农干部参加县委，然后逐步改造区委、支部组织。同时，委派夏采曦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出席淮盐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部署和指导工作。4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重新成立淮盐特委，泗阳县委属其领导，县委书记为潘鸿烈（兼）。

一、宿迁县的革命斗争

1930年11月，中共徐海蚌特委陈资平（又名陈治平）到宿迁

县，在耿车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宣布撤销宿迁县行动委员会，恢复宿迁县委，县委书记汤涤非。马仑牺牲后，大兴东平乡恶霸马成谦额首称庆，嚣张异常，伺机反扑。12月，大兴区委马良之、梁大仓等人，为了在县东乡立足，组织党员群众乘夜杀了马成谦。第二天，国民党宿迁县政府派人检验，并实施抓捕行动。党的活跃分子出走隐蔽，马爱亭以“共产党杀人犯”的罪名被通缉。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宿迁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提出以群众要求为中心，结合《苏维埃十大纲领》为号召，领导群众开展一些小型的抗捐税、抗租债、抗拉夫斗争。在斗争中，宿迁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至1931年春，宿迁县委下辖城区、大兴、耿车、埠子、双山、洋河6个区委43个党支部，并确定大兴、双山为中心区委，以推动各区工作。县委活动中心转移到县东南古城山一带。古城山位于宿迁、泗阳二县交界处，离宿迁县城较远，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当地居民多为贫、佃农。古城山党支部有党员20多人，支部书记时俭斋是个开明地主，家有良田百亩，生活较为富裕。县委书记汤涤非一班人到古城山在他家歇脚，由其供应饭食。县委机关设在古城山一座观音庵内。庵里当家和尚孙昌松为中共地下党员。因此，县委印刷的传单，由孙昌松以化缘名义到洋河、大兴、宿城、仰化各处散发。这一时期，县委领导古城山人民开展一些小型的斗争。这年5月，大麦黄芒时期，正值青黄不接，贫苦农民饥饿难忍。县委委员王绍武组织“捋麦队”20多人，到严家地主麦田里捋麦。严家看青的不让捋，被王绍武带人打了一顿。结果，看青的吓跑了，严家8亩大麦穗全被捋了下来，解决了农民燃眉之急。严家地主慑于农民协会的威力，未敢吭声。捋麦斗争取得胜利。埠子、双山等区委也建立类似组织，帮助贫苦农民度过春荒。

1931年4月，中共徐海蚌特委再次撤销，成立中共徐州特委。7月，徐州特委撤销，分别成立宿迁、铜山、宿县3个中心县委。宿迁中心县委辖宿迁、睢宁、邳县3个县委。孔子寿任宿迁中心县委书记兼宿迁县委书记，纵翰民任宿迁县委副书记；县委委员有王绍

武、马良之、许振亚、仝太昆、朱凤章等。中心县委和宿迁县委机关均设在西城门外土圩内。这时，宿迁的斗争环境非常艰苦，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军警经常下乡抓人，地下党员和干部情绪低落，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根据斗争形势，县委将农民协会改称“农会”，并在大兴、埭子、泰山、龙虎山一带，组织短工会、捋麦队，与地主豪绅开展一些小规模的斗争。

1932年7月，宿迁中心县委撤销，孔子寿调离，纵翰民接任宿迁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王绍武、沈光智、仝太昆、马良之、许振亚（兼团县委书记）。县委下辖大兴、埭子、耿车、宿城、古城山、龙虎山6个区委。县委机关设在城西体育场附近。不久，县委改属中共淮盐特委领导。纵翰民以织袜子为掩护，常常肩背褡裢，扮作串馆先生到农村进行革命活动。许振亚以卖毛笔为掩护，在学校开展活动。仝太昆在皂河发展党员，建立中共皂河特支，特支书记唐更生（公开身份皂河小学体育教员），委员有王家品、叶可泽等。不久，唐更生在皂河小学发展党员，成立皂河小学党支部；王家品在王营发展党员，成立王营党支部；曹福珍在皂河镇发展党员，成立皂河镇党支部。特支计辖3个党支部49名党员。此外，驻城的县委委员主要抓城市工运工作。他们秘密组织工人突击队，以搬运工、挑水夫、泥瓦匠、店员为发展对象；又在黄色工会中培养积极分子，组成5人以上革命反对派，建立赤色工会小组，并在国民党县警察大队发展成海滨加入共青团。由保卫团教官黄一平和仰化公安分局局长朱宗敬（均为地下党员）等人负责兵运工作。驻农村的县委委员主要组织雇工会与抗租抗债抗捐委员会。大兴、泰山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还开展了秋收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二、沭阳县的革命斗争

1930年八一暴动失败后，沭阳县行委针对失败后的严峻形势，在郑庄召开紧急会议，具体研究下阶段斗争部署：认真对党员、团员进行形势、前途教育，鼓励其斗争积极性；县、区行委机关迅速转移，防止敌人破坏；凡活动较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工作地点；活动方式应改为隐蔽式的斗争。这次会议对于尽量减少党的损失起了

一定作用。

1930年10月，沭阳县行委撤销，恢复中共沭阳县委。1931年海州特委成立后，为了更快地恢复沭阳党的工作，特委即派朱秋白到沭阳检查工作，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出沭阳县委前一阶段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犯了一些错误，如在发展党员上走上层路线，盲目搞城市暴动，党团不分等。同时改组沭阳县委，指定宋沛然为县委书记，徐增修改为团委书记。同年4月，海州特委为加强沭阳党组织的领导，指派姜大化为沭阳县委委员，并从东海调徐润斋到沭阳任县委委员，兼团县委常委。

在白色恐怖环境中，沭阳县委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党的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仍坚守在本地，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开展艰难的斗争，重点是准备暴动。

八一暴动失败后，在险恶的环境中，沭阳县行委继续带领全县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决定继续做好敌军士兵工作，准备新的士兵暴动。中共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民党驻沭部队第二十七师某部活动，进行革命宣传，为举行士兵暴动做好准备。1930年9月，正当准备发动兵变、举行全城暴动时，又因士兵中出了叛徒，暴露了计划，暴动流产。

沭阳县委贯彻海州特委关于加紧年关斗争的指示精神，决定由南区区委在赵庙开展抗捐抗税和抗债斗争，并举行暴动。1931年1月下旬，在南区区委领导下，百余农协会会员集中起来举行暴动。因泄密，国民党沭阳县、区队早有准备，联合几处地主武装共同行动，疯狂反扑，斗争队伍被驱散。1932年3月，沭阳县委在宋庙秘密集会，发展组织，训练武装，组织一支50多人的徐海区红色游击队。他们活动在葛巷、宋庙一带，砍电杆，拆电线，收缴地主枪支，支持农民搞借粮斗争，给地主以沉重的打击。一次，游击队策划夺取地主宋方吾家的枪支，准备暴动，由于当地一地痞告密，国民党沭阳县警备队出动一个连的兵力，联合地主武装进行镇压。暴动再次失败。

沭阳县委根据上级“布置春荒斗争，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分粮”

的指示精神，在全县发动贫苦农民分地主粮食以度春荒。1932年春，共产党员徐润斋领导李恒农民向地主借粮，陈文祥带领地主武装镇压，双方进行激烈的斗争，终因力量悬殊，借粮斗争未能获胜。同年6月，东区党组织领导马厂、李恒一带农民，强行收割地主小麦，夺回劳动成果。这一斗争显示了群众的觉悟与力量，在全县颇有影响。

1934年9月，东区区委委员武传贤叛变后，在国民党沭阳县调统室当特务。一天，受特务机关派遣，他到连五庄进行破坏活动。武传贤叛变早为连五庄党支部所掌握。当晚，连五庄党支部党员把武传贤引到连五庄西北角500多米地的坟地处决。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公函：“兹派武传贤先生前往各地逮捕共产分子，各地军政当局，必须全力协助。违令者按军法处治。”落款为“中国国民党沭阳县调查统计室”。严惩叛徒，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三、泗阳县的革命斗争

1931年4月，孙耀宗在海州被捕，10月2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镇江火车站附近，时年21岁。5月，泗阳县委组织部长、城区区委书记谢楠和许宝庭遭敌逮捕，东南、城区区委解体。1932年7月，县委书记潘鸿烈调淮盐特委工作，陈亚昌调任县委书记。全县只剩下零星支部，较有影响的有黄道口、南新集、袁集、东河滩、营门口、王集等支部，另外，城里还有狱中支部，五里渡有个别失掉联系的党员。泗阳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1933年秋，全县只剩下一个王集区委，下设南王庄、张大南庄、小周庄、魏圩4个支部。王集区委一直坚持到1934年夏解体，但县委书记姜大化、淮盐特委特派员王国平仍在王集活动。姜大化负责张大南庄，王国平负责南王庄，王业奎负责魏圩等支部，开展抗租抗暴等斗争。

斗争转入低潮后，泗阳党组织主要开展了组织“红军之友”、支持南新滩小刀会暴动等斗争。1931年秋，泗阳县委曾派蔡兆奎等党员打入成子湖上国民党泗阳水上派出所，任派出所巡官，搞“红军之友”。这个派出所七八个人，表面上看是国民党的机构成员，但实

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的武装队伍。1932年1月，县委又派蔡兆奎、葛华章等人打入运河线上水上保安团，蔡兆奎任团副，葛华章任党支部书记。水上保安团共计三四十人，枪支大都掌握在地下党手里，武装训练，筹集资金，为地下党所用，一段时间，搞得有声有色。1933年8月，水上保安团受“乔翠礼事件”影响被迫解散，蔡兆奎等人身份暴露出走。乔翠礼，绰号“乔大头”，是泗阳地下党县委发行员，打入国民党内部，任国民党泗阳县党部常委、国民党县报《电波日报》记者。1933年8月，乔翠礼经不住国民党泗阳县党部的利禄引诱，与国民党泗阳特务室相勾结，准备出卖地下党。他在水上保安团扬言：“如果小黄（潘鸿烈）再到泗阳，我一定叫他在《电波日报》上认识我。”泗阳县委根据乔翠礼的言行表现，认为他对党组织有极大的危害，经请示淮盐特委书记陈霞林后，决定成立红色特务队严惩叛徒，由夏如爱、蔡兆奎等人秘密将乔翠礼处死。8月24日，夏如爱把乔翠礼引至五堆头芦柴地，蔡兆奎亲自用手枪将乔翠礼打死。乔翠礼被杀的消息轰动泗阳城，群众传言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当时，国民党泗阳县长陈维俭认为蔡兆奎“无党无派”，决定由他负责破案工作。蔡兆奎出走3天后，被陈维俭召回“破案”。蔡兆奎受命后，意志脆弱，恐真相暴露，再次出走，引起国民党泗阳县政府的怀疑，遭到通缉。蔡兆奎等人多次出走，给敌人以把柄，这是水上保安团被“围剿”的直接原因。

1934年春至1935年初，泗阳县二区及淮阴县二区小刀会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以反对“土地升科”名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暴动。所谓土地升科，就是官府把新滩湖一带已转让或仍为地主、农民占有的土地一律按亩议价，由官府出面变卖，立契约，盖官印，成为死契。官府收取“升科”费用，从中渔利。1933年，为了筹集导淮款，国民党导淮办事处把“升科”提到议事日程。由于害怕经济上受损失，官僚地主以及一些中小地主、占有土地的农民都反对“升科”。1934年春夏之交，导淮办事处动员民工准备工具、粮草，由区长带队、乡保长上阵开始导淮。导淮伊始，泗阳二区东南部、淮阴二区西南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国民党派系斗争，支持小刀会

上千人以反对土地“升科”名义组织示威游行。小刀会行动得到了地主及占有土地的农民支持，一些地主武装也乘机混进小刀会阵营。10月，泗阳国民党以周化鹏为首的“周派”掌权，以陈如翼为首的“陈派”失势，“陈派”下面人物吴卫久等人，为了嫁祸“周派”也暗中为小刀会助劲，以图东山再起。小刀会的武装抗争为国民党所不容，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立即派保安团镇压。保安团与小刀会多次在废黄河边激战。国民党泗阳、淮阴县政府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调集武装，协助省保安团“会剿”。1935年1月19日，省保安二团及泗阳、淮阴二县的地方武装与小刀会在南新集附近激战，暴动队伍击退了泗阳警备队两个连。国民党泗阳县政府认为用硬的不行，便采取“安抚”的办法，把暴动责任统统推到吴卫久等人身上，并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指出吴卫久、陈佩华（大地主）是这次小刀会暴动的总祸根，是由他们两人操纵的。县长董辙根据“周派”开列的名单，报请省府，经批准通缉吴卫久、陈佩华等20余人，其中也有个别农民会首。小刀会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制止了土地“升科”。

四、泗洪县的革命斗争

1930年10月，今泗洪县境内暴动相继失败后，国民党泗县县长张海舟乘调走之机，向在押人员敲诈勒索，中共党员万方毅、徐蔚农等人花钱出狱。万方毅出狱回家后，被董事黄尚达严加管制。万方毅等人就借了几支枪，利用大年初一之夜，杀向黄尚达家，黄尚达被砍了一刀，打了一枪，躺在地上装死。万方毅等人走后，黄尚达被抬到泗城医治，伤好后更加为非作歹，带人抢收农协会会员家的麦子，晚上住在姘头家。万方毅又组织8个人躲藏在附近，等黄尚达到达时将其处决。

1931年5月中旬，党的地下组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农民武装，从金锁镇出动攻打罗岗，打伤打死民团数十人。国民党派军队镇压，农民武装失败。同年春，中共江苏省委派省委巡视员刘瑞龙在临淮关指示魏紫波返回泗县，同王亚箴、张元才、魏尚芝等人恢复党组织关系。1932年，因叛徒刘小平告密，王亚箴被捕，押

送南京，经营救出狱后，恢复了界沟支部，王亚箴、丁珍为支委。1935年夏初，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其三伯父郭春海带着他的亲笔信，到白庙取得联系后，住在许宝庭家。从此，白庙地区革命形势好转。不久，许宝庭去枣庄向郭子化汇报白庙地区情况。同年秋，白庙地区恢复党的组织，许宝庭任支部书记。被恢复组织关系的有许采苓（后叛变）、许宝新、王馨芝、许宝霞等人。到1936年，恢复和发展党员有许宝玉、许保松、叶立俊、王香之、王若安、王绍之等人，许宝新为支部书记。

第二节 党的深远影响

1932年下半年始，在残酷的斗争中，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叛徒的出卖，以及特委和县委领导班子不稳定等原因，宿迁地区各县县委和基层组织先后遭到破坏。

1932年8月，省委军委书记陈治平调任河南省委书记。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自首叛变。11月，省委巡视员陈伯阳在上海被捕叛变。此二人熟知淮盐地区中共组织情况，其被捕叛变给淮盐地区党组织带来破坏，淮盐地下党面临着空前困难。1933年2月，淮盐特委与省委失去联系，特委书记王伯谦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因陈伯阳出卖被捕。之后，淮盐特委进行改组，由陈霞霖任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委员有宣传部长潘鸿烈，农委谢鹏飞、张云飞，巡视员沈亚平等。特委下设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宿迁和盐阜6个县委。其中泗阳县委书记陈亚昌，宿迁县委书记纵翰民。同年11月，淮盐特委书记陈霞霖受组织委托，到上海找省委时被捕。赵心权联络陈亚昌、沈亚平、沈肇华等人，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建淮盐特委，赵心权被推选为特委书记，委员有组织部长沈亚平、宣传部长陈亚昌、秘书沈肇华。此时，淮盐特委辖涟水、淮阴、泗阳和海灌漑4个县委。

1932年春，宿迁私立中学校长季梦九在镇江创办华东职业中学，私立中学党、团支部成员一起转往镇江。同年冬，学生党、团支部的地下活动被国民党镇江当局察觉。教师陆露鸥（特支书记）、学生王亚珍（特支副书记）被捕叛变，华东职业中学党、团支部全遭破坏。陆露鸥、王亚珍叛变后，被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派到宿迁充当特务。1933年5月，中共宿迁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许振亚被特务王亚珍诱捕。许振亚被捕后叛变，出卖全体县委委员和各区委员及城内党员50多人，致使宿迁县委书记纵翰民，县委委员沈光智、全昆山、朱宗敬、成海滨等先后被捕。同年春，皂河特支书记唐更生召集党员学生秘密集会，筹备枪支，准备暴动。因消息泄露，唐更生被国民党宿迁县党部逮捕。皂河小学党支部遭到破坏，继而皂河镇、王营两个党支部也遭受破坏。之后，国民党宿迁县党部成立肃反办公室，相继破坏各区委，并在共产党活动活跃地区举办“自首人员训练班”。至1933年年底，宿迁县有党员800多名，向敌自首的有200多人，为形势所迫而脱党的有400多人，还有部分党员逃往外地或在本地隐蔽下来。

在沭阳境内，沭阳县委书记宋沛然于1932年10月调动工作，不久在镇江叛变。国民党江苏省特务机关任命宋沛然为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主任，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疯狂破坏海灌沭地区党的组织。1933年春，姜大化任沭阳县委书记。5月4日，中共海州特委宣传部长刘秀文在沭阳东乡被捕叛变。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海州特委书记曹苏、委员孔照明等相继被捕。海州特委机关被破坏。6日夜，宋沛然等在海州国民党四县中心特务室直接指挥下，到沭阳城区抓捕30多名党员，城区区委遭受严重破坏。7日晨，国民党地方武装分几路包围东区的秦庄、孙洪、汤涧，搜捕共产党员，秦习斋、司干卿、郑传诰等数十人被捕，东区区委又遭严重破坏。不久，徐增修、于殿桥等于北区被捕，北区党组织遭受破坏。此时，县委书记姜大化调离沭阳，赴泗阳县任县委书记。至此，沭阳无人接任书记，县委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同年10月中旬，鉴于海灌沭地区党组织严重受挫的情况，淮盐特委派陈亚昌到东海、灌云、沭阳三县做党的恢

复工作，成立中共海灌沭县委，陈亚昌任书记。1934年1月，陈亚昌调到淮盐特委工作，陈书同任海灌沭县委书记。叛徒李树汉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委任为沭阳县特务室主任后，疯狂破坏沭阳地下党。此时，沭阳仅剩东区、南区、西区3个区委，14个党支部，百十名党员，而且组织很不健全。至年底，沭阳只剩下西区区委。

在泗阳境内，1931年5月25日，县委委员谢楠、许宝庭被敌逮捕，泗阳党组织自此不断遭到破坏。1933年上半年到1934年初，在国民党“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城区刘华、孔祥和等人向敌自首，供出同志。1934年夏，团县委书记卢士元被捕叛变，出卖王集区委，城区、洋河、王集等地党组织遭敌彻底破坏。1935年夏，县委书记姜大化被捕。至此，除少量党员隐蔽或外出，被捕自首和自动自首人员200余人，全县党组织停止活动。地下党员自首后，受到国民党特务室控制，国民党泗阳县特务室将自首人员按家庭住处编成自新小组，小组之上再设中心组，要自首人员学习所谓“三民主义课本”，定期汇报思想情况，揭发尚未自首人员。1936年2月，迫于形势，自新小组解散，但特务室负责人孟祥祯仍把自首人员组织起来，成立所谓“中国国医针灸研究会”，以“研究会”为名，继续开展“自新”活动，直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才解散。

在各县党组织遭到破坏期间，曾发生对宿迁地区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潘鸿烈“通共案”。潘鸿烈是涟水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涟水县委委员，淮盐中心县委、淮盐特委、淮扬盐特委宣传部长兼中共泗阳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6月，潘鸿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办理了自首手续，充任国民党淮安县特务室主任。然而，他认为在思想感情上并未同共产党彻底决裂，仍然留恋地下党的组织，希望与党取得联系。他还散布了“在革命低潮时被捕投敌，掩护党的组织，保存干部，到革命高潮到来时，则又起而革命，革命的本质不变”等“假自首”理论。自首后，潘鸿烈等曾给淮盐特委写信，并先后与特委秘书沈肇华、特委书记赵心权取得联系，给特委送情况，及时提供敌人要破获涟水党组织等消息。潘鸿烈还利用自己的影响，找机会与一些自首分子、特务分子谈话，

使他们不为敌人工作。在其影响下，确实有一些特务整天“混”日子，使一些地方的特务工作进展不大。而对于自首叛变人员中积极反共的反动分子，潘鸿烈等人与特委取得联系，实行镇压。他们和特委派来的人员协作，处决了叛徒李步雅和杨士发。处决李步雅后，潘鸿烈曾赋诗说“慷慨歌淮上，从容捉叛徒。无钱乘驷马，来去一条驴”，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为党除害的心情。1934年夏，共青团泗阳县委书记卢士元在被捕后，当即供出淮涟一带特工搞“假自首”的真相。潘鸿烈等人“假自首”言行，也遭到一些人的告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省特务室在得到潘鸿烈“通共”报告后，于同年11月逮捕潘鸿烈等20多人，潘鸿烈对“假自首”言论供认不讳。1935年8月中旬，潘鸿烈等4人在镇江北固山被枪杀。在走向刑场时，潘鸿烈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潘鸿烈“通共案”，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里，发生的一件十分复杂的事件。潘鸿烈等“假自首”后，虽然做了一些对党有益的工作，但客观上对革命造成很坏影响。尤其是潘鸿烈散布的“假自首”言论，蒙上了一层“革命哲理”的色彩，曾经使包括宿迁地区各县在内的淮盐地区许多党组织及赤色群众错误认为特委、县委领导人均能自首，下属自首则更无问题，因此纷纷自首。这是宿迁地区党组织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宿迁地区党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党的影响是深远的，共产党的主张深入人心，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为了谋求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深深播种在宿迁人民心中。1933年6月，宿迁县皂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地下党员叶可泽到上海寻找党组织，1936年夏被捕，关押在镇江监狱。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经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保释出狱。回乡后，即往延安寻找党中央，中途因战火受阻，未能如愿。后与山东临、郯一带青年救国团取得联系，在皂河开展抗日宣传，组建青年抗日救国团和抗日自卫队，为皂河地区建党、建军做出一定贡献。

1933年年底，宿迁县党组织被破坏后，县委委员朱凤章到泗县开展隐蔽斗争，在杨景庄、黄沙滩、白庙等地发展党员，成立党支

部。1935年，白庙支部与苏鲁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取得联系。宿迁师范学生肖朴，目睹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捕，激起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慨，在教师沈新萍及左翼作家张天翼、黄源、葛琴的启发影响下，于1936年在宿师成立“左翼文学小组”，以研究新文艺为名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该组织后来发展到30余人，为宿迁抗日救亡运动培养骨干力量。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们有的在地方拉起武装，组建抗日团体；有的寻求革命真理，前往山东岸堤参加共产党创办的军政干校学习，成为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武圩人武海峰与地下党员刘颖生始终保持联系。在党的影响下，武海峰满腔热情，立志报效祖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毁家纾难，卖地买枪，武装群众，成立抗日自卫队与日伪顽固派开展斗争。

第二编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章

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第一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荷枪实弹在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防区内河北宛平县城东北的龙王庙一带举行挑衅性“演习”。深夜11时，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正交涉期间，日军即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民族危亡严重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两党结束长达十年的敌对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宿迁地区分属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运河为界，沭阳县全境、运河以北的泗阳县境以及运河以东的宿迁县境，属淮海根据地基本区；运河以南的泗阳县境、运河以西的宿迁县境以及今泗洪县境内，属淮北根据地核心区。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当天即派飞机18架次轮番轰炸宿迁县城，使宿迁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宿迁县党政机关迁到郊区农村。11月中旬，日军富永旅团约3000人由徐州沿海郑公路东犯，企图进占宿迁县城，遭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一九八团刘振璜部顽强抵抗。宿迁县城沦陷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在宿迁地区抗击日军近百日，在宿城、洋河、罗圩等地给日军

以沉重打击。其间，第六六七团团长、共产党员万毅率部驻泗阳临河期间，曾以新兵队的形式开办秘密学校，为地方培养抗战人才。同年夏，驻防沭阳城北章巷的国民党五十七军一师师部秘书、中共工委书记王维平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动员和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去鲁南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并组织章巷的章维仁等进步青年，建立抗日民众自卫组织。1939年2月下旬，第五十七军奉命移防淮阴，泗阳、沭阳相继陷落，整个宿迁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把侵华主力转移到敌后战场并大量扩充伪军，发展伪组织，推行伪化政策，企图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方针。此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和积极反共方针，于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具体政策，其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随之掀起反共高潮，发动对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抗日武装的进攻，残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因此，地处敌后的宿迁地区处于敌、伪、顽的严重夹击之下。1937年12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从镇江移驻淮阴（今淮安市）。此后，韩德勤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理主席（1939年冬任省政府主席）和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打击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众组织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加剧对这个地区的统治。除了强化政权组织外，着重整编各地自发的游杂武装，当时国民党在苏北的全部武装号称10万人，实际不足7万人，计有第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以及保安第七纵队和各县常备大队，其中一些爱国官兵虽也曾奋力抵抗过日军的侵犯，但总体上在蒋介石片面抗战的方针指导下溃不成军，致使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同时，韩德勤的家乡泗阳等地又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多年精心经营的“模范区”，国民党反共势力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基础。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汉奸郝鹏举为首的伪淮海省政府在徐州成立，在淮阴亦成立了伪苏淮特区专员公署，并在沦陷区相应建立县、区、乡、保、甲的伪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宿迁地区人民的处境更为险恶和困难，敌、伪、顽的严重夹击，就成为抗战初期宿迁地区斗争

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节 日军入侵的暴行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魔爪逐渐伸到宿迁的大地上。1937年9月17日，日军一架侦察机在宿城上空出现；1938年5月，相继出动飞机轰炸宿城及今泗洪境内的双沟和泗阳里仁。日军第十二军二十一师团主力占领徐州后，续向宿迁地区侵犯，于1938年11月22日攻陷宿城。后向沭阳、泗阳进犯，于1939年2月27日和28日相继侵占沭城和泗阳县城。至此，宿迁地区各县城相继沦陷。至1945年8月，日军在宿迁地区犯下了累累罪行。

一、狂轰滥炸不设防的城市和乡镇

1938年5月19日，日军出动18架飞机轮番轰炸宿城，并投掷燃烧弹64枚，大火烧了3昼夜，烧毁火神庙到西堤、东大街中市、鱼市口、竹杆街、草园拐、东西马路口、凤凰墩、书院前后、西炮台附近共十片，受灾1000多户，烧毁民房6000余间，死伤20余人。同年5月，日军出动飞机6批11架次，轮番轰炸古镇双沟，投掷炸弹、燃烧弹数百枚，炸毁民房600余间，炸死炸伤多人。5月30日，日军飞机轰炸泗阳里仁，炸死炸伤居民30人。1939年2月27日，日军5架飞机轰炸泗阳县城中小学、周家槽坊等处，死亡居民19人。同日，日军9架飞机轰炸沭阳县钱集，死伤民众41人，毁民房30余幢。同年4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沭阳县丁集，死伤10余人。1943年2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里仁、丁集、松张口、前庄圩四处，投弹数10枚，死伤10余人。

二、血腥屠杀平民百姓

1938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宿迁县城后逢人便杀，300余人被杀，皆为贫病老弱不能逃避者。12月1日夜，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反攻入城，日军逃走。第五十七军当夜退出，日军次日入城，挨户搜查，逢人便杀，历时3日。后经教会红十字会恳求，日军才停

止杀戮。屠城中女尸多赤身，被奸后仍不免一死，婴幼儿或是被摔死或是被劈成两半，后经清理，发现被害者尸体4000多具。同年12月12日，日军强攻宿迁县埠子集，受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痛击，当晚退去。后第五十七军撤退，圩内群众恐日军再至，皆乘夜外逃，仅老弱病残者守家。15日，日军复至，自北门进入逐户搜查，见人即杀，共搜杀69人。南门蒋姓老母，年85岁，也被刺死。1939年2月25日，日军约200多人侵入宿迁县曹集乡刘圩村，从村西头杀到东头杀死70余人。同年3月10日，日军在行军途中发现少了一个士兵，就折回路过的沭阳县汤涧街，把没来得及逃走的群众围在一个院子里进行屠杀，16名无辜百姓当场死亡。1940年9月16日中秋时节，日军十三旅团一部伙同伪军400人，从盱眙乘汽艇50多艘袭击双沟镇，制造骇人听闻的“双沟惨案”。据统计，双沟惨案中被杀害同胞550多人，被奸淫妇女20多人，被烧毁房屋3800多间。1943年3月17日，日军从沭阳出动，向北裴圩、张圩一带“扫荡”，杀死百姓80余人。同年9月20日，日伪军包围沭阳塘沟，屠杀70多人。

三、野蛮残暴烧村毁城

1938年11月26日，日军攻占洋河镇，进圩后到处纵火，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镇西门大街、南门米市等地一片焦土，经营几百年的老字号福泉等槽坊被毁，锡制的酿酒甄被烧化，盛酒容器烧炸裂，老字号胡家油坊也被烧成灰烬，共烧毁房屋990余间。经此浩劫，洋河镇经济萧条，元气大伤，多失去生产能力，全镇商业、服务业十之存一。1939年1月22日，日军侵入宿迁县农村集市卓圩，残杀未及出逃的20多名群众，撤退时一面搜杀凌辱未逃走的群众，一面用当地居民家玉米杆捆成一束束火把浇上煤油，挨门逐户点火焚烧，200多户人家所有民居、商店尽毁。同年11月28日，日军“扫荡”宿迁县大兴集，烧毁1000余间民房。1941年前后，日军多次“扫荡”宿迁县仰化及周围村庄，前后抢去粮食70吨、小鸡1781只、肥猪53头、羊142只、牛驴80多头、衣服1090余件，烧毁房屋百余间。1944年1月22日至23日，日军在淮泗县从陶圩开

始焚烧村庄，沿途向南烧了 102 个村庄，约 40 千米长。卢集、小王集、裴圩、黄圩、顺河集 5 个集镇被烧得地塌土平，被烧被抢财物、被抢虏的牲畜无法统计。1944 年 3 月，日军向泗阳南部“扫荡”3 天，从曹庄向龙集、界集一带纵火，直烧至尚嘴，火烧泗阳南乡 20 多千米，烧毁村庄数十个，上万人流离失所。

四、实行法西斯式暴力统治

1938 年 11 月 22 日宿迁县城沦陷后，日军少将富永所率前哨部队一个旅团 2000 余人首批侵入县城，其部队又名“烧杀队”，所至之处推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入城的还有由日军骨干分子组成的宣抚队（又称新民会）30 余人。1939 年 3 月，日军富永旅团南侵，由日军土师大队接防，另有宪兵队数十人驻城。1940 年，日军两个联队先后驻宿迁县城、中运河线及宿新大路。1941 年先后调走，由日军土福中队至县城接防。1942 年，日军高桥大队接防，300 人驻县城，200 人分驻洋河、新安镇（今新沂市）。1944 年，日军竹下中队接防宿迁县城，5 月调离，后滕元中队接防至逃走。

日军在宿迁地区极力推行其“以华治华”侵略政策，侵占宿迁县城仅 5 天时间，就成立伪复兴会，陈亚平（又名陈靖）任会长、邱丽堂任副会长。后由陈亚平保荐原旧商团队长徐善东（又名徐壁巨）任伪复兴会副会长。1938 年年底，改复兴会为治安维持会，委徐善东为会长。1939 年 6 月，伪维持会改名伪县公署，徐善东充当伪县知事。伪县署下设秘书兼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在宿迁县设 8 个伪区公所，各设伪区长、伪区团长。1942 年，伪淮海省成立，下分行政区，伪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设在宿迁县，辖宿迁、宿睢、邳县三县。1945 年年初，在宿迁县设伪第四绥靖公署，伪专员张奇兼任伪中将指挥官，统辖宿、睢、邳三县县总队。各级伪政权替日本侵略者推行保甲制度，并征粮、征税和搜刮军用物资，为日军强化治安管理和“以战养战”政策服务。

自 1938 年 11 月日军攻陷宿城至 1945 年 8 月逃离，宿迁地区大部分地区被日伪统治达 7 年之久。日军占领期间，杀人、放火、奸

淫、抢掠，无恶不作，大量平民百姓被屠杀，人民财产遭到掠夺、抢劫，损失惨重，宿迁人民遭受有史以来最深重的灾难，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而严重倒退。

第三节 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宿迁地区反日斗争异常活跃。宿迁县各中等学校（宿迁县县立师范学校、新生中学、崇实中学、省立宿迁中学等）及小学高年级学生，联合组织宿迁县学生反日会。在学生反日会统一组织领导下，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检查组，按片分段，进行街头宣传，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反对不抵抗政策，提倡使用国货，反对贩卖日货，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9月22日，在中共努力之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0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在徐州成立，李宗仁任司令长官。11月，李宗仁在徐州建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并任主任。徐州总动委会对苏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新形势下，宿迁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出现良好势头。一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当局囚禁的共产党员陆续出狱，在外地读书、工作或当年避难出走的共产党员和有识之士也纷纷重返家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络一些学生和进步青年，在各县主要城镇以及农村，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这些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标志着宿迁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初步形成。

此时，部分外地抗日救亡团体也到宿迁地区开展活动。1937年9月，刚刚改编的八路军某部南下宣传队（代号兰苏维）到宿迁县，散发《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共中央文件和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受到宿迁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12月，上海国民救亡歌咏会宣传二队的冯国柱、陈飞等，与如皋话剧团的俞铭璜等人会合，以上马台、汤沟（抗战时期属沭阳县）一带为基地，组成抗日巡回宣传队，由冯国柱、陈飞任正、副队长，先后演出《血战卢沟桥》《宛平战斗》等剧目。1938年4月，荣千祥（荣高棠）带领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到宿迁县宣传演出。他们积极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宿迁人民的爱国热情。

一、宿迁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宿城青年教师张一平、陆海川、倪培修、蔡西野以及学生肖朴、黄石奇等，满怀抗日救国激情，自发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党的抗日政策，讨论宣传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具体办法。他们利用课堂阵地，慷慨陈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青年学生抗日热情，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从上海回来的爱国青年许里人，在《宿迁日报》发表文章，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激起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报国杀敌的决心。张一平编印了《抗敌吼声》救亡歌曲集，在宿迁县广泛传唱。

1938年1月，徐州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派权翊庭到宿迁县筹建组织动委会，并与肖朴、许里人、倪培修、蔡西野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工作。不久，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又称徐州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国民党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的身份，利用与宿迁县长黄晋珩（黄楚白）的同学关系，派中共党员于化琪出任宿迁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即民政科），负责动员群众抗日工作；派中共党员谢光亚出任县大队参谋长，负责发展民众抗日武装。于化琪到任后，一面倡导组建抗日救亡团体，武装群众抗日；一面广泛接触青年，对其前一阶段抗日宣传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不久，宿迁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县长黄晋珩兼主任，于化琪为副主任，肖朴、黄石奇、许里人、蔡西野任指导员。接着，成立宿迁县民众

抗日自卫总队。各区、乡（镇）分别成立大队、中队。县总队派军事人员担任区、乡（镇）自卫队教练，学习军事操典，练习射击投弹，后请动委会成员去各地培训，民众抗日情绪很高，自卫队活动一时兴盛。台儿庄战役期间，自卫队员参与抬担架、运送物资等活动，同时维护地方治安。

4月，经徐州总动委会秘书、中共党员郭影秋安排，以荣千祥（荣高棠）为团长，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到宿迁县演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多场街头剧和话剧，并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张一平、倪培修、许里人、黄石奇等人，同剧团成员杨易辰、庄璧华、徐文烈、陈荒煤等多次座谈，研究抗日救亡问题，交流活动经验。在移动剧团的帮助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宿迁小组成立，由张一平任组长，成员有肖朴、倪培修、许里人、蔡西野、黄石奇、肖明等。后从第五战区抗敌剧社回来的陆海川，也参加了民先队小组活动。由于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公开进行活动，因此，他们酝酿拟以民先队为基础，组成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以便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剧团的影响以及于化琪的支持帮助下，5月2日，宿迁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成立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青救会章程”和“青救会工作纲领”。大会推选陆海川为会长，张一平为组织部长，蔡西野为副部长，倪培修为宣传部长，许里人、黄石奇为副部长。青救会的干部都是民先队员，在中共党员于化琪领导下开展工作。自此，宿迁县青年救国工作，由无组织进入公开和有组织活动阶段。接着，宿迁县青救会皂河分会与堰头分会相继成立，叶可泽、郭翰分别为负责人。马良骏、周化龙、张一秀、陆裕民、杨静泽等分别在月河、大兴、埠子、县中成立青救会小组。青救会员发展到200人左右。

青救会成立后，各项活动迅速在城镇各地展开，声势很大，影响很广。首先是开展读书活动，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著作，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阅读

《新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与《抗战》《群众》《解放》等进步报刊，定期举行座谈会，研讨革命理论，分析抗战形势，谈论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加强学习指导，用革命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的主张及其方针政策武装会员思想，提高政治觉悟，鼓舞抗日热情，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其次是通过出壁报、编会刊开展抗日宣传。壁报每周定期在四城门和财神庙张贴，会刊名称《尖兵》，为油印16开本，不定期。壁报图文并茂，吸引各界人士围观。一次，在南城门壁报处，驻宿国民党五十七军两个军官看后很受感动，主动到青救会找负责人谈心，鼓励他们“认真办下去”。除了壁报之外，还经常举行漫画展览。张一平、倪培修、许里人都擅长绘画，他们便利用漫画描绘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场面和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很受群众欢迎。再次是通过演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宣传。在青少年学生中选拔人才，成立剧团，组织歌咏队，常在晚间利用广场演街头剧、活报剧或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歌曲广为传唱。还经常在街头、广场或剧团演出之前，请于化琪或青救会领导成员向群众作演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分析战争形势，传播胜利消息，鼓舞群众情绪。

5月19日，日本飞机18架次轮番轰炸宿迁县城后，社会秩序大乱，城镇居民早出晚归到郊外躲飞机，青救会活动不能正常进行。为此，于化琪在6月初召集青救会骨干分子研究当前形势，最后决定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农村，到农民群众中去。会后派出一批人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宿北几个乡镇出任民众抗日自卫队政训员。由于各乡镇民众自卫武装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他们倾向国民党，因此，在自卫队中进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活动阻力很大，甚至遭到刁难和破坏，致使宿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未能充分展开。到7月中下旬，经总队政训处同意，青救会骨干先后撤回县城。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宿南土地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朱敬芳和武海峰等人，先后在泗宿边境的朱大兴庄、武家圩、蔡乱庄、蔡破圩等地，自发组建抗日联庄会，宣传抗日救国。在宿西，王万

武、杨新、王怀秀、袁介之等人，在睢宿边境的王大庄、蔡桥口、张晓亭、王营子、花园等地，建立青年抗日救国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8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获悉宿迁县青救会十分活跃，在淮阴召见宿迁县长黄晋珩，批评他擅自任用延安来的“不法之徒”“扰乱社会秩序”。接着委派鲁同轩（鲁盾）接替与共产党合作的黄晋珩为宿迁县长。鲁同轩上台后，派特务监视青救会活动，以青救会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借口不予支持；对各区、乡民众抗日自卫队，以“抗日由国家军队负责”为理由宣布解散，有的被鲁同轩收编为常备旅，有的当了土匪，有的投靠日伪，也有的转化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至此，宿迁县青救会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停止。

9月，古邳人戴树璜受邳睢党组织派遣到宿北，以动委会的名义联络进步青年杨梓才、王子鲁、晁福祥、汪益之等人在宿北五、六、七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青救团，组织联庄会和抗日自卫队，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为在宿北重新建党和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沭阳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初夏，沭阳县初级中学部分学生吴瑾瑜、王茂前、葛高奇、杨新亚等人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组织前哨社，出版不定期刊物《前哨》，多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夏，他们从东北军五十七军政治部订阅的《大众日报》上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即在《前哨》上转载。除办刊物外，该社还走上街头演出抗日活报剧。该社活动一年多，对于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唤起民众抗日保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前哨社活动同时，钱序烈等人在沭阳东乡组织读书研究会（简称读书会）。钱序烈用自己教书的微薄收入购买一些进步书刊，供青年学习。读书会很快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他们以读书为名，以走亲访友作掩护，四处联络，聚集进步青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7年8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钱序烈、王展、钱天素等人，在东乡李恒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钱序烈任队长，王展任

副队长。他们自带武器，进行军事训练，活动在沭五区柴米河两岸，随时准备抗击日军，为保卫家乡而战。至年底，队员发展到近 200 人。

1937 年秋，在汤沟小学教师汤曙红倡导下，汤沟小学也办起了读书会，不到两个月，会员发展到近百人。每到逢集，读书会成员就走上街头，唱抗日歌，进行演讲。他们还创办汤沟剧团，汤曙红任团长，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在街头和村头演出，以文艺形式动员群众起来抗日。1938 年 3 月初，汤曙红在汤沟小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汤曙红任自卫队大队长。

1937 年 9 月，沭西林头村高鹤年在家乡开办补习班，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此前后，连五庄一带先后组织起抗日自卫队、青救会、儿童团等。沭五区化南乡召开抗日救国动员会成立大会，会上推选章振球为主任。会后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全乡 800 多户人家，有 500 多人参加动员会。这些抗日团体的诞生，使沉寂多年的沭阳农村、城镇爆发出波澜壮阔的斗争。

三、泗阳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 年 1 月至 10 月，泗阳县抗日民众动员会、泗阳抗日同盟会、泗阳中学青年救国团、第五战区泗阳民众抗日工作团相继成立。其中，于 2 月成立的泗阳抗日同盟会影响最大。泗阳抗日同盟会为苏北抗日同盟总会的分会，以总会理事谢楠为会长。谢楠和理事王颖密切配合，很快发展了李耀、薛洁民、徐芳、姬同祥、姬同结、李开荣等一批会员。他们到街头演讲宣传，深入群众，组织青年抗日歌咏队、儿童抗日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泗阳县城一片沸腾，抗日歌声四起。同时，同盟会还发动慰问抗日军人家属的活动，凡是抗日军人家庭都敲锣打鼓地送去一块“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牌”。他们还组织会员到乡村、集镇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演讲，贴标语，散传单。同年 10 月，同盟会被国民党县长王光夏以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取缔。

泗阳抗日同盟会被明令取缔后，部分成员又利用《淮滨日报》和《抗日战报》宣传抗日，直到王光夏密令逮捕他们，才被迫停止活动，离开泗阳。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为创建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

第四节 党组织的重建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上海、南京，继而分兵西进北上。1938年2月2日，日军占领蚌埠；5月19日，占领徐州。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八路军应南进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日军之后方活动。5月22日，中央书记处即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提出向豫、鄂、苏、皖四省敌后发展的方针，指示河南、江苏省委立即动员大批党员、干部、工人、学生到豫皖和苏皖边区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指示山东分局执行“巩固鲁南，发展苏皖”方针，派党员干部和八路军部队南下苏皖边区。

一、从苏鲁豫皖特委到苏皖区党委

1937年10月，以郭子化为书记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机关从鲁南山区迁到徐州。11月，在萧县黄口召开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确定以津浦、陇海两铁路为界，划分4个工作区，建立区域性党组织。1938年1月，中共徐东南区委建立，区委书记张芳九，组织部长邵幼和，宣传部长张震寰。邳宿沭海边区由徐东南区委领导。4月，中共徐东南区委改名为中共苏皖边区工委，隶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划归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撤销，中共苏皖边区工委改为中共苏皖边区特委，直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至12月，中共苏皖边区特委下辖邳县、睢宁、铜山、东海、灌云、沭阳、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宿迁、灵璧、泗县等县党

组织。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接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对中共苏皖边区特委进行调整和改组，任命李浩然为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邵幼和为统战部长，张震寰为宣传部长。同时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1939年9月改名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任命钟辉为司令员兼政委，梁海波为副司令员，李浩然任政治部主任。中共苏皖边区特委下辖4个工作区：邳睢铜地区、东灌沐地区、淮淮涟泗地区、皖东北地区。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工委、中共山东分局分别派人到皖东北开辟苏皖边区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别委员会成立，隶属山东分局，由杨纯、江彤、孟戈非（汪洋）、江上青等人组成，杨纯任书记，统一领导皖东北地方和部队党的工作。6月，中共苏皖边区委员会（亦称苏皖区党委）在邳南地区成立，书记金明，领导邳睢铜、皖东北、淮海和盐阜地区党的工作。中共苏皖边区特委同时撤销。9月，苏皖区党委机关移驻皖东北张塘（今泗洪县境内），区党委机关设在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内，领导津浦路东军民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皖东北特委同时撤销。11月，苏皖区党委决定，自西向东分别成立三个地委，即大运河以西地区为第一地委；大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六塘河以北为第二地委；六塘河以南地区为第三地委。杨纯为第二地委书记。

1940年2月初，第二地委在磐石庄（今耀南村，新沂市境内）召开地委扩大会议，总结前段工作经验并研究当前工作，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1）在二地委辖区内设立4个县委：宿北为第一县委，书记王亚东；沐西为第二县委，书记钱天素；沐东为第三县委，书记夏炳桂（夏岩）；灌云为第四县委，书记吴书。（2）成立一支由地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会议期间，地委调东海云台大队、宿北青救大队、沐三区青救大队3支抗日武装到磐石庄集结，合编为云台大队，任命钱霖（钱沛三）为大队长，汪谦（汪益之）为副大队

长，刘锡九为政委，宋耀南为政治处主任，王通吾为参谋长。(3)准备建立宿沭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此，杨纯给中共山东分局写信，请求山东纵队派主力到沭宿海边区，协助开辟宿沭地区和马陵山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下旬，陇海南进支队东渡运河，受到国民党宿迁常备旅鲁同轩部的进攻，支队在沭阳、宿迁的东西鲍圩子、邵店、五华顶予以反击，给顽军以沉重打击。后因顽军势力强大，自身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陇海南进支队遂撤出这一地区。

1940年3月下旬，苏皖区党委决定二、三地委合并，成立淮海地委，原三地委书记万众一调任淮河大队政委，淮海地委书记由杨纯担任。9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从皖东北进入淮海地区开辟根据地。

二、党组织的重建

宿迁县党组织的重建 1938年底到1939年初，苏皖特委派原邳县青救团宣传部长吴云培和夏炳桂到宿北，开展建党工作。他们在宿北青救团骨干分子中发展晁福祥、王子鲁等人入党。为了培养地方干部，苏皖特委和南进支队司令部在邳北铁佛寺创办随营学校，宿北青救团骨干分子参加学习。其中，马茂宗、马连翠、晁岱文、晁岱宾、杨相鄂等人在学习期间入党。晁福祥、王子鲁又发展胡震球入党。这为宿迁县党组织重建打下了基础。

1939年1月，中共宿迁县委在宿北竹园成立。吴云培任县委书记，夏炳桂任组织部长，戴树璜任统战部长。之后，苏皖特委派陆裕民（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启曙（任县委军事部长）、兰启新（任县委副书记）、孙素（任县委妇女部长）等先后到宿北参加县委，充实和加强宿迁县委领导。不久，成立五、六区联合区委，区委书记晁福祥，委员王子鲁、胡震球。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苏皖特委将邳县沂河区委划归宿迁县委领导。县委主要工作区为宿迁五、六、七区与邳县沂河区。2月3日，县委在堰头镇召开党的工作会议，确定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发展青救团员与地下党员、建立抗日自卫队为党的中心任务。会后，县委委员即分头深入各区、乡进行建党、建团工作。3月，苏皖特委又派陈少南（宿西耿车人）

到中共宿迁县委工作，先后出任六、七、八区政治指导员。陈少南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力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组织青救团，并在王庄、新店等地发展沈樵枫、訾兆勋、连化东、张亚夫等入党，建立地下党支部。4月，在县委的关怀与指导下，青救团宿迁县总部在宿北正式成立，汪谦为县团总部主任。总部创办《宿迁青年》（油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反映战时青年生活，表彰先进，交流办团经验，大大促进了团组织发展。当时，青救团组织遍布宿北各大小村庄，为建党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准备了条件。5月，县委批准五、六、七区分别成立区委，由晁福祥、王子鲁、臧涛年分别任五、六、七区区委书记。各区委在党员比较集中的地区先后设立许楼、龙池、魏牌坊、大冲、泉子、墨芬塘、龙泉沟、唐店、王庄等10个党支部。与此同时，县委副书记陆裕民到宿东二、八区建党，先后发展蔡西野、倪培修、盛光尧等入党。盛光尧又发展高沧洲、吴鸿金等入党，为在宿东地区建党奠定了基础。至6月，中共宿迁县委在宿北已建立4个区委、10多个党支部，约有党员50多名。

1939年11月，苏皖区党委决定成立3个地委，宿迁县境主要属第二地委领导。11月下旬，第二地委书记杨纯为迅速打开宿沭边区的斗争局面，率领党员干部从皖东北返回宿沭边区，对宿迁县委及各区委重新委派领导人，并分别派赴各地进行党的恢复工作。宿迁县委由王亚东任书记，夏炳桂任组织部长，杨肇庭任宣传部长，白卜山任青年部长。县委下辖沂河区委，书记朱万国；宿五区区委，书记晁福祥；宿六区区委，书记王子鲁；宿七区区委，书记徐养春。同时，二地委将沭二区委、沭三区委划归宿迁县委领导。

12月初，宿迁县委领导各区进行整党，把一些动摇投敌分子清除出党；对一度失掉组织联系的，经审查后重新填表登记；对原有的党支部进行改组，从而纯洁了党的组织，并在工农知识分子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通过恢复与发展，宿迁县委下辖6个区委，有20多个党支部、100余名党员。与此同时，宿北地区青救团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0年2月，第二地委决定把所属地区划为四片，分别成立4个县委。宿迁为第一县委，书记王亚东。4月初，国民党顽固派鲁桐杆在宿北制造大刘墩惨案，宿北党组织再次受到破坏。3月，苏皖区党委决定第二、第三地委合并。4月，杨纯派李仲祥到宿北恢复第一县委。恢复后的第一县委李仲祥为书记，王子鲁为组织部长，孔宪质为宣传部长，晁福祥为军事部长。5月，县委派张亚夫、臧大全等到宿东二、八区协助马爱亭做开辟工作。他们在宿东组建抗日团体，发展地下党员，先后建立嶂山党支部与邵西党支部。此时，宿北六区港头党支部、七区龙泉沟党支部也相继建立。沂河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晁岱文任区委书记。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党在宿北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

沭阳县党组织的重建 1939年1月，苏皖特委派余耀海、孙朝旭到东灌沭地区开展工作。二人到沭阳后，很快与东灌沭涟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汤曙红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海属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属工委），余耀海任书记，孙朝旭分管组织工作。不久，发展了汤曙红等一批党员。1939年2月，在海属工委关心和帮助下，中共沭阳县委继1935年遭受破坏之后又重新成立，章维仁任书记，汤化愚任组织部长，汤曙红任军事部长。3月上旬，中共海属中心县委（亦称东灌沭中心县委）成立，周瑞迎为代理书记；不久，由张克辛任书记，陈飞任组织部长，孙冠吾（即孙海光）任宣传部长，领导东（海）灌（云）沭（阳）地区的工作，海属工委同时撤销。4月，章维仁在高流、磐石庄一带进行建党工作，发展了宋耀南、宋光采、夏君彝、王通吾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沭四区委员会。6月，汤化愚、章维仁发展秦奇均入党，不久建立了沭八区党的中心支部，秦奇均任书记。9月，钱天素到沭西开辟工作，先后发展党员20余名，成立了中共沭二区、沭三区委员会和磐石庄中心支部等党组织。同月，海属中心县委改为苏皖区党委第二地委，杨纯任地委书记，章维仁任宣传部长，张克辛调苏皖区党委工作。沭阳县委隶属于苏皖区党委第二地委领导。

1940年2月，中共苏皖区第二地委在沭西磐石庄召开扩大会议，

决定在所属地区分别成立4个县委，其中沭阳西部二、三、四区与东海南部为第二县委，书记钱天素；沭阳东部为第三县委，书记夏炳桂。

泗阳县党组织的重建 1939年春，郑光华（王光华）任中共泗阳地下党特派员，5月，介绍董涯入党。同年夏，中共苏皖三地委李风派朱鸿章到泗阳组织读书会，发展革命力量。夏秋之交，谢楠到皖东北接受任务，回泗阳开展党的重建工作。不久，谢楠到运河以北活动，口头介绍徐平、刘冬、王颖入党。10月，苏皖区党委派董涯任泗阳工委书记，和谢楠一起在泗阳城东，先后发展冯沛、张文烺、谢友志、傅锦、陈克琏、王士如等人入党，成立城厢支部，冯沛、张文烺先后任支部书记。同年冬，他们又向南活动，在罗圩、海桥、郝桥、陶圩、裴圩、黄圩一带发展罗光沂（后叛变）、臧道四（后叛变）、周守武、周广智、海木林、方坤、海景波、海杰三、孙绍康、王超（王其华）、范忠、杨干、海德寿、陶惠、陶如立（后叛变）、陈洪友（后叛变）、李耀、徐徐（徐恒茂）等20多人入党，成立罗圩、海桥、陶庄、裴圩4个支部。其中，海桥支部有7支枪。随着党员的数量增多和形势的需要，成立了分区委，罗光沂、徐徐先后担任分区委书记。

1940年2月，朱鸿章再次到泗阳，在张圩源盛庄召开一次党小组会，研究如何收集掌握顽县政府及王光夏常备第七旅兵力情况，并布置今后情报联络工作。当晚，朱鸿章住在刘冬家，分头开展联络活动，很快联络了徐化民、郝华峰等，还联络了砂疆河北的李柏和砂疆河西的史化南、史贯四。他们以搞“读书会”为名，实际搞情报工作。除了继续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还着重了解从毕滩到戚渡、六塘河各个渡口的水、渡船等情况，为八路军从皖东北进入淮海地区做准备工作。

三、党组织的初步发展

1940年9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开辟淮海区，苏皖区党委机关移至运河东沭阳钱集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即在各地初步展开。同月，淮海区军政委员会建立，刘瑞龙任书记（1941年春，

由金明接任书记)。原皖东北地区建立地委，直属苏皖区党委领导，张彦任皖东北地委书记。撤销二、三地委，原二、三地委所属各县直接归苏皖区党委领导。

1941年5月，华中局决定，撤销苏皖区党委，成立淮海区党委，专门领导淮海区所属各县党的工作，金明任书记，李一氓任副书记（从1942年3月始），杨纯任组织部长兼民运部长，张彦任宣传部长，张克辛任军事部长，刘述周任敌工部副部长。各县县委也都不断调整和充实，辖8个县委和1个工委，其中，宿迁地区各县委的领导人：泗沭县委（1941年11月由泗阳县委更名）书记郭光裕，宿迁县委书记姬子华，潼阳县委书记胡叔度，沭阳县委书记龙光瀛^①，沭宿海县委书记章维仁，东灌沭县委书记夏炳桂，宿北工委书记王子鲁。县以下基层党组织发展也很快，全区共成立36个分区委，207个党支部，617个党小组，有党员3997人。

在皖东北地区，华中局于1941年5月决定，撤销皖东北地委，成立皖东北区党委，刘子久任书记，刘瑞龙任副书记。8月23日，华中局又作出决定：划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地区为淮北苏皖边区，并将邳睢铜和淮宝县划入，在张塘正式宣布成立淮北苏皖区党委，刘子久为书记（1942年11月，邓子恢为书记，刘子久、刘瑞龙先后为副书记），刘瑞龙、刘玉柱、张彦、吴芝圃为委员。11月，华中局对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邓子恢、刘子久、刘瑞龙、彭雪枫、吴芝圃为委员。至此，属宿迁地区的县委有淮沭县委（书记张毅）、泗阳县委（书记张维城）、泗宿县委（书记石立志）、睢宿县委（书记吴云培）、泗北县委（书记罗代周）、半城直属区委（书记王光宇，1942年前）、泗东县委（书记王光宇，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泗南县委（书记罗克明）、洪泽湖工委（书记高峰，至1942年5月）、运河特区工委（书记高峰，从1942年9月始）。

^① 1941年5月，淮海专署与沭阳县政府合署办公，沭阳县委改为中心区委，傅东华任书记，1942年5月恢复沭阳建制。

从1940年9月起，在苏皖区党委以及淮海、淮北区党委的领导下，宿迁地区各级党组织得到初步发展，不仅区党委、县委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且乡以下基层党组织发展也十分迅速，党支部、党小组纷纷建立。党组织的初步发展，推动了宿迁人民抗日运动的开展，为迎击敌伪顽的夹击、坚持抗战最终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第五节 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

一、宿迁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

宿迁县委于1939年1月重建后，书记吴云培即与夏炳桂、晁福祥、杨学忠等着手建立抗日武装。他们以杨庄、何庄为中心开展活动，以共产党员、青救团为骨干成立青救团自卫队，胡培义（后为何光启）为队长，晁福祥为指导员。接着，徐玉珍用吴云培、杨学忠献出的两支枪，带人收缴了汉奸陈振华十余支枪，并在山河崖动员20多名青年组建抗日自卫队，徐玉珍为队长。戴树璜通过做统战工作，将邳县庄鸿勋领导的抗日自卫大队带到宿北。1939年3月初，宿迁县委以青救团自卫队与抗日自卫队为基础，与庄鸿勋大队合并，在棋盘镇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宿迁独立大队，约80余人枪，庄鸿勋任大队长，张启曙任政治委员，下辖一、三两个中队，庄部编为第一中队，中队长庄逸民，指导员许仰杰；青救团自卫队与抗日自卫队编为第三中队，中队长徐玉珍，指导员晁福祥。3月中旬，戴树璜、臧大全、谢瘦石、江仲权等在宿北七区马场成立宿北第二营，有40余人枪，编成一个中队，江仲权任营长，曹健任指导员。4月初，胡震球等人在墨芬塘徐马庄一带，动员二三十名青年成立抗日青年自卫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这些抗日武装组建后，在宿迁县委领导下，活跃于运河、沂河、沐河之间。至5月，宿北抗日武装发展到二三百人。这时，苏皖特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宿北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二梯队，任命吴云培为梯队长，陈书同为政治委员，张启曙为参

谋长。梯队下辖两个大队，原宿迁独立大队改编为第一大队，庄鸿勋任大队长，罗森为教导员。原宿北第二营与抗日青年自卫大队合编为第二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曹健为教导员。先遣二梯队主要活动在宿北五、六、七区。

1938年春，马爱亭在大兴集组建民众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不久北上鲁南，归入蔡少衡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7月，马爱亭、张荫棠根据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钟辉关于发展武装的指示，受蔡少衡委派，带领10名队员以李明扬苏鲁边区办事处名义，返回宿迁县组建抗日武装。蔡贡庭已先期返宿组建武装。不久，他们在宿东邵店成立苏鲁边区抗日游击大队，马爱亭任大队长，蔡贡庭任政治部主任，张荫棠任参谋。初创时，枪支不足，蔡贡庭把自家的两支枪献给大队。给养有困难，马爱亭、张荫棠各自从家里运来粮食供应部队。苏鲁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多人，编为3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王守成，第二中队长陆敦益，第三中队长刘维峰。游击大队成立宣传队，成员有陆海川、孔瑞五、蔡敏则、宋新民、周化龙等。他们创办油印小报《游击生活》，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反映游击队生活；通过矿石收音机收听各战区抗战情况，并及时报道。1940年3月初，苏鲁边区游击大队随南进支队撤到陇海路北休整，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大队，张荫棠任大队长，马爱亭任政治委员，盛志明任协理员。

1939年4月，宿西北地区抗日自卫队引导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第一梯队在皂河镇击溃伪军王振铎部，后在庙庄成立邳宿睢抗敌自卫团，叶可泽任团长，下辖4个大队，约600人枪。6月30日，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随陇海游击支队第一梯队在皂河西王营活动，突遇日伪军“扫荡”，金明亲临前线指挥阻击，将日伪军击退。10月，邳宿睢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独立团，彭伯华任团长，叶可泽任副团长。在宿南，1939年秋，陈少南在龙河一带组建宿睢独立团，有二三十人。陇海南进支队挺进该地区后，成立了蔡玉辉的宿迁大队和叶道友的运河大队。

宿迁县境内人民抗日武装在成长过程中，以粗劣武器与装备精

良的强大敌人拼杀，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1939年3月15日，窑湾日伪军400余人，为打通陇海路东段，从窑湾出发，向堰头、棋盘一带进犯。牛滩青救团自卫队闻讯，在宿迁县委统战部长戴树璜指挥下，于青墩湖设伏阻击。10时许，敌人进入伏击圈。自卫队队员枪炮齐鸣向敌群开火，打得敌人无法向前。日军开炮向自卫队阵地轰击，自卫队员坚守阵地，英勇还击。接着，堰头、王番子、陆场、柳沟、墨芬塘一带的民众抗日武装和庄鸿勋的自卫武装约数百人，纷纷前来增援，国民党区长牛文凡也带队赶来参战。从牛滩至双庄一线筑起一道防线。日伪军接连组织5次进攻，皆被群众抗日自卫武装击退。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日伪军仍不能前进一步，只好狼狈逃回窑湾。此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70多人，粉碎了敌人妄图打通陇海路东段的阴谋。同年11月，宿城日伪军向大兴集“扫荡”。马爱亭率苏鲁边区游击队一部，在大兴集设伏。当日12时后，日军前哨抵达东炮台，游击队奋起出击，给敌人当头一棒。敌人惊慌失措，摸不清游击队虚实，未敢还枪。半小时后，日伪军发现游击队子弹不多，即以机枪、小炮拼命向游击队阵地射击。马爱亭考虑到敌强我弱，当即下令边打边撤，安全脱离险境。此战，打死日军小队长1名，缴获马1匹。

二、沭阳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

1937年冬，钱序烈、王展、钱天素等在沭阳李恒一带发起成立抗日民众自卫武装。1938年6月，汤曙红在汤沟成立汤沟乡民众武装抗日自卫队。九十月间，汤曙红串连邻县抗日武装，成立了东（海）灌（云）沭（阳）涟（水）边区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汤曙红被推选为总指挥，下设若干游击大队、中队，有3000人左右，成为一支活跃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3月底，日伪军夜间包围西圩街，企图消灭西圩民众抗日武装。国民党沭阳县县长夏铸禹（夏鼎文）正在西圩家中，贪生怕死，力主逃窜。西圩抗日武装坚持抗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汤曙红闻讯，即率抗日游击大队支援，日伪军腹背受攻，于次日晚溃逃，留下了200多具尸体。

1939年初，苏皖特委、陇海游击支队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意见，

决定将东灌沭地区人民抗日地方武装组建成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张克辛奉山东分局之命，于2月25日到汤沟镇，与余耀海、孙海光、汤曙红取得联系，商谈筹备成立八路军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事宜。4月10日，中共海属中心县委在李恒东南陈庄召开大会，张克辛宣读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把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汤曙红任团长，张克辛任副团长，周瑞迎任政治委员，陈飞任政治处主任。下设4个营，有1100余人。第一营营长汤良智、教导员王士林，活动在李恒、汤沟一带；第二营营长田宝瑚、教导员吴书，活动在灌云张店一带；第三营营长江剑农、教导员周江平，活动在钱集、胡集、塘沟一带；第四营营长周晓江、教导员刘锡九，活动在安峰山、房山、颜集一带。政治处成立抗日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

同年7月，第三团掌握了日军汽艇在盐河一带活动规律。8日晨，第三团80余名战士埋伏在盐河与涵养河交界处的灌云县五里槐渡口。上午，一艘日军汽艇拖着一条木船从北向南驶来。进入伏击圈后，战士们一阵猛烈射击，汽艇遭袭后向西急转弯，把拖船带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汽艇上的日军丢下木船，调头向西逃跑。日军落水后，以翻船作掩护，向岸上疯狂还击。日军被打死打伤数名。五里槐战斗打破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东灌沭人民的抗日士气。几天后，第三团又奇袭土匪头子贾锡福的巢穴孙二庄，击毙贾锡福及匪徒共37人。第三团的发展壮大吓坏了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沭阳县县长夏铸禹指使国民党沭阳县常备大队大队长王绪五谋杀汤曙红。7月17日傍晚，为团结抗日，汤曙红只身前往汤沟乡公所谈判，被王绪五部中队长周法乾杀害。汤曙红牺牲后，第三团由张克辛代理团长，为保存革命力量，忍痛西撤。8月初，第三团西撤到达宿北，与前来接应的先遣第二梯队会师于五花顶。后在反击国民党宿迁顽县长鲁同轩部进攻后，于8月20日和先遣第二梯队胜利到达运西，与第一梯队会合，完成了西撤计划，在岈山一带休整。第三团后编入先遣第二梯队，杨致雅任团长，杨纯

任政治委员。第三团西撤后，留在东灌沐地区坚持斗争的孙海光、周晓江、吴书、孙良浩等相继组织新的队伍，开展新的斗争。

1939年9月，以沐西的青救武装为基础，在颜集西门外霸王桥边的虞姬庙正式成立七乡抗日联防队，吴石坚担任联防主任。与此同时，吕德恂、秦奇均、陈宗奎、周德之等进步青年，组织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基干游击大队，由第三团派来的周立卓任队长，发展到100多人，其主要活动区域在吴集、韩山以北，湖东口以南，后被改编为沭阳县大队第二中队。同年12月，吴石坚、陈辅增等在二区组建沭西大队；王通吾、宋耀南、夏君彝等在沭三区组织青年救国大队，开展武装斗争。1940年2月，沭西大队为陇海南进支队三团收编；9月，沭三区青年救国大队改编为沭河大队。

1940年7月，沭四区委决定铲除当地恶匪胡方贤及其反动武装。胡方贤部拥有40余人，残害百姓，破坏抗日。经过秘密组织，沭四区委安排仲尚元等领导的数十人埋伏在龙庙附近，由安峰区委委员仲传歧开枪将胡方贤击毙。仲传歧在战斗中牺牲。此后，曹通三来到沭四区，以仲尚元数十人枪组成青年救国大队，曹通三任大队长，后并入沭河大队。仲尚元任三连连长。三连英勇善战，活跃在龙庙、华冲、阴平等地，多次获胜，被群众誉为“铁三连”。同年10月，周立卓、宋成思等人在韩山、吴集一带建立新江游击大队，李必超任队长，宋成思任指导员。1941年初，新江游击大队上升为主力部队，补入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

党领导下的沭阳地方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保卫了刚刚恢复的沭阳党组织，而且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为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开辟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

三、泗阳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

1938年2月，王业奎、沈肇华在运北王集一带组织泗阳抗日自卫队。7月，张相白、丁文波、蔡兆弼、李耀先等联合五区40余名热血青年，自带枪支，在穿城玉皇庙成立抗日支队，张相白任支队长，丁文波、蔡兆弼、李耀先任分队长。一个多月后，泗阳顽县长

王光夏宣布不准自发组织武装，抗日支队被逼解散。后经丁文波联络，又组成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支枪的抗日分队，在穿城一带活动。

1939年春，泗阳、宿迁、沭阳三县边区联防抗日自卫团（简称三县边联）在泗阳县泰山镇徐兴庄成立，马爱亭为主任委员，史文煜为秘书长。三县边联成立后，积极组织人民自卫武装，坚持泗、宿、沭三县边区的抗日斗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为发展武装培养干部，三县边联成立苏北人民抗日干部训练班，史文煜任校长，董苏民负责校务和后勤工作，徐晓霞、史开林任教员，另有鲁南岸堤干校毕业学生叶泽生、高耀（后叛变）分别任学员队长和文化教员。训练班的课程有《政治常识》《论持久战》《游击战术》《民运工作》《军事教练》等。训练班成立不久，国民党县党部就发出对史文煜等领导人的秘密通缉令。同年9月，由于形势所迫，他们向皖东北转移，训练班全体人员参加了八路军，改编为鲁豫皖支队军政干校，史文煜任校长。不久，干校又改编为苏皖纵队随营学校。苏北人民抗日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泗阳县的徐洪学、史玉、王作宾、徐爱富，宿迁县的陈绍昆、丁静波、徐玉珍、苏农、惠兆民、叶素琴、叶志宝，沭阳县的叶志俊、徐乃鲁、吴玉理、李竞成、徐浩等，在后来泗、宿、沭三县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时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六章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一、皖东北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军事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则加紧了政治诱降活动。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形势转折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不久，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会议还决定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敌后抗战和党的工作，均由中原局直接领导。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这个地区的敌后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皖东北地处苏皖交界，其范围包括徐州的东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地区，今宿迁市泗洪县县城一带为其中心区。当时，这个地区属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盛子瑾任皖第六专区专员。皖东北地区是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重要生命线，是进军苏北的前进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8年秋，六安县县长盛子瑾调至皖东北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司令兼泗县县长。同年11月，受中共安徽省工委委派，江上青随盛子瑾到皖东北赴任。江上青的公开身份先是安徽省第六行政区民运科长，不久即任第六行政区专员秘书

兼第五战区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密身份为党在盛子瑾部建立的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江上青到皖东北后，根据党的指示，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把武装斗争和宣传发动工作结合起来，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江上青深刻理解把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和推动盛子瑾逐步接受党在皖东北合作抗日的建议。

1939年2月，江上青向盛子瑾建议，派朱伯庸去鲁南，与八路军联系，请求南下支援。中共山东分局遂派杨纯为特派员（原名万国瑞），由朱伯庸陪同南下，于3月到达管镇，建立了中共皖东北特别委员会。同时，江上青又建议盛子瑾派吕振球到河南的书案店，同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取得联系。5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党政军委员会派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和党政军委员会秘书刘玉柱赴皖东北，同皖六区专员盛子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当他俩抵达津浦路东时村时，适逢日军“扫荡”，无法继续东进，便随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撤回津浦路西。7月上旬，张爱萍以八路军高级参谋身份，再次和刘玉柱带着彭雪枫写给盛子瑾的亲笔信，随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经宿县越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在双沟北罗岗听取了杨纯、江上青关于皖东北情况介绍，决定与盛子瑾进一步建立统战关系。在罗岗，张爱萍把彭雪枫的亲笔信交给盛子瑾，在江上青参与下与盛子瑾会谈，圆满达成合作抗日七项协议：划宿县、灵璧和泗县二区由八路军、新四军负责掩护，并执行当地的行政，另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为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共同建立洪泽湖根据地；民运工作由中共方供给干部；行政方面由中共方保护，皖六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由中共方一人担任；每月供给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万元（不够再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不就地筹粮；准许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设立公开的联络机关；共同组成一设计委员会作为此协定执行的权力机关。从此，皖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8月，张爱萍写信给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约其到灵璧县张大路会合。金明同张爱萍、刘玉柱在张大路会合后，召开会议（即张

大路会议)，张爱萍介绍了与盛子瑾的统战关系，建议苏皖区党委应到皖东北，同时建议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由张爱萍和刘玉柱分任办事处正副主任，以便负责主持同盛子瑾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同月，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在张塘成立，作为共产党对盛子瑾开展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机关，张爱萍为办事处主任，刘玉柱为副主任。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国共两党在皖东北地区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9月初，金明率区党委机关从邳南到张塘，区党委机关设在办事处内。办事处既是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机关，又是区党委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的掩护机构。进驻张塘后，苏皖区党委对盛子瑾的统战工作的策略、方针作了重新审议和决定：拥护盛子瑾抗日，促进盛子瑾抗日，推动盛子瑾进步；大力开展民运，独立自主地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壮大皖东北的进步力量；力争同盛子瑾长期合作，同时做好盛子瑾动摇、分裂的准备，盛若反我，我即反盛。办事处制定了统战的策略和方针，积极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和团结开明绅士和进步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同盛子瑾的统战工作，推动盛子瑾的进步。

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一方面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积极推动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区党委以皖东北为工作重点，指导整个苏皖边区党的工作，分别在邳睢铜、海属和淮属地区建起第一、第二、第三地委。办事处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武装的方针，在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加强党对盛子瑾和第三支队、特务支队和农民支队的领导。从1939年春起，到年底，奉命进入该地区的部队有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胡炳云的第一大队，钟辉的陇海南进支队，江华的苏皖纵队，共计6000余人，成为皖东北地区抗日的中坚力量。办事处对皖东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以后坚持皖东北的抗战局面，初步开辟和建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二、八路军进入皖东北

1938年12月上旬，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从山西开赴鲁南，开展苏鲁皖边区的抗日游击

战争，于12月底抵达微山湖西丰（县）沛（县）地区，与当地武装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彭明治任司令员，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梁兴初任副司令员。193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意见，彭明治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萧（县）宿（县）永（城）地区，配合新四军游击支队开展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望令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酌派一部分兵力并地方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活动，侦察苏皖边区情况，并建立工作，以便南与周骏鸣的新四军第五支队、西与彭雪枫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取得联系。遵照这一指示，彭明治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越过津浦铁路，挺进至皖东北地区抗战。7月，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在吴法宪和大队长胡炳云率领下进入今泗洪境内。经过张山、魏洼、冯庙等战斗，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致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振奋了皖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促进了皖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八路军苏皖纵队也在此时进入皖东北。1938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为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和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梁海波为副司令员，李浩然为政治部主任和苏皖特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负责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展抗日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阻止和破坏日军打通从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铁路东段的企图，同时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12月21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在邳县许楼村正式成立，在苏北地区诞生了第一支八路军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在沭阳境内成立，任命汤曙红为团长、周瑞迎为政治委员、张克辛为副团长。5月，在宿迁县境内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二梯队，吴培云为梯队长，陈书同为政治委员，活动于宿（迁）北、邳（县）东南、沭（阳）西诸县交界处地区，发展到400余人的武装部队，对该地区的开辟和对敌伪的打击以及配合主力活动起了积极作用。1939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根

据党中央《关于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毛泽东《关于八路军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对发展华中的指示，决定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领导机构，任命江华为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开往苏皖地区，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10月，江华率苏皖纵队机关从鲁南越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苏北地区，将在此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正式改名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作为苏皖纵队的主力部队，随纵队进军苏皖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创建根据地。当苏皖纵队部率领支队三个营进抵灵璧与睢宁交界处的九顶山张山口时，与从双沟出动的500名日军遭遇，支队迅速占领山头有利地形，与日军从清晨激战至下午，共击毙日军100余人。战后，支队转移到灵璧、泗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三、新四军进入皖东北

1939年12月初，张爱萍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以护送过津浦路为由，经盛子瑾同意，率领赵汇川的三支队和余筱仙的沱河大队共1000余人，越过津浦铁路，进抵涡北新兴集。为了学习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军风军纪和军事技术，张爱萍组织护送部队参观了游击支队的军事表演，并为之联欢，使护送部队受到了教育与鼓舞。12月下旬，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刘少奇致电彭雪枫指示：淮北苏皖边区党所领导的主力 and 地方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统一党与部队、民运、统战工作的领导；将在皖东北的新四军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以张爱萍为总队长兼政委。并指示张爱萍不赴延安，须返回津浦路东领导皖东北的抗日斗争。为此，彭雪枫指派游击支队第一团随张爱萍到达皖东北，以增强皖东北的武装力量。

1940年元月，张爱萍率领第四总队（对内称第四总队，对外仍按盛子瑾部队番号称）和第一团部队返回津浦路东，进入灵北山区。不料第二天，从渔沟、尤集等地出动的日伪军乘汽车向第四总队驻地进行快速奔袭。赵汇川率第三支队第八、第九两个大队迅速开展阻击，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当第四总队和第一团途经沙滩、张

大路时，遭到盘踞在这里的地主武装雷杰三部的阻拦，第四总队和第一团配合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对沙滩、张大路两个伪军据点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攻破。除雷杰三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在皖东北连战皆捷，声威大震，使得土顽不敢轻举妄动，伪军不敢远离据点，日军也不敢小部队“扫荡”。

四、打击顽固派倒退逆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日伪势力和土匪恶霸，深得群众拥护。对此，反动地主豪绅异常恐惧，纷纷向省府控告盛子瑾为共产党收买，省府意欲调升封建豪绅代表、顽固派灵璧县县长许志远为第六公署专员，以取代盛子瑾。许志远立即指使所属雷杰三部进犯盛子瑾。这种破坏团结的行为严重影响皖东北团结抗日的局面。1939年8月下旬，张爱萍、刘玉柱出于团结抗日的大局和诚意，邀请盛、许在灵璧张大路举行谈判。许志远表面上答应团结抗日，拥护盛的领导，暗地里却在策划阴谋。29日，谈判结束返回时，盛子瑾不听张爱萍的劝告，执意经刘圩沿濉河返回驻地青阳。当队伍行至泗县东北小湾时，突遭反动武装的袭击，骑马走在前面的江上青和朱伯庸不幸牺牲。

“小湾事件”发生后，苏鲁豫皖支队胡炳云大队和赵汇川支队进驻小湾老周圩一线。张爱萍派刘玉柱代表八路军、新四军，石青代表专员公署出面调解。他们深入大柏圩，对反动地主施加压力，制止暴乱事态的发展。盛子瑾为中共抗日诚意所感动，进一步向中共靠拢。区党委分析认为，盛子瑾虽怀有个人目的，但因与新桂系有矛盾，愿意抗日，应当区别对待，努力推动盛子瑾的进步；反动地方武装反对盛子瑾，虽属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但这将破坏皖东北合作抗战的局面，是倒退的行为，因此对少数不可挽救的顽固武装，则予以孤立和打击。因此，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指导下，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的行径，在政治上予以揭露、抨击，在军事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击败反共顽固派的挑衅。

同年秋，安徽省桂系军阀黎纯一率领 500 余人进驻傅圩、吴圩一带，与王光夏、秦庆霖相互策应，破坏皖东北团结抗战的局面，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根据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的精神，为对顽固派的挑衅实行自卫反击，当即令八路军胡炳云大队向黎纯一驻地吴圩挺进，准备予以歼灭性打击。黎纯一闻讯，立即仓惶逃跑。安徽省府派到皖东北视察的李本一也吓得望风而逃。11 月下旬，汉奸雷杰三又蠢蠢欲动，多次向皖东北发起挑衅，新四军第四总队配合胡炳云大队，一举将沙滩、张大路两据点攻下。

1940 年 1 月，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下令免去盛子瑾的六区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同时又委派国民党第十四纵队司令马馨亭率一个加强营千余人到皖东北，以武力威逼盛子瑾交权。张爱萍当即命令盛部农民支队配合胡炳云大队坚决予以阻击。经过一天的猛烈袭击，马部不得不于深夜退至灵北。经过一个多月休整，马又绕道睢宁以南日伪区，进驻泗东大柏圩。皖东北顽固势力一时“拥马倒盛”的气焰甚嚣尘上，盛子瑾在此情况下，一筹莫展。苏皖区党委深入研究皖东北政治形势，认为坚持皖东北的团结抗战就必须“拥盛驱马”，应乘马馨亭立足未稳聚而歼之。决定由张爱萍统一指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攻击。由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担任主攻大柏圩的主圩子，新四军第四总队和第一团主攻西小圩。大柏圩圩壕水深，工事坚固，火力强，易守难攻，部队冒着凛冽的寒风涉过刺骨的冰水，冲向圩内。马部虽作抵抗，但不敢恋战，马馨亭遂于当夜率残部逃回津浦路西。大柏圩战斗胜利后，正值农历除夕，即开仓济贫，皖东北广大军民欢庆战斗胜利，欢度春节。大柏圩战斗，是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胜利，不仅打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倒退的逆流，而且打出了皖东北抗战的新局面。

同年 2 月 28 日，盛子瑾率部渡过淮河南去，投靠在扬州的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盛子瑾的出走，标志着中共与盛子瑾在皖东北的统战关系结束，中共正式开始独立自主地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第二节 刘少奇指导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领导华中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1月底，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盛子瑾出走后，国民党皖六区专署解体，安徽省政府派栗天一准备东来就职；马馨亭和王光夏等虎视眈眈，妄图伺机夺取皖东北政权；泗县顽县长朱天修勾结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皖东北形势复杂，人心不稳。为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民心，苏皖区党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张贴安民告示；扣押朱天修；建立泗县县委和县政府，由石立志任县委书记，派中共党员陈国栋担任县长；改编由中共掌握的盛子瑾部武装，正式公开宣告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成立，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将赵汇川的第三支队编为第十一团，徐崇富的特务支队编为第十二团，石青的农民支队编为独立团；由第四总队分兵出击，拔除伪据点，消灭土匪及地方顽固武装。由此稳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民心，巩固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在皖东北的地位。

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赴中原局（驻淮南）向刘少奇等汇报工作，返回皖东北时，带来刘少奇写给张爱萍、江华、刘瑞龙关于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信。刘少奇在指示信中要求：“目前苏皖地区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北、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并在这块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必须迅速发展我党领导之下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八路军、新

四军，在半年内达到三万人枪以上，并须注意部队的巩固与整训。必须坚决地建立政权，派遣最好的干部（如省委、县委的委员等）去做县长、区长。必须建立广大的自卫军。必须建立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救国会，工人、青年、妇女等救国会。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必须实行各种进步的抗日政策，以便能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部队的给养及斗争中的各种任务。”^①刘少奇还对斗争的重点和策略作了明确指示：必须坚决打击日伪军，必须打破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对我们的阻碍。在“扫荡”顽固势力的斗争中，要打击最顽固分子，要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去消灭顽固派；要广泛地发动党政军民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分子。

为了统一对苏皖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刘少奇决定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由刘瑞龙、金明、张爱萍、江华、田维扬等组成，刘瑞龙任书记。接着，按照军政委员会和苏皖区党委对建立皖东北根据地工作的布置，3月下旬，张爱萍带领第四总队扫除了盘踞在大庄、老周圩一带的顽固势力许志远的部队，清除了皖东北根据地内部的隐患，控制了皖东北局势，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3月24日，苏皖区党委在今泗洪县境内的青阳镇召开全区第一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成立由中共领导的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名称仍沿用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推选开明绅士原专署秘书陈粹吾为代理专员，刘玉柱任秘书，同时成立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张爱萍任司令员，赵汇川为副司令员。会后，调整了区乡政权的干部。中心地区泗县的6个区和盱凤嘉一个区的区长，均由中共干部担任。为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区党委于4月召开了皖东北地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了巩固皖东北中心区，发展泗（县）、灵（璧）、宿（县）工作方针，并确定大力开展群众运动，建立群众团体。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皖东北根据地发展农救会会员5万人、

^① 刘少奇：《关于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给张爱萍等的信》（1940年3月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自卫队5万人。

二、刘少奇到皖东北视察指导工作

1939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从延安到华中以后，走遍了豫皖苏和皖东新四军部队各游击区，直接领导了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反对顽固派摩擦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40年春末夏初，正值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初创之际，有不少带根本性的问题亟需解决。4月底，刘少奇从盱眙县北渡淮河，抵达今泗洪县境内的罗岗。刘少奇一到驻地就开始研究工作，先后听取刘瑞龙、张爱萍、金明、江华等汇报工作，一直到深夜，都全神贯注地询问、研究，对各种问题提出许多意见，作了明确指示。刘少奇很谦虚，总是说：“这是我的意见，情况你们比我清楚，请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5月上旬，刘少奇在朱湖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干部作了题为《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为皖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刘少奇指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建立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争中牵制敌人，消耗敌人，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然后转入反攻，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上准备自己，坚决抵抗和粉碎日伪军对我军的“扫荡”，建立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有效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直到最后胜利。针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影响，他通俗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说打日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是人民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能存在，有人担心国民党说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破坏统一战线，你管国民党干什么？你既然能组织乡农会，为什么不能组织区农会、县农会？还有人认为招兵买马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做法，我看能招到兵买到马就不错。革命的兵为什么不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买？发展武装，多多益善。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

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干部培训，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六大宝”的总体，就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少奇的报告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对皖东北乃至整个苏皖地区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在皖东北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从政治上关心、教育、培养干部，经常给干部战士作报告、谈工作、谈思想，反复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加强思想修养，正确开展斗争，防止和克服宗派主义倾向；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等等。还谆谆教导干部，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他说，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是一致的，既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凡事就要和群众商量，工作也就一定能做好。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皖东北部队进行了整训和整编，江华调回山东，苏皖纵队撤销，其第一、第二团编入陇海南进支队，第四总队十一团编入苏鲁豫支队胡炳云一大队。

6月中旬，刘少奇在胡炳云大队的护送下，离开皖东北返回淮南。

三、皖东北的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

1940年5月1日，即刘少奇抵达皖东北的第二天，泗县、五河的日伪军，突然发动“扫荡”，妄图摧毁新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苏皖区党委原定请刘少奇作报告，只好停止，立即投入反“扫荡”战斗。经过一天激战，泗县日伪军占领了上塘集和马公店，五河的日军也占领了郑集。为保护刘少奇和区党委机关，也为保存实力，决定连夜转移，跳出日伪军的合围圈，从外线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第二天夜，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北渡濉河，向青阳镇东北的新行圩子、朱湖等地转移。不料，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常备第七旅旅长王光夏，趁日伪军“扫荡”之机，于5月3

日派高铸九、马子廷等匪部袭击半城、孙园。5月13日，王光夏率常备第七旅第十三、十四两个团及泗县常备队3000余人，公然配合日伪军向皖东北根据地发动进攻，占领了曹庙、界头集、朱湖、新行圩等地。皖东北形势十分危急。而这时，战斗力很强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已奉命调回山东执行任务。刘少奇给中央军委发电，请求增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接受任务后，即率部火速南下，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抵达皖东北，配合新四军第四总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开展反“扫荡”、反摩擦战斗。在刘少奇部署下，在王光夏立足未稳之际，进行快速反击。

在日军“扫荡”期间，发生了袁圩事件。5月上旬，青阳区委组织安排泗县妇救会主任朱碧莎（朱启杰），带领喻尊霞、陈兴吾、夏复兴、马文训四位同志，到陈集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住在袁圩村。袁圩大地主袁林勾结土匪，连夜跑到泗县城，向日军告密。5月28日，日伪军100多人包围了袁圩村，朱碧莎、喻尊霞等5位同志全部被俘。汉奸王仲涛是青阳人，认识喻尊霞，劝降说：“喻家三小姐，我们是乡亲，只要你讲出共产党组织，我担保你到徐州念书，仍过你的小姐生活。”喻尊霞训斥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谁是你的乡亲？你枉披一张人皮，给中国人丢尽了脸。想叫我投降，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日军队长叫人拿来纸笔，要她写一份“悔过自首书”，就放她回家。喻尊霞从容接过笔，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军队长见状，暴跳如雷，拔出军刀，残忍地砍下她的四个指头，并声嘶力竭地吼道：“埋掉，统统地埋掉！”喻尊霞与战友一道，大义凛然地走向日军挖好的坑。她昂首高呼：“同志们，为祖国牺牲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最后高唱一支歌吧！”歌声响起，“枪口对外，仇敌认清，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歌声在重岗山头飘荡。喻尊霞和她的四位战友一起壮烈牺牲。喻尊霞等殉国后，中共泗县县委专门发出《关于向喻尊霞等烈士学习的决定》。

5月下旬，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纠集江苏独立团、第六旅两个团、八十九军第三十三师两个团、第二旅两个团及王光夏部等11个团，西渡运河，侵入金锁镇地区，再次向皖东北根据地大

举进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刘少奇决定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再组织一次讨顽战役。在刘少奇的统一部署下，新四军第四总队同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一部，经过两天一夜激战，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团，并将其逐回运河以东。

6月初的一天早上，日军200余人装成农民模样的“求雨”队伍，从灵璧往郑集移动，当到达胡炳云大队九连驻地时，这些求雨“农民”忽然从神龛下面抽出枪支向九连开火，发动突然袭击。与此同时，灵璧、泗县的日军1000多人分左右中三路向郑集包围，还调集200多骑兵横冲过来。胡炳云大队与敌人展开一天一夜的激战，夺回了朱湖和新圩以北大小20余个村庄，打退了日伪军的“扫荡”，把日军赶到了泗县、灵璧一带。这一仗歼灭日伪军400余人，俘虏一名日军少佐。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乘胜前进，击溃了王光夏部的进攻，将其驱逐到界头集、曹庙一线。

在取得反“扫荡”、反摩擦战斗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又乘胜收复泗县八区和界头集以南地区，建立了泗宿联防办事处。此后，颁布了专署保障人权、合理负担与肃清土匪的三项政策，有计划地整理财政，解决粮食问题，建立政府各种制度，改造基层政权，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巩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第三节 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了今后大力向东发展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任务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会议强调指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地区，不仅可以冲破国民党隔断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联系，粉碎其陷新四军于危境的阴谋，而且可以背靠山东，凭江据海，依托水源和广阔平原，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华中作战。中原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多次指出，敌人已确定占领华北的方针，国民党的政策是想把我军封

锁在敌后，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华中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线。同时指出，八路军一部要迅速南下，向华中进军，坚决控制全苏北，新四军也应即向江北发展，共同完成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淮海区东临黄海，西倚京杭运河，北枕陇海铁路，南迄淮阴，是联系华中（苏北）与华北（山东）两大战略基地的重要枢纽，也是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几大战略区的接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刘少奇力主开辟淮海区，建议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一部在津浦路东开辟邳睢铜和皖东北的同时，把开辟淮海区作为实现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突击方向，开展创建淮海根据地的斗争。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欠第四团）共1.2万余人，分两个梯队从冀鲁豫南下苏皖地区，于6月20日抵达安徽涡阳新兴集，与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6月底，奉命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一个月后，根据刘少奇指示，黄克诚将刘震、康志强部第三四四旅（欠第六八七团）留给彭雪枫作基础，亲率第二纵队机关和新二旅两个团以及第六八七团，于8月初进入皖东北地区双沟（今泗洪县境），协助新四军作战，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

8月7日，黄克诚到达盱眙，与刘少奇共商开辟淮海根据地工作。按中原局指示，黄克诚所率部队和彭明治率领的苏鲁豫支队，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领导的陇海南进支队（钟辉护送江华等已回山东），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和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五纵队（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由黄克诚接任苏皖军政委员会书记，刘瑞龙任委员。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和1个保安司令部：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下辖第一、二、三团；第二支队由新二旅和第六八七团编成，田守尧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吴信泉；第三支队由陇海南进支队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编成，支队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张爱萍兼司令员，赵汇川任副

司令员，辖宿东独立团。

8月中旬，第一支队第一团在团长胡炳云、政委田维扬率领下，向淮海地区挺进，由皖东北强渡运河，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打开了局面。第一团沿淮阴县五里庄、涧桥、徐溜一线，向西出击顽保安第七旅王光夏部，稍一接触，王光夏部即沿六塘河两岸向西逃窜。随后，第一支队主力部队跟踪追击，迅速扫除了六塘河两岸的顽军和土匪武装，顽军营长王业奎在泗阳县庄滩率部起义。28日，第一支队由苏皖三地委宣传部长李风等作向导，到达淮阴县新渡口，与坚持敌后抗战的地方武装淮河大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梯队）会师。不久，第一支队奉命南下增援新四军江北部队，由高沟、杨口出发，到达盐河两岸的大、小金圩集结，准备次日晚东渡盐河。此时，敌情有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部队于当日返回高沟、杨口。自9月8日黄昏起至9月17日止，响水口、新浦、大伊山的日军700余人，两次侵犯高沟、杨口。第一支队经过激烈战斗，击溃来犯之敌，迫使日军退出新安镇（南）和涟水城。在战斗中，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日军松本司令被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支队进入宿北、沭阳地区临近陇海铁路一带开辟工作。

9月中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和第二支队六八七团进入淮海地区。正在此时，顽韩德勤部企图以数倍兵力，消灭驻扎在黄桥附近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策应新四军黄桥战役，黄克诚奉命亲率5个团兵力，即第一支队3个团、第二支队2个团，由淮海地区奋力东进，日夜兼程，不到两天，中途收到前方捷报，说韩德勤部遭到惨败，已退驻曹甸、兴化、车桥一带。于是，黄克诚率纵队司令部机关直属队急转盐阜区东沟、益林等地。10月10日，在东台县以北刘庄、白驹之间的狮子口与新四军胜利会师，从而完成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9月中旬，苏皖区党委机关随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东移到沭阳钱集、陈圩、张圩一带，留下新二旅第六团，建立皖东北地委、专署以及党的军政委员分会和军分区，坚持皖东北地区的斗争。地委由张彦、吴植椽、常玉清、刘玉柱组成，张彦为书记；军政分会

由张彦、常玉清、刘玉柱、鲍启祥、胡继成组成，张彦为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常玉清为司令员，吴植椽为政治部主任，刘玉柱为皖东北专署专员。

在八路军一部主力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少奇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0年6月底，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在豫皖苏边区涡阳新兴集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后，刘少奇就电告黄克诚作东进皖东北的准备，并3次去电催促行动。当黄克诚率部到达皖东北后，刘少奇又及时作出了整编部队、加强领导的决策，并指示黄克诚：“现在要赶快整编队伍，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把南下主力转过去，支援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黄克诚率部进入淮海区后，刘少奇又调苏皖军政委员会委员刘瑞龙加强淮海区工作。10月间，刘少奇由皖东去盐城途经淮海区时，专门听取了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刘瑞龙和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关于淮海区情况的汇报，指示要抓紧巩固抗日阵地，肃清残匪，发动群众，武装群众。1941年4月底，刘少奇又通知刘瑞龙去盐城汇报工作。他在听取汇报后着重指出，目前我党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仍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为目前中心一环，必须抓紧来做。要求半年内，即从夏收到秋收期间，在我根据地内，至少组织300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抗日团体和自卫队中。5月3日，他为此写成长信，由刘瑞龙向黄克诚、金明等进行传达。5月4日，他直接向党中央报告了淮海区的政权建设、党组织建设、地方武装以及群众工作等情况，如实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9月，华中局发出主力部队地方化指示后不久，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刚从津浦路西转赴淮海区。刘少奇迅即通知旅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到华中局谈心，提高他们对主力部队地方化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刘少奇亲切教导下，第十旅坚决执行在淮海区“安家落户”的指示，做出了很大成绩。1942年春天，刘少奇返回延安途经淮海区时，在淮海军区机关又住了一个多星期，充分肯定了第十旅扎根淮海的成绩，并强调指出，淮海区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刘少奇对淮海区工作的指示，

为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为开辟淮海区，建立稳固的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由山东南下淮海区，增强华中武装力量。12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到达宿迁县与沭阳县之间的辛圩一带，进入淮海区，并与已在这一带活动的张爱萍部取得联系。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同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其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整编为第二师，驻守淮南抗日根据地，支持淮北抗日根据地作战；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驻守苏北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第三支队改编为第三师第九旅，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原辖第七、第八、第九团，改为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团；八路军第四纵队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坚持战斗在豫皖苏边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奉命改编为军部独立旅，梁兴初任旅长，罗华生任政治委员，刘兴元任政治部主任，其任务是配合新四军第三师在淮海、皖东北地区活动，共有3个团、1个特务连、1个工兵连、1个通讯连，还有供给部和卫生部，总人数5200余人，其中党员1697名，占全旅人数30%多。1月底，独立旅奉命调至洪泽湖东的南新集、顺河集和蒋坝地区活动，接替新四军第五支队十团防务。2月19日，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旅，奉调到皖东北地区，后因情况变化，又调回淮海区，主要任务是协助新四军第三师开辟淮海区的的工作。此时，淮海区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初建，社会秩序尚乱，地方土匪尤为猖獗。这些土匪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相互勾结，抢劫群众财物，杀害共产党干部，破坏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独立旅到淮海区后，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土匪和顽固地主武装，先后剿灭了沭阳、涟水和东海一带的顽匪。

8月初，淮海区军政委员会提出“继续以剿匪为中心任务，要求于最短时间，挫其凶焰，缴其枪械”。独立旅贯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指示，继续积极配合兄弟部队清剿顽匪，部队进入宿迁县丁家嘴、仰化集、大新集一线以南地区，配合第三师在成子湖以东、泗阳李口以西和第四师第十旅在成子湖以北、运河以南临河集、仓集、屠园圩等地区作战。不久，第四师第十旅奉调运河以东地区防务，原防区改为独立旅统一指挥，并负责全力清剿顽军徐继泰部，巩固盐河西岸，向东发展。此时，沭阳至淮阴公路以东属独立旅防区，公路以西属第四师第十旅防区，两支部队通力协作，肃清土匪，共同完成巩固和发展淮海的任务。

此后，新四军独立旅参加了由陈毅代军长直接指挥的程道口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部以有力打击。接着，其主力集结在沭阳以西和西南、宿迁县东南等地区，给“扫荡”的日伪军以迎头痛击。

1942年11月上旬，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形势紧张，新四军独立旅奉命返归山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建制，离开了淮海区。为了铭记这段战斗的光辉历程和业绩，独立旅全体指战员于调离前夕在泗沭县里仁集（今属泗阳县境）西门外建亭勒碑，以示永恒纪念。

新四军独立旅在淮海区转战两年多时间，始终斗争在剿匪、反顽和抗击日伪斗争的最前线，共进行大小战斗150余次，配合兄弟部队尤其是第三师巩固和扩大了淮海根据地。

第四节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的过程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决执行中原局有关指示，从各地实际出发，帮助地方迅速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一、从皖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到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

1940年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部队东进，苏皖区党委于9月东移淮海，同时在皖东北建立皖东北地委、党的军政委员分会和军分区，坚持皖东北地区斗争。皖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由中共党员刘玉柱接任。此后，皖东北自上而下由半公开到公开地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专署下辖泗县、泗宿、泗五灵凤、盱凤嘉、淮泗5个县、16个区、104个乡。同年10月，为有利于开展斗争，皖东北地委决定将泗县建制撤销，分别建立泗宿、泗东、泗南、泗北、淮泗等办事处。1941年3月15日，皖东北第三届各界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成立皖东北参议会，于20日选举孔祖南（民主人士）为参议长，吴静宣（民主人士）为副参议长（后由吴芝圃接任）。8月23日，华中局划定淮北苏皖边区范围，即划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地区为淮北苏皖边区，并将邳睢铜地区和淮宝县划入。撤销皖东北区党委，在张塘成立淮北苏皖边区党委，仍由刘子久任书记。9月15日，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在泗南县半城召开成立大会，到会300余人。大会选举刘瑞龙为主任、刘玉柱为副主任（后增加陈荫南为副主任）。同时撤销皖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淮北苏皖边区军区，赖毅为司令员，刘子久兼政治委员；成立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党委员会，以邓子恢为书记，统一领导淮北地区党政军工作。此时，淮北行署辖泗南县、泗宿县、淮泗县、泗阳县、泗东县、运河特区办事处等。各县县大队和独立团也随之建立和发展。

淮泗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年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东进，在行军途中经过南新集一带，冲垮了顽泗阳县第二区署，击毙顽区中队长。9月，苏皖区党委决定，将淮准宝泗联防办事处一分为二，以洪泽湖大堤为界，在堤西成立淮泗联防办事处，为县一级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6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政策，淮北撤并办事处，改为县的建制。7月，淮北区委决定撤销淮泗联防办事处，成立淮泗县民主政府和中共淮泗县委，县长为张辑五，县委书记为胡天禧。淮泗县从东南到西北，

长 60 多千米，东西宽 30 多千米，是淮北、淮海和淮南 3 个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是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第二、第四师往返联系的交通纽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淮泗民主政权建立后，辖区不断扩大，由初建时两个区发展为 8 个区，即顺河区、李口区、吴集区、营门区、新袁区、黄圩区、河东区、陈集区。这些区政府和区委共管辖乡政府和支部 82 个。

泗南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1 年 6 月，淮北撤并办事处改为县建制时，泗东、泗南办事处改为泗南县，张太冲任县长，洪沛任县委书记（后为罗克明），并在汤圩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选举向有富等 79 名开明绅士为参议员，陈荫南为参议长，王仲安为副参议长。8 月，第四师师部进驻泗南半城一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前，淮北行署已驻泗南张塘一带。自此，以半城为中心，泗南县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

泗宿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 年 4 月，苏皖区党委决定成立泗宿办事处，由狄克东任主任兼书记。办事处下辖宿迁县境内的潘山、闸塘、归仁 3 个区和泗阳县境内的金镇区。次年 4 月，泗宿、泗北办事处合并，成立泗宿县抗日民主政府，狄克东任县长，石立志任县委书记。在各界代表大会上，泗宿县选举周干民为参议长，贺礼泉为副参议长。

泗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1 年 8 月，淮北区党委决定以原泗东县八区（龙集区）为基础，在洪泽湖以北、大运河以南、成子湖以西、安河以东地区建立泗阳县抗日民主政权。该地区在洋河、众兴、程道口的日伪顽据点威胁之下，敌人控制着海郑公路和运河交通线，不仅封锁了淮北、淮海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并经常乘虚南犯，侵扰淮北根据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淮北抗日民主政权，扩大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支持下，以龙集为基地，逐步向北推进，采取打进去、撤出来、再打进去的办法，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完全控制了界集、金锁镇、曹庙、中扬、屠园等地区。9 月 5 日，县政府成立大会在太平集路庄召开，王路被任命为县长，张维城任县委书记。程道口战役胜利后，又新建

陈圩区，后来又建立洋河市（区级），这些区级政权管辖 74 个乡镇政府和支部。泗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加强了淮北、淮海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并使淮北军民在反“扫荡”斗争中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运河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从泗阳众兴镇沿运河向西北至宿迁县城脚下这块狭长地带，是淮北与淮海、新四军第三师与第四师联系的纽带。为控制这一地区，经淮北与淮海党政军领导人研究决定，于 1942 年 9 月 24 日在这里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运河特区，隶属淮北区。设立工委和办事处，高峰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后戴岳为主任）。特区成立后，先后建立大兴、双河、程道、陈圩、古城五个区委和区政府，16 个党支部和乡政权。特区办事处成立后，立即着手抓武装，成立了运河大队，大队长和政委均由高峰兼任。特区地方武装发展迅速，共有大队主力 300 多人，下辖五个区中队 200 多人枪，各乡设有脱产乡队 10 余人，还有群众性的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1943 年 3 月，运河特区划归淮海区，随着淮北和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于 1944 年 8 月撤销。

二、从淮海区专员公署到淮海区行政公署

1940 年 8 月，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一部开辟淮海地区后，迅即帮助各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于 8 月率先建立，由苏皖区党委任命夏如爱为县长。后改称泗沭县，属淮海区党委领导。接着，其他各县也都相继成立了县政府，并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县长。9 月，苏皖区党委机关从皖东北进入淮海区，直接领导淮海区各县工作。9 月 18 日，苏皖区党委机关在沭阳县钱集召开绅士座谈会和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成立淮海区专员公署的决定，并推选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吴文玉（吴法宪）为专员。机关驻地设在张圩。10 月，吴文玉随军东进，由金明代理专员。12 月 25 日，淮海区临时参议会在沭阳成立，民主人士吴月波任参议长。临时参议会宣布了专署的三大政策：第一保障人权，第二合理负担，第三肃清土匪。淮海区专员公署和临时参议会的成立，标志着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完善。专署下辖涟水、淮阴、泗阳、沭阳、东海、宿迁、

灌云、沐宿海、涟灌阜 9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1 年 7 月，沭阳县第五、第十区与东海县第二区及灌云县合并成立东灌沐办事处；沭阳县第七区与泗阳县大部合并，成立泗沭县。同年 4 月，淮海军区成立，由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团团长覃健任司令员，金明兼任政委，张克辛任参谋长。在此前后，各县独立团或县大队相继建立。至此，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日臻完善。1942 年 3 月，中共华中局决定撤销淮海区专员公署，成立淮海区行政公署，李一氓为主任。下辖泗沭、沭阳、沐宿海、宿迁、淮阴、涟水、东海、东灌沐 8 个县级政权。6 月，沐宿海抗日联防办事处改为潼阳县，东灌沐边区办事处改为灌云县。10 月，宿北县办事处直属行署领导。1945 年 7 月，盐阜、淮海两行政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淮海行署隶属于苏北行政区委员会，更名为苏北淮海分区专员公署，1945 年 11 月更名为苏皖六专署。

泗阳县、泗沭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王东保带领的主力部队到达泗阳县北的王集，次日即以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宣布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委任夏如爱为县长。同时，苏皖区党委宣布建立中共泗阳县委，派孙川人为县委书记。11 月，孙川人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孟亚人任县委书记。1941 年 1 月，由郭光裕任县委书记。泗阳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泗阳县运河以北建立四、五、六 3 个区级政权和区委。11 月程道口反顽战役胜利后，苏皖区党委决定，把运河以南划归淮北区党委领导，沭阳县第七区划归泗阳县，加上新划的程道口区，共 5 个区政府和区委，泗阳县改称泗沭县，属淮海区党委领导。不久，根据专署有关规定，重划区乡，改之前的“保甲制”为“乡村制”。共划成 11 个区，即里仁区、丁集区、十字区、魏圩区、三庄区、穿城区、新集区、王集区、庄圩区、八集区、程道区。实行精兵简政后，又合并为 7 个区，即三区、四区、五区、六区、七区、十字区、穿城区。泗阳县（泗沭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立即建立县大队，倪永昌为大队长。此时，顽江苏省常备第七旅王光夏部十四团三营营长王业奎在共产党的政策

感召下，火线起义，不仅拉过来自己领导的一个营，还把二营拉过来两个连，壮大了泗阳县的抗日民主武装力量。1941年7月，县大队扩建成独立团，县长夏如爱兼团长，县委书记郭光裕兼政委，全团280余人。

沭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年8月下旬，沭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县政府设在马厂的秦马棚，钱天素任县长，设民政科、保安科、司法科、财经科、财粮科、文教科等工作部门。县境东到高沟（今属涟水县），西到沭淮路，南至六塘河，北至沭海路。辖五区、六区、七区、八区、九区、十区共6个区84个乡2个镇。同时建立中共沭阳县委（第三县委撤销），秦奇均任县委书记。1941年5月16日，淮海区党委决定，沭阳县政府与淮海专员公署合署办公，沭阳县行政工作由淮海专署代管。同时，中共沭阳县委改为中心区委，傅东华任中心区委书记；6月，陈云龙接任中心区委书记；8月，中心区委撤销，重新恢复中共沭阳县委，龙光瀛任县委书记。1942年5月1日，恢复沭阳县政府建制。中共沭阳县委决定在塘沟召开沭阳县政府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0余人，徐禹民当选县长。县政府辖4个区：六区，辖9个乡；八区，仍辖10个乡；九区，辖7个乡；十一区，辖7个乡。

潼阳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年9月18日，沭宿海县委成立，章维仁任书记，王亚东任组织部长，李仲祥任宣传部长。同时，成立沭宿海抗日联防办事处，江剑农任主任，辖原沭阳县二、三、四区，3个区相继建立了区政权。1941年12月，沭宿海抗日联防办事处改称潼宿海办事处。1942年6月，以潼宿海办事处为基础，建立了潼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驻地阴平，隶属淮海行政公署，下辖6个区政府。1944年8月，潼阳县并入东海县。

宿迁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0年9月，宿迁县顽县长鲁同轩被八路军第五纵队赶跑后，宿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乡保安圩成立，蔡贡庭任县长。同时苏皖区党委决定，将中共第一县委改为中共宿迁县委，李铁民为县委书记。宿迁县委、县政府主要以邵店、叶海子、大兴集一带为基地开展活动。之后，又建立二、八区署，

同时成立二、八区联防办事处，马爱亭任主任。同时，组建宿迁县抗日武装，将宿迁民众自卫大队 20 余人与沂河区自卫队 30 余人合编，组成沂河大队，胡震球任大队长，晁福祥兼政委。后将二、八区队编入沂河大队，使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了 4 个中队，计 400 余人枪，成为保卫宿迁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宿北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41 年 5 月，中共宿迁县委决定以县委组织部长王子鲁、宣传部长张渐摩等人，组成中共宿北工委，重新开辟宿北。之后，王子鲁等便以六区四明乡为基地，以“反对维持、保家自卫”为宗旨，利用宗教形式，在群众中组织佛教会，借以开展反伪化的斗争。不久，佛教会员就发展 1000 多人，推王天民为会长。王天民在佛教会员中筹集枪支，组建一支佛教会武装，计 30 余人，编成一个中队，王如光为中队长。接着，王子鲁等人又在棋盘镇一带，成立联庄会，发展农民武装 100 多人。接着又摧毁 16 个伪乡镇政权，粉碎了日伪军伪化宿北的阴谋。同年秋，宿北形势再度恶化。年底，宿北工委书记王子鲁派人到淮海地委，要求主力部队支援宿北。新四军独立旅一部在旅长梁兴初率领下，于 1942 年初进驻宿北，使宿北有了以金李庄为中心的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宿迁县委决定建立宿北抗日民主政权。4 月，宿北行署（办事处）成立。1942 年 10 月，淮海地委决定将宿北工委改为宿北县委，李广仁任县委书记，王子鲁为县委副书记。从此，宿北单独设县。

第五节 镇压土顽和反动地主暴动

宿迁地区的泗阳等地原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反共“模范区”，国民党顽固派有较深的社会基础。在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初，顽固派韩德勤部在黄桥作战中残留的散兵游勇，勾结土匪，四处抢劫、绑票；地方上反动道会门势力也乘机捣乱、破坏，社会秩序不稳。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韩德勤部变本加厉，经过特工利用反动地主、土匪、“小刀会”帮会等，甚至勾结敌伪，对抗日民主政府极尽破坏、造谣、欺骗之能事，并杀害抗日干部。因此，在淮海区各抗日民主政权初创阶段，打击地方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挑衅，稳定社会秩序，成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当务之急。

在淮海区，农村土匪为患由来已久。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全区共有土匪 60 余股、2700 余人，其中，沭阳有 24 股 600 余人枪，泗沭有 9 股 200 余人枪，宿迁有 7 股 500 余人枪，宿沭海有 17 股 300 余人枪，东灌沭有 7 股 600 余人枪，淮涟有 500 余人枪。匪首有东灌沭的周法乾、潼宿海的刘庆余等。他们各据一方，横行乡里，直接影响到对敌斗争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因此，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把清剿土匪作为安定社会秩序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新四军独立旅以及第三师第八、第九旅和各地地方武装，采取果断措施，在地方抗日武装紧密配合下，坚决打击首恶和反动分子，很快平息了地主武装的叛乱，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巩固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

一、沭阳境内镇压小刀会和反动地主武装暴动

1941 年 2 月初，沭西地主陈松权等，纠合地主武装 2000 多人，与国民党沭阳常备大队长吴筱柴勾结，包围沭宿海党政军机关。淮海军区沭河大队在张湾、后河头、麦墩一带奋起抗击，激战 8 天，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长途跋涉赶来增援，终于击溃敌人，把这次暴乱镇压下去。此役共毙敌 40 余人，俘敌 250 余人，缴获长短枪

600余支，保卫了新生政权，巩固了沐宿海根据地。2月中旬，沭阳八区小店一带地主以薛庚六、韩凤彩、巴六、万玉柱等为首，利用小刀会唆使群众抗缴公粮，策动会众暴动。他们包围区中队，袭击县大队武装巡逻连，开枪打死县大队参谋长汤良智等9人，酿成了流血事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闻讯派部星夜开赴小店附近，兵分三路将小刀会头头和匪首据守的韩凤彩圩子包围，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克匪据点。击毙暴徒13人，打伤多人，除匪头目从暗道逃跑外，绝大多数受骗群众，经说服教育，回家安心生产，少数主要暴乱匪首、骨干，后被一一抓回镇压。同时，第五纵队三支队在沭阳胡集一带平息了反动道会门暴动。

二、泗阳境内镇压小刀会和反动地主武装暴动

泗阳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王光夏为了破坏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组织地指使一批有枪有钱有实力的地方顽固派，从外地找来一些小刀会“点传师”，分配到各地，再由各地顽固派强迫广大农民参加小刀会组织。这些组织名义上是抗日保家，实质上是操纵在地方反动顽固派手中。王光夏就利用小刀会和地方土匪制造多起反共摩擦事件，妄图扼杀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2月初，在王光夏精心策划下，发生了西至王集、东至魏圩、北至里仁集、南至众兴方圆几十里的小刀会暴乱。当抗日民主政府征粮人员下去征粮的时候，他们拒绝交粮；当抗日民主政府耐心细致做说服教育工作时，他们认为新建的民主政权软弱可欺，主动挑起两起流血事件。12月21日，驻扎在王古墩的新四军某部孙营长，得知小刀会会首刘三砍及一伙不明来历的人聚集在魏圩乡刘仰书的圩子里举枪弄棒，即率领一个连去了解情况，劝阻制止越轨行动。在刘仰书圩门前，受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小刀会众攻击，牺牲和负伤30多人。后新四军骑兵团闻讯赶到，步兵也随后来援，打死打伤小刀会众300多人，迫使小刀会四散奔逃。流血事件后，王光夏部制造谣言，歪曲事实真相，鼓动为已死的小刀会会员报仇。顽固派乡长王其英蠢蠢欲动，扬言为死伤刀会成员报仇。县长夏如爱率一连武装到王其英处做工作，王其英竟将前去劝说的人员开枪打死，还夺走两挺机枪，造成

第二次流血事件。此后，小刀会气焰更加嚣张，到处摆坛，招收新会员，妄图采用蚕食的办法把抗日民主政府人员和军队赶出泗阳县境。泗阳县党政军领导决定进剿小刀会。1941年2月，泗阳独立团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平息了王集一带的小刀会暴乱。泗阳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和发展。

三、坚持打击分化和教育瓦解相结合的方针

在打击土匪斗争中，淮海区党政军领导坚持采取打击分化和瓦解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匪首和一些死不悔改的惯匪，实行严厉打击，坚决镇压；对于受胁迫、受骗或盲目为匪并愿意改恶从善的一般分子，尽量争取，既往不咎，欢迎他们重新做人，为抗日出力。由于共产党宽大政策的威力和影响，各地土匪主动向政府自新。1941年11月，泗阳县四区民治、乐善、里仁3个乡有土匪60余人自新，其中民治乡匪首主动带枪到区署自新，并召回同伙一起参加抗日。为了进一步争取土匪自新，淮海专署于12月19日颁布了《土匪自新办法》，规定：凡在抗日民主政权区域内潜伏之土匪，统限于12月30日前至政府办理自新手续，逾期不自新之匪，严惩不贷；土匪所有长短枪均须缴给政府，抢劫之赃物亦应交给被灾之民众，倘有隐匿，一经查出即以自新不诚论处；凡土匪之亲属及邻居，应切实查、挤、劝导，令其自新或秘密检举，否则以通匪论；土匪自新后，应切实悔过，并应受保人管束，倘有不法行为从严惩处。目前如有怙恶不悛之徒，藐视法纪，再行任意抢劫，决以严惩不贷。《土匪自新办法》公布后，各地土匪在政策的震慑和感召下，纷纷自新。12月19日，淮海区党委为了更有效地维护抗日秩序，又制订了《惩治盗匪暂行条例》，经淮海区临时参议会通过，后由专署公布施行。条例公布施行后，淮海区社会秩序进一步得到安定，对巩固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起到重要作用。

第七章

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第一节 淮北抗日根据地粉碎 日伪“扫荡”“蚕食”

一、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持和恢复

1940年八九月间，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和苏皖区党委机关东移淮海。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洪泽湖等地土匪互相勾结，频繁袭扰，反动气焰甚嚣尘上，甚至发生半城孙乃香叛变并袭击两淮中学、杀害校长吴云邨的严重事件。同时，日伪军也在加紧策划“扫荡”，企图摧毁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皖东北斗争形势非常严峻。

留在皖东北坚持斗争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第六团仅千余人，零散各地的地方武装总计只有1300余人，各级党政干部仅有70余人。武装力量的薄弱和党政干部人员的不足，给坚持皖东北斗争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皖东北的严峻形势，皖东北地委和专署及时召开各县干部会议，部署大力发展抗日武装，肃清侵入根据地内的日伪顽匪，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从政治上争取团结中间势力。还部署在秋后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准备过冬粮食、棉衣等，随时准备抗击日伪顽匪的进攻。为便于领导，皖东北地委决定将泗县划分为泗南、泗北两个县，成立泗南、泗北县委。不久，又成立泗南联防办事处和泗北联防办事处。在泗县中心区，广泛动员青年参军，补

充第六团新兵共 670 人。同时，集中兵力消灭了王光夏残部和陈小瞎子、李成五等土匪武装，开辟了淮泗、泗八区和泗五灵凤地区，扩大了皖东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淮泗县委和淮泗联防办事处，并在淮泗地区以第六团的两个连为基干，扩充建立湖北大队，共 400 余人，加上濉河大队、泗南大队发展的人员，共扩大地方武装 820 余人，充实和加强了皖东北的武装力量。

11 月底，专员公署召开了皖东北第二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群众代表和地方开明绅士等 100 多人参加了大会，成立参议会，吸收许多有声望的绅士参加民意机关，加强了党与皖东北各界人士的联系，争取他们积极参加并支持抗击日伪军、顽匪的武装自卫斗争。

12 月 5 日，日军从宿县、灵璧、睢宁、泗县调集步兵 1000 余人、骑兵 300 余人、汽车 40 多辆，分五路向濉河以北新行圩子一带分进合击。7 日晨，包围了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第六团。第六团指战员奋力抗击，突围而出，撤向安河以东金锁镇、界头集一带。同时，宿迁日军也配合出动，向归仁集一带进攻；马厂、里塘伪军向皖东北中心区进扰；泗南伪军向东进占上塘集、魏营子；土匪张文博、高铸九从洪泽湖登岸，占领半城直属区镇。此时，皖东北局势逆转，情况危急。第六团为便于作战，决定分散游击，两个营转移到淮泗地区，一个营留在皖东北地区打游击。地委和专署机关随主力东去淮泗，皖东北遂转入游击战争的困境。

敌人“扫荡”刚结束，第六团即由淮泗迅速返回皖东北中心区。为总结这次反“扫荡”经验，地委决定召开军政分会扩大会议。会上，讲清形势，统一认识，调整部署，确定第六团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保卫家乡、武装自卫运动，建立群众抗日自卫武装。第六团一个营负责控制濉河以北的泗北地区，恢复归仁集南北地区的政权；一个营负责控制泗南、泗五灵凤地区，将张文博部从直属区赶下洪泽湖；另一个营负责控制界头集、金锁镇一带。

此后，日伪军连续多次“扫荡”。皖东北抗日武装战斗频仍。在历次战斗中，青阳镇保卫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

1940年12月20日，日伪军700余人分乘50辆汽车，向皖东北专署机关驻地青阳镇再次发起大规模“扫荡”。第六团事先掌握了日伪军“扫荡”的情报。19日夜，第六团团长胡继成率第二营和警卫连两个排赶到青阳，在镇四周修筑工事，严阵以待。拂晓时，日伪军包围了青阳镇，开始向该镇发起猛烈进攻，均被击退。下午3时左右，第六团乘战隙组织两个排，把苇草堆在船头作为掩体，从正北强渡濉河。上岸后，即猛攻北岸日伪军，歼敌50多人，缴获战马30多匹，占领北堤，并支援青阳东北角作战，使敌处于交叉火力之下。傍晚6时，第六团向被围困的小股日军发起火攻，烈焰腾空，30余日军尽数葬身火窟。天黑后，敌人惧怕夜战，慌忙渡河西逃。青阳镇保卫战是第六团在皖东北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击毙日军5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余支、炮弹9发、子弹3000余发、手榴弹20枚。此次战斗对皖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皖东北3个月的艰苦斗争中，由于日伪军“扫荡”和顽匪袭扰，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丧失5个区和31个乡政权，根据地缩小了30%，皖东北重镇青阳被日军占领，并安上了伪据点。但由于第六团和地方武装英勇作战，在3个月间进行大小战斗600多次，歼灭日伪军700余人，终于保卫了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陈毅率领的江南新四军和黄克诚率领的南下八路军胜利会师，共同创建了淮海和盐阜两块抗日根据地。鉴于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已初步完成，中原局指示：调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返回皖东北地区，开展恢复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1941年2月中旬，张爱萍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不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回师皖东北，决定首先收复青阳镇。张爱萍先派侦察员化装进入青阳镇，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和工事情况，然后作出周密作战部署，由三支队第二十五团和第二十七团担任主攻；二支队第六团到青阳镇和马公店之间，准备阻击从泗县出动的日伪援兵；皖东北地方武装配合作战。18日黄昏，张爱萍亲临前线

指挥作战，第三支队发起猛攻。战至次日晨，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伪军缴械投降。此役共歼俘伪军 700 余人。

青阳战斗结束后，第三支队又乘胜攻克马公店并继续向四周扩大战果。不久，皖东北根据地基本恢复。3月17日，皖东北专署召开第三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爱国绅士、教育界及群众代表千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皖东北参议会，推举民主人士孔祖南为参议长，吴静宣为副参议长。会议通过三项议案：恢复被日伪军侵占的地区；各级参议会实行民主政治；开展春耕互助活动，兴修水利，改善民生。会后，皖东北抗日政权进一步民主化，各阶层的团结更加巩固，党在沦陷区的工作也得到很大发展。

洪泽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又是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湖上盘踞着顽匪武装，为首的有陈佩华、高铸九、魏友三等。他们拥有数百只船和数千人武装，与国民党顽军沆瀣一气，依据湖荡苇滩，经常上岸出扰抗日民主政府边沿区的乡政府，抢劫群众财物，并拦劫商船，扰乱社会秩序。洪泽湖沿岸人民群众对其深恶痛绝。消灭湖上匪患，解放洪泽湖，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张爱萍主动请战，要求率部清剿洪泽湖匪患。这一建议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批准。4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由皖东北向洪泽湖地区进军，在第二师第五旅、第四师第十旅和当地群众配合下，准备发起湖上剿匪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精心准备，5月初战斗打响。首先扫除顽匪在洪泽湖沿岸的陆上据点，完成了对湖匪的封锁围困。继而，对盘踞湖区顽匪作清剿部署：第三师第九旅第二十五团和警卫连执行进攻任务，从临淮头向东进攻；第二师第五旅一个团在洪泽湖东边，扼守蒋坝、高良涧一线，防止敌人登陆逃跑；第四师第十旅第二十九团在成子湖东北一线警戒；地方武装在管镇方向警戒。5月4日，第九旅主力从里河出发，向湖区顽匪发起进攻，一举全歼高铸九部；陈佩华部除少数逃向盱眙投降日军外，大部逃至高良涧被迫缴械投降。从此，洪泽湖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内湖，成为淮北、淮南根据地的可靠后方。洪泽湖上匪患被平定后，新四军在罗嘴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宣布成立洪泽湖武装大

队，同时成立洪泽湖管理局（相当于县级机构）和党的工作委员会，陈醒任局长，高峰任工委书记。

二、新四军第四师转移皖东北和淮北根据地的建立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主力部队和豫皖苏边区地方党政干部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撤离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转移到了皖东北地区，进一步增强了皖东北根据地抗日力量。第四师主力进至洪泽湖地区驻防。其中，第十旅在南新集至高良涧一带，第十一旅在高良涧以南地区，第十二旅在淮河以南的马坝至金沟一带。第四师主力由于在豫皖苏边区坚持三个月的反摩擦战斗中，过于疲劳，急需休整。同时，由于连续战斗，损失严重，部队存在着一些情绪低落、纪律松弛和不团结的现象，因而急待整训。为此，中共中央电复华中局，指示第四师加强整训，深入检讨豫皖苏边区反顽斗争经验教训。

6月上旬，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率领新四军军部巡视团，从淮南到皖东北地区检查和帮助工作。7月19日至月底，第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和第四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在淮宝县仁和集召开，师长彭雪枫作专题报告，总结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在豫皖苏边区三年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邓子恢代表华中局对会议作总结。仁和集会议统一了认识，稳定了情绪，增进了团结，推动了第四师的整军建军工作。

第四师司令部进入皖东北后即制订了整军计划，确定教育方针为：提高干部战术教育，提高战士战斗技术，同时学习抵抗敌顽战斗方式和干部指挥管理的教育能力。师部还将理论上急待提高的或工作需要调动的在职营团级干部成立上干队，集中学习军事理论；有计划地在部队中调班、排、连干部到抗大受训，以资深造；开办排、连、营短期教导队，传授迎战经验；各部门按其不同性质，开办不同训练班，培养各种专门干部。与此同时，第四师加强了装备，补充了服装、被服，补充了枪支、弹药，每个战士都配有刺刀、大刀和工作器具等。这次整训，提高了第四师主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为第四师主力在反“扫荡”、反摩擦战斗中节节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命邓子恢为第四师政治委员。在彭雪枫和邓子恢的领导下，第四师在整训基础上进行缩编。经过缩编，第四师共辖第十、十一两个旅和两个直属团。9月9日，根据军部指示，第三师第九旅与第四师第十旅对调建制，其旅团番号不变。第九旅旅长为张爱萍（后为韦国清）、政委韦国清（后为康志强），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团3个团。该旅战斗力强，善于作战，屡建战功，在巩固与发展淮北根据地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皖东北区委自5月成立后，加强了党对皖东北根据地的领导；第四师近万人主力和豫皖苏边区400多名党政干部转移到路东，增强了皖东北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三师第九旅和第二师第五旅进入皖东北作战，打通了与邳睢铜的联系，开辟了萧铜和宿东游击区，开拓了泗五灵凤边境地区；加之淮宝地区划为第四师防地，扩大了皖东北根据地，使根据地扩大到包括皖东北地区以及苏北、苏中一部分地区。为了统一该地区的领导，8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划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地区为淮北苏皖边区，成立淮北苏皖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和军政委员会。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华中局决定撤销淮北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改组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区党委改组后，即调整了各地党政军组织机构，在全边区设立4个地委、行政区联防办事处和军分区，加强了全边区党的一元化领导。至此，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建立，皖东北地区成为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区。

三、淮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33天反“扫荡”斗争 1942年冬季，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法西斯侵略军遭到苏联红军沉重打击，已自顾不暇；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战线过长，顾此失彼，亟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继续蓬勃发展。为了摆脱困境，达到其巩固战略后方、“以战养战”和在中国建立起所谓“大

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目的，侵华日军在其统治区内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集中64%的在华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荡”。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实行打、拉政策，逼迫其投降。

日军继“扫荡”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后，于1942年冬将“扫荡”重点转移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淮海、淮北和淮南地区。11月14日，日军出动第十七师团及数部伪军共7000余人（其中骑兵600人），另配备坦克2辆、汽艇9只、汽划子10只、飞机8架，分兵5路，对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伪军从西向东，自北向南，矛头指向淮北苏皖边区根据地中心区半城一带，企图利用其陆海空军的优势，一举歼灭新四军第四师及淮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其作战方针是：首先以半城、青阳为全边区的中心目标，进行大规模的分进合击；其次又分别以泗宿、泗南、泗阳、淮泗等县的中心集镇为目标，进行小规模的分进合击。

11月14日晚，新四军第四师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形势，作出判断，认为敌人此次“扫荡”规模将是全面的，时间将是长期的，方针将是分东西两翼“扫荡”，西翼以泗县为指挥中心，“扫荡”泗南、泗宿、泗东；东翼以淮阴为指挥中心，“扫荡”淮泗、淮宝等地。日军战术将是长驱直入，分区“扫荡”，反复“扫荡”，以骑兵及伪军吸引我军主力，而以主力和机械化部队进行包围突击。因此，我军应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遂确定此次反“扫荡”的战役方针为：第一步，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由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争取主动，并以一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第二步，转移到敌人来路的侧翼和后方，协同我处于敌人最后方的部队，在运动中集中力量寻机打击敌人，力求歼灭敌人一路或两路；第三步，如日伪军建立据点，则制造并寻找其弱点进行袭击，予以拔除。按照这一作战方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和第四师师部立即领导皖东北军民行动起来。其战斗经过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4日至19日。第四师师部、旅指挥机关、

后方机关及各部队分途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避免了内线作战。当日伪军猛扑第四师师部所在地半城的时候，师部早已安全转移。接着，日伪军又扑向青阳、双沟、鲍集、管镇等地，均无收获。淮北地方党政干部则组织地方武装与留守部队一道，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四处出击，与敌纠缠，迷惑敌人，疲惫敌人，消耗敌人，使日伪军腹背受击，日夜处于惊恐不安状态。根据地人民还组织起来，积极参加破路运动，使日伪军机械化部队难以展开，尤其是根据地人民的坚壁清野，使日伪军冻馁交加，无心恋战。

第二阶段，从11月20日至30日。转移到日伪军侧后的第四师主力部队及原在日伪军包围圈以外活动的部队，积极寻找日伪军的薄弱处，连续发起猛烈攻势，不断给日伪军以打击。至此，日伪军的分进合击，到处扑空，对我主力部队、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后方资财一无所获，其主力不得不撤回原防地，敌人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失败的‘扫荡’”。

第三阶段，从12月1日至16日。第四师部队转入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争夺战阶段。日伪军残部控制青阳、马公店、金锁镇及泗宿公路上的各要点，构筑据点，改进攻为退守，企图分割根据地，实行划区“搜剿”。因此，拔除日伪军安设在根据地境内的据点便成为反“扫荡”的最后目标。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第四师将士英勇斗争，浴血奋战，经过朱家岗、马公店、关帝庙等地战斗，日伪军残部不得不于15日和16日撤出对边区威胁最大的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据点。第四师步骑各部队分路追击，直逼泗县城下。至此，淮北根据地基本收复，从11月14日至12月16日的33天反“扫荡”结束。

朱家岗战斗 根据地军民在淮北区党委和第四师师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在33天反“扫荡”斗争中，先后在泗南魏营、管镇、大小宋庄、青阳、马公店，泗宿归仁集、蔡圩，泗阳金锁镇、朱家岗等地作战37次，攻克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日伪军据点，共歼灭日伪军700余人。其间，朱家岗守备战最为壮烈，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伪军“扫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家岗东临洪泽湖，西靠安河，位于淮北根据地腹地，是一个东西走向的稍高于平原的土岗子，上面坐落着曹圩、张庄、孙岗等几个自然村，除了南北各有一条抗日交通沟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在日军“扫荡”时，第四师第九旅决定由第二十六团在内线作战。第二十六团在内线和日军周旋 20 多天，于 12 月 9 日黄昏后进驻朱家岗。团召开营连干部会议，对消灭金锁镇之敌进行部署，休息时已是凌晨 1 点。日伪军共 1500 多人，趁着夜色，兵分 3 路，于 10 日拂晓偷袭包围了朱家岗，企图将第二十六团一举歼灭。为了拖住敌人，掩护外线主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彻底粉碎其“扫荡”计划，第二十六团指战员不怕牺牲，坚守阵地。

激烈、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曹圩北面交通沟、张庄大院和曹圩东南门 3 处展开。在曹圩北面交通沟，二连指战员击退上百名日军的两次进攻。团长罗应怀命令五连一排接替二连阵地。8 时许，日军再次冲击，一排长王康运用诱敌之计，以成束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纷飞，用雪亮的大刀吓得敌人胆战心寒。日军转头又向交通沟东端冲去。这里离曹圩团部住地只有几十米，若被敌突破，曹圩将受到敌东、南、北三路夹击。罗应怀在交通沟东端阵地上指挥作战。五连二排排长王鸿庐率 3 个班，用大刀、手榴弹和敌人展开拉锯战。10 时许，罗应怀左腿中弹负伤，交通沟东端被敌突破。危急之际，王康率五连一排一个班增援，王鸿庐带领战士誓死争夺，终于夺回阵地。整个交通沟敌尸狼藉，五连二排的战士也有很大伤亡。经过 5 个多小时激战，日军未能占去一寸阵地。从界集赶来一路日军增援，团领导命令二连连长孙存余带一个加强班，配合五连二排，杀退敌人 3 次冲击。敌人冲击失败后，又挑选特等射手，打伤二十六团战士七八名。孙存余拿起步枪，三发三中，打得敌人再也不敢露出头来。不久，20 多名日军再次进攻，进至 30 米时，战士们甩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在浓烟中，孙存余率领战士，挥舞大刀冲入敌群，左砍右杀，将 20 多名日军全部消灭。12 时 15 分，日军发射几百发炮弹，多次轮番进攻。孙存余率仅有的 10 名战士，和敌人肉搏 3 个小时，最后只剩下 2 人。这时，三排排长王学如、班长程明宽等 3

人增援，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张庄大院战斗同样激烈、残酷。100多名日军一窝蜂地冲向大院，五连三排战士沉着应战，抛出几十枚手榴弹和用机枪疾扫，迫使日军丢下三四十具尸体退去。8时30分，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30多名日军步步逼近。三排战士机枪、手榴弹并发。这股日军刚刚被打倒，又一股日军拥上围墙缺口。三排战士冲上去用大刀劈、刺刀挑，八班战士和敌人撕杀成一团。副连长戴春涛带领九班战士连续冲杀，激战延续半小时之久，敌人第二次进攻又被打垮。第三次日军用火攻，整个大院被烈火浓烟笼罩。战士们喘不过气，被迫伏在地面上。敌人又发起进攻。20多名日军向大院匍匐前移。戴春涛马上掷出一枚手榴弹，将敌机枪炸翻，紧跟着率队冲入敌群，挥起大刀向敌人砍去，将20多名日军消灭。五连三排只剩下8名战士，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大刀砍豁了。戴春涛到团部汇报，团部把仅有的4枚手榴弹交给戴春涛。戴春涛回到原地坚守，下决心誓死保卫阵地。戴春涛和战士们把搜集到的耙子、铁叉、爪钩等农具作为武器，准备与敌人搏斗。敌人从西巷冲了过来。8名战士手持农具，冲入敌群。戴春涛手起刀落，砍死一个日军小队长。敌人窜回后放燃烧弹，又在墙壁上挖枪眼，当第一个枪眼挖通时，战士就向洞里塞上一枚手榴弹，几十名日军全部葬身火海。

在曹圩东南门阵地，150多名日军成群向圩内发起猛烈冲击。坚守阵地的是四连三排，在排长耿立成指挥下，两个小时打退敌人3次进攻。整个阵地围墙坍塌，弹坑累累。战士们利用残墙和弹坑迎击敌人。日军不顾伤亡，多次向东南门冲击。战士们和敌人展开肉搏战，不少战士和敌人扭在一起同归于尽，少量日军攻入圩内。在千钧一发之际，副团长严光指挥重机枪手，暴雨般地向敌人扫射，圩门内外敌尸遍地，四连三排又夺回了阵地。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仅有的预备队“小鬼班”又冲入敌群，抢回大车，堵塞圩门。日军又冲上来，“小鬼班”弹无虚发，30多名日军应声倒地。敌人改变战术，交叉掩护，分组跃进，逐渐接近圩门。“小鬼班”的机枪、步枪吐出火舌，打得敌人满地翻滚，一束又一束手榴弹炸得敌人断肢

残臂。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小鬼班”勇猛顽强，反复冲杀。从早晨到下午3时，150多名日军对东南门计发起10多次进攻。圩门外遗尸累累，枪支弹药遍地，敌人未能跨进圩门一步。

下午4时许，第九旅旅长韦国清率骑兵增援，敌人开始溃退，第二十六团立即发起追击。到晚上10时，经过18小时的血战，朱家岗守备战胜利结束。此战共消灭日军280余人；第二十六团牺牲73名指战员，68名指战员负伤。

朱家岗战斗是淮北军民33天反“扫荡”中一次关键性战斗，狠狠打击了日伪军嚣张气焰，粉碎了日伪军摧毁淮北根据地党政机关及消灭新四军第四师的阴谋，使33天反“扫荡”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战后，陈毅代军长通电嘉奖，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

反“蚕食”、反伪化斗争 33天反“扫荡”胜利后，日军无力再对淮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遂改变策略，采取以军事进攻为主、其他手段相配合的策略，即在对淮北根据地实施反复“扫荡”“清乡”的同时，又以其所控制的据点和交通线为依托，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特务和文化等手段，对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和伪化，企图逐步扩大伪化区，从而达到缩小和摧毁淮北根据地的目的。

1942年夏季后，日伪军对淮北边缘区频繁进行“蚕食”性“扫荡”，企图完全伪化这些地区，以巩固其以徐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日伪军在当年冬季“扫荡”中，曾打通泗宿公路，并沿公路两侧进行“蚕食”，在该线归仁集至枯河头段增设据点11处；在淮泗地区侵占陈集、林桥、顺河集等处。由于日伪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伪化，淮北地区形势日趋紧张。1943年10月，伪淮海省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郝鹏举又提出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淮北、淮海等地“蚕食”抗日根据地。

日伪“蚕食”、伪化手段主要是在政治上搞欺骗宣传，实行怀柔政策，编组保甲，成立“反共自卫团”，企图诱使边缘区群众接受其伪化统治。在欺骗无效时，即露出凶残面目，对边缘区群众进行大

肆烧杀抢掠。一时间，各据点的日伪军纷纷向四周扩张，袭击和屠杀根据地地方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到处抓丁、抢粮。还利用反动地主、劣绅、土匪、会道门建立伪政权，编组保甲，加强特务活动，以欺骗、诱惑、镇压等手段奴役和残害根据地人民，加紧推行其“蚕食”、伪化政策。

为了粉碎日伪“蚕食”、伪化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1943年5月，淮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总结各地的斗争经验，进一步确定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以泗宿地区为中心，全面开展反“蚕食”、反伪化斗争。宿迁地区各县（特区）按照区党委制订的反“蚕食”、反伪化斗争方针和办法，以地方武装与敌纠缠，主力机动突击，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敌占区推进，向敌人游击，以攻为守，坚决打击向根据地深入之敌，不让敌人多安一个据点、多辟一条公路；同时加强日伪军工作，以动摇日伪军心，分化日伪；把灵活的武装游击、群众的合法斗争与伪军中的两面政策结合起来，努力开辟敌占区工作；加紧反特务工作，以断绝敌人的耳目；加强内部团结，以工农人民大众为基本核心，去团结地主绅士及商人共同抗敌；采取多种措施，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与破坏，全面开展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新四军第四师以主力一部分散配置于各边缘区，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决打击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同时发动群众破坏道路、圩寨，改造地形，开展游击战争，镇压汉奸敌探，相机进袭日军薄弱据点。

在泗宿公路沿线，军民不断打击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敌人。1943年2月4日晨，第九旅二十五团主力在泗北归仁集以南设伏，由地方武装靠近归仁集活动，诱使敌人出动。归仁集日伪军200多人被引入伏击圈，被二十五团主力包围，激战数小时，敌人被歼大半。3月1日，第九旅二十五团、二十六团各一部，一举攻克罗圩子敌据点，将敌全部歼灭，并将圩内10余个三层堡垒及周围铁丝网等全部破坏。此外，主力部队和民兵还拔除了苏圩、董圩等敌据点。泗宿公路沿线的敌人在遭到不断打击之下，被迫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不敢轻易出扰。

在斗争复杂的泗宿县苏圩区，敌伪据点林立，驻日军1个联队，伪军2000余人，顽军1个旅，还有小刀会、民团、土匪等反动势力，“蚕食”与反“蚕食”斗争非常激烈。苏圩区委为把这块复杂的地区逐步变为解放区，经历了艰苦的斗争。1943年5月，日伪军合击苏圩区，区中队长姜克带领区队边打边撤，击退敌人6次进攻。敌人撤退后，姜克带领区队又回到原地坚持。在日伪军威胁勾引下，利民乡副乡长叛变，信义乡乡长企图叛变，被立即捕获关押，挫败了敌人阴谋。日伪军以300多人的优势，突然将区队两个班包围起来，副排长许永田带领战士英勇拼搏，子弹、手榴弹打光，就进行肉搏战，砍杀敌人数十人，除两人幸存外，其他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之后，第九旅二十六团在区队配合下，攻打西小圩敌据点，使苏圩区复杂斗争局面缓和下来。

在淮泗地区，日伪军不断向外扩张，分割根据地基本区。淮泗地区军民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围困与封锁日伪据点，并向敌占区挺进，不断打击敌人，取得很大的胜利。1943年2月27日晚，第四师骑兵团袭击驻三棵树的伪军自卫队。该伪军分驻南北两圩。骑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入南圩。伪军退到北圩固守，依堡顽抗。骑兵团加以火攻，将圩内伪军全部消灭。12月12日，驻洋河的伪军50人进入众兴，经胡园时，被淮泗地区的民兵阻击。泗阳大队一个连及运河特区一部闻枪声赶到，将伪军包围并全歼。淮泗地区军民主动出击，将敌人向根据地“蚕食”时在顺河集、陈集、林桥等设立的据点一一拔除。

淮北根据地各边缘区纷纷开展反“蚕食”、反伪化斗争，在1943年一年中，先后拔除了罗圩、苏圩、董圩、林桥、顺河集、叶场等处的26个据点；共恢复与开辟了13个区、72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收复2000多平方千米国土；从敌人铁蹄下解放50多万人民。至此，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基本上遏制住了日伪的“蚕食”、伪化活动，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春季攻势 1944年春季，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反

法西斯力量逐步夺取了战略主动权，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欧洲战场，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已被迫投降，德国正遭受着英美等盟军和苏联红军的两面夹击。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经过中途岛等一系列海战，受到英美等盟军的沉重打击。法西斯势力逐渐处于守势和行将覆灭的困境。在此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为了挽救其失败命运，于3月中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方针，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一败涂地。在日军进攻河南时，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使中原广大地区沦于敌手。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人民抗战方针，从1944年开始，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进行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为了策应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破坏敌军调兵计划及配合淮海、山东等地反“扫荡”，淮北苏皖边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在根据地人民支援下，从3月21日起，沿边区周围各重要交通线，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在横宽数百里的战线上，协同作战，对日伪军各据点同时发动了猛烈进攻，开始了伟大的春季攻势。

4月5日，第九旅第二十六团切断泗宿公路，在连续攻克河涯徐、新关、老韩圩敌据点后，为配合民兵围困归仁集敌据点，将至埠子集的公路破坏。15日凌晨，30多名日军乘两部汽车向埠子撤退，当其行至侍卫圩子附近时，遭到第九旅第二十六团和骑兵团第九大队伏击，被全部歼灭。归仁集敌人闻风丧胆，遂于第二天晚趁夜色逃跑。归仁集据点不攻自破。同一天，第九旅第二十五团一部在仓集附近埋设地雷，炸毁敌汽车多辆。26日夜，第九旅第二十六团一部及泗县总队一部趁伪淮海绥靖军第三路蔡介石加修蔡圩据点时，出其不意地冲入圩内，大获全胜。次日，挟余威围攻双蔡圩。5月1日，双蔡圩敌人趁第二十六团阻击宿迁增援之敌时突围逃走，该圩遂被收复。3日，凌城、埠子、三棵树日伪军分三路进攻杨圩区。第四师步骑兵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打击其中一路敌人，将睢宁伪第三区队大部歼灭，其他两路敌人闻风丧胆，赶紧撤回。

在运河沿线，第四师部队于4月不断向伪第二十八师驻地七堡、

洪庙、和尚庄等地袭击，并向伪华北支队韩雄部发动了有力进攻。27日，又连续攻打伪第二十八师潘干臣部。当晚，第九旅第二十六团一部攻下冯庄据点，全歼伪军一〇一团二营。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分别袭击了武墩、余坝、史炮楼等地。

淮北根据地的整个春季攻势到5月5日止，历时45天，共进行大小战斗6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6处，毙伤日军523人，俘虏伪军1296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根据地军民大获全胜。在春季攻势中，泗阳县长兼总队长谢骥、大队教导员陈彬等91名指战员牺牲，团政治处副主任周吉一、营长尹瑞九等292名指战员负伤。

这次春季攻势绝大部分为攻坚战、歼灭战，反映了淮北边区军民的雄厚实力，证明了新四军第四师部队经过战争锻炼已经成为一支能征善战、有良好军事素质的正规兵团。春季攻势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有力声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以及淮海、山东解放区的反“扫荡”，解放了大片国土，使泗宿、泗灵睢、宿北等县完全连成一片。在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敌人只能孤守在若干点线上。

第二节 淮海抗日根据地粉碎 日伪“扫荡”“蚕食”

一、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主力实行地方化

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奉命向津浦路东转移，为统一领导，皖东北划归第四师活动地区。第四师第十旅在崔集一带休整后，开赴洪泽湖以北和以东地区，开展边沿斗争，同时整训部队。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四师第十旅与第三师第九旅互调建制，原旅、团番号不变。同时命令第十旅由皖东北进入淮海区，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区，司令员由第十旅旅长刘震担任，原淮海军区司令员覃健改任副司令员，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兼任政委，高农斧兼任政治部主任。10月8日，淮海军区召开全体军人会议，刘震在会上作了关于淮海区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及斗争方针的

报告，号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为巩固和扩大淮海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对于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第十旅部分指战员起初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正在盐阜的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通知第十旅旅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到盐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刘少奇说：“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新的局面，第十旅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淮海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又说：“你们不要犹豫，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这不是回头路，是坚持和发展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刘少奇的讲话，使第十旅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逐步形成共识。不久在程道口战役胜利后，第十旅在反顽斗争胜利的欢乐中，在思想上弄通了实行地方化重要意义基础上，像撒种子一样，迅速地在淮海区“化”下去。1942年春，第十旅第二十八团一、三营并入第二十九团，第二营充实淮海独立团、滨海大队和沭河大队。

11月，根据军、师部的指示精神，为了更好地适应反日伪“扫荡”的需要，分地区坚持斗争，以主力加强地方军，使主力进一步地方化。新成立的以黄克诚为书记兼司令员、政委的苏北区党委、苏北军区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民协调行动，同时将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淮海军区改为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和军分区遂将全区划为灌沭、泗宿、潼宿海、淮涟4个地区，分别建立4个中心县委，并将第十旅第二十九团全部和第七旅第二十一团第一营及淮海地方武装合编为4个支队，分别在4个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其中，第一支队活动于灌沭地区，支队长沈启贤，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张克辛，下辖一团（原沭阳独立团）、二团（原滨海大队）、三团（原第二十九团第二营）。第二支队活动于泗宿地区，支队长张万春（后为冯志湘），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石瑛，下辖四团（原泗阳独立团）、五团（原沂河大队）、六团（原第二十九团一、三营各一部）。第三支队活动于潼宿海地区，支队长覃健（兼），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章维仁，下辖七团（原东海独立团）、八团（原沭河大队）、九团（原马陵大队）。第四支队活动

于淮涟地区，支队长钟伟，中心县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张彦，下辖十团（原淮阴独立团及第二十一团一营一部）、十一团（原第二十一团一营一部及淮涟大队）、十二团（原淮涟地方武装）。此外，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地方武装（县总队或独立团）。

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之后，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残酷的对敌斗争和日伪“扫荡”“蚕食”，淮海军分区于1943年6月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运动，于7月正式颁发文件，提出“模范兵团”的三大标志，即提高战斗力，改进战斗作风；巩固扩大部队，提高部队质量；严肃军队纪律，贯彻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贯彻，运动收到了良好效果。4个支队战术提高，战斗力旺盛，出色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11月7日，淮海军分区在泗沭县史老庄召开创造“模范兵团”运动总结大会，副政委吴信泉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全区12个团分别受到表扬，并各获得奖旗一面，同时得到表扬的还有模范干部134名、模范党员252名、模范战士261名。至年底，这一运动初步告一段落。

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军民，主力部队地方化在淮海区全面开花结果，使人民武装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建立起武装；两年前不足100人的区中队，发展成为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模范兵团”运动的开展如虎添翼，使人民武装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淮海区人民武装成为淮海区军民粉碎日伪军“扫荡”的主力军。

二、反日伪军“扫荡”斗争

1941年初，日军为了巩固对南京、上海、徐州、连云港等地的占领，频繁调动兵力，在“扫荡”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乘新四军重建军部、整编部队、调整战略部署之际，策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妄图摧毁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日伪军第一次向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期间，日伪军亦用相当多的兵力控制了淮海区的交通要道和重镇，依托众多据点，经常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扫荡”“清剿”。1941

年6月20日，宿城日伪军配合伪八区东挺大队计200余人，向保安圩进犯，在老张圩附近遭到地方武装和民兵顽强抵抗。战至正午时分，县、区、乡队民兵约200多人从四面向老张圩发起猛攻。敌人惊慌失措，两次放出通讯鸽子向宿城日军求援，均未能得逞，只得放起烟幕弹，趁着烟雾向北逃窜。此役之后，宿城之敌轻易不敢东犯。7月下旬，驻沭阳日军三浦小队长派七区伪军“扫荡”县西南乔王尚庄，被乔王尚联庄会武装和赶来增援的泗沭县独立团打败，敌人死伤18人。乔王尚庄被誉为“铁打乔王尚”。8月，日军一个连队从沭阳城出发，向阴平、北新集镇方向开去，在扎埠荡与沭河大队一个营正面相遇，被消灭20多人。12月11日，沭城日军第二十一师团阪本警备队和伪军张化南保安大队300余人，联合“清剿”驻在扎埠东北麦墩、牛墩一带的新四军三师主力部队和沭宿海县委机关，企图控制沭（阳）新（沂）公路中段，切断苏北和鲁南两个根据地的交通。沭河大队配合新四军三师主力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斗，经过半小时浴血奋战，歼敌百余人，其中日军50余人，迫使敌溃逃。此后，沭阳日伪军又多次“扫荡”，均被根据地军民击溃。1942年4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和淮海军区武装一部，在淮涟地区先后进行王营、高庄、王圩、小成集、苗何庄、陈师庵、王集等战斗，重创日伪军。活动于沭阳西及西南的新四军独立旅，在运河东侧和沭宿公路上进行了浪石、新店战斗，给日军以痛击。7月，新四军独立旅第三团第二营在宿迁陆集进行反“扫荡”作战。在激战中，营长朱启勋在肚肠被刺破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指挥战斗，终因伤势太重，壮烈牺牲。

1942年11月14日，在发起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同时，日伪军对淮海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14日下午，日军华北派遣军以第十七师团藤原联队为主和伪军第三十六师李实甫部，计8000余人，由泗阳、淮阴、涟水以及新集镇等地分9路出动，合击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小胡庄、张圩，妄图一举扑灭首脑机关，进而摧毁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淮海区的民兵和各分散部队对日伪军进行顽强抵抗，党政军机关及时跳出了敌人的合击

圈，顺利转移到泗沭地区庄圩一带。淮海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灵活转移，分散坚持，在有利条件下，积极打击敌人。淮海军分区主力一部和沭阳县独立团，于小店子、塘沟、马渡一线相机打击北犯之敌。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一部，于丁集阻击由淮阴出犯的 400 余名日伪军。第十旅第二十九团一部袭扰杨口据点之敌。敌人合围扑空后，更加疯狂，在淮涟地区及六塘河两岸古寨、徐溜等中心地区反复进行“扫荡”，分 30 路寻找淮海军分区机关及主力，淮海区主力部队从敌控制的间隙里穿插，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沭阳、淮阴、涟水等县独立团相机袭击官田、十字桥敌据点，予敌以很大威胁。

日伪军为控制淮、涟、沭地区，从 11 月 28 日起，在沭（阳）淮（阴）、泗（阳）沭（阳）、沭（阳）赣（榆）、新（新安镇）宿（迁）公路及六塘河、沭河沿岸地区，安设了 18 个较大的据点，构筑碉堡，恢复公路，对被其分割的地区实行封锁和“扫荡”，妄图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其占领区。针对敌人依托公路安设据点，推行伪化的阴谋，淮海区军民于 12 月发动了第一次交通破击战，有 2 万余群众参加，使纵横于全区的 7 条主要交通干线大部不能通车。第二十九团袭击了徐桥伪据点。第十九团在杨集、浅上集一带与日伪军作战。各县独立团到处打击出扰之敌。各地民兵自卫队于 12 月中先后伏击、袭击了由朱圩、古寨、马家圩、陈师庵等据点出扰之敌，迫使日伪军缩回据点。此间，各部队主动向日伪据点发起进攻，先后攻克部分据点。但由于在淮海地区活动的独立旅奉命北返山东，归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加上日军兵力、装备处于优势，少数反动分子与日伪勾结，为虎作伥，因此，坚持一个月以后，沭淮、沭赣、新宿等 350 千米公路又被敌修复打通。日伪在公路沿线两侧新设 349 个据点，根据地又被分割为几个小块，部队以连为单位活动，日夜要数度转移。为了改变严重的困难局面，淮海地委决定实行中心县委制，并建立 4 个支队，以适应分割地区坚持斗争的需要。

从 1943 年 1 月 5 日起，淮海区军民展开了对日伪军的第二次交通破击战。各地普遍开展了“破”“拆”“打”“动”的运动。“破”

就是改变地形，做到路路皆通、沟沟相连，跳出交通沟，或主动出击，或与敌周旋；“拆”就是拆敌人碉堡、据点、土圩子；“打”就是“打狗”，扫除部队夜间活动障碍；“动”就是动员人民群众和地方开明绅士积极参加抗战，做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同心同德，打击日伪。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4个支队采取袭击、围点打援战术，对六塘河两岸的日伪军多次发起攻击，先后攻克了马厂、岔庙等10多处日伪据点。到2月上旬，淮海军民共破坏交通线150余千米，使沭（阳）马（厂）之间公路完全瘫痪。这一系列斗争把反“扫荡”以来严重形势稳定了下来，把敌进我退的局面变为敌我相持的局面。

三、反“蚕食”斗争和1943年夏季攻势

日伪军在大规模“扫荡”失败后，即改用“蚕食”、伪化的办法，对根据地边缘地区以其控制的据点为依托，由点线变为面的占领，达到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缩小或分割根据地的目的。1943年4月，日军为了控制（东）海沭（阳）、宿（迁）沭（阳）、新（安镇）沭（阳）、淮（阴）沭（阳）公路和六塘河，推行伪化，加紧了“蚕食”出扰、抢劫活动，并在柴米河两岸增设了范场、南余据点。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伪化，保卫麦收，4个支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发动了对日伪军的夏季攻势，首先向六塘河南岸连五庄伪军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克了该据点，生俘伪军715人，缴获步枪612支。活动于沭宿地区的第三支队，攻克了沭河北安峰山地区的陆楼、李圩等据点。4月20日晨，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第二营与进犯东鲍圩的日伪军150余人遭遇，激战1个多小时，毙日军40余人、伪军11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步枪120支。5月5日，第二支队独立第六团在沭河南攻克宿新公路上的晓店据点，毙伤伪公安局长以下20多人，俘伪中队长以下40多人，缴获步枪40多支。

为了打破日伪封锁，保卫麦收，制止日伪的“蚕食”活动，5月10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以第一支队配属第二支队独立六团和特务营，发起围攻日伪中心据点塘沟的战斗。在攻打塘沟时，新浦、

淮阴、涟水的日军 160 余人、伪军 270 多人前来增援。第二支队打援部队于姜庄、王庄迎击敌人，先后打退敌人 3 次进攻，将其围在姜庄、王庄路沟内。日军 3 次施放毒气，至黄昏狼狈溃逃。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 40 人、击伤日军 65 人，击毙伪军 30 人，俘虏投降的伪军 200 余人，同时拔除了塘沟及附近据点，收复了广大区域，打开了沭阳东南地区局面，打通了淮海区的东西交通。6 月 3 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及第三支队打响万匹战斗，全歼伪张化南第二大队五中队。8 月 16 日，第一支队对位于沭（阳）、泗（阳）、涟（水）中心的水陆交通枢纽钱集发起攻击，俘伪中队长以下 50 余人。第三支队为策应钱集战斗，围困桑墟，在打退日伪军 400 余人的增援后，收复了桑墟。在此次战斗中，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兼七团团团长宋耀南（宋光璧）身负重伤，不幸牺牲。与此同时，各地武装和民兵，普遍利用“抗日沟”迫近日伪据点，寻机打击敌人，并以堵截粮草、填井断水和坑道作业等手段，围困日伪的孤立据点，开展争取与瓦解伪军工作，迫使敌人撤出 20 多处据点。至 8 月 20 日，历时 130 天的淮海区夏季攻势胜利结束。这次攻势的胜利，使六塘河两岸及东灌、沭宿部分地区人民重获解放，恢复了 70 多个乡的抗日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深入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伪化之敌，斩断日伪军企图分割、封锁淮海区的沭（阳）淮（阴）、沭（阳）赣（榆）、沭（阳）杨（口）、沭（阳）泗（阳）等公路之企图，从而扭转了淮海区的整个局面。

夏季攻势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控制运河一线，策动运河两侧土顽暴动，破坏抗日政权，阻碍抗日武装的活动。对此，淮海地方武装配合第七旅主力一部，于 9 月中旬对宿北顽县长郭霞轩部进剿，歼其大部，攻克据点 21 处，开拓纵横 10 余千米的游击区。泗沭地区土顽赵子玉部 700 多人，盘踞众兴、来安、葛集三角地带，出入日伪据点，配合日伪军“扫荡”。第三师第七旅、第十旅对顽军的挑衅给予坚决斗争。9 月 15 日，淮海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向土顽赵子玉、戴传道部等发起反击，歼其大部，俘顽泗宿游击总指挥戴传道等人，其余顽军逃往日伪据点投敌。

日军为了保持淮海区的战略交通，恢复已失去的据点，紧接着进行报复性“扫荡”。8月20日，日军集中第七十二旅团各大队一部共1300余人、伪军2800余人，由少将旅团长村上到沭阳督战，分兵五路“扫荡”沭（阳）泗（阳）等地区，企图肃清六塘河、柴米河三角地区。在地方抗日武装的不断打击下，日军的“扫荡”仅一周时间就被粉碎。时隔几天，日军新调伪苏淮特区直属保安队一个团，由保安副司令员孙端率领到沭阳，企图控制六塘河、沭淮公路，切断根据地的东西战略交通。在当地抗日武装的连续打击下，日伪军的企图又一次被粉碎。

1943年，淮海军分区司令部在领导人民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取得了辉煌战绩，共进行大小战斗820次，缴获敌各种枪械302支、各种枪弹31033发，拆毁敌碉堡128座，俘虏日特务班长1人、指挥官25人、伪军官189人、伪军1728人，击毙日军175人、指挥官11人、伪军2352人、伪军官126人，攻克日伪军据点93个。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终于赢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顽军的破坏和摩擦

一、韩德勤部破坏抗日的活动与汤恩伯部东进

韩德勤和部属王光夏都是泗阳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韩德勤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抗战前期曾率部反击日军侵略，但其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8年时即下令解散受共产党影响的苏北抗日同盟会，王光夏等部屡次进攻宿迁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共产党地方抗日武装，残杀共产党员和地方抗日干部群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配合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不断挑起摩擦，掀起反共高潮。韩德勤在苏北地区贯彻反共方针，变本加厉地寻衅、夹击新四军。在豫皖苏边区，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集团军于5月侵占豫皖

苏边区后，得陇望蜀，妄图东进苏北，配合韩德勤部东西夹击新四军第四师。7月20日，在日伪军大举进犯盐城的当天，韩德勤即令所属保安第三纵队王光夏部进攻驻涟水、淮阴、宝应、泗阳的新四军部队，在穿城、王集、大兴庄、悦来集一带屠杀抗日群众，强缴新四军独立旅枪械；令余土梅部侵犯涟水、泗阳等地，配合王光夏部策动、支持当地反动势力暴动；还组织数百名所谓“别动队”，捣乱后方，捕杀抗日人员。同时，千方百计勾结日军，策动部属投敌。苏北各地反动势力甚嚣尘上，收缴民枪，威逼群众，组织连庄会，阻止共产党和抗日武装活动并乘机建立许多顽据点。

1941年秋，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更为彻底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一元化“总力战”。在战术上运用优势兵力，分区“进剿”，分进合击，加修公路，安设据点。经常分布在淮海区活动的敌伪军六七千人，系敌十七（平林）师团、五四（森田）联队及八一（平岛）联队，其中一个大队驻淮（阴）、涟（水）、泗（阳）地区，一个大队驻新集镇、响水口，一个大队驻灌云、沭阳、新浦一带，一个大队驻宿（迁）新（安镇）公路及运河线上，其主力分布在陇海线上，总兵力2000余人。此外，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十六师李实甫部两个旅，其第七十二旅彭朋占领灌云、沭阳一带，约2000余兵力；顽徐继泰活动于淮海、盐阜区之间。各县伪警部队也有很大发展。1941年，淮海区敌伪据点51个，到1942年已增加到100余个。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淮海区的力量不仅日益增大，而且与日伪沆瀣一气，互为呼应，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根据地。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东西对进夹击淮海、淮北根据地的形势，新四军军部指示淮海、淮北等党政军机关应在积极准备对付日伪发动大“扫荡”的同时，由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通力协作，开展反摩擦斗争，以巩固与发展胜利局面。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各地党政军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顽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坚决反击。

程道口战役、山子头自卫反击战给韩德勤部以沉重打击，从而使整个苏北地区一直存在的与日伪、顽军斗争的复杂局面基本结束。

二、程道口反顽战役

1941年春夏之交，韩德勤部乘日军大举向盐阜区“扫荡”之机，令保安第三纵队王光夏部两个团在程道口、仰化集、史家集等处构筑坚固据点；令刘立卓、余士梅率两个团兵力进至涟水西北大兴庄、新渡口和张官荡处构筑据点，并和灌东向西侵犯的徐继泰部相呼应，企图控制运河中心，切断苏北抗日根据地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以便尔后向淮海区推进，策应由豫皖苏地区东犯的顽固派汤恩伯部，扼杀淮海区 and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程道口位于泗阳县城西北的运河东岸，据点由陈圩子、小圩子、老圩子3个相连的圩寨组成。守敌王光夏部1400余人，在据点内筑有堡垒及地道等坚固工事，四周有一道6米高的围墙，两道5米深、3米宽的外壕，4道铁丝网，200米内射界皆扫清。王光夏部凭借坚固的工事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并在其他国民党军的协同下，固守待援，使淮海抗日根据地遭到了直接的威胁和破坏。新四军盐河与运河的交通也有被切断的危险。

面对韩德勤、王光夏部的进攻，新四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决定由代军长陈毅亲往指挥。为牵制韩、王的力量，掩护程道口作战部署，在黄克诚的指挥下，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于9月集中兵力攻克了日伪号称“模范工事”的郑潭口据点，全歼伪军孙礼陶部600余人，拔除了日伪插入淮海与盐阜地区之间的一颗钉子，取得了苏北攻坚战的大捷，扩大了益河以西、涟水以东、响水口以南的根据地区域，也为攻打程道口提供了经验。

10月中旬，程道口战役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代军长陈毅在淮阴县古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淮海区党委领导人金明、杨纯，独立旅政委罗华生，第十旅旅长刘震，第十九团团团长胡炳云等参加了会议。陈毅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报告，后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对程道口战役作出详尽部署。程道口作战方针是攻点打援，兵力部署为：以第七旅第十九团胡炳云部附一个山炮连，位于程道

口西北向东南主攻；以独立旅一团位于程道口东南向西北主攻；以第四旅第十团秦贤安部位于六塘河南岸渡河向东攻击，并以第十旅刘震、康志强部位于淮阴、涟水间盐河西岸，阻击可能由曹甸西援的韩德勤部队；以位于东沟、益林地区的彭明治、朱涤新第七旅尾击可能西援的韩德勤部；以成钧、赵启民第五旅位于淮阴、淮安运河西岸，阻击可能由淮阴出扰的日伪军，并视情协同第十旅歼灭韩德勤的西援部队；以第四师黎同新的骑兵团位于八集，准备机动驰援各方的战斗；另第四师派必要部队向泗阳县城、洋河镇警戒；淮海区独立团向仰化集、宿迁和众兴集、渔沟方向警戒。在陈毅代军长的统一指挥下，各部于14日进入集结地点。15日，在程道口东5千米处构筑一个碉堡，安上电话机作为临战指挥所，陈毅代军长亲临这里指挥作战。各有关部队即开始扫清程道口之外围据点，以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迅速攻克了史集、仰化集、丁庄、毕庄、张庄等地，顽敌被逼全部龟缩于程道口，据险固守。

从15日开始，在淮海区党委、淮海军区的领导下，泗沭、泗阳各乡干部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战前准备工作。他们纷纷召开群众大会，愤怒声讨王光夏部的罪行，表示驱逐王光夏部的决心。仅六塘河北岸12个乡，即组织起4000余人的支前大军。当时正值秋收时节，遍地山芋、花生、黄豆急待收割，但人民群众宁可迟收几天，也要支持新四军把王光夏除掉。在临近决战的日子里，支前民工自带干粮、铁锹、扁担和绳床，一支支工程队、运输队、担架队通过第二运输站，沿着六塘河畔前往程道口战役前线，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10月19日，第四师奉陈毅命令，从师部赶到程道口参战。在途经洋河镇以南地区时，彭雪枫率部消灭了顽王光夏的第二支队，俘虏了支队长李守宽以及其副官以下100余人。

程道口战役是一个典型的阵地战。由于程道口周围都是开阔的平地，在攻围时易受围内火力射击，担任主攻各部便开展近迫作业，从四面八方围子附近挖沟，利用坑沟掩护前进，以避免火力杀伤。经过3天准备，20日下午3时，程道口战役总攻正式打响。担任主

攻程道口中心据点的第七旅第十九团和独立旅一团负责清除障碍的突击队首先行动。破坏组负责砍铁丝网；填壕组负责填平壕沟，或在壕沟上架设供部队通过的桥梁；运梯组负责把长梯运至高墙下，供攻击时登围；手榴弹投掷组专打手榴弹，掩护突击冲锋。尔后，在迫击炮、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进攻西小圩的第十九团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冲上去，经过4小时冲锋肉搏，攻占了西小圩。但第一团对东小圩的攻击未能奏效。21日晚8时，攻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再次发起冲击，激战3小时，攻克东小圩和老圩子两据点，除王光夏率百余人逃窜外，守敌大部被歼。

此役共毙伤顽军100余人，俘1230余人，缴步枪850余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12挺、炮2门，无线电台2架，战马38匹，各种弹药4000余发，以及其他各种物资。

程道口战役结束后，参战部队继续扩大战果。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第二十九团北进东灌沐地区，配合滨海大队打击徐继泰部，经十余次战斗，毙、俘顽500余人，迫其停止进犯。在各地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也积极配合作战，打击日伪军的出扰。企图增援王光夏的余士梅部，被迫退回原地。

程道口战役的胜利，粉碎了韩德勤依托运河两岸为反共基地及配合津浦路西王仲廉部东西夹击新四军第四师的企图，新四军取得了控制运河两岸的主动权，打通了淮北与苏北的联系，使淮海、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扩大了淮北根据地，稳定了运河西岸泗阳、泗宿、淮泗地区的形势。

三、山子头自卫反击战

1943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德、意、日法西斯已处于不利地位。日军为了稳定苏北战线，确保太平洋战线的后方供给，决心毁灭性“扫荡”苏北地区的韩德勤总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及新四军军部，出动万余人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和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发动大“扫荡”。在敌伪“扫荡”前，韩德勤部与新四军第三师师部代表经过数日商谈，双方约定，如果日军向韩德勤部“扫荡”，第三师

即配合作战，牵制敌人，韩德勤部在不得已时可向第三师之防区指定地点转移。韩德勤部代表向第三师师部代表保证，敌向其“扫荡”而向抗日根据地转移时，对抗日根据地地方政权、民众团体不予侵害，予以保护；敌“扫荡”停止时，即返原防。2月12日，日军由湖垛、宝应、淮阴、淮安及涟水等地出动，向韩德勤部合击，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和泾口。韩德勤部不战而溃，一部投敌。新四军第三师信守诺言，在军部统一命令下，向敌伪据点频频出击，分散日军兵力，切断日军退路；并且还掩护韩德勤部退入淮海根据地的淮阴、涟水、苏家嘴之间休整，同时，又在粮草、经费等方面给予接济。新四军第三师这种光明磊落的行动，博得了各阶层舆论的赞扬和韩德勤部广大士兵的感激。

为了支持韩德勤部，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分三路强袭洋河敌据点，激战5个小时，摧毁碉堡20余座，将敌全部歼灭。在攻下洋河敌据点之后，第九旅部队积极扩大战果，又强袭海（州）郑（州）公路沿线的田河、邱圩子敌据点，摧毁其全部工事，将敌全部歼灭，以实际战斗给予配合。

然而，在日军停止“扫荡”后，韩德勤却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不仅不“即返原防”，反而在“南返原防、收复失地”的烟幕下，于3月1日突然向西侵占淮海抗日根据地里仁集、程道口等地。新四军第三师以抗战大局为重，当即派人前往婉言规劝，晓以民族大义，呼吁团结抗日。但韩德勤执迷不悟，又于3月14日亲率第八十九军、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部，偷渡运河，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青阳镇东北的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并令第八十九军赶到安徽省灵璧县以北地区接应王仲廉部东进。

山子头是成子湖西北岸的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土岗子，岗上有孙圩、韩圩、王圩、裴庄等主要村庄，韩德勤部侵入山子头地区后，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分别盘踞在这几个圩子里，韩德勤总部设在王圩比较坚固的地主庄院里。他们对根据地地方政权、民众团体百般破坏，逮捕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中扬区副区长，缴了中扬区区队的枪械，杀害伤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并召开“绅

士会”，妄图委任他们的区长、乡长。韩德勤这种肆意摧残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为此，新四军军部决定集中兵力自卫反击。

根据军部命令和当前敌情，第四师师部决定于3月17日夜发起山子头战役。师长彭雪枫和参谋长张震亲临界头集指挥。由第九旅第二十七团担任主攻，围歼山子头韩德勤总部及保安第三纵队；第九旅第二十五团由南向北攻击，以主力围歼王圩、裴庄之敌，用一个营围歼韩圩特务营；第九旅第二十六团由北向南攻击，并用一个连警戒唐莫圩之敌；第十一旅攻击盛圩独立旅；其余部队和地方武装阻击王仲廉部东犯；第七旅第十九团到达后作总预备队。

17日黄昏，各部均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担任主攻的第九旅于15时在马宅以东集结。20时，第二十五团和第二十六团分别由驻地出发，向山子头方向前进。23时许，突然下起大雨，给攻击部队行军增加困难，但韩德勤部也因此放松了警惕。第二十五团和第二十六团遂由两路改为多路平行急进。23时30分，第二十六团担任突击任务的一个营进至山子头北侧，其第三连即向唐莫圩构成警戒阵地，切断了驻山子头韩德勤部的退路。18日零时，雨暂停，山子头的警戒哨兵躲在房内，其官兵大部入睡。第二十六团一营二连迂回到孙圩东北，第一连在孙圩西北，同时向保安第五团发起袭击。第二连连长带部冲至一所院前，遇哨兵正烤火吸烟，当即将其俘虏，一枪未放即突入房内，敌人从梦中惊醒就做了俘虏。第二十五团以一个营直插韩圩，其第三营七连由西南侧向裴庄发起攻击，第八、九连分别由西侧与东侧对王圩达成合围。此时，各部对山子头韩德勤部已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完成合围后，即实施大胆穿插，将孙圩、韩圩、王庄、裴庄予以分割，使韩德勤各部不能互相增援。18日2时，驻孙圩、韩圩的保安第五团和特务营被全歼。驻唐莫圩的保安第六团向东北逃窜，第二十六团三连实施追击，歼其一部，缴获其全部战斗物资。此时，第二十五团八连二排登上韩德勤总部大院屋顶，向院内投弹、扫射，第一排在圩寨外压制裴庄敌人火力，指导员率第三排用机枪封锁院门，将韩德勤压缩在院内。第八连用火烧着了

韩德勤总部屋顶，乘其慌乱之际突进院内，第八连指导员头部负伤，未等包扎即带4名战士冲入韩德勤住房内，当场击毙王光夏，生俘韩德勤。到18日4时左右，山子头地区敌人全部被歼。对盘踞在山子头北侧的国民党独立第六旅，各攻击部队统一于18日午后发起进攻，至下午2时左右解决战斗。

整个山子头自卫反击战，从攻击开始至战斗结束，计15个小时。此役全歼韩德勤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千余人，击毙王光夏和独立旅旅长李仲寰，缴获轻重机枪56挺、炮2门、掷弹筒6个、长短枪750余支。

3月25日，陈毅从黄花塘军部到半城第四师师部处理韩德勤问题。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顾全大局、以团结抗战为重的指示精神，将韩德勤释放，发还部分枪支，并划出睢宁、宿迁间的凌城、埠子、邱集一带为其驻地，以促使其共同抗日。4月1日，陈毅为韩德勤饯行，新四军第四师备牛车送其出境。韩德勤到达皖北阜阳后，奉令去重庆，改任鲁苏皖三省边区游击总指挥，仍兼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山子头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王仲廉两部东西夹击新四军的阴谋，最后铲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内的反共堡垒，保卫了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

第四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军工作

一、淮北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自1938年秋开始，在中共皖东北特支、皖东北特委和苏皖区党委领导下，皖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效，为皖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40年3月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统一战线工作继续得到推进，推举第五游击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祖树屏为皖东北抗战推进委员会主任，开明绅士、国民党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秘书陈粹吾为代理专员，聘请爱国民主人士孔祖

南、吴静宣为参议会正、副会长，社会各界和衷共济，共同开展抗日工作。

1940年秋，由于根据地主力部队东进开辟淮海区，日伪顽匪联合进攻皖东北，有些统战政策落实不够，出现不少地主逃亡、资本家不敢开业等问题。1941年上半年，根据地恢复，新四军第四师移师皖东北。淮北区党委成立后，针对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安定社会、稳定人心、团结抗日，首先纠正了过左的政策，在一定限度内保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颁布了保护财产法案。为争取逃亡地主回家，新四军第四师发布公告，表明态度，保证他们身家性命的安全。同时召开绅士座谈会，申明共产党的态度是保障人权，批评违反政府法规的现象，指出各阶层要联合一致抗日，申明抗日民主政权是“三三制”。加强同地主、资本家的联络工作，由统战部和政府人员出面访问绅士，进行联络工作。组织各种委员会，请地主、资本家参加，如扩军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等，并请他们参加教育工作、政权工作，聘请他们作参议。为保护工农基本群众，淮北区作出四项规定：一是改善他们的生活有限度；二是建立阶级的独立组织（工、农救会）；三是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进行策略教育；四是发动农民参战。对商人的政策，主要是保证商人的自由，并禁止商业垄断，营业税不缴，维持治安，生活太平。对地方流氓的政策，是争取他们中立，逐渐进行改造，吸收他们参加农救会，参加劳动，动员他们参军参战，给予生活出路。对于青帮分子的政策，是不干涉他们的组织，也不帮助发展，吸收会众加入农救会，改善他们民生，并打击其中的破坏分子。对于会道门的政策，是坚决扑灭坏分子，对于基本群众争取他们参加抗日部队，同时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阶级分化。对于宗教的政策，是保护信仰自由，尊重佛教救国会，实行共同抗战。经过淮北区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各级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167个逃亡地主大都回来，工农基本群众大都动员起来，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家、店铺老板

重操旧业，改造了会门、帮派和流氓，打击了坏分子。1942年10月13日，新四军第四师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政治报告总结说：“自去年行政公署宣告成立以后，一年之间，边区党政军民都在抗战民主的大旗之下，日益走向大团结，如军民之间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团结，各阶层团结，各地方团结，教民之间的团结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为充分发挥各级参议会的作用，巩固发展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淮北根据地加强了参议会工作。1941年8月下旬，皖东北行署参议会改称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由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区委书记刘子久兼任参议会会长，爱国人士吴静宣任副会长，并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调整充实了参议会驻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了参议会的职权：选举与罢免行政委员会与政府负责人；监督与弹劾各级行政人员；讨论与决定政府立兴与立革的事项；通过政府的预决算方案；议决政府及群众提交议事项书等。参议会由咨询机关变成权力机关。1942年4月18日，为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吸引广大人民参加政府工作，使政府能够确实代表人民利益，并为人民监督管理，淮北行署拟定了《淮北苏皖边区县以下各级代表大会（县为参议会）组织法、选举法》草案，经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讨论通过后公布实施。在淮北区党委组织领导下，淮北行署和各县、区、乡政府，认真筹建县参议会和区、乡代表会，尊重参议会的权力，发挥参议会的作用。1942年9月，经参议会通过的法规议案共有156件，先后有8个县建立了临时参议会，有的区乡建立了代表会，人员组成上基本符合“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要求，并认真行使职权，发挥作用。10月中下旬，淮北苏皖边区第二届参议员大会召开，对淮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生产、法律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作出决定。大会闭幕后，授权驻会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在参议长刘子久、副参议长吴静宣组织领导下，到1943年12月6日共召开8次常务会，会议所决议案件、通过法规，均交政府执行，并经常检查其执行情况，协助实施。到1943年年底，全边区14个县中，有8个县召开了参议员代表大会。其中7

个县共有参议员 458 人，其阶级成分为雇工 12 人，贫农 71 人，中农 119 人，富农 70 人，地主 130 人，商民 17 人，其他 39 人。在泗南县的 75 个参议员中，党员 27 人，不到三分之一，充分体现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性质。

在总结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验教训中，淮北根据地十分重视开展对友党、友军交朋友工作，巩固发展统一战线。1942 年 3 月，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八十五军军长兼苏鲁豫皖边区总指挥王仲廉东进建立反共阵地阴谋，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命令第九旅两个团，于 3 月 6 日长驱直入敌区连打五仗，在津浦路边张小圩子将顽军东进先头部队全部歼灭，俘虏五河县副总指挥兼十七纵队司令许志远、灵璧县长赵觉民等。许志远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曾与新四军在皖东北合作过，因此被俘后仍任他为淮北苏皖边区参议员，礼送他和赵觉民等出境，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 年 2 月，淮北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加强统一战线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进一步要求“各个地委、各个县委以及主力部队之各个兵团重视这个业已奠定了的团结合作基础，立即将其巩固并扩大起来，不要放松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努力以赴，以求加强边区内外的统一战线和交朋友工作”。3 月中旬，为粉碎韩德勤和王仲廉东西对进夹击淮北根据地的阴谋，陈毅命令第四师主力，配合第二、第三师各一部，以彭雪枫、邓子恢为前敌统一指挥，于 3 月 17 日对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的韩德勤部进行反击，至 18 日上午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入侵韩之各部，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 1000 余人。韩德勤被俘后，要求与陈毅军长见面，留面子，给出路。经中共中央同意后，陈毅与韩德勤会面，并同意韩德勤三项要求：发还一些人枪，不能片甲不留回去；给一块地盘，不能回去无立足之地；继续承认他是江苏省主席，不能不挂省政府牌子，否则难以交待。陈毅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交还韩德勤 400 多人、300 多支枪以及 1 部电台，发还韩被俘时缴获的收音机、貂皮大衣及夜光钢笔，另外送给 8 万元，并和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等淮北根据地领导为其饯行，礼送其到新四军划给的睢宁、宿迁间

凌城、埠子、夏圩一带驻防，促其觉悟，共同抗日。

二、淮海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淮海区政权建立之后，淮海区党委十分注意抓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充分利用和信任曾经办过自首手续而又积极抗日的原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最广泛地团结各方面人士。1940年9月淮海区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各地党组织认真将大会精神贯彻到基层，通过逐级贯彻，争取了部分中间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和执行政策中过左行动的错误。1941年初，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在淮海区县、区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在我党干部中立即加强对统战政策的教育，要不断检查下级对统战政策的执行程度，主动地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金明还指出：“每县、区、乡要经常确定自己的统战对象，争取社会力量，共同抗日。”不久，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在淮海区建政五个月来的工作总结中，也着重提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他强调指出，无论在中心区、边区、敌伪区都要进行这个重要工作，要通过统战工作，把对立的、反对我们的人争取过来，打击其中最顽固分子，要确立具体的统战对象，并团结在参议会里面；地主阶级是敌后农村中一个很大力量，是农村统一战线主要的对象，要加紧对地主的统战工作；要教育农民知道统战工作的重要，使他们参加统战工作。这些意见，对提高淮海区干部的统战政策水平，克服工作中的偏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苏皖区党委、淮海区党委以及黄克诚、金明、李一氓等领导 and 指导下，淮海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自上而下相继建立了参议会，活动十分活跃。一些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学者通过参议会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对稳定局面、发展胜利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随着整个形势的改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敌伪、汉奸的挑拨离间，加上共产党内一部分干部不能正确把握统一战线政策，淮海区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过左作风，如在观念上把敌、伪、顽、

匪四种不同情况混为一谈，认为他们在抗日的态度上毫无差异，都是不可争取的；在态度上，不尊重进步的绅士、社会名流、学者的意见，专断狭隘的作风有所滋长；在处理上，乱抓乱罚随便处置他人生命财产；等等。这些过左的作风在各地造成了严重后果，使积极抗日的人情绪消沉，同情的人变为动摇、中立，中立的人变为反对，反对的人变为坚决的敌人，尤其在部分地区发生了地主绅士因害怕而逃亡，甚至起而反抗民主政府的严重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淮海区党委和淮海专署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并采取了得力措施予以纠正。一是加强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区党委和专署运用《淮海报》这个阵地，连续发出《扫除抗战中的障碍》《同舟同命，一心一德》《团结一切抗日民主力量，坚持长期抗战》《祝泗沭县参议会开幕》和《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纠正各级工作中过左作风》等重要社论，进一步阐述“团结抗战是中华民族战胜日军的基本方针”，指出“抗日民主政府，是抗日的各阶层统一战线的政府，是实行‘三三制’的政权，有义务与各阶层抗日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任何抗日人士”。还指出“参议会乃抗日的民意机关，是人民的参政组织”，应该“成为政府与人民的桥梁”。在加强正面引导的同时，揭露各级工作中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出纠正的办法。通过舆论导向和具体剖析，进一步统一认识，提高执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水平和自觉性。二是通过对程道口战役中被俘人员实行宽大处理和颁布《土匪自新办法》等进行现实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程道口战役胜利后，淮海区党委、军区、专署（行署）除对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为敌作伥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打击外，对大多数受顽匪利用或胁从人员，以及对“革面洗心的人犯”，均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既往不咎，也决不株连无辜。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还专门召开欢送大会，欢送程道口战役中被俘的唐凯等8人返回乡里。唐凯等8人深受感动，写了一封长信。欢送大会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显示民主政府的诚意和党的政策威力。淮海专署还制订和颁布《土匪自新办法》，办法规定，对愿意自新的土匪，政府不加追究，并保障生命财产。

办法颁布后，许多逃亡在外的土匪以及地主豪绅纷纷回归。此外，淮海区党、政、军领导同志经常邀请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学者座谈，讨论本地应兴应革的大事，为他们名副其实地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环境。由于采取了以上有力措施，淮海区各级工作中过左的现象得到了及时纠正，又统一、又斗争的崭新局面重新恢复。

1942年1月1日，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在《以新的工作迎接新的胜利和斗争》一文中，再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应时刻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更加严格照顾各个抗日阶级的利益，注意调整各阶级的关系。对于一切积极与我合作共同抗日的公正人士，一定善为团结、体谅爱护与赤心相助；要深入检查纠正少数干部执行政策过火或不及之处，坚决反对狭隘胸襟、包办一切”。金明的这个意见，体现了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真髓，成为1942年以后淮海区实践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准则，为夺取反“扫荡”斗争和全面反攻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三、淮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

淮北抗日根据地敌军工作可以追溯到新四军游击支队成立之后。1939年初，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开始设立敌工科。10月，敌工科改为敌工部。1940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派赵彤、张文华、吕凤翔、刘滔、吴振中和史克带着总政的指示和整套文件，到新四军第六支队从事敌军工作。这6位同志都是抗大的优秀学员，选调到总政第一期敌工人员训练队，经过一年半严格的业务训练，并学会了日语。第六支队有了这批专业干部后，开始选调和训练敌工人员，逐步建立和健全旅、团敌工组织，部队的敌军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新四军第四师编成，并于5月间移师皖东北。同年，第四师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升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王子光继任第四师敌工部部长。此时，淮北区党委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敌军工作的指示精神，设立敌工部，调吴宪任副部长。接着选调一批精干的县级干部，先后成立地、县委敌工部和县敌工站，淮泗、泗阳（含运河特区）、泗

宿、泗南都建立了敌工站（对外称新四军驻某某县联络站），敌工站受第四师敌工部和区党委敌工部双重领导。

淮北区党委十分重视对日伪军工作的领导和指导。1942年1月1日，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强调要加强日伪军工作。邓子恢要求，要把握动摇敌军、争取伪军的方针，以达到瓦解伪军孤立敌人的目的，在必要与有利条件下，要争取某些伪军反正，建立据点内对敌兵的交朋友工作；要加紧宣传工作，利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组织宣传日本必败、英美苏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伪政权；要切实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有计划地释放敌伪俘虏，以扩大影响，严格禁止虐待俘虏现象；要健全敌工站组织与工作，统一其领导，加强其干部，定期督促与检讨。1943年2月，针对反“扫荡”斗争中部队中一些对待伪军的不正确做法，邓子恢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伪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好瓦解伪军工作。

淮北根据地敌军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县敌工站成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又称便衣队）。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同年9月归第三师建制）老红军陈世锦受命在淮泗县成立了第一支公安便衣队。同年10月，彭雪枫和邓子恢决定在边区建立便衣大队大队部，各专区和县组成便衣队，人员从部队班排长及侦察、警卫、保卫、通讯人员中挑选，人数从几人到数十人不等。便衣队在公安部门领导下执行锄奸反特和执法任务，在淮北军区统一指挥下执行情报侦察和特殊战斗任务。最初是侦察敌情，镇压暴动，逮捕案犯。随着根据地的逐步发展和巩固，便衣队的主要作用是打击敌伪“蚕食”活动，坚持边沿区斗争，开辟新游击区，解决一些主力部队管不着的小股伪军和日本特务、国民党顽固派特务操纵的武装，以及执行某些特殊任务。1942年，日伪军加强对淮北根据地的“蚕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于同年夏掀起反“蚕食”、反伪化斗争的高潮。淮北便衣大队深入泗县、灵璧、睢宁、宿县等县敌占区，恢复与开辟了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基本上制止了敌之“蚕食”、伪化活动，稳定了边沿区的形

势。各县武工队经常携带短枪深入敌伪据点内外，执行任务，散发宣传品，行动上忽隐忽现，到处扰乱敌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北便衣大队奉命到达淮阴，在苏皖边区政府领导下，和兄弟部队一起看管日军战俘以及各地送来的汉奸特务。后又奉命编为边区训练大队，队员们参加军政训练后，被分配到边区各地和各部队的侦察、警卫、保卫和公安部门。

1944年秋冬之间，淮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开展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由邓子恢兼书记，王子光、吴宪、姚克、李云鹤、谢邦治为委员。委员会下设3个部，即城工部、联络部和敌工部。不久，为了统一领导，把师敌工部合并于区党委城工部，王子光任部长，吴宪和姚克任副部长。同时决定地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设城工部；各县委敌工部改为城工部。到1945年6月，淮北区党委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讲话，要求开展大股伪军工作，在城市建立地下军，并组织深入根据地内据点之小股伪军反正（除战略上必须待机者外）。在谈到具体任务时，邓子恢提出要上下层并重，各级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进行上层工作，今后应着重开展上层，通过上层开展下层。军事上打击，政治上争取，经济上封锁，三者要很好联系。在谈到开展地下军工作时，邓子恢指出，单搞争取伪军恢复城市是不够的，必须武装群众，准备将来起义，因为地下军是领导敌区群众暴动的先锋队，是反攻时内应的秘密武装，所以在城市要初步建立地下军，交通要道、城郊要普遍建立。现在组织应改造、提高、发展，进一步掌握，向城市发展。派适当干部，加强地下军的领导。为了普遍进行瓦解伪军工作，要彻底登记伪军家属，宣传宽大与镇压政策，建立各级调查战争罪犯委员会。在力量配备上，邓子恢要求应广泛运用外围干部，大批抽调上层联络干部，培训内线干部，大量派党员干部做内线工作。要大量大胆使用俘虏、反正伪军、流氓头子做工作。还要争取敌占区青年、技术人才参加根据地工作，以及训练后派出。邓子恢特别强调要加强各级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县城市部长由一位县委书记兼；要走群众路线，动员党政军民一齐来干，纠

正过去孤军奋斗的偏向。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以封建迷信、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在战斗陷入绝境时，往往宁肯拼死和自杀，也不肯举手投降当俘虏。但是，由于日军绝大多数的士兵毕竟还是劳动人民，侵略战争是与他们的利益完全冲突的，加之敌军中的阶级压迫很残酷，这就为从政治上对日军进行分化瓦解创造了条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军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士兵厌战情绪不断上升。乘此有利形势，淮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四师大力组织开展对敌军政治攻势，宣传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和新四军优待俘虏等敌工政策，开始容易为日军士兵所接受。至1942年年底，第四师在战斗中俘虏和自己来投诚的日本士兵已有十余人。1943年春，组织上考虑到这些日本人经受新四军优待、照顾和教育后，不仅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积极要求参加抗日斗争的表现，决定帮助他们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以发挥他们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作用。至年底，该支部成员已有十余人。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成立后，发表了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声明和告日本同胞书，对淮北地区的日军震动很大。接着，支部出版了《士兵之声》日文小报，印发了大量日文宣传品，并对日军喊话，有力地配合新四军对日军展开政治攻势，促使日军矛盾激化，削弱日军战斗力。1945年，反战同盟支部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淮北支部”，成员发展到30余人。抗战胜利后，该支部成员发展到70余人，根据上级指示送他们回国。

四、淮海根据地的敌军工作

1942年11月日军向淮海区大“扫荡”前，淮海根据地敌军工作主要由新四军部队政工部门进行。反“扫荡”斗争开始后，根据斗争的需要，淮海地委决定加强敌伪军工作，主要由地方党政组织来进行。同年冬，淮海地委成立敌工部，由地委书记金明兼任敌工部长，刘述周任副部长。地委敌工部对外称新四军淮海联络部，下设宣传、组织二科。各县设敌工处，对外称新四军某县联络处，县委书记兼处长，另指派一名副处长具体负责。县以下，每个敌据点

附近都设有1至2个敌工站（对外称联络站），每个站3至4人。原部队敌工干部分别转到地方敌工部门工作。为了提高敌工人员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淮海区敌工部门干部整风班先后共办3期。1943年春、夏季，还办了2期敌工人员训练班，培训各县选派的青年学生60多人。下半年，淮海地委专门召开各县敌工处处长会议，组织学习对敌斗争政策，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经验。全地区自上而下敌工部门的建立及其培训，对进一步加强淮海区的敌工工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淮海根据地开展敌伪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当地社会基础广泛、势力较大的“安清帮”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帮会工作。“安清帮”原为清朝运漕粮的船户组织，每一线的漕运船队称为一帮。这种帮会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后来逐渐扩大，被当地恶霸、封建把头所控制。日军侵占苏北后，这种组织被日军掌握。在沭阳境内，汉奸实力派大部分为“安清帮”头子，从伪军团长到下属大队长、中队长、排长、士兵，都是送过帖子的徒子徒孙。因此，淮海区伪军基本上都是“安清帮”。在这些成员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不少是可以分化利用和争取的。194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帮会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淮海地委决定进一步开展“安清帮”工作，使“安清帮”为我所用。由著名绅士、淮阴县县长夏仲芳和新四军联络处宣传科科长李文达，拜“安清帮”中辈份最高的“大”字辈高道衡为师父。按照帮规，谁的辈份愈高，谁在帮会中的地位就愈高。夏仲芳、李文达为“通”字辈，再加上他们的职务，既有帮会做“桥梁”，又有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新四军武装力量做后盾，因而会员发展很快。淮海地委先在沭阳县搞试点，摸索经验后再在各县推开。沭阳县县长兼敌工处处长吕镇中、敌工处副处长刘铁英、吴心荣等对开山门收徒弟作了分工，由县长招收敌伪军中连以上军官，联络处长、区长、股长招收一般伪职人员。同时，县联络处在中心区沈乱庄开办摆香堂和开山门收徒弟的仪式训练班，集训各区敌工干部，传授“帮规”“帮法”。训练班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敌伪军政人员中秘密串联。从1943年夏到1944年年底，

沭阳县举行香堂百余次，共收徒弟千余人。泗沭等县也各具特色，有的县城伪军头目向地委书记金明、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等递学生帖子。通过开展“安清帮”工作，把掌握敌情工作深入到了敌人内部，一些与共产党建立师徒、师生关系的伪军，都成了根据地的“情报员”。泗沭县八集以西的庄滩周围，有几十支零散的反动武装，多的百十人一股，少的二三十人，总共六七百人。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由于“徒弟”“学生”搜集情报及时，新四军主力和淮海地方武装便在天亮前分别对这几十支反动武装发起突袭，迅速把他们全歼。在情况紧急时，这些伪军政人员掩护抗日干部，为新四军部队购买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并为新四军部队攻克据点作内应。此外，不少伪职人员拜根据地干部为“师”后，都表示改邪归正，有的带枪投靠，有的秘密为根据地工作。开展“安清帮”工作，是淮海区党组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统战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开展敌伪军工作的一种隐蔽手段，对争取、瓦解敌人，开展合法斗争，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巩固政权，起到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加强敌后交通线建设。1941年春，淮海区党委与山东分局鲁南地区党委共同商定，开辟江苏、山东之间的秘密苏鲁交通线，以保障华中与华北、苏北与鲁南、华中局（盐城）与党中央（延安）、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这条交通线在陇海铁路南，以赵庄为主点线，过安峰山下的周沈庄，经大稠出东海县，然后分东西两条线，东线经沭阳县、西线经宿迁县进入淮海区，并布置主线和副线，沿线两侧还设立联络网点。其特殊使命是护送往返过路干部和人员。1942年3月，刘少奇从盐城回延安，途经桑墟、赵庄、后谷庄，越过敌伪严密封锁的铁路线，安全到达鲁南海陵县刘湾。1943年7月，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因病去华中局治疗休养，也从这条交通线往返于苏北与山东之间。华中局还通过这条交通线把他们出版的刊物《真理》传送到山东、延安；党中央在延安发出的指示和重要文件以及新华社发出的重要文稿，也源源不断地传到淮海区、盐阜区和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刘少奇曾于1942年6月在山东专门写信给淮海区潼宿海县委书记章维仁，表扬他们在苏鲁交通

线上所作出的成绩，并要求县委加强这方面工作，做到苏鲁交通线万无一失。从此，淮海区党委和潼宿海县委更加重视这一工作，保障苏鲁交通线的畅通。通过苏鲁交通线，华中与华北两大根据地互通情报，配合默契，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伪顽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苏鲁交通线在华中敌后抗战史上作出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第五节 创建和发展军工生产

宿迁地区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是在战火中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军工厂创建后，因陋就简，制造了大量武器，保障了新四军特别是地方部队的弹药供应。

一、新四军第四师兵工厂

1939年9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皖苏边的永城县白庙建立了制造所和修械所，于11月造出第一颗手榴弹。1940年元旦，生产出第一批30枚手榴弹向元旦献礼。后经改造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到1942年时，每开一炉可以生产七八百个弹壳。

皖南事变期间，汤恩伯顽固派10万国民党军队疯狂进犯豫皖苏边区，兵工厂从龙亢集向北转移到罗集，为冲出敌人的包围，一方面将设备分散埋藏；另一方面将人员分别化装成老百姓，疏散到附近几个村庄。经几昼夜行军，终于找到司令部，很快恢复生产。在路西3个月反顽斗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生产两个多月，手榴弹产量还能保持反顽斗争前产量的60%左右。修械方面也能做到随来随修，使损坏的枪支尽快重返前线。

1941年4月，兵工厂转移到皖东北根据地的青阳镇东南大刘圩子，开始第二次白手起家重建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5月，工厂又奉命东渡洪泽湖，进入第二师活动的淮南地区，在马坝镇以北沙河以南的张楼、张夏庄一带组织生产。9月，兵工厂从淮阴、淮安等敌占城市招20余名能工巧匠，又从二师调来曾是皖南军部修械所的

老工人支持工作。同时，从江南敌占城市买来车床、牛头刨床、钻床、砂轮机 and 柴油发动机等设备。工厂由此进入机器生产时期。

随着战争的需要，第四师军工队伍和军工生产不断发展壮大。到1942年，设有大小3个炸弹厂和修械所，内设4个股：材料股专管材料收集、分藏、管理、统计；制修股专门修械及造刺刀、器具、水壶、行军锅、枪托；翻砂股专管炸弹壳、地雷；装备股专管制药、装炸弹、零件、木柄。每月可生产出炸弹5000枚，子弹可生产出一两千发。另外，旅设有炸弹股，人员20多名，每月可生产出炸弹2400枚；同时设有修械股。

为了改善部队装备，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第四师兵工厂决心研制五〇掷弹筒。在研制过程中，依靠集体智慧，发扬技术民主，反复讨论研制方案，最后选定携带与作战使用都比较方便的结构，形似八二迫击炮，两条筒脚平时可以拢折、紧贴筒身，便于携带，使用时撑开两脚与筒身成一角度。工厂生产的掷弹筒弹也近似迫击炮弹，是迫击炮弹的缩小型。1942年5月30日，在马坝镇以北大云山召开的留守处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了五〇掷弹筒实弹试射。后经改进，于同年11月6日，在第四师师部驻地半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节攻坚军事演习大会上，五〇掷弹筒作实弹射击表演，20门掷弹筒一字排开，20发掷弹筒弹凌空飞起，发发命中目标。到1943年10月，共生产掷弹筒150多门，全师每连装备1门。

1943年1月，第四师兵工厂进驻洪泽湖畔勒东村，主要任务是制造五〇掷弹筒、五〇掷弹筒弹、改装迫击炮为平曲射两用炮，制造迫击炮弹、修复山炮等。这里比较隐蔽和安定，职工生产情绪高涨，整天机器轰鸣，夜间灯火通亮。一天黄昏，敌人突然向工厂奔袭。由于平时有应变方案，有计划地拆卸了笨重的机器并分散掩埋。除少数警卫人员和武装的青年工人留下监视敌人、保卫工厂外，其余人员携带轻便机具、材料登船向洪泽湖撤离。在第四师打击下，敌人仅烧毁了空厂房，破坏了部分机器。敌人败退后，工人迅速返厂，在当地政府、人民群众支持下很快重建厂房，修好机器，恢复了生产。

二、淮海军分区军工厂

淮海军分区军工厂的前身为淮河大队修械所。1940年9月，随着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地方武装的日益壮大，军械维修和弹药供给发生了困难。在此情况下，淮河大队大队长吴觉利用统战关系，通过淮河大队供给处长张一平等的介绍，把当地一批修枪、制弹药的技工召集起来，在淮阴县古寨北金圩筹建修械所。在缺乏军工生产知识、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修枪，并着手研制手榴弹。10月，淮河大队修械所正式成立，由吕一敏任所长。1941年春，人员充实到30余人，每月修枪数十支（挺），手榴弹月产量增至3000枚。5月，修械所划归淮海军区领导，改名为淮海军区修械所，所址移至六塘河畔的沭阳县田圩，月产手榴弹约4000枚。9月，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区。由于第十旅没有修械所，遂将淮海军区修械所改归第十旅供给部领导。其间，吕一敏、林士钧、万净涵先后任修械所所长，所址移至涟水县乡间，人员扩充到50余人，两种型号手榴弹月产量增至5000枚。

1942年11月中旬，日伪军对淮海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及主力部队。为适应反“扫荡”斗争需要，淮海地委决定，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把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混合编队，组成4个支队，分散在4个地区活动。修械所也分为4个修械所。他们随支队活动，在极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始终坚持敌后生产。在反“扫荡”斗争后期，4个修械所人员都得到扩充，生产能力扩大，既能修理枪械，也能制造手榴弹，第一、四支队修械所还生产了简易八二迫击炮。

1944年初，淮海军分区司令部决定，将各支队修械所和手榴弹厂集中起来，在泗沭县张后荡成立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军工部，以集中统一管理，扩大军工生产。军工部将原有所、厂合并，重新分设机工厂、弹药厂、铸工厂。厂址几度迁移，最后移到泗沭前庄圩。此间，军工生产得到大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反攻。

1945年1月11日，淮海行署为扶植地方军工生产，杜绝枪支流入伪区，以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力量，颁布了《淮海区土造枪管理

办法》。《办法》规定：凡本地区土造枪炉户或铁工合作社，均需要向各住地附近工商管理总局或其分局登记注册；凡登记注册者享受煤、铁原料供给与请求无利贷款；未经工商管理总局核准不得私自买卖枪支，其他枪支无论属于何人均没收，并课以千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这个《办法》的颁布执行，促进了全区军工生产的健康发展，同时保证了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及广大民兵的战斗能力，为战略大反攻积聚了力量。

三、沭阳“马厂造”

沭阳县马厂街一带素有打铁造土枪、土炮的历史。全面抗战开始时，马厂街上就有四五十户会造土枪的，当时造的都是仿汉阳造七九步枪，被称为“马厂造”。1940年8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入淮海区后，苏皖区党政军机关便随主力过运河以东，进驻沭阳。他们得知马厂街一带有一批铁匠会造土枪的情况后，迅即决定并派员帮助地方党组织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发展军工生产，支援作战。

1941年春，马厂造枪铁工会成立，吴锡昌任会长。为了加强领导，淮海区党委和军区委派共产党员、抗大五分校毕业的姜剑英任马厂铁工会指导员。在人员分散、设备简陋、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姜剑英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经历了数次尖锐斗争，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带领会员们造出一批土枪，头一个月就生产了400多支枪。不久，马厂铁工会又办起南园、北园、厂东3个分会，附近村庄如章集、小店、汤涧、李恒一带会造枪的人也分别成立了铁工分会，还吸收一些学员，造枪铁工从原来的二三百人发展到七八百人。为了从管理上切实解决造枪质量问题，铁工委在马厂西街成立造枪实验组，同时发动各分会成立“合伙组”，制订造枪责任制等制度。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马厂造”的质量，使其名声也更响了。许多枪运到部队，都反映说“三八式”“大盖板”不比“马厂造”强。

1942年春，马厂街沦入敌手，铁工会被迫撤出马厂街。此时，敌伪气焰嚣张，叫嚣“务必铲除共军马厂兵工厂”。在此情况下，铁

工会迅速把撤出的几百名铁工武装起来，组成一支游击造枪队。造枪实验组的二三十人，把大炉支在马厂街西的一排柳树行里，选一班“射枪手”瞭望、警卫，其他铁工，肩上背着枪，手里拿着工具，继续造枪。同时，把主要任务分配到离马厂街较远的各个分会去。敌人出来“扫荡”，他们就抬着炉子走，敌人走了，他们又蹲下来造枪。就这样，铁工会坚持带领会员与敌人周旋了7个多月。他们发扬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神，一次次粉碎敌伪缉捕铁工会领导、瓦解铁工队伍、逼迫铁工家属等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造枪。到1942年年底，随着反“扫荡”斗争的胜利，铁工委重新回到了马厂街。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厂街一带制造的“马厂造”共7000余支，还生产刺刀5000把以上。这种土枪和刺刀，不仅成为淮海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而且输送到盐阜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八章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第一节 党的建设

宿迁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在党中央和华中局领导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和制度建设等，逐步得到加强，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建立；8月，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建立。随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快速发展。1940年9月，苏皖区党委由皖东北进入淮海区，领导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4个地委工作。1941年5月，苏皖边区党委撤销，分设中共淮海区委和皖东北区委。至9月，淮海区委共设宿迁、淮阴、灌云、东海、涟水、泗沭、宿沭海、东灌沭8个县委（至1942年2月间，调整为宿沭海、宿迁、沭阳、泗沭、淮阴、涟水、东灌沭、东海8个县委）和宿北工委（秘密工作）。在此期间，党的各级组织得到极大发展。基层党支部主要是根据行政区划来分，一般是一个乡建立一个支部，在斗争形势严峻的边区，支部大部分建立在人民武装或游击队中。党支部领导的方式，根据群众斗争的情形决定，在根据地中心区尽量使支部成为领导一切的核心；而在敌伪顽交错的边沿区，党支部主要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据1942年2月不完全统计，宿沭海县委有12个分区委，70个党支

部，220个党小组；宿迁县委有2个分区委，8个党支部，21个党小组；沭阳县委有4个分区委，4个支部，148个党小组；泗沭县委有5个分区委，24个党支部，69个党小组；东灌沭县委有5个分区委，18个党支部；另有部分机关支部小组。

在淮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中共皖东北区委成立。8月，中共华东局决定撤销皖东北区委，成立中共淮北区委，直接领导淮宝、淮泗、泗阳、泗宿、泗南、泗五灵凤、盱凤嘉等县委以及洪泽湖工委和半城区委。此后，淮北区开始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巩固了党在根据地绝对领导地位，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极大发展。除区委、地委、县委外，县以下区有区委，乡有支部，村有小组。至10月，淮北边区有3个地委、7个直属县委、28个区委、373个党支部。1942年，泗阳县各个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至1944年年底，全边区的乡党支部达到1048个。1941年后，宿迁地区根据地的党员队伍不断壮大。至1942年2月，淮海根据地有党员3997人。其中，正式党员有：泗沭县257名，宿迁县89名，沭阳县454名，宿沭海1019名，机关支部86名；候补党员有：泗沭县85名，宿迁县16名，沭阳县260名，东灌沭300名，宿沭海82名，机关支部5名。在淮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时，皖东北地区有党员3000余人；至10月，淮北苏皖边区有党员6754人；1943年，发展到24010人；至1945年5月，全边区已经有党员38969人。

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发展，在根据地建立前后，发展对象主要是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之后，逐渐大量发展工农成分的党员，注重从生产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工农和知识分子入党。1942年2月，淮海根据地党员队伍中，共有产业工人5名，手工业工人38名，雇工50名，贫农815名，中农457名，富农123名，地主46名，教职员10名，小商人39名，自由职业者6名，小贩6名；初中159名，高初小学85名，其他138名。至1945年5月，淮北根据地党员队伍中工人占总数的7.58%，贫农占62.63%，中农占24.47%，富农占2.49%，地主占0.86%，其他占1.97%。此时，工农成分党员占党员队伍的绝大多数。

根据地发展党员的方式方法，在初期主要是上级派人一对一单独发展。1940年初，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团到各地发展党员，开始时的地方只有一名党员，这名党员就任支部书记，而后逐步健全组织。工作团任务完成后，其成员大部转为区、乡干部。还有通过干部培训班发展党员。1942年，运河特区先后举办两期干部培训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先选几名觉悟提高快、表现好、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清白的学员，通过个别谈话教育，经支部讨论通过吸收入党，然后通过他们的推荐再扩大发展范围，以此发展了一批党员，解决了运河特区干部紧缺问题。更多的是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及反“扫荡”、反摩擦斗争中，通过实际考验发展党员。通过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使党员在数量上极大发展，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乡党支部，从而巩固了党在根据地的绝对领导地位。

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党的各级组织注重发展质量。1941年3月，淮海区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淮海区成立以来，在淮海区发展了党，给了党员以相当训练、教育与锻炼，在斗争中培养了相当多的干部，打下了淮海党的基础；但与此同时，“部分的党员不能起模范作用，甚至结党营私，借公报私（如不缴公粮、公草、报仇等），引起群众中严重的反感（泗阳、沭阳）”。因此，黄克诚强调要求，在党的工作中，“发展党要慎重，不要乱拉。要普遍各村镇，不要集中在一个区域，每个村庄要有我们的党员，但不要某一个村庄全是我们的党员。发展时要注意党员的质量，党员质量的好坏对工作有很大作用的”。黄克诚的报告，对淮海区发展党员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具体指导，对淮海根据地在发展党员中保证党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淮北根据地，针对前一时期的发展党员过程中存在的让一些不纯分子混进党内的问题，淮北区党委于1943年7月明确规定了农村支部入党的必备条件：“（一）阶级成分好，必须是雇佣工人、雇农、贫农、贫苦出身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及个别斗争中坚决的中农，原来的地主、富农本身一般不能参加党，尤不能参加支委，地主、富

农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支委须经县委批准；（二）在改善民生斗争中表现坚决勇敢，热心积极，在这方面需要严格地把党的组织与一般群众组织及统一战线的组织严格地区别开来；（三）办事公道，不自私自利；（四）有相当活动能力。”这一规定，使基层党组织把住农村党员入口关，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党员发展质量。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淮北区党委还先后4次开展整理基层支部工作。第一次整理支部工作从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区党委提出了“建立工作上积极的、组织上巩固的、政治上纯洁的党支部”口号。这次整理支部工作不彻底，收效不显著。第二次整理支部工作从1943年5月开始，区党委专门召开一次支部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各地工作出色的支部书记。会议确定整理支部的基本要求是使“支部群众化”，规定支部的第一个任务是领导群众为改善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而斗争，第二个任务是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同时规定整理支部的内容为两项：一是审查支部领导成分，二是加强党的基本教育。还规定了5条具体内容，即彻底了解每个支部的详细情况（包括数量、成分、正式和候补党员的表现等）；清洗支部内的坏分子，保证党组织成分的纯洁；支委经过改造，清除阶级异己分子，支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工人、雇农、贫农及斗争坚决可靠的中农手里；加强阶级教育，普遍训练一次支委，首先是支书与乡长；提出创造模范支部号召。这次整理支部工作成绩较好，每个支部都进行了整理工作，但由于1943年冬开展扩军等工作挤掉了整支工作，使之有始无终。第三次整理支部工作是从1944年秋开始，区党委确定每个县要搞一个典型支部实验，比前两次工作更认真扎实，为今后全面开展整理支部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次整理支部开始于1945年6月，区党委召开组织会议，通过《关于开展整理支部工作的决议》，规定了整理支部的方针、内容、步骤，强调把政治上的审查和组织上的调整放在首位，要求各地委、县委、区委都要抓住一个支部，亲自做好典型实验，取得经验后再普遍开展。通过整理支部工作，纯洁了党的组织，巩固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

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了根据地建设的发展。

在规范基层组织生活方面，淮北区党委于1942年1月作出《淮北区党委关于党费问题的决定》，指出缴纳党费是党规定的每个党员的义务，详细规定了根据党员的不同情形缴纳党费的标准，党费收缴的办法，党费的用途，党费收缴与管理部门，并规定“各级党部从支部到区党委，征收党费的数目及处理经过做出清算，向直接领导机关做报告（支部向支部大会及区党委做报告，县委向县代表大会及地委做报告，地委向区党委做报告，区党委向代表大会及华中局报告）。直接领导机关应负责审核之”。这一规定，增强了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党章意识和组织观念。之后，淮北区党委还相继出台了《淮北区党委关于提拔与培养地方干部的决定》《淮北区党委关于反对目前党内严重存在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倾向的决定》等，在提拔与培养地方干部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提拔地方干部的基本条件应为：政治上有坚强党性与正确的群众观念；工作积极，生活朴素，不贪污，不腐化；对人对事能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在当地有相当群众信仰；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反“扫荡”斗争中，表示沉着勇敢者。淮北行署先后发布了《淮北行署施政纲领》《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整顿纪律训令》《淮北苏皖边区行政纪律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包括党员在内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和生活规范。

在党的廉政建设上，根据地建立法规惩治贪污腐化分子。1941年和1942年，淮海区、淮北区分别颁布《淮海区修正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和《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淮北苏皖地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凡边区所属行政机关与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依本条例论罪：克扣和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渔利者；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意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者；意图营利，贩禁运物品或漏税物品者；伪造或变造单据、证券、印信、账目，意图侵蚀公有财物者；因职务上之行为，要求期约或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为私人利益，未擅自支付公有财物者。

同时还规定，凡犯前条之罪，当依其贪污数目多少，分别给予惩处。这两个条例规范了党员干部的行为，促进根据地廉政建设逐步走上以法治政的轨道。

二、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的。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华中局统一部署下，各地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的整风学习运动。

自1942年7月开始，淮北根据地整风运动经历了初步整风、深入整风和民主检查3个阶段，至抗日战争胜利时结束。1942年7月至1943年3月，为初步整风阶段。淮北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四三”（1942年4月3日）整风指示和华中局《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决定在根据地内开展整风运动。1942年6月25日，邓子恢在第四师第二届政工会议上作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问题》的报告，发出了整风号召。第四师师部首先发布整训令，规定自7月7日至15日为动员准备时期，用4至5个月时间进行整风学习。师成立总学委会，军区、师直、旅、抗大均成立学委会，团及较大机关部门建立学习分会，学习分学风、党风、文风和综合研究四个步骤进行。地方党政机关由区党委组织进行。从7月20日开始至10月初，为学风学习时期，10月后为党风学习时期。因不久开始33天反“扫荡”，整风学习一度停顿。1943年1月，总学委会再次号召党风学习，至3月结束。

1943年7月4日，彭雪枫在淮北区党委扩大座谈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华中局关于整风的新指示，提出了“继续整风一年”和“整风第一”的方针。7月7日，开始了重新整风即进入深入整风阶段。在7月之前，区党委曾开展了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的斗争。8月1日起，部队开展了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地方开展了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打开了整风的大门，

初步纠正了过去脱离实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的倾向，使整风运动进入了更深入普遍的阶段。9月底，淮北区党委召开第二次高干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整风学习的决定》，强调整风第一的重要意义，规定了部队和地方干部每天3小时的学习制度，并决定对干部、战士进行两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事政策教育。到年底，时事学习结束，转入学风和文风学习阶段，着重清除主观主义，端正思想方法。

在此期间，淮北根据地相继发生了“泗阳案件”和“淮中案件”两件冤假错案。此前，泗阳县金镇区张功昌、王子言名义上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实则暗中与敌伪勾结，并受敌伪区款接济，被敌伪封为正副团长和情报站长，引诱策动根据地干部参加叛变。泗阳县公安局于1943年10月破获了这一案件，将伪团长以下连以上及情报站负责人等12人逮捕，在审讯中使用肉刑，使其供出该区以刘秉如为首的另一特务组织系统。县公安局对供词未加深究，采取肉刑逼供，使案情随意扩大，认为这是国民党与三青团在根据地的活动，其最高组织为特别区，下辖泗、宿、沭3个县，县下为区，各级党部均有三青团、行政、武装等组织。此案随后波及到武装部队，县总队第七大队连排干部有20多人被捕。到1944年3月，被捕者有151人，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干部、群众，被牵连者千人以上。这被称为“泗阳案件”。“淮中案件”始于1943年11月，首先是该校某学生向学校当局举报，有某某等暗中以“进步青年救国团”名义，组织反动团体，进行破坏学校的“特务”活动，以后又向学校连续报告学校中“特务”活动情形。该校领导未查明真相，遂信以为真。11月4日，淮中召开第二次反特斗争会，会上检举出所谓“进步青年救国团”，涉及淮中师生44人，地方人士48人，总计92名。这两起所谓案件发生后，区党委十分重视，彭雪枫、邓子恢等领导干部亲自过问，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彻底纠正冤假错案，给被冤者一一平反。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对广大党员干部教育很大，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反对主观主义告一段落后，从1944年春起，进入党风学习阶

段。在党风学习中，重点反对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广大干部党员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从思想意识、阶级立场、工作作风以及自己同党的关系等方面写出了个人反省报告提纲，交小组会上讨论。在局部反省完成之后，开展了全面反省。区党委把审干防奸工作同整风结合起来，组织干部学习党的审干政策，号召干部打破顾虑，坦诚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每个党员干部从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到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写出自传。最后，由党组织对每个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并作出鉴定。区党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审干工作中虽然对某些历史复杂的人有压力，弄清了他们的历史问题后，他们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清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纯洁了革命队伍。

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从1944年冬起进入整风的第三个阶段，开展民主检查运动。淮北区党委规定，民主检查的对象，主要是各级党政军领导，检查的要点是各级领导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领导方法，以及执行干部政策等方面。各级党政军机关都先后召开了民主大会，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领导通过民主检查，树立了群众观念，改进了领导方法，发扬了民主作风，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淮北区党委在开展部队和地方直属机关整风的同时，还采取举办整风轮训队的办法，分批分期抽调部队和地方干部集中整风学习。从1942年8月开始，先后举办9期轮训队，将部队营团和地方区县干部全部轮训完毕。同时，各分区和各县也分别开办了轮训班，将部队连排干部和乡干部全部轮训完毕。淮北根据地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于1945年胜利结束。

淮北抗日根据地整风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写给区党委的一封信，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被列为各抗日根据地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1943年冬，刘子久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他理论联系实际，就过去自己及区党委各项工作中有关问题，写信给淮北区党委，谈了他反省的几点意见。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

从“走夏陶然的路”谈起。夏陶然是泗南县峰山区中潼村小学校长兼教员，在实践中把学生的学习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爱集体、爱学习、爱劳动、守纪律的作风，成绩斐然，深受家长的称赞与爱戴。在一次小学教育研究会上，夏陶然介绍了自己的办学方法，引起了主持会议的行署教育处长江陵和副处长潘琪的注意，建议加以宣传推广，但区党委认为中央及华中局没有这方面的指示，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因之夏陶然的办学方法，也就未被宣传和推广。刘子久对此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夏陶然的办学方法，与党提出的教育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群众创造天才的体现。而我们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经过与态度，是反映了我们在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辩证唯物论的革命性和创造性，是反映了我们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不够，是反映了我们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是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不肯向群众学习，是反映了我们不大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问题”。二是正确的口号，错误的方法。刘子久回顾了区党委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创造模范村、乡、连队、支部的口号，却未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模范来，原因就在于只是从主观的想法去行事，没有从发挥当地模范人物作用着手，而是从别处凑来一批干部去突击，去代替包办，使工作不能持久；再者，往往采取多头并进，全线出击的方式，而没有运用“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推进全盘”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所以常常“贪多嚼不烂”。三是缺乏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对一些良好的工作萌芽，没能追根究底地加以钻研，找出其发展规律，使它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东西，以便再回到实践中去，推动我们的事业和丰富我们的理论。同时，对于遇到的困难和犯过的错误，也都因为缺乏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多半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与改正。四是怎样去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过去有的干部积极性不高，创造性不大，是由于领导作风不够民主和工作方法不够科学造成的。他指出：“假若我们能够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作风，为党外干部与群众造成一种发挥他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环境，告诉他以

‘实事求是’‘打开脑筋’的分析的科学思想方法，再加上一种为群众服务、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则所有那些对革命忠实的干部与群众，不用说，一定朝气蓬勃，日新月异。”五是为了谁，对谁负责。刘子久在信中说：“我们应当根据广大群众的斗争经验、觉悟程度、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具体情况去制订我们的斗争纲领、工作要求和决定，选择我们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法。”

刘子久把信写好后，原想托人带回，当交给中央领导同志阅看时，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封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认为可以并且应该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遂委托新华通讯社向各抗日根据地广播。1944年7月27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印成单行本予以发行。在单行本“出版者的话”中指出：“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他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没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未深入，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盘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们曾发表苏联作家的剧本《前线》与郭沫若先生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并印成小册，发给同志们阅读，目的都是帮助同志们整风，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正确作风早日得到普及。现在又将刘子久同志的信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广送同志阅读，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刘子久给区党委的信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件大事。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总结了淮北区党委的工作，对指导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和推动整风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淮北根据地一样，淮海根据地的党内整风运动，也经历了精心组织、中途停顿、逐步展开、不断深入的过程。1942年9月初，淮海区成立了由李一氓、张彦、杨纯、邵幼和、刘震、高农斧、朱

一苇、曾直组成的淮海区整风学习总委员会，李一氓为总会负责人。中旬，总会举行会议，讨论和制订了关于党政机关及军区部队整风学习计划。计划规定整风学习对象为机关科员以上、部队连以上有阅读能力的干部，重点是党政机关区级以上、军区团营以上的领导干部，同时欢迎机关及部队中的非党干部参加学习。总会下设两个分会，第一分会由区党委和行署组成，以县党政机关（民兵总队）组织支会，属第一分会领导；第二分会由军区单独组成，以军区直属机关、第二十九团及地方兵团各组成支会，属第二分会领导。学习组织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为中心组，支会以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为整风学习的主要对象；乙级为中级组，机关中层干部、部队营团干部参加；丙级为普通组，文化水准低，不能阅读文件的工作人员参加。学习时间安排从9月14日开始，至次年2月止。大体分为粗读、精读与工作检查、总结3个阶段。在此期间，总会负责人专门撰文号召各级干部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把学习搞好。《淮海报》发出了《整风学习实际开始》的社论，强调“淮海区今天的特殊情形，是小资产阶级的干部很多，农民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政治水准较低，斗争经验少，尤其要抓好学习，并提倡在干部中造成学习的热潮”。同时，《淮海报》还定期刊出《整风学习》专版及油印《学习通讯》刊物，分会、支会也均出油印刊物，及时报道学习经验与心得，推动了整风学习运动的全面展开。

11月中旬开始，日伪军对淮海根据地发起大“扫荡”，整风运动被迫中断。直至1943年秋，淮海区局势开始相对稳定后，淮海地委根据华中局整风会议精神，决定重新开展整风运动。地委认真总结了上一年整风学习的经验，决定不设整风学习委员会，全区以地委为领导中心，各支队范围以中心县委为领导中心，各县以县委为领导中心，统由党委书记负责。地委、行署合为一个整风单位，成立中心小组，下设两个学习小组。军分区为一整风单位，单独成立中心小组，下设3个学习小组（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营各成立1个）；各支队成立中心小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各县委成立中心小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同时，制订了淮海区第一期整风学习计划，

时间从1943年9月至12月，采取自己阅读、上课、讨论、反省、测验、出墙报、写自传，最后做鉴定的方法。这一期整风学习虽如期开始，但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尚不甚安定，学习计划实际上没有能完全实行起来。

从1944年起，淮海区整风运动走上正轨。为使整风运动更加深入，达到预期效果，淮海地委专门举办整风训练班，又称整风队。整风训练班从1944年3月中旬开始集中学习，至10月中旬结束，共7个月时间。参加训练的有83人，初期以县为单位编成10个小组，民主选举小组长，并建立临时党支部，实行“一元化”领导，即整风队的一切行政、学习、生活问题，均以党支部为领导中心。在时间安排上，以学风学习时间为最长，约3个月；时事学习半个月，党风学习两个月，最后进行反省及干部鉴定约一个半月。在训练中，整风队对每一个指定的学习文件，均采取上课、讨论及从局部联系到反省自己的方法，加深对文件精神钻研和理解。后期，地委、行署领导（党内同志）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训练。训练班召集了3次小组长联席会，经过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使每个领导成员都确立和端正了思想作风。在此期间，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到位于泗沭县庄圩的整风训练班参加整风学习，进行具体指导，并带头作检查。在黄克诚的带动下，党政领导同志都自觉地联系实际，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检查。这期整风队结束后，各县都普遍采取了集中学习的方法，或在工作岗位上边学习边工作，联系个人思想和历史状况进行反省、检查，同时组织上结合审查干部，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淮海区最后一期整风训练班到1945年8月底结束。

整风是党内思想上的一次革命。通过整风，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水平，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进了思想作风，党内更加团结统一，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政权建设

宿迁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领导下，积极进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以此改造旧政权，开展精兵简政，加强作风建设，有效地推进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一、淮海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0年9月淮海专署成立后，一度与沭阳县政府合署办公。1942年3月，经华中局批准，专署改为行署，李一氓任行署主任，陈月斋任副主任。同年11月，苏北地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淮海行署名称未变。直到1945年7月，为适应抗战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淮海、盐阜两个行政区合并为苏北行政区，设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统一苏北行政领导。李一氓、曹荻秋、计雨亭、陈月斋、贺希明、吴觉为临时委员会委员，由李一氓任主任委员，曹荻秋、计雨亭为副主任委员，下辖淮海分区专署和盐阜分区专署。淮海分区专员由吴觉担任，秘书陶白（兼民政处长），文教处长孙存楼，文书科长王颖，总务科长王少衡，工商局长孙笃生，公安局长黄赤波。淮海分区专署下辖灌云、沭阳、泗沭、宿迁、潼阳、东海、宿北、淮阴、涟水9个县政府。

改造旧政权，是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地建立民主政权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基层政权的组织仍沿袭国民党政权县、区、乡、保、甲的形式，乡以下的保、甲两级基本上没有改变。1942年夏，淮海行署召开全区县长会议。会上，李一氓提出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的施政方针，第一项就是“重划乡区，废保、甲，完成行政改建，建立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及民选政府”，要求：（1）夏收后秋收前，沭阳完全划小乡、区，泗沭、涟水完全划小区，划一半小乡，灌云、宿迁、潼阳、东海、淮阴划一半小区，四分之一乡；（2）划乡后，沭阳、涟水、泗沭开始实行新乡的选举，

搜集民选经验；(3) 10月完成沭阳选举，成立沭阳参议会，改选县政府；(4) 12月完成泗沭、涟水选举，成立泗沭、涟水参议会，改选县政府。会后，沭阳、泗沭等县参议会相继成立。不久，日伪军大“扫荡”，基层政权改造工作中断。反“扫荡”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后，淮海区局势开始好转，但战斗仍很频繁。虽然各地都把基层政权改造工作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但鉴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只是在中心区的一些地方继续进行改造旧政权的实验。到1944年，全区除游击区外，中心区和边缘区基本上根据《淮海区县区行政委员会以及乡镇组织法》的规定进行了改造。通过改造的基层政权，都确定以贫雇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充分发扬民主。大部分乡建立了乡选委员会，登记选民，推选候选人，张榜公布，进行竞选，使新建立的政府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热心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具体要求是切实整顿党政军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精简上层，加强下层，紧缩次要部门，充实主要部门，提倡协作，大量减少公勤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以达到短小精干、量少质精的目的。淮海区党政军机关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的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1943年春，经过精简，淮海地委、行署机关均缩减了三分之二左右；淮海军分区机关由500多人减少到200多人。各县委、县政府只留下主要负责人和极少数工作人员领导全面工作，其余大部分人下放到基层，二三个小区合并为一个大区，各级领导干部除留几名负责人，也下放到基层，降级使用，加强对基层的领导。这次精兵简政，使淮海区党政军民各部门的工作机构得到了调整和充实，不仅在组织上保持了高度的统一，奠定了抗战后期党政军机关设置的基本格局，而且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和工作效率，为粉碎日伪军大“扫荡”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此后，淮海区党政机关一度出现反复，政出多门，各地编制人员参差不齐，尤其是杂务人员增加过多。1944年7月15日，为了巩固精兵简政的成果，淮海地委和行署制订了《关于党政领导机关组织及额外人员之统一规定》，旨在调整各部门的需要，增加工作

人员，减少杂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地委和行署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县、区、乡的党、政、民现有的人数及实际需要情形与田亩、人口数，确定三类编定人员：泗沭、涟水、淮阴为第一类；潼阳、宿迁、灌云、沭阳为第二类；运河特区、宿北、东海为第三类。然后按照不同规定进行调整，该充实的充实，该精简的精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机构建设，节省了物力、财力，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参议会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和重要方面。1940年12月25日，在淮海区专署成立3个多月后，淮海区临时参议会在沭阳召开成立大会，吴月波被推选为参议长。大会通过了临时参议会组织章程，并宣布参与专署工作，抓好3件大事：第一保障人权，第二合理负担，第二肃清土匪。临时参议会成立后，广泛团结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学者，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推行，开展有利于安定人心、稳定局面的工作。至1941年年底，淮海区各县相继成立了参议会，积极开展活动。沭阳等县经常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各方面工作进行详尽讨论，并通过有关决议，号召土匪自首，通告外出民工还乡等，把各方面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周围。

1942年春，淮海区开始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经过一个多月准备，第二届参议会于5月6日至24日在沭阳正式举行。这次参议会总结和积累了过去一年多的经验，虽然仍是采用选聘办法，但比起临时参议会要进步和民主，改变了临时参议会在特定条件下参议员全是绅士的不足，真正贯彻执行了党的“三三制”原则，使淮海区民主政治建设达到了新水平。这届参议员包括各阶层的人士共229人，大体依照“三三制”的分配，其中共产党员约90人、地主绅士61人。大会讨论和通过的主要议案是：行政公署的改组及其组织法、减租减息条例、增加工资条例、田赋改征实物条例、1942年度公粮公草征集条例、盐税及进出口物品附加税及增办营业税提案、农民借粮善后四则提案、开禁酿酒提案等。在会议期间，参议员们对各种条例、提案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辩，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表决。其中，对1942年度公粮公草征集问题，地主绅士意见

较多。因为事先准备充分，政府代表人、行署粮政处长李干成说明提案理由，作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说，从数目需要、过去困难、去年与今年征集率的对比，地主、富农、贫农的负担及今后政府的保证等，人情入理，当场说得与会者心悦诚服。所以，参议员们在讨论条例草案时，几处略作修正后就顺利表决通过。会议期间，参议员们还用一天时间对政府工作提出质问，人人勇于讲话，批评政事，主要集中反映在若干外围军（指土匪收编的部队）不良的群众纪律、司法手续过于随便、借粮中的问题等。执行主席是一位绅士，在质问中不仅没有受阻的事情发生，而且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体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主精神。政府在答复时采取谦虚、缓和与接受批评的态度，实事求是，不溢美，不护短，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威信。会议在选举阶段，采用提候选名单的办法，如驻会委员 19 人，就加一倍提出 38 人候选名单，先在会外折冲，然后在大会上通过。特别是在保证党的“三三制”原则这一点上，淮海区党委和行署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充分的准备。在选举中，驻会委员中党员参议员超过了一人，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党员委员超过了两人。区党委和行署发现问题后，当场宣布退出三席。这样做，博得了整个参议会的赞许，认为党和政府是真民主，真正实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会议最后推选金明任参议长。参议会结束时，由行署主任李一氓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报告。这届参议会开得十分成功，争取和教育了中间分子，扩大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和树立了党的权威，在淮海区民主政权建设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在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中，淮海区党政机关广泛开展民主运动，进一步掀起了热潮。为配合全国争取民主的运动，淮海地委于 1945 年 7 月初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讨论民主运动。区以上干部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淮海地委书记刘震作“民主运动”的动员报告，着重阐述开展民主运动的意义，具体分析了有利形势和困难条件，明确提出开展民主运动总的方针，即“开展全区性的广泛的民主运动，实行普选。在民主运动中，必须继续削弱封建势力，贯彻‘三三制’政策，加强各阶层团结。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干部作风，密切

党与群众联系”。地委委员万众一也在会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转变作风”的报告。通过广泛讨论和典型材料的研究，形成了共识。会后，颁布了《行政干部管理条例》，其内容包括乡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工商管理局、辞职、请假、转任、惩戒、附则等，计40条。规定区、乡、镇各级行政委员会均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罢免及改选，并依次报县政府或行署备案。同时颁布了《淮海区村镇选举法草案》《淮海区区级政府选举法草案》《淮海区各级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为了进一步动员群众，行署还发表了《为开展民主运动告全体选民书》和李一氓、陈月斋签署的《布告》。《布告》指出：“目前开展民主运动的目的是通过选举运动，使全体人民更加亲密团结，为准备反攻、战胜日寇，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由于盘踞两淮的伪潘干臣、吴漱泉部与人民为敌到底，负隅顽抗，解放两淮任务迫在眉睫，因而真正实行以普选为内容的民主运动，到1946年初才完成。

二、淮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1年9月13日，淮北行政公署成立，刘瑞龙任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玉柱为副主任。淮北行署成立后，区政府公布施政纲领，明确了改造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目标，明确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在基层废除旧联保、保甲制度，建立新型乡、村人民政权。淮北行署先后颁布了《关于行政区划的决定（草案）》《县以下各级代表会（县为参议会）组织选举法（草案）》《区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乡（镇）公所组织法（草案）》等条例，但真正普遍推开，是在1943年春反“扫荡”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后。根据上述条例，泗阳、泗南、淮泗等县对过去的大区、大乡进行重新划分，改过去的保甲制为乡村制，以1000人至2000人为1个乡，8至13个乡（镇）为1个区，10至15个区为1个县，以便于政令的推行和人民群众的参政与管理。1943年年底，淮北大部分县都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县参议会和区行政委员会。其中，以泗南县的乡选最普遍，全县72个乡中有58个乡进行了乡选，占总乡数的80%左右。通过乡选，基本群众在乡政权中取得了优势，

大批地方干部进入了政权机关，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4年6月底，据泗南、泗宿、淮泗、泗阳、盱凤嘉和淮宝等县的统计，在1700个乡级干部中，只有为数几个是外来干部。200个左右的正、副区长中，外来干部占12%左右；20个左右的正、副县长中，外来干部占32%，地方干部担任正、副县长的有13人。

在政权民主化的进程中，淮北抗日民主政权基本上实现了“三三制”。从党派成分来看，根据地中心区的5个县参议会中，共有驻会委员43人，其中，党员14人，占32%；非党员29人，占68%。在中心区8个县行政委员会中，共有委员86人，其中，党员30人，占35%；非党员56人，占65%。据38个乡的统计，行政委员会委员共有347人，其中党员133人，占38%；非党员214人，占62%。此外，从选进政府中的抗日阶层人民代表来看，各阶层的人民代表都有，不仅有组织的群众可选代表参政，无组织的群众也可选代表参政。

淮北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工作指示，于1942年9月成立了边区精简委员会，行署正副主任刘瑞龙、刘玉柱分别为正、副主任委员，领导并检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从1942年9月至1943年春，共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工作。第一次是合并重叠机关，撤销审计处，改为财务审计科；撤销财政总务科和教育处总务股；公署机关只留两个伙食单位，由秘书处总务科管理。切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减少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同时，建立了集体办公、学习、作息时间和定期会议等制度。这次精简，将原有360人减到281人，减少22%。33天反“扫荡”之后，行署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根据新编制重新配备人员，将编余人员进行妥善安置，干部充实到基层工作，战斗员充实到主力部队作战，杂务人员遣散回家生产。在第一次精简基础上，这次精简又减少了72%，仅保留了101人。为使各级政权机关在将来更严重的战争环境中能灵活机动地执行工作任务，行政公署于1943年初进行第三次精简，着重并处减科，将财政处与粮政处合并，成立财粮处，将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每处只留二三名干部。根据新编制，行署

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只有 60 人，较之精简前的 360 人减去了六分之五。在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后，行署机关呈现出新的风貌：一人做几个人的事，提高工作效能；机构精干，人员少，行动敏捷迅速，适应战争的环境；自己生产，自己开支，不发公费，既节约了公费，又减轻了群众负担；取消了勤务员与马匹，领导干部生活更群众化，增强了干部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淮北行署成立以前，淮北抗日政权的组织形式大多还是旧一套，县以下的保甲制度仍然存在。虽先后成立了皖东北军政推进委员会、参议会、皖东北临时参议会，但都是咨询机构。淮北行署成立后，致力于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淮北《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实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的原则，改造基层行政，建立民意机关，实行各级政府民选，树立民主政治的新作风。”淮北行署刚成立，就开始进行机构改革，按“三三制”的原则，成立边区、县参议会和行政委员会。淮北抗日根据地从边区到县都成立了参议会，不少区、乡也成立了人民代表会。淮北边区参议会的职权是五项，即选举与罢免行政委员会及政府负责人，监督及弹劾各级行政人员，讨论与决定政府立兴与立革的事项，通过政府的预决算方案，议决政府及群众提交请议事项书。各级政府接受参议会的监督和批评，切实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并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1942 年 10 月，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员大会，选举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行政公署正副主任、高等法院正副院长，还讨论通过了行署主任刘瑞龙作的《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及 150 多件法规议案。此时，边区参议会已不是初期的咨询机构，而成为民意机关，并且向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逐步过渡。

淮北行署成立后，加强政风建设，形成了良好的有别于旧政权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工作方法上，做到工作有计划，既有长期的工作规划，也有近期的工作计划，按计划办事，定期检查督促，定期汇报工作情况，定期完成任务；工作有中心，以中心工作带动全盘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动员群众，宣传群众，坚持“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工作实效，不搞形式，不搞浮夸。在工作作风方面，主要形成了三种作风：一是战斗的作风，做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决定了就干，苦干实干，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改变过去政权的一切繁文缛节，做到简便、易行，适应战斗环境；二是民主的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扫除衙门作风，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批评监督，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三是廉洁的作风，不贪污，不受贿，涓滴归公，廉洁公正。民主政权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教育了干部与群众，振奋了革命精神，密切了干部与群众关系，增进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促进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第三节 军事建设

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摩擦进攻，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军事建设，充实主力部队，发展地方武装，发展民兵组织，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根据地的军事建设不断得到加强，为抗日反攻积蓄了力量。

一、组织参军扩军

在淮海根据地，为充实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发展地方武装，从1943年冬季开始至1945年8月，先后掀起了3次参军热潮。在1943年冬季第一次参军运动中，8000余人参军，超过计划数的4倍。1944冬季和1945年8月又两次掀起全区参军热潮，共征集新兵1.4万余名。

淮海地委和行署提出参军任务后，各县均热烈响应。县、区、乡都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展区与区、乡与乡、个人与个人竞赛、挑战，形成参军热潮。接着，动员干部、绅士、教员、学生、农救会员、妇救会员等所有力量，开会讲参军，演戏演参军，标语传单写参军，亲戚朋友谈参军，形成群众参军的氛围。《淮海报》用

大量篇幅集中报道各地参军动态、典型事迹，进一步造成强大的舆论。全区各地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同戴大红花景象。从1943年冬开始到1944年春，各县参军热潮此起彼伏。宿北县扩充新战士234名；沭阳县在25天内动员600人参军；运河特区460人参军；泗沭县动员1916人参军，超过县委规定数的1倍。1944年冬，淮海地委和行署提出在11月底前动员2700名新战士参加主力部队的任务，并就参军与备战工作写信给各县县委，要求“各县在干部中加强敌情的认识，反对太平观念，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备战动员，已动员参军的各县，参军工作要加紧突击完成”。在地委和行署的动员下，淮海区很多共产党员及干部，带头报名参军，率领近3000名青年加入主力队伍。同时，淮海军分区地方兵团也得到几千名新战士的补充，各区队均保持六七十人骨干武装，各县总队由三四个连壮大到二三个营、每营6个连到10个连的武装，每连均在百人以上。许多工、农、青、妇的会员们，其父劝子、兄劝弟、送子参军、送郎上前线的模范事例，超过了首次大参军。淮海区原计划用20天完成任务，仅10天就超额80%完成任务，经几次精简后，还有3587名成分好、来历明、年轻力壮的新战士。

到1945年春，淮海区除以军分区第二、第三支队为基础组建一个独立旅增援皖江外，同时还组建了新一团和新二团（每团3个营，11个连，计全团1500人），还恢复了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建制。第十旅由刚到淮海区时的两个团4个营扩充为武装整齐的两个旅（含独立旅）6个团。

1945年8月底，为了扩大反攻力量，迎接胜利，淮海区掀起抗日战争胜利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参军运动。在历时20余天的参军运动中，各地均热火朝天地成立反攻团、反攻营等，每县都有千百名优秀青年参军。泗沭县反攻团有1900人、宿北县反攻团有1000余人；其他各县反攻团或反攻营，人数均在七八百人至一千人左右。淮海区参军人数总计达万余名。这支新军成立后，便相继上升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独立旅、第十旅、军部警卫团及淮海区地方兵团和各县警卫团，走上了反攻的前线，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

随着3次大规模参军以及零碎的壮大主力，淮海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8月，淮海区地方武装已达五六万人，其中上升补充主力的有1个营、2个大队（相当营）、2个团，共有4000人；建设2个整旅、6个团机动（独立旅是2个团机动，后经补充；新二团乃为3个团），计有7000人。

其间，还组建新四军第三师独立旅增援皖江地区。皖江地区东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达青阳、泾县，北抵合肥、全椒，地跨长江两岸，紧邻汪伪巢穴南京，是联系鄂豫皖、淮南、苏南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4年12月，处在战略大反攻的前夜，敌伪垂死挣扎，对皖江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蚕食”“清剿”，经常抢占地盘，切断新四军第七师（皖江）与第二师（淮南）的联系，并妄图从北、西南夹击第七师，摧毁皖江根据地。

据此情况，新四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增援皖江地区的力量，从淮海区紧急编成一个战斗力较强的独立旅前去增援。1945年3月下旬，第三师第十旅在参加反击伪孙良诚部扩张伪化的斗争取得胜利后，驻扎在淮海区泗沭县北部里仁集地区。淮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旅副旅长覃健和淮海军分区（兼第十旅）第二支队政委石瑛接到组建独立旅任务后，即南下洪泽湖赶往新四军军部，聆听军部首长的具体指示。不久回里仁集，遵照军部、师部的指示组编部队，于3月底完成组编。其大体编制是：从第三师及淮海军分区机关抽调干部，组成独立旅机关，覃健任独立旅旅长，冯志湘为副旅长，石瑛任政治部主任。独立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抽调淮海军分区第二、三支队归独立旅建制。支队干部基本上随建制继任，即第二支队长俞和坦、政委蔡永；第三支队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每个支队编3个团，每个团编4个连，团相当于加强营。另编旅直特务连、通讯分队、迫击炮分队等。各机关还编有勤务、警卫、炊事等。全旅共编4000余人，其中，党员1700余人。同时，健全党的组织系统，旅部设军政委员会，支队设党总支，团部设党的分支部，连队设党的支部。

1945年4月4日上午，新四军独立旅在泗沭县里仁集隆重召开

成立和出征誓师大会，淮海区党政领导刘震、李一氓、吴信泉等出席大会并讲话；下午，独立旅奉命出发，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中踏上南下征途。全旅先冲过宿（迁）淮（阴）公路和运河封锁线，然后越过一段游击区，很快进入洪泽湖边，沿湖东岸前进，经高良涧，过洪泽湖，于4月10日抵达淮南区马坝（今属盱眙县）。在第七师策应下，独立旅乘机继续南下，先后抵古城、池河、藕塘，经赤镇一战，南渡滁河，进入江（浦）全（椒）地区。4月23日下午4时左右，独立旅进抵十林庙，与在这里迎接的第七师含（山）和（县）部队胜利会师，打通了第二师与第七师的联系通路。到月底，独立旅到达皖江的巢（县）无（为）根据地与含和地区。至此，独立旅行程400多千米，南下皖江进军胜利结束。独立旅抵达皖江地区后，暂属第七师建制。经过整训，全旅指战员以崭新的面貌投入保卫夏收战斗和巩固、发展皖江根据地的战斗，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袭击骚扰，并参加了解放襄安和无为县城的战斗。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独立旅奉命返回淮海区集结，归建第三师，准备进军东北。独立旅接到命令后，立即班师北上，于10月4日返回泗沭县里仁集集结归建，准备进军东北，从而结束了6个月南下行动的任务。

独立旅返回淮海区以后扩大了编制，全旅辖3个团，即第二支队改为第一团，团长俞和坦，政委蔡永；淮海军分区新二团调归独立旅，编为第二团，团长吴大林，政委吴书；第三支队改为第三团，团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吴信泉调任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原旅长覃健留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10月上旬，独立旅在里仁集体整补充，至中旬启程进军东北。12月上旬，抵达辽西的义县一带，完成了进军东北任务，随即投入了解放战争。

从1943年冬季开始，淮北根据地的泗宿、泗阳、淮泗等县，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和发动下，也掀起了群众性参军的热潮，涌现出很多“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参军扩军模范。这些县在参军运动中做到“不欺骗、不收买、不强迫”，对参军对象要求“来历明、年纪轻、身体强、成分好”。在1943年冬季的扩大参军工

作中，泗阳县扩充新战士 431 人，超出原规定数 72%，其中党员 58 人。淮泗县经过半个月的扩军工作动员，顺利完成 400 名的计划，县总队也扩充了 350 名。1944 年 9 月 26 日，淮北区党委作出《关于扩大一万地方军，创造十个独立团，发展十万民兵的决定》。此次扩军的中心目标是要求各县建立有 1200 人至 1500 人的健全的独立团，并同时建立与健全区、乡队和发展民兵，平均每个区队要有 50 人，每个乡队 20 人，民兵至少扩大现有数量的一倍，达到总人口的 4%。年底，各县均胜利完成这一扩军任务，泗宿、泗南两县超过任务很多，其中泗宿县扩大新战士 1700 多人，新行圩乡动员 119 人参军。至 1944 年 12 月，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共下辖 4 个军分区，拥有 26 个县总队、14 个独立团地方武装，共计主力和地方兵团 43123 人，步马枪 21675 支、轻机枪 501 挺、重机枪 41 挺、驳壳枪 1510 支、炮 14 门。1945 年 8 月，第四师恢复 1941 年时撤编的第十二旅建制，主力部队共有 3 个旅、一个独立旅、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此时，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阶段。

二、发展民兵组织

为了不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坚持人民战争，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在大量扩军和积极发展抗日自卫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兵组织。

淮海抗日根据地民兵工作基础较好。1938 年起，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有 6 个县大队、几十个区中队。开展好的地区，村村都有民兵武装，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1942 年 8 月，淮海区武装代表大会在沭阳召开，成立淮海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筹备会，由萧松甫、高兴泰、徐铁波、吕镇中、陈亚昌等负责具体筹备事宜。1943 年 5 月，淮海地委发出《关于普遍组织自卫军及民兵，发动广泛的群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广泛组织自卫军和民兵列为这一年夏收完成后至秋收过程中的中心工作”，并对民兵武装组织、领导干部、工作步骤、粮食经费供给以及武装来源等问题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决定，未脱离生产及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由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和

各级民兵队部领导指导；县、区委书记兼同级民兵政治委员，各级民兵队长则兼同级的军事委员；各级武委会下设人民武装部，实施对武装工作的具体领导等。经过几个月的贯彻落实，淮海区发动与组织的民兵达数万人、自卫军 20 万左右。

1942 年冬，淮海区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各县、区武装、民兵联防队配合主力部队，夜夜出击，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使敌伪丧魂落魄，其“接点连线”的计划迅速破产。敌伪据点虽然密密麻麻，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小股敌人出据点，到处受到民兵的伏击；各村联防队实行空舍清野，水井填死，粮食藏起，让敌人找不到吃的、喝的。民兵、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便采取“冷枪阵”“土炮阵”“火鸡阵”“臭狗阵”等手段对付敌人。有些民兵联防队还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安上轮子，装上火药和秤砣，夜晚推到日伪军据点附近，向敌人发炮。沭阳城南有个敌据点，修筑在一块高地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将其围困后，天天放冷枪，打得伪军连大小便都不敢出屋，惊魂不定。广大民兵在反“扫荡”斗争中初显神威，与敌伪斗争的办法越出越奇，越出越妙。后来，金明在总结反“扫荡”经验教训的报告中特别着重总结了民兵工作“这一个大问题”，肯定“民兵打仗是有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教育方面还不够”的问题。

1943 年 2 月，针对日伪妄图卷土重来的严重形势，淮海地委又发出了《关于准备春季大“扫荡”工作的紧急指示》，再次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坚持淮海敌后斗争到最后胜利，乡坚持乡，区坚持区，县坚持县，反对任何退却、逃跑的借口，并进一步对民兵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特别教育与动员民兵自卫队，更要在反‘扫荡’的群众工作上起模范与先锋作用”，“区游击队民兵的组织，要扩大起来”。由于广大民兵的充分动员与组织，淮海区反“扫荡”斗争不断扩大战果，从而转入局部反攻的阶段。

1944 年，淮海区民兵工作开展更为普遍，尤其在边区或情况比较恶劣的地区，或反“蚕食”、反伪化斗争较尖锐的地区，民兵的数量不断增加，对敌斗争的经验逐渐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淮

海区民兵达 86845 人，占总人口的 5.3%，占全区壮丁数的 25.7%。

淮海根据地民兵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劳武结合，经常整训，在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他们创造了许多战斗方法与战术。麻雀战术是民兵普遍采用的战术，即利用农村自然村庄分散的特点，一处发现敌情，附近周围各村庄的民兵即行集合分头向敌人包围，遍地打枪，常陷敌人于莫名其妙的失败之中。还有围困战术，就是把接近敌伪据点的地区变成无人区，挖围沟，拉防线，组织短枪队在据点周围，敌人出一个捉一个（又称“猫捉老鼠战术”）；采用死看不死守的狗咬“叫化子”办法，你来我走，你回去我又来（又称“苍蝇叮臭肉战术”）；遍地放野火，对付敌人可能出来抢劫、威吓等，把敌伪据点围困住，使敌人无法越出一步。还有袭击战术（利用夜间，积极开展袭扰敌人）、伏击战术（在地区交通线上打埋伏，打击敌人）等。

在广大民兵中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泗沭县葛集乡民兵刘其锦，有胆有识，在作战时奋不顾身活捉伪中队长、小队长、乡长八九人，缴获步枪 6 支，参加战斗 20 多次，取得显著成绩，被评为泗沭县民兵英雄。

1944 年夏，淮海地委专门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地委书记金明对进一步加强武装建设问题作报告，要求各地民兵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在行政村建立民兵小队，乡建立民兵中队，区设民兵区队，县设民兵指挥部，单独成为领导系统，县均建立民兵中党的核心组织——支部，同时要求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如战斗报告制度、统计报告制度等。10 月 25 日，淮海行署公布了淮海区民兵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全区上下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评选、表彰民兵英雄的活动。1945 年 2 月底，在各地评选、表彰的基础上，淮海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沭阳召开，刘其锦、王凤山等 8 名同志被评为淮海区民兵英雄。这次评选表彰民兵英雄的活动，对促进淮海区民兵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到 1945 年春，淮海区各地都建立和健全了民兵领导机构，建立了民兵军政工作制度，每乡均组织了六七十人以上的民兵武装。这些民兵武装，不仅是人民直接的强大的自卫军，

而且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支有力后备军。

在淮北根据地，1943年7月，淮北苏皖边区举行第一次民兵工作会议。会议规定：凡是在根据地居住的年龄在16岁以上55岁以下的公民，不分性别、阶级、阶层、种族、学校、信仰，均有参加自卫武装的义务；凡加入自卫队的，均应编入各自卫队为队员，但加入民兵的，不需再编入自卫队组织；对于自卫队中体力强壮、作风果敢、坚决杀敌的队员，在自愿的条件下，动员参加半脱产性质的民兵，成立独立组织系统，使之成为自卫武装的骨干；在组织领导方面，建立各级民兵领导机构；各级政府设立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其建制分别为县民兵总队、区民兵中队、乡民兵分队。会议通过的《抗日自卫队与民兵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自卫队与民兵的基本任务，即配合抗日正规军与游击兵团，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护地方治安，站岗放哨，检查行人，肃清敌探汉奸，捕捉逃兵、土匪；担任战场勤务，如帮助军队运输，送信带路，封锁消息，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等；进行独立自卫战，保护抗日政府及抗日人民团体，厉行政府法令；自卫队与民兵皆需接受军政教育训练。

淮北苏皖边区各地结合开展反“扫荡”、反伪化和剿匪、锄奸等斗争，动员大批男女青壮年参加民兵。到1943年年底，全区共组织基干民兵53277人，普通民兵173442人。民兵基干大队一般以乡为单位，以党员、雇贫农为骨干，其余青壮年编为普通民兵，由乡党支部书记担任指导员，加强党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在武器装备上，以动员地主献枪、向地主借枪等方式，逐渐将地主手中的枪支转移到民兵手里，同时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

为了扩大民兵数量，提高质量，中共淮北区委对发展民兵工作提出“三化”的要求：一是普遍化，每乡每村都要有民兵，民兵的数量要达到当地总人口的4%至5%；二是精干化，民兵不仅数量要多，而且质量要好，参加民兵的人必须自觉自愿，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要真正以工农为中心；三是战斗化，民兵都要学会打仗的本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淮北抗日根据地广大民兵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创造

了一系列适合于自己特点的独有的作战方法，经常使用的有麻雀战、破击战、围困战、地雷战、伏击战、捕捉战、攻心战、联防战等作战方法。通过运用这些神奇而巧妙的作战方法，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用劣等的武器装备战胜了优等装备的日本侵略军。泗南游击区的民兵，经常到泗县城郊游击，并以土大炮炮轰泗县城，敌伪军非常恐慌。泗宿县归仁区民兵给敌人以严重的袭扰，破坏电话，配合新四军主力伏击，深入敌人据点间进行游击活动。当新四军主力攻打罗圩据点时，曾有数千民兵协同作战。各县、区的民兵在阻击敌人抢粮队、掩护群众跑反、查拿敌探汉奸土匪逃兵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三、拥政爱民，拥军优抗

为了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增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都普遍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形成了一种深入人心军心的传统和制度。

在淮北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部队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拥政爱民教育，订立拥政爱民公约，使每个指战员深刻了解到抗日民主政权是各个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部队是政权的支柱。要求指战员尊重地方政权机关，遵守民主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部队驻到哪里，就在哪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切实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派出代表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群众团体联系，召开座谈会，听取地方机关和群众的意见。凡驻军3天以上的，都要积极帮助地方办冬学，训练民兵，慰问抗属、烈属，为群众治病，参加收割、栽种、推磨、割草、积肥等活动。凡是对群众有利的事，大家都争着去干，15千米以内一般的运输劳役，都由部队自己负担，不准动用民工。对根据地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为老伯伯、老大娘、老大哥、小弟弟、小朋友。部队移防的时候，总是把群众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水，把借来的东西还给群众。

地方上，由淮北行署颁布拥军公约和拥军实施办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拥军教育，使他们深刻了解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以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拥护新四军的热忱。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积极帮助军队解决训练和生产中的困难。平时，对驻军伤病员、残疾军人和抗属、烈属，经常进行慰问和给予各种照顾，妇救会还发动广大妇女做军鞋、看护伤病员，为战士拆洗、缝补衣被。战时，积极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

1941年12月25日，淮北行署发布《优待抗属暂行条例》，根据地参加抗日部队的军人直系亲属（父母、妻子及未成年弟妹）给予各种优待：免除缴纳田赋；减免救国公粮及一切临时负担，减免劳役；家中缺乏劳力，无力耕种田地与收获的，由各级优待抗属委员会组织义务人力畜力代耕代收，每年至少帮助40天，不取工资，不吃饭；缺乏土地不能维持生活的，有优先租种公田、庙田、学田的权利；租种别人土地的，在服兵役期间，地主不得抽回其土地；有经商能力缺乏资本的，有获得各公营企业小本借贷的优先权；所负私债无力偿还的，在抗战期间本息一律缓期偿还；缺乏种子的，由优待抗属委员会设法代募代借；子弟求学一律免费。1942年春荒时，全边区抗属获得救济粮、救济款，获益的抗属共计5022户12359人。在1942年一年内，仅泗南、泗阳、盱凤嘉、直属区4个地方，就帮助抗属代耕土地1.27万亩。各地将优待抗属工作作为一种制度，抗属的一切困难均尽量设法帮助解决。

1943年1月14日至2月10日，第四师开展“拥政爱民月”活动。10月27日，边区行署发布《关于发动冬季扩军贯彻拥军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开展拥军运动中把扩军工作作为中心，并于11月9日成立了淮北苏皖边区扩军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推动扩军工作。12月12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拥政爱民与拥军工作“对我军坚持敌后抗战与将来完成建立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均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我军为民族与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这种为人民斗争而与群众呼吸相通、休戚相关的精神，十余年如一日，现在我们更当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同时规定，1944年2月1日至3月1

日为华中各地区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月，在运动中，要把拥政爱民工作与发展生产、加强民兵训练、开展群众锄奸运动联系起来。1944年1月29日，在春节期间拥政爱民运动周中，彭雪枫在第四师直属队大会上作了《我们是政府的卫队，老百姓的护兵》的讲话，提出了拥政爱民的八点要求，对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关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淮海根据地，按照华中局《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精神，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工作。淮海地委决定，1944年2月1日至3月1日为淮海区“拥政爱民与拥军月”，由地方慰问部队、军属，同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拥军优抗教育。通过“拥政爱民和拥军月”活动，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积极帮助军队解决训练和生产中的困难。另外，淮海行署颁布了《淮海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条例》《淮海区优待荣誉军人暂行条例》《淮海区优待抗日烈士遗族暂行条例》。这些条例的颁布，使对抗属、荣誉军人和烈士遗族的优待形成了制度，也有了法律的保障。如对抗属，逢年过节政府首长亲自访问他们，区、乡政府宴请他们，地方发动群众向抗属送礼；抗属子女入学一律减免学费；向公私合作社购置物品享受八五折优待；到公立医院诊病免费，到私立医院酌予减免；缺乏土地和劳动力的抗属一切义务服役全部免除，并有租种、享受贷款等优先权；无依急须救济者，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粮食补助；每年四季各设一周为优抗劳动周等。对烈士遗族，各县编纂烈士传，附之遗志永垂后世；择其死事最烈者，政府对其遗族发给匾额，发动地方为其树碑；政府择地建立烈士亭，并雕刻烈士姓名；烈士子女入学一律享受免缴学杂费待遇等。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和落实，各地抗属、荣誉军人和烈士遗族的许多实际困难得到解决，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和士气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在地方开展拥军优抗活动的同时，淮海根据地新四军主力部队也在根据地内展开了热烈的拥政爱民活动。第三师政治部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拥政爱民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懂得建立军民鱼水情是立于

不败之地的保证。部队领导要求指战员做到爱护群众如同爱护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尊重地方政府如同尊重部队首长一样，服从政府法令如同服从部队命令一样。部队驻到哪里，就在哪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切实帮助地方群众开展生产劳动。1944年，淮海根据地拥政爱民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这项工作大致分为拥爱突击运动和经常性的拥爱工作两个方面。一方面工作是广泛开展春季拥爱月、春耕突击周、夏收突击周运动。在春季拥爱月中，淮海军分区政治部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即编写拥爱教材，着重进行“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思想的再教育。从机关至连队，从战士到干部，对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拥爱公约》，普遍进行思想反省，抓住实际材料把教育引向深入。二是拥爱实际工作，即清查纪律进行赔礼、赔偿；各单位请房东吃饭，征求老百姓对部队的意见；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绅士与政府人员座谈会，征求意见，慰问并进行会餐；举行军民联欢，开展帮助群众做活运动。在春耕和夏收突击周中，淮海军分区政治部及时确定帮助群众春耕和夏收的区域，并要求做到注意警戒，进行宣传，不损坏农具，不让一粒粮食给敌人抢走，不接受群众物资酬报，不违反群众纪律等。这一年夏收，部队共帮助群众收割麦子2万亩左右。再一方面是经常性拥爱工作。平时进行各种形式的拥爱思想教育、拥爱宣誓和现实教育，表扬模范，批评落后，对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进行严肃处理。在此基础上，开展自运粮草节省民力、帮助群众做活以及宣传、教育群众等工作。通过拥爱突击与经常拥爱相结合，淮海区军民关系更为融洽，部队中不仅违反纪律的事情大为减少，而且指战员的群众观念、根据地观念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第四节 群众运动

一、发动组织群众

1940年3月，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建立后，群众工作开始起步，但根据地社会秩序不稳，各阶层人士对抗日民主政权持观望态度，且群众工作干部较少。5月，刘少奇到皖东北视察指导工作，提出了根据地工作的“六大宝”，要求抓好群众工作。此后，皖东北根据地群众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工作团分散到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工作重点由集镇开始转向农村。部分地区群众开始发动起来，泗南的鲍集、陈涧庄、半城、孙园，泗宿的周庄、刘圩子、归仁集等，都有了一些群众工作，有的地区建立了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自卫队的组织，农民在斗争中开始觉悟并行动起来，干部也学到了发动群众的初步经验。

1940年八九月间，淮海根据地开辟。年底，苏皖边区党委书记金明在淮海区县区书记联席干部会议上作动员报告，在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指出：“群众工作是今后地方工作的基本工作，是一切工作中心的关键”，“群众工作是党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做群众工作的支部和党员便不是好的支部和党员。今后以群众工作的发动与否，群众工作深入与否，作为检查地方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但由于淮海区政权初创，社会秩序混乱，群众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到1941年10月程道口战役胜利后，淮海区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淮海区党委抓住时机，确定工作重点，选择沭阳等中心地区，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办法，结合夏收减租，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雷厉风行地发展农救会员，掀起了群众运动的热潮。各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督促制度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一方面首先建立了各县农救筹备会，运用合法的公开的组织形式来领导与督促这次工作，另一方面则运用在保甲建立起一种自愿加入的农救会小组，开始经过一定民主方式来建立保、乡、区、县的农民代表机

关。同时，还采取以下方法来巩固农救会组织：一是从农救会中发展党员建立农救会的核心，从建立核心中巩固农救会。1942年6月，淮海区党委发出《关于夏收运动中大量吸收农民党员的决定》，提出在夏收基本运动中，“党应在组织之群众中吸收百分之二的党员”。沭阳县在农救工作开展后，所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农救会的下级干部。二是从识字教育工作中巩固农救会，号召所有会员参加识字班，在识字班中起模范作用。三是从自卫队的工作中巩固农救会，号召所有会员都参加自卫队，并在自卫队中起积极先锋作用，用以坚持自己的地区和岗位，巩固组织。

在淮北区，1941年5月，津浦路西地方干部随新四军第四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加上皖东北原有的干部，共500余人，大大增强了群众工作力量。6月，区党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华中局对淮北群众工作的指示，介绍了盐阜、淮海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会议决定采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抓住一点，推动全盘”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会后，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民运工作，发动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运动，开展对地主的斗争，组织自卫队，成立群众团体，发展了大批党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43年1月，为精简机构，将边区工、农、青、妇4个抗日救国总会合并，成立边区各界联合抗日救国总会。1月5日，根据华中局对淮北群众工作的指示，总会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夏收群众运动的基本纲领，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土地租佃条例，对减息作了具体规定，并决定储粮积谷，对边区群众运动健全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宿迁地区根据地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救会组织发展迅速。1942年春，淮海区农救总会成立，杨纯任总会长，黄以干、李铁民任副会长。各县、区、乡也相继成立农救组织，全区有县农救会6个、区农救会13个、乡农救会90个、保农救会756个、甲农救小组1948个，共有会员5.7万余人，占全区所有群众组织中的94.6%，农救会成为淮海区最广泛、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

淮北根据地到1942年年底，在39个区、196个乡中，共组织347142人，其中，工救会员19265人，农救会员269762人。到1943年年底，全边区500个乡200万人口中，有400多个乡组织了农救会员426934人、工救会员28090人。1945年春，全边区会员发展到130多万人，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优势已经确立。

1943年5月，淮海地委发出《关于重整与继续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提出了1943年群众工作的总方针，即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行得普遍彻底的地方，要深入群众教育，巩固群众组织，发扬群众力量；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行得差的或还没有实行的地方，要彻底实行，以期确立群众的优势；对于群众组织形式，特别在敌后，必然要发展到武装阶段，变成庞大的群众武装，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根据这个总方针，淮海区重点明确了以下三项工作内容：一是恢复群众情绪；二是重整群众组织，以恢复农救会为重点，积极恢复青救会、妇救会等其他群众团体；三是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规定组织形式，必须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敌后精兵简政的原则，必须适合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原则，和在敌伪“扫荡”下坚持工作的原则。地委设群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推动全区的群众工作；县不设专门机关，通过民运部掌握与领导群众工作；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组成联合委员会，由民运部部长兼联合委员会主任。区农救会配5人、区青救会3人、区妇救会3人，农、青、妇3个团体联合办公，统一领导。乡农救会5人，均不脱产，不设乡青救会、乡妇救会，直接组织小组。村或保只设农救分会，共3人，均不脱产。通过重整组织，加强了武装斗争，使群众斗争又深入一步。但是，伴随着群众斗争工作的深入，在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捉人、绑人、打人、游街等过火现象。为了保护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淮海地委及时予以正确引导，尽量减少斗争的偏颇性。1943年6月29日，淮海地委发出《关于目前农村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导全党尤其是县委领导群众斗争上，一切从实际斗争出发，看事物的本质，不要看现象，灵活运用，不要教条主义。从而把群众斗争纳入健康轨道，站稳脚跟，讲求实际利益，

进一步推动了群众运动的高涨。

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群众组织的建立，群众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开展，对推进根据地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动员群众配合军队作战和直接作战。每次战斗都有农救会动员参加。沭阳新五圩战斗中，动员了300余名民众。程道口战役中，动员了3580余名民众抬运伤员。与此同时，开展优待抗属工作，帮助抗属耕种与解决耕牛困难，从而稳定了军心，巩固了部队。淮北区1942年共募集军鞋1.1万余双，募集80余千米的电杆电线，收买旧棉花10吨。淮北直属区发动妇救会做棉军装5438套、棉背心1500件、被子160条、鞋子305双，洗衣服3480套。第二，在改善群众生活方面，举办了合作社和小本借贷所。淮海区由地区、县、区农救会发动募集基金和地方绅士投资成立的小本借贷所，仅沭阳、淮涟就有49所，有粮食10吨、法币2万余元。淮北直属区设立了1个农民合作社，淮泗县设立4个、泗宿县设立2个、淮宝县设立15个；开办了小本借贷所，淮泗县设立12个，泗宿县设立14个。发动农民参加减租减息、赎田以及工人增加工资，初步改善了生活。第三，在开展群众工作中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改造一些基层政权。1942年，淮海区经过民主选举的乡长共8个，经过群众提议而撤换的21个，经过民选的保长35个，同时在沭阳农民代表大会上，由农民选出农民参议员30人。淮北区在开展群众工作中，发现了一些贪污和不公正的乡、保长，经群众会议评论而自动辞职的，直属区内就有6个乡、43个保、368个甲，乡级干部调整了2个、保级干部改选316个，甲长改选了64个。通过调整，群众参政的热情大大提高。第四，在开展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发动农救会会员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工作。淮海中心地区普遍办起了识字班，绝大部分会员参加了识字班学习，不但提高了会员的政治文化水平，更锻炼了他们集体生活的习惯。

二、大力改善民生

根据地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改善民生，而改善民生的主要途径是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淮北、淮

海根据地持续开展了减租减息、增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

淮北行署在发动与组织群众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减租减息、增资为中心，努力改善民生。行署成立不久，即先后颁布了《边区修正改善人民生活各种办法》（1941年12月25日）、《边区减租缴租条例》（1942年6月20日）、《边区救济灾荒借贷付本还本暂行办法》、《边区当地押地赎地办法》、《边区增加雇工工资调剂劳资关系办法》等条例。规定减租率为：对分租，原来对半分者改三五、六五分（即收粮一石，佃东分三斗五升、佃户分六斗五升），四六改三七分，三七改二五、七五分，原租不到三七者不减；对包租，一律减二五（按原租减去一成五，即原租四斗减一斗），满收满交，半收半交。规定减息率为：分半付息，老债还本；利过半，停利还本；利倍本，停付利，减本还本；借粗还粗，借细还细，利加二成。规定雇工工资标准为：大领（即雇工中技术高，农活可全掌握的）工资约计粮食350千克至500千克，二领工资约计粮食250千克至350千克，小伙计工资约计粮食100千克至250千克。

淮北区自1940年3月皖东北专员公署成立开始实行减租，开始时只有个别地区减租；到1941年，减租范围达22个区、98个乡，得利佃户9000余户；到1942年，减租范围增至39个区、196个乡，得利佃农19240户；到1943年，增至65个区、412个乡，得利佃农42756户；到1944年，增至899个乡。其间，农民从害怕、观望、斗争到攻势，地主从不理、反抗、合法斗争到低头，减租的程度随着农村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农民觉悟的逐年提高而年年增加。减租共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法令减租阶段。1940年政府公布法令，由工作队与保甲长减租，因而形成地主不肯减、农民不敢减的状况；二是农救减租阶段。1941年，农救会配合保甲长减租。1942年，全面开展减租，采取集体分场的办法，由上而下号召与由下而上配合，干部带领群众减租。这时地主采取造谣、躲避、让步、引诱等反抗办法，农民中一部分积极分子敢于同地主进行坚决斗争，而大多数则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在这两年中，农民还未全面发动起来开展减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很普遍；三是集体减租阶段。1943年，减

租规模扩大，中心区继续深入减租，边区各地也全面进行减租。佃户自己组织佃户小组集体行动，开展减租与退租，普遍采取斗争的方法，减租较为深入彻底。大地主遭受了打击，中小地主不敢不减，由公开反抗转入秘密活动或合法斗争；四是自动减租阶段。1943年秋减租以后，有些地方普遍进行查租，1944年起，减租已成为一种制度，佃户自动减租，地主不敢反抗，遇事找佃户商量。佃户生活改善了，纷纷买地、买牛。

淮北根据地过去利贷形式多、利率高。利贷形式基本上有粮利与钱利，也有粮钱混合的。高利贷名称大致有“头里跑”、“麦垫子”、“青麦账，听涨不跌，六撞十”、悬租、六分利、加一利、见涨等。也有借一还一的，这叫人情账。1940年，政府提出减息口号，对老债提出利过本，停利还本；利倍本，本利停付；一般的分半减息，又订出赎当地办法。减息工作在个别地方实行了分半减息，但比较普遍进行的还是赎当地。1941年，因法币跌价，债务人借钱还钱，实际上不但减了很大的息，连本也减了不少。1942年至1943年，主要是新债，借粮听涨不跌，边区悬租即借钱付粮利，有的利过本3倍至5倍。1942年春荒，政府提出借粮度荒，春借1斗，夏收秋收后还1.5斗。1943年春，因1942年收成不好，春荒严重。政府一方面拨公粮平糶，给予救济，另一方面号召贫富互借。夏收后，由于群众春荒借债过多，原息较高，政府又规定了减息的办法，从而大部分债户照规定还清了。1943年年成较好，政府提出储粮积谷办法。这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创举，对打击高利贷及解决群众春荒缺粮起了很大作用。1944年，政府又发放春荒贷款，缺粮户大为减少，私人借贷很少。发放积谷时，群众不愿借了，各地感到有粮借不出之苦。因此，政府对减息只号召群众归还政府贷款，继续办积谷，防止灾荒，提倡私人借贷自由，并提出在各合作社举办小本借贷所。从此，淮北根据地借贷关系进入正常状态。

在淮北根据地，工人增加工资工作与群众运动同时开展。1940年与1941年，政府都提出照原工资加二成的口号，1940年只在个别地区实行，1941年比较普遍。1942年，政府规定了雇工工资的标

准，增加了工人的工资。10月，边区工救总会成立，从上而下建立了工会独立系统。1943年，工资有了更完善的规定，只限最低工资，不限最高工资，并对工资食粮种类及支付时间作出更具体的规定。1944年，提出查资评资口号，一次议定，不再增资，并提出长工与短工结合，提供储蓄与发展工人合作社。

在淮海根据地，减租减息斗争起始于1940年9月。这年年底，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对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有关政策、步骤、意义以及应该注意问题作了明确的部署和要求，并号召“把减租成为群众本身的热烈的运动”。但由于各种原因，运动未能真正形成。1941年年底，为了推动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淮海区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布置了结合退租借粮等工作，开展群众斗争的工作计划及其方针。1942年4月，淮海行署制订了《减租条例》。5月下旬，经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讨论通过，淮海行署正式颁布了《减租条例》《减息条例》《改善雇工待遇条例》《典赎土地条例》等。《减租条例》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不设公田私田，一律照原租额减去25%。同时规定了佃农向地主交租和佃农永佃权等，保证了业主与佃农之间的正常关系。《减息条例》规定，原成立的借贷关系尚未结清者，其利率概以一分半为准许，付息已超过原标准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已超过原标准两倍者，本利停付；今后成立的借贷关系，其利率已订一分者，可以双方之协议改订之。还规定，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契约，债务人也不得在减息后拒绝交息等。《改善雇工待遇条例》规定，支付工资的最低标准，即大领以能赡养成人家属一个半至两个人为准，二领以能赡养成人家属一个至一个半人为准，学徒等以能略补贴家用为原则。为避免因货币跌落而影响雇工收入，《条例》还规定支付工资一律以粮食为准，从而保护了雇工利益。

1942年6月初，淮海区农救总会对当年夏收工作提出减租减息及发动参加农救会的任务，提出要普遍地、彻底地、认真地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增加工资，改善雇工待遇，以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造成坚固的抗日基础，粉碎敌人的“扫荡”，必须坚决做到第

一是无佃农不减租，无雇工不增加工资；第二是无农民不参加农救会，无会员不全家参加。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条例》，发动党内外人士投入这场斗争，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撰写了《二五减租在党内》《今后增加工资的问题》等重要文章，帮助大家统一思想，释疑解难，尤其对一部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态度，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初步发动，结合夏收工作，通过由点及面、逐步推开的办法，在50多天时间里，数万户佃农和雇工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共借地主粮食150吨、减租退租中地主退粮80吨、退法币（由退粪水折算法币）5.2万元，并新发展农救会员5.1万余人，新发展党员500人，新提拔县、区、乡、保农救会干部1728人。

1944年开始，淮海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群众受益更大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经过前几年减租增资，打下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初步基础，为全面反攻准备了一部分雄厚的力量；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地区减租增资不彻底，虽然彻底的程度比过去是逐年增加，年年进步，但个别顽固守旧的落后地主，阳奉阴违，使用种种手段，拉拢佃户，避免减租。据此特点，淮海区党组织和政府发动广大佃农普遍地同地主进行经济清算，不仅减了当年的租息，而且减了往年的租息，使佃农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减租结合查租。佃农向地主清算以后，乡、村干部及农救会配合，发动群众揭发减租减息中的问题，一户一户地检查，把该减没减或明减暗不减的租息清算出来分给佃农，使佃农真正受益。6月上旬，泗沭县召开退租和增加工资积极分子大会，县委书记李广仁总结了两年减租不彻底的教训，提出今后退租和增加工资的办法。会后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掀起减租查租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调整了租额，使减租、征粮更公允。6月23日，淮海区行政公署发出布告：“查二五减租规定，系照现行分租额为准，由于本地一般租额比例为主五佃五，减租后恰为三七五（主）、六二五（佃）。故新征粮条例为照顾地主减租后之实际情况起见，地主土地以四折计算，佃农土地以六折计算。较之旧条例公粮由主佃

五五对出折，自更为公允。但现行分租额中，尚有一种主六佃四折，如以新征粮条例计算，则适得其反。现为适应本地区一般现行租额及与新征粮条例主四佃六之折算符合起见，特规定现有维持原有主六佃四之分担额者，一概改为主五佃五，然后二五减租，以使减租、征粮均获公允。”布告颁发后，各地严格执行规定，既保证了佃农利益，也保证了业主的利益。但在这一年夏秋两季减租增资运动中，也出现一些偏向。各地减租增资比之前较为彻底与普遍，但从群众查租与算差粮中，自发产生了某些算旧账现象，以及个别佃农对地主人权尊重不够的过火行为，从而妨害了部分主、佃之间的团结，引起少数地主一时误会而逃入敌区，甚至怀疑到党的土地政策是否有了改变。淮海地委和行署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进行了纠正，并再三释疑，使逃亡地主陆续回归，主、佃关系走上了比较民主平等的团结道路，整个农村也较前活跃。

三、开展青年、妇女救国运动

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和农民抗日救国热潮的影响下，宿迁地区根据地青年、妇女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1942年1月16日，《淮海报》发表《青年工作方向》的重要社论，指出：“建立反法西斯民主战线，是目前工作的战斗口号；反对法西斯匪徒的侵略和奴役，是目前青年工作的唯一任务”，“青年工作除了执行抗日民主生产等一般的任务外，还须注意青年的教育、学习、婚姻、娱乐等特殊任务的要求，争取青年生活上、经济上、政治上一切改善”。社论还指出：“青年组织是有其独立的系统的，只要他不违抗抗日战线原则，任何团体和个人，只能从旁建议和帮助，不能直接干涉。”这篇社论传达了淮海区党委关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政策，给淮海区青年抗日救国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

在淮海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各地青年不分阶层、党派、信仰、性别、财产和文化程度，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1942年1月底，淮海区青年代表在沭阳钱集召开了淮海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发起成立淮海青年救国会。东灌沭地区青年在东灌沭中学召开会议，对发动和组织青年参加各项活动进行了广泛讨论。9月22日，淮海

区青年救国总会正式成立，选举曾直为总会长，同时决定：第一，通过召开大会，掀起青年运动热潮，扩大组织，健全组织系统；第二，立即开办青工学校；第三，召开儿童工作扩大会议，确定工作方针和办法，整顿儿童组织；第四，成立各县学生救国会，并召集学生扩大会，确定工作、学习办法，把学生工作作为组织知识青年的中心；第五，有计划地参加民主运动，掀起青年参军热潮。此时，淮海区青年救国会会员已经达到两万余人，儿童团员达到4.3万余人。他们在青救总会的具体领导下，在各自战线上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11月中旬，日伪军对淮海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致使一些工作未得到落实。但是，青救总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把淮海区青少年最大限度地动员到反“扫荡”斗争中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新安旅行团淮海分团于11月上旬在沭阳成立，聂大鹏任团长。他们根据陈毅关于组织全华中少年儿童任务的指示，积极协助开展青少年工作，开展各项文化艺术活动，使淮海根据地内到处充满了生机。

在淮北区，以青阳镇为中心的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抗会”）活动开展活跃。1938年夏，日军已经占领了徐州、蚌埠，皖东北地区抗日高潮正在兴起。广大青年在青阳小学校长张涇、教员杜元庆等带领下，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揭露土豪恶霸敲诈勒索的罪行，鼓动群众抗捐、抗税；组织文艺宣传队进行演戏，搞街头演讲，出墙报，贴标语。这样，青抗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参加青抗会的青年最多时达八九十人。1939年春，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为青抗会作《目前形势和青抗会任务》的报告，同时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学习材料，对引导和推动青年坚定走向革命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1943年年底，宿迁地区的妇救会、工救会也得到迅速发展。1942年3月，淮海区妇救会筹备会在沭阳成立，吕继英、耿明、于馨励等人为筹备会委员，吕继英、于馨励为筹备会正、副主任。妇救会筹备会成立后，立即根据妇女群众的特点，着重领导妇女进行自身的解放工作，在反对买卖婚姻和保护妇女婚姻自由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妇女们还参加了识字班、冬学、夜校，参加歌咏队、农村剧团。在淮北区，各地在改造政权、实行民主选举中，一些积极肯干、办事公道的妇女被选入村、乡行政委员会，不少人当选为村长、乡长，从根本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此期间，宿迁地区少数乡、保和城镇的工人抗日救国会也开始组织起来，主要的是油坊工人、磨工、蚕工、理发工等。工人抗日救国会会员仅占整个群众组织的十分之二不到，数量虽少，但在根据地建设和对日伪顽的武装斗争中，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五节 财经建设

财经工作是根据地军需民食的根本保证，根据地存在、巩固发展的重要条件，争取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淮北、淮海根据地十分重视财经工作，始终把财经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确立财经工作方针，逐步健全财经组织，完善财经制度，财经建设稳步发展，财经状况不断好转，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政策，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淮北根据地的财经建设

淮北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主要包括粮政、财政、金融、税收和贸易等方面，起步于1940年3月皖东北根据地建立后。这一年5月，根据刘少奇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皖东北专署确定了财经政策，制定了财经制度，决定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利用原皖六区专署的财经机构和工作人员及税章、税票，建立税务局和进出口货物检查总处，开展税收工作。淮北行署成立后，确定了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扩大与健全各级财经组织，建立与推行各种制度，举行土地查报，实行改赋征粮，征收公粮公草，厉行合理负担，以及建立淮北银号，发行边币，开展贸易事业，统筹物资出入，创办小规模工业，发展农业生产。还召开边区第一次财经会议，总结财经工作经验，提出财经工作的任务，即保证部队的供给、改善民生和与

敌人开展经济斗争。按照财经工作方针和任务要求，整顿和建立财经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全边区的粮食、财政、金融、税务、贸易和经济建设等工作；依照工作性质从上而下建立起各个独立系统和专门领导机关；建立各项财经制度，使边区财经工作逐步走上正规，财经状况有了初步好转，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进入1943年后，根据地形势开始好转，财经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整顿和完善财经制度，开展勤俭节约、反贪污浪费运动，加强财经工作队伍的建设，与日伪经济掠夺和封锁进行坚决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粮政工作方面，1940年3月皖东北专署成立后，根据合理负担原则，开始征收公粮，每年夏、秋二季各征一次。由于根据地刚建立，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加之未建立专门机构，政策尚不具体，工作缺乏经验，所征公粮不足以解决部队和机关人员的食粮需要。1941年淮北行署成立后，边区建立粮食处，县设粮食科，区设粮食员，乡配粮食助理员。各级政府还成立公粮动员委员会，协助各级政府开展动员、调查、征收及保管、储藏、运输、调剂等工作。同年秋，制订了公粮征收政策。其主要内容为：有粮有钱者出粮，无粮有钱者出钱；赤贫者不出；粮多钱多者多出；粮少钱少者少出；抗属、烈属、公务人员家属优待；用民主的会议决定，不许保甲长胡派乱派。1943年11月，淮北行署召开边区第二届财经会议，刘瑞龙在会上作了题为《切实整顿粮政，保证军需民食》的报告，指出了前阶段粮政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如土地调查不确，公粮征收率降低；粮食管理不善，霉烂蚀耗严重；支付审查制度不严，使贪污分子有可乘之机；粮食管理不严，边境走私猖獗；日伪大量抢购粮食，斗争十分激烈等。提出了切实整顿粮政的措施：清查存粮，立即出晒，勿使腐蚀（以后实行固定蚀耗的办法）；改善支付手续，严格执行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建立粮票制度，废除便条支粮，各乡建立经济审核委员会，严格审核制度，按月公布审核账目；严格粮食管理，禁止粮食走私；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军需民食。同月，还颁布了《1943年秋季救国公粮公草征收条例》，规定以实际收获

量划分 11 级征收标准，每人收获量不满 50 千克者免征，50 千克以上不满 100 千克者为第一级，征收百分之三；至收获量在 1 吨以上者为第 11 级，征收百分之十八，使征粮级差更细，征粮制度更趋完善与合理。1944 年 5 月，淮北行署又发布了《关于土地复查的训令》，规定土地复查的任务和目的，即解决土地纠纷，解除土地积弊；查清所有土地，确定人民产权；改进粮赋征收，固定人民负担。同时要求在土地复查中，查清全边区人口、户数、地亩、土质等级，“确定其收获量，编造成册，自此以后，每人每年公粮田赋，每年如此，丰年不加，荒年不减（十分荒年按一定成数照减）”。此后，在经过土地复查的地区，按照固定收获量的原则，对征收的级数和级差作了进一步调整，调整后的级差为 18 级。这样，人民负担开始固定，政府财政收入有了保障，粮政工作卓有成效。

在财政工作方面，1943 年 9 月，淮北行署设立了财政处、审计委员会、审计处、金库等财政机构，建立了各项财经制度。在 11 月召开的边区财经工作会议上，确立了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原则及财政收支统一实行预决算制度，并决定财政收支由一个机关执行，在统筹统支原则下，严格划分财务行政、财务会计、财务保管及财务审核 4 个系统，使其互相牵制，互相监督，收钱者不用钱，用钱者不收钱，用钱之前和用钱之后，要有完备的审核手续。

为了执行上述原则，采取了下列措施：（1）划分省、县款。省款来源于货检、盐税、特税的全部及田赋、契税的 50%，县款来源于牙税、屠宰税、烟酒税的全部及田赋、契税的 50%。省款用于主力部队及边区直属机关的开支，其中，军事费约占总开支的 80% 左右。省、县款亦可相互调剂，如县款不足，省款有余可予补助；如县款有余，省可提支。（2）实行统一的预决算制度和会计制度。建立预决算制度，是实行统筹统支的前提。1941 年秋，淮北行署实行季度预算制，确定了预决算的编造方法，统一制订了各种表式和各种经费的预算标准。会计工作是财政工作的生命线，淮北行署重视会计工作，颁布了会计程序，确定了会计科目和账目格式。新的会计制度规定：凡 500 元以上的现款，必须上交金库，5 日内交 1 次。

此外，解款必须用解款书，按照一定的格式，履行一定的手续。(3) 建立审计制度。边区设立审计委员会，行署设立审计处，负责边区的审计工作。审计部门对各机关的经费审核后，发给核准通知书，否则不能支款；对贪污浪费事项，审计部门有权提出处分书，交由最高机关执行。在预算审核后，本机关如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提出意见再审。审计制度的建立，严格了财政制度，减少了贪污浪费，节约了经费，同时使干部养成了节约经费和爱护公物的廉洁作风。(4) 建立金库。边区设总金库，下设分金库。党政军机关的一切收入，均须交金库；一切现金支出，向金库领用。财政处根据核定预算，发给领款机关支付书，金库则依据支付书发给领款机关经费。收入机关存款超过法定数额（500元以上）如不交金库，金库有权催交及向上级报告。金库如不经财政处的支付书而随便支付，则属违法。

为了进一步贯彻上述四项措施，执行财政制度，淮北行署注重加强财政干部的业务培训及其自身建设。行署成立后，财政处多次举办训练班，培训财会人员，并加强对财会工作的指导。1944年，淮北行署加强财经干部队伍思想和组织建设，要求财经人员政治化、专业化和群众化，即要求财经人员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热爱财经工作，并视之为终身事业；要积累经验，发挥专长，取得系统化的专门知识；要树立群众观念，事事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群众服务，着力建立一支既有一定思想觉悟，又有一定专业知识的财经工作队伍。

在税收工作方面，淮北行署设立了边区税务局和检查局。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税，依行政区划分，下设县税务局、分局、分所。检查局负责征收货物进出口税和过境税，依交通线划分，下设货检处、分处、分所、小组。这样，在全边区自上而下地建立起税务局和检查局的独立系统。在建立税检机构的同时，淮北行署对过去的税收制度和进行了整理。首先，颁布了统一的税章、税率，印制了统一的税票，以便于统一开展边区的税收工作。其次，开征正税，豁免杂税。行署确定盐税、检查税、田赋、契税、牙税、屠宰

税、烟酒税为正税，予以开征，其他各地方税为杂税，一律释免。其中，盐税是淮北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日军经济封锁，皖北、皖西、豫东、豫南、鄂北食盐缺乏，淮海食盐西运，淮北苏皖边区是必经之地，淮河、古邳、归仁集、青阳和黄河故道等地为食盐西运的主要通道。淮北行署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大小盐商争相通过该区，因而盐税收入约占全边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再次，实行关税制度，即在边境水陆交通要道口设立检查站，征收进出口检查税，这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其征收原则是：（1）对我利大，而对敌利小者，征轻税或免征；（2）对敌利大，而对我利小者，征以重税或禁止进出口，对资敌物资严禁出口；（3）对敌我均有利者，则根据需要缓急，课以不同的税收。此外，还实行没收制度，对那些不法奸商偷税、漏税，或贩卖禁运物品，则予以没收，以示警戒。

在税收工作开展过程中，淮北行署多次调整税率，不断整理税收，从而使税收政策更为合理，更能适合淮北地区的特点，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1943年11月召开的边区财经工作会议上，就整顿税务和加强缉私工作作出决定：第一，调整税务机构。各税检小组改属各分局直接领导；小组专任查缉，不负征税之责；征税员和检查员职责要分清。第二，加强缉私组织。划定封锁线，指定征收处，规定商贩必须走正路，绕道者按走私论处；征收处与征收处之间的大小道路，普遍组织群众性的缉私小组，并在交通线上配备检查小组，兼领导群众缉私小组，结成缉私网；配备秘密情报网，直接由分局领导。通过整顿，税检机构更加健全，组织更加严密，税检人员分工更加明确。

由于淮北行署及时整顿税检组织，调整税检工作，加强税检人员管理，税检工作成绩显著，税收不断增加，边区财政完全平衡，并有节余。1944年，边区总收入为1306万元（抗币）。其中，税款收入为1106万元，占边区总收入的84%。在税款收入中，检查税为599万元，占边区总收入的45.8%；盐税为425万元，占边区总收入的32.5%。公粮与田赋收入为157万元，仅占全边区总收入的12%，

说明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税收又主要来源于检查税和盐税，因此，淮北根据地人民负担较轻。

在贸易工作方面，淮北行署坚持以税率促进贸易、以贸易繁荣增加税收的方针，以达到开辟财源和克敌制胜的目的。1941年9月，淮北行署成立后，即设立淮北贸易局，作为领导全区贸易工作的总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调剂内地物资，平抑物价；组织商人，推动商业发展；举办公营事业登记，限制不利于边区人民的行业盲目发展；有计划地进口必需品，出口剩余物资；开展对日伪的经济斗争。淮北贸易局最初只是一个商业机关，输入必需品、土特产品。从1942年夏起，主持统制粮食的出口工作，并在青阳成立平衡物价交易所，开始由单纯的商业机关转为统制管理机关。为调剂根据地物资供给，平衡物价，组织进出口货物，并与日伪进行经济斗争，淮北贸易局采取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和对内贸易自由政策措施。对外贸易控制中，边区政府对粮、油、棉等土产物资实行统购与专卖制度，由贸易局统一组织收购，有计划地进行输出，并有计划地争取必需品的输入，严格控制资敌物资出口。一是对粮食实行统制与专卖。1944年夏，日伪军计划大量收购小麦，并在边区设立收购点，淮北贸易局采取针锋相对办法，不使日伪阴谋得逞，日伪只得进行协商，提出以伪币收购，并企图压低价格。贸易局坚持要用洋布交换，按市价出售，否则不卖。日伪只得运来洋布换粮食，两天内就成交2000多匹洋布的生意。二是对油盐实行全面管理。敌占区油盐主要靠华中几个根据地供应，对油盐实行全局管理，是与日伪进行经济斗争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以换回大量的棉纱和洋布，解决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穿衣困难。三是管理洋纱洋布。为了保护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进口的洋纱洋布既不能便宜，但又不能不进口，为此，淮北贸易局采取一面明许进口，一面加以管理的办法，由贸易局统一收买，转售时加以控制。这样既不影响根据地土布的发展，又解决了根据地的需要。四是开展各抗日根据地间的贸易，以减少对敌区的依赖。根据华中局的指示，苏北、淮南、淮北各抗日根据地间物资直接交换，以互补余缺。如苏北和苏中的食盐、棉花、土布与淮南、淮北的烟叶、

硝磺、牛皮交换，运输由双方共同负责，各运至指点地点，互相接送。此外，还建立各根据地间的汇兑关系，互相通融资金。在对内贸易自由方面，边区政府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对根据地的商人，只要其不违犯政府法令，不破坏抗日军队，不贩卖毒品，一律予以保护，并鼓励商人经营，帮助解决困难，如代购原料和推销产品，举办低息贷款等。对于较大的和比较重要的工业，商人无力独开，政府可与之合营。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保护商人的政策，不少敌占区的商人到根据地内经商。贸易局还在边区进出口要道上开设公营商店，如青阳大华商店、南新集丽华商店、双沟大兴商店等。这些公营商店一方面组织小商贩进行进出口货物的运销业务，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储存物资，调节市场价格。边区政府还组织县、区、乡三级合作社，主要是发展乡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方便群众，繁荣经济和发展生产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金融工作是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开展金融工作，就是对日伪进行金融斗争，围绕着货币斗争进行，斗争的目的是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和人民利益，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金融市场和贸易阵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占区和根据地都使用法币^①，当时法币可以固定汇率，兑换美元、英镑。日军曾以各种办法收买和夺取法币，甚至伪造法币，骗取法币，用以兑换外汇，购买军火，屠杀中国人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宣战，敌人不能再以法币套取外汇、购买军火，同时又因国内通货膨胀，法币本身贬值，敌人便采取发行伪币排斥法币的办法。1941年，汪伪政府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一方面在敌区禁用法币，扩大伪币市场；另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将贬值的法币推向敌后根据地，掠夺抗日根据地的物资。这不仅使已经贬值的法币愈加贬值，而且也使抗日根据地的金融面临危机。为有效排斥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防止敌伪利用掠夺的法币套购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使根据地在敌伪的

^①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法令，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

金融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利于经济的发展与财政的充裕，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各抗日战略区要采取实际步骤，创办人民自己的银行、印钞厂，发行地方币即抗币。于是，各战略区立即着手筹建银行、印钞厂，并很快发行货币和办理信贷业务工作。按照华中局指示，淮北行署确定了巩固法币信誉，抵制伪币，收买和保存硬币的金融政策，与日伪开展金融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成立淮北地方银号，发行边币，作为边区的本位币；收兑法币，以调剂根据地资金，发展生产，繁荣工商业。（2）劝告根据地群众拿法币到日伪区买货，以减少人民因日伪排斥法币所遭受的损失，同时还可以扩大敌伪区法币的流动量，使日伪排挤法币更加困难。（3）如边币发行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则提倡以货易货，或由商号发行本票。（4）对于伪币，不管军票、联银票或中储券，一律禁止在边区使用。由此打击了日伪的金融政策，稳定了边区的金融，保护了根据地的经济，也减少了人民因日伪的金融政策所遭受的损失。

1942年5月，淮北地方银号成立，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兼任董事长，陈醒任经理。地方银号发行了1角、5角、1元、2元、5元、10元和20元等8种面额、32版面的边区货币。到10月，共计发行边币215万元。由于边币是以根据地全部财政收入作为准备金，边区的财政收入比边币发行量要大五六倍，从而保持了边币的稳定，保证了边币的信用。淮北地方银号发行边币的方针，不是为了财政开支，而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调剂金融。因此，边区地方银号除了发行纸币外，还经营以下业务：（1）举办低利放款。据1942年统计，共计放款160万元，其中，农业放款30万元，工商放款26万元。（2）汇兑。办理各根据地同行汇兑业务，各县都相继成立分号或兑换所，以便各地民间兑换边币。此外，银号还办理存款业务。1944年下半年，因伪币狂跌，法币一再贬值。为增加根据地内的货币流通量，充实市场筹码，平衡外汇及扩大生产资金，根据华中局指示，淮北地方银号发行抗币，逐步回收边币，作为根据地的本位币。到年底，共发行抗币600万元。为进一步开展货币战线的斗争，

淮北行署采取扩大抗币、排斥法币、打击伪币的政策，使抗币的信用日益上升，法币和伪币的地位逐渐下降衰落。

二、淮海根据地的财经建设

淮海根据地建立之初，由于日伪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对此，淮海根据地军民进行坚决斗争。1942年1月，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指出：“为了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充分供给军用和民用，必须进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措施，进行广泛的生产建设。”并把经济斗争列为1942年淮海区人民奋斗的主要任务之一。不久，为贯彻中共华中局《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淮海行署制订了实施的具体办法：工作人员要参加生产，改善自身生活（种菜、养猪等）；植树造林，增加木材生产；劝告种棉，保证棉布供应；实行寸土运动，使地尽其利；解决春耕困难，帮助穷苦抗属；武装保卫春耕，打击敌寇。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团体负责人以身作则，除全体人员参加劳动外，还要帮助农民劳动一天。还提出开展生产竞赛，鼓励生产热情，发动组织代耕队，帮助贫困抗属耕种。为扭转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淮海行署于1942年6月10日召开全区财经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财经工作总方针，调整机构，确定了具体工作和实施步骤。同时提出：平衡收支，统一收支，宽筹经费，力求节约，整理县财政和税务工作；建立地方银行，发行辅币，筹备建设经费，大规模发展地区的农业生产及手工业；控制贸易，与敌伪掠夺物资的政策作斗争等。会议还通过了淮海区收支及预决算条例、县经费征收和经费标准、税务经费标准等章则。6月中旬，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在各县县长会议上，提出了淮海行署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的施政方针，其中，包括建立财政制度、统筹安排、整理税赋、力求节约、平衡收支等任务。7月14日，为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军队的需要，反对敌伪的经济封锁，淮海行署又颁布了“关于限制粮食出口”的布告，规定粮食一律不准出口。8月，淮海区水利委员会讨论兴修水利征工办法、保卫堤防办法等提案20余件，全面开展水利建设；9月，淮海区农业生产会议在

沭阳召开，李一氓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号召增强农村团结，加强生产。淮海区各项经济方针、政策的确定，对于发展根据地生产，保证根据地的供给，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落实财经工作总方针，淮海根据地在税收、田赋等方面都出台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获得了初步成绩。在制度方面，将县政府代管的田赋等税划归各县税检局，由行署财经科直接领导，实行统一征收；颁发了收支程序，收入统缴金库，统筹支配，建立预决算制度、金库会计制度，实行审计、会计、金库三权分立；在各县税局设政治指导员，由地方党领导，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加强税务人员的政治教育。在税收方面，取消了辗转相包、层层剥削的包税制，将屠宰税由各地税检局统一收回自办。为减轻人民负担，出布告免除了 72 种税目；健全与发展了检税网，全区设总局共 66 个。在田赋方面，淮海区进行土地登记，重新根据土地的肥瘠划为上、中、下三等则，75 千克以上为上则，37.5 千克以上为中则，37.5 千克以下为下则；在征赋机构中确立“核票”“算串”“收税”三部门的分工，互相监督。

建立淮海银行等，发行地方货币。1942 年春，淮海行署根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指示，开始在根据地内试行淮海流通券，共发行 30 余万元，给人民带来极大的方便，受到普遍欢迎。6 月，淮海区党委和行署在财经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淮海地方银行，发行辅币，筹措建设经费，对敌伪掠夺根据地物资开展政策斗争”的任务。下旬，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正式作出关于“成立淮海区地方银行发行兑换券与敌伪作金融斗争”的决议。由顾准、卢钝根任筹建处正、副主任，积极进行筹备工作。筹建处 20 余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了圆盘印刷机、石印机及其他物资，聘请印刷技工，建立起淮海银行印钞厂。印钞厂印刷 1 元、5 元、10 元和 1 角、5 角共 5 种淮海银行钞票。

1942 年 8 月 9 日，淮海银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到会理事有朱一苇、李干成、萧志贤、顾准等。会议推选顾准为理事长，黄以干为监事，卢钝根为总经理。行署副主任陈月斋到会致词，顾准向理

事会报告了银行筹备经过及其今后的业务方针。理事会还讨论了淮海券的标准，举办商业贷款、手工业贷款原则，并通过了手工业贷款章程、手工业奖励条例等。8月10日，淮海银行在沭阳县张圩正式开业，钱集、高沟、汤沟、古寨等镇商民纷纷往贺。全区除潼阳、宿迁二县因距离较远不及准备外，其余各县均于11日或12日起全部使用淮海券，原来流通的各种货币一律停止使用。持有淮海券者，随时都可以兑换法币，因此淮钞信誉极高，仅1个月内，发行额占制成额的97%强；贷款投资占发行额50%左右，存总行及各代理处基金占发行额25%左右。至9月，淮海银行各代理处的规模，业务人员的训练，内部制度的建立，都初具规模。9月底，淮海币已发行514万元（其中辅币150万元）。其投向始终贯彻发展生产的方针，发放大批农业贷款、榨油贷款和纺织贷款，还有手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其他贷款，对发展淮海根据地生产起到巨大的作用。

1942年11月，由于敌伪对淮海区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淮海银行部分人员随行署分别向泗阳、涟水方向转移。途中与敌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丢失了部分钱包，淮钞散失。为保护人民利益，行署决定从1943年3月起通过征收公粮和税收，全部收回淮海币。

征收抗日救国公粮。1940年秋，淮海根据地刚刚建立，公粮征收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筹粮机关，部队都是就地筹粮，不分等级、人口、田亩，再加上旧的乡、保长经手三分肥，花样百出，从中捞取好处，因此，到11月底，全区粮食开始发生困难。淮海区专门召开粮食会议，自上而下建立粮食的领导系统，专署、县均设粮食科，区、乡均设粮食助理，并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改进粮食工作，但还是筹不应支，只能勉强维持当时需要，到青黄不接时，仍不得不向富户预借粮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需民食和财政上的困难，1942年2月，淮海专署召开全区粮食会议，总结全区粮食工作，提出了统筹统支的原则，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给自足。专署粮食科改为粮政处，县仍设粮食科。会议通过了粮食征集条例草案，修订了过去的粮食征集率：改变过去每户每人除基本田2亩的办法，改为5

亩以下的免征，5亩以上的一律征粮；改变过去1亩至50亩为一征粮等级的规定，定为5亩至20亩、20亩至50亩为一征粮等级；改变过去地主佃出田亩每2亩折1亩，但按原有亩数定征集率等级的规定，定为征集率按折成亩数订定；一般的增加了粮食征集率。经过修订后，虽然粮食征集率比前提高，但由于规定了较合理的征集率，各阶层的负担比前合理、公平。会议还规定了田赋与公粮合并征收的原则与办法。粮赋合一征收后，既避免一部分通货膨胀的损失，又利于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的负担。还规定了统一的粮食保管与支用条例，利用统筹统支，大大减少损失。4月，《淮海行署救国公粮公草征集条例》《淮海区三十一年田赋改征实物暂行条例》经淮海区第二届参议会讨论通过，并交行署颁布施行。1943年2月，淮海行署又召开了全区财粮会议，作出了进一步加强粮食工作的决议，重申严格粮食制度的有关规定，如严禁以粗粮换细粮或换菜换油等，违者以贪污论处，贪污粮食15千克者处以死刑等。由于区党委和行署的重视，对征粮政策进行初步改革，全区人民拥护条例，并踊跃缴纳公粮，初步解决了粮食筹不应支的问题。

1943年年底至1944年1月，随着形势的发展、部队的壮大，淮海区军需粮食成倍增加，加之遇灾荒，粮食歉收，民食亦发生困难。为此，淮海行署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对1942年征集公粮公草条例又作了修订并试行。修订后的条例，将土地分为15级，将征集率区分为16级，科学地订出256个征集率，做到阶层区分明确，照顾到人口、土质及负担能力，使中、贫农负担大大减轻，而最高负担也不超过31%。同时，重新规定每亩收获量在10千克以下者，免征田赋；10千克至40千克的每亩收5千克；40千克以上者按比例增加120千克以上的每亩收20千克。这是田赋史上的一大改进。此外，采取新的管理办法，主要将收支、管理分开，县、区、乡仅管征收和保管，任何人任何理由不得动支，支拨则另设粮草站负责。支拨粮草一律由行署发粮草代金券，凭券向粮草站购买，从而减少了浪费和舞弊行为，也方便了购粮者，利于敌后环境，适合部队的流动。这一新条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开，因而

受到人民的普遍赞扬。各地又经过4个多月的土地清查，剔出了80余万亩黑地，整理了地册，清查了人口，评定了全部土质，训练了一批财粮干部，然后遵照新条例统一征集粮食，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众的合理负担和保证了军需民食。

第六节 大生产运动

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经济封锁，宿迁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生产遭受破坏，经济造成严重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军需民食，淮北、淮海两区党委政府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淮北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淮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后，边区政府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大减轻了农村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颁布政策，采取措施，推动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淮北市署立足根据地实际，提出了具有淮北地方特点的边区生产建设基本方针，就是“在现有生产基础上发展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工业为辅，发展私人农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组织机关、部队、学校进行生产”。在这个正确的方针指引下，淮北各项生产建设发展迅猛，其中农业生产、水利建设和纺织运动成绩尤为卓著。

发展农业生产。淮北平原历来以农业为主，盛产水稻、小麦、大豆、玉米、高粱、花生、山芋等农产品。由于战争破坏和封建剥削严重，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低，农民生活困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困难，1942年春，边区政府颁布了《垦殖暂行条例》和《垦殖实施办法》，鼓励和奖励垦殖，规定：不论公荒、私荒一律准许民众垦殖。公荒由当地县政府分配给抗属、难民、贫农开垦，土地所有权归承垦人，三年内不缴田赋公

粮；私荒由业主开垦，若不垦殖，由政府招人开垦，三年内不缴地租，土地所有权仍属原主，承垦人享有永佃权。号召难民、移民来边区垦荒，其待遇与边区内民众相同，并号召与动员边区内外资本家投资或招工开垦。还规定每户垦殖在 20 亩以上或介绍移民来边区垦殖者，政府予以奖励。1943 年，全区共开垦荒地 31.6 平方千米。对开垦的荒地，采用领放方式，规定每户领 20 亩，共 2300 多户领到了土地。垦殖的成绩显著，扩大了边区的耕地面积，解决了部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边区政府坚持以农业为主的方针，发展农业生产，每年都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部署和领导。1943 年 11 月，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确定了生产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农业生产的任务和计划，制订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和办法。边区政府每年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口粮、种子、耕牛、农具等方面的困难。1943 年，共发放农业贷款 793 万多元边币。此外，推广先进技术，提倡深耕细作，号召多积肥、多施肥、多锄草。同时鼓励多养猪，多喂鸡、鸭、鹅，多放鱼，多栽苇子和蒲草，发展副业生产。

为保证边区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各地政府干部深入农村，挨家挨户帮助制订兴家计划。1944 年春，全边区订立兴家计划的共有 70053 户，占边区总户数的五分之一。在订立兴家计划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开展生产竞赛，发动人与人、户与户、村与村竞赛。在组织生产竞赛中，培养模范生产者（自己做得好）、劳动英雄（自己做得好又能帮助人家做得好）、模范村（全村生产好），并颁布了奖励劳动模范的条例，从而掀起了争当模范和学习模范的生产竞赛热潮。

在生产中，广大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了劳动互助。劳动互助的形式有多种，如人力互助有合伙、扯伙、农忙队、互助小组、短工队、副业小组；牛力互助有合具和官牛，人力换牛力有换工小组，还有人力、牛力、工具三方面的互助等。1944 年，有互助小组 8061 个。由于劳动互助的广泛开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机关、部队、学校大力开展业余生产。淮北区党委规定：部队每人种一亩地粮、一分地菜；机关每人种一分地菜，上半年每人种半亩地粮，下半年种一亩地粮，另外养猪，收集野菜，做到菜金自给一半或完全自给；学校以种粮为主，种菜为辅，每人种一亩粮、一分地菜，逐步自给自足。通过业余生产劳动，机关、学校不仅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增强了劳动观念，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大力兴修水利。淮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淮河流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淮河年久失修，水患频仍。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淮北行署决定振兴水利，减少和防止洪涝灾害，确定了以防为主，同时兼顾排水蓄水的方针。成立边区和各级水利委员会，加强对水利工作的领导。组织干部深入各地，对水利工程进行详细调查，做出施工方案，并派技术人员到工地具体指导实施。政府每年发放水利贷款，还按照受益地亩，合理负担工程费用。采取了这些政策和措施，调动了广大干群兴修水利的积极性，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

淮北的水利兴修工程成绩斐然。在防水工程方面，完成了淮河右岸盱凤嘉境内自井头区的外河起，到潘村区的双炮楼止的5段工程，左岸泗五灵凤的淮北区邵家大路到唐家一段，淮河大闸一座，耗资180万元；淮泗县修筑洪泽湖堤两段。在排水工程方面，9个直属县共修大小河沟193条，计长563.5千米，起土30万立方米，受益土地为466.67平方千米。其间，以1944年春水利兴修的成绩最大，全边区共挖大小河沟414条，计长2113千米，受益土地为2526.13平方千米。还重点修筑了泗南的双峰大堤、淮宝的人字头堤等工程。其中，泗南大柳巷圩堤的修筑工程在边区有一定的影响。大柳巷位于淮河和月牙河交汇处，四周环水。1942年7月，大柳巷淮河大堤10多处决口，情况危急。正在此召开会议的彭雪枫闻讯后，立即率领当地驻军和群众奔赴险要工地，经过一昼夜的奋力抢救，终于化险为夷，保住了淮堤。此后，边区政府和泗南县政府发动群众，重点修筑了大柳巷围堤。彭雪枫牺牲后，应大柳巷人民的

请求，这段大堤被淮北行署命名为雪枫堤，以示对彭雪枫将军的永久纪念。

开展纺织运动。淮北地区历来经济落后，既无种棉习惯，土纺土织也不普遍，所需棉纱布匹多从敌占区进口。1943年，日伪统制棉纱布匹，严禁细纱进入抗日根据地，致使抗日根据地内布价暴涨，一斗粮只换一尺布，穿衣用布成为抗日根据地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为了粉碎日伪经济封锁，解决广大军民的衣被问题，淮北区党委于1943年12月10日发出《关于开展纺织运动的决定》，确定了解决边区布匹的基本方针：“发展根据地内广大群众的纺织运动，使根据地内广大家庭妇女学会纺纱织布，发展家庭纺织工业，使能自力更生，逐渐走上自给自足之途。”在纺织运动中，淮北区还提出了“从本年十一月到明年三八节发展纺纱车一万辆、织布机三百五十架”的计划和“今明两年内达到穿衣半自给”的目标，并制订了开展纺织工作的措施：一是建立边区、县、区、乡各级纺织推广委员会，切实加强对纺织运动的领导；二是推动和奖励植棉，要求明春种棉面积达总耕地的3%；三是号召并资助外来难民来根据地纺织，传授纺织技术；四是办训练班，培训纺织骨干；五是建立纺纱和纺织小组，成立纺织合作社；六是发放贷款，扶持纺织业；七是制订纺织事业奖励条例。这些办法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掀起了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群众纺织运动。到1944年，仅9个直属县已有纺纱车36680辆、织布机2686架，其中，泗宿、淮泗、泗阳等县各有纺纱车4000余辆、织布机300余架，还训练了数以千计的纺工，形成了村村有纺车的局面。在纺织运动中，涌现出一批纺织英雄。其中，泗宿县的耿道元成为全边区纺织合作社的先进典型，被授予“织布英雄”称号。

二、淮海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从1943年夏收后开始，淮海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历经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从1943年7月全地区总结武装保卫夏收开始，到1944年2月淮海地委扩大会议全面动员为止。地委和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武装保卫夏收的成绩及其意义，奠定了全区

干部重视生产工作的思想基础，同时各县、区确定实验区，采取结合冬学运动和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等形式，按农救会编写的生产教材上课；还发动了改造砖粪堆（猪圈、茅厕、粪池合一）、开展合作及纺织的运动。第二阶段是布置与开展阶段，从1944年2月开始，到7月上旬淮海地委召开总结春耕生产工作会议为止。1944年1月29日，苏北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开展地方党政民机关生产的通知》。2月底，淮海地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地贯彻《通知》精神，进一步在全区范围内结合春耕春种掀起生产热潮，并要求在夏收以前，全区安家计划能订好全部农户的70%；劳动互助的组织能以多样的形式包括全部劳动力30%至50%，合作社则在夏秋之间完成乡的组织、有二分之一的区的组织，秋后冬初完成县、区的组织。在此过程中，淮海行署颁布了《奖励群众生产办法》，农救会发出了《为春耕运动告农民书》，军分区也发出了关于春耕生产的训令。同时，《淮海报》连续发出了社论或专论，如《加紧准备反“扫荡”》《把生产推向群众运动》等，配合运动的开展大造舆论。7月上旬，淮海区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由地委副书记、行署主任李一氓作了春耕生产工作的总结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全区春耕生产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对大生产运动的坚持与深入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三阶段从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为巩固与发展阶段。淮海行署颁布了评选劳动模范、合作模范等条例，在各县层层评选的基础上，于1945年2月28日至3月6日召开了淮海区第一届群英大会，部队和地方代表参加了大会，金明、李一氓、吴信泉、杨纯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报告。会上，评选地方代表王维德等3人为劳动模范，王凤山等8人为民兵英雄，陈大奶奶等3人为合作英雄，姜万春等10人为模范工作者；评选部队代表陶茂章等8人为战斗英雄，杨青等7人为学习英雄，包振祥等3人为劳动英雄，张斌等8人为模范工作者。这次大会对鼓舞和激励广大干群、部队官兵的生产、战斗、工作和学习情绪，起了重要作用。会议以后，淮海地委和行署结合重新整理互助组，对1945年春耕生产作了部署，把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

淮海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提出了有利于解放本地区生产力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当时，在干群中存在着“淮海区不是陕甘宁边区”“不组织农民照样生产”等糊涂认识。针对这种认识，淮海地委和行署对两个地区各自的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淮海区在垦荒的潜力、生产的环境、开展生产运动的经验方面不如陕甘宁边区，而劳动力则比陕甘宁边区多。其共同点都是推行党中央的生产政策、方针和内容，都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性质，都是承认私有财产制度，都是以农业经营为主。经过具体分析，不仅坚定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正确方向，而且确定了适合本地区实际的生产计划和措施，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淮海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注意培养典型，用典型引路，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泗沭县三庄区贫农王维德于1943年秋在王庄组织了一个有8户的劝工小组，后又在李庄组织了一个8户小组。1944年春，两个小组合并，共16户。秋收后，经过整理，其中一户富户被洗刷出组。此时，全组有68人，土地14.4公顷。通过合作互助，他们调剂劳力、牛力，种粮、植棉，还利用剩余劳动力，组织了打油、运盐、刨树等合作小组，增加了产量和收入，改善了生活。王维德互助组在当时淮海区农村经济发展中引起了一个革命，成为远近闻名的互助合作的典型。泗沭县王庙村王业久，于1944年春组织11户成立了纺织小组，有木机1架、纺纱车9架。经过1年多经营，发展成拥有6个村（全区11个村）、653户、木机58架、纺纱车75架的大众合作社。淮海地委和行署发出向王维德互助组和王业久合作社看齐的号召，并在全区大张旗鼓介绍和宣传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和经验，从而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迅猛发展。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淮海区地委机关干部率先垂范，积极开展种植棉花、榨油及运盐等生产劳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干部党员的劳动观念、爱民观念，防止滋生官僚主义。淮海地委、行署领导同志

还加强了对大生产运动的具体指导，地委副书记、行署主任李一氓写信给王维德、王凤山等劳动模范，热情赞扬和大力号召他们开展劳动竞赛的做法。当淮海区土纱布一度滞销时，李一氓深入调查研究，对土纱布销路困难的成因及其应采取的对策作了深刻分析，教育干群注意内在的困难，着重改善自己，并采取新的扶助手段，从而使淮海区纺织运动渡过了难关，掀起了新的生产热潮。

为了支援地方生产，减轻负担，淮海军分区在1943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支队、团（总队）成立生产委员会，在生产委员会领导下，以团（总队）为单位成立生产队，连成立生产组，具体领导战士开展种菜、磨面、养家禽等生产。同时，以支队（分直）为单位成立合作社，营业内容包括贩卖货物，开油坊、糟坊、运盐等，并规定红利的支配：20%作为改善部队给养生活，80%作为建军费用。1944年1月20日，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进一步明确发展生产是部队当前的中心工作之一。《训令》发出后，淮海军分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各支队订出了落实的计划。《战旗报》上也及时介绍了各单位的生产情况和经验。到1945年春，经过一年多生产运动，部队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达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500克菜以及每月500克肉的供应。在后方工厂生产中，缝衣工厂保证了2万多部队春夏衣服、鞋子的供应等。同时，通过生产运动，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劳动观念，还涌现了包振祥等一大批劳动模范。

淮海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基本上达到了根据地经济自给自足的目的，而且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积累了经验。其主要成绩是：（1）普遍订了安家计划。全区以沐阳最多，泗沭、潼阳等次之。这个工作是在总结1943年7月泗沭四区等实验工作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安家计划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和副业、办法及家庭分工。大力推广泗沭县孙为树订的安家计划。安家（安村、安组）计划的普遍订立，为劳动、互助、合作三位一体的基础工作作了保证。（2）开展互助合作。这是在农村中原有的“合牛腿”“打情工”“合犋”等组织形式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的。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淮海地委和行署利用旧有形式加以改造，号召广大群众在组织生产中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1944年，淮海区（除宿北县外）共组织了10887个社（组），除宿迁、东海、淮阴无统计外，包括了65395个劳动力、58229个牛力，耕种春田206.57平方千米。到1945年5月，各县互助组又提高了一步，订出等级，除头等组等，各县还创造了典型组，质量都比以前有了提高。（3）发展合作社事业。淮海区合作社自下而上发展极为迅速，其种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支持或直接经营的民营事业；老百姓组织的运输合作社（运粮、运油、运盐等）；小的消费合作社，经营盐、油、针线等日用品；纺织、油业、拐粉、造纸、打铁等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泗沭县合作小组有500个组。对于各类合作形式，淮海行署一方面要求合作社讲究劳动效率，节约原料，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争取市场和提高与外来品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采取扶助政策，如采用部队、机关所需用品的定货办法，采用免税办法，举办短期的合作社训练班，培养一批业务会计人员等；同时成立合作金库，帮助解决资金问题。行署还公布了对合作社工作人员舞弊行为的惩处条例，规定在5万元法币以上者，除交还款项、赔偿损失外，送司法机关，依照惩治贪污条例处以死刑。（4）发展纺织业。经过几年的倡导和扶植，到1943年底，沭阳等县的纺织业已初具基础。在大生产运动中，淮海行署一改过去官办形式，采取一切由老百姓自己经营，政府给予必要的贷款、定货、免税等扶助手段，同时制订了植棉奖励办法。到1945年上半年，全地区植棉达166.67平方千米。此外，切实解决纺与织的矛盾，把纺与织组织在一个合作社中。1945年6月底，淮海行署召开了合作社会议，作出了全区开展大规模纺织运动的决议，并决定推广泗沭县王业久合作社开展纺织运动的典型，要求各县联社集中资金，投放到弹织工具上去，以保证纺织运动的新发展。（5）开展生产救灾、节约防荒。1944年年底，淮海区发生冻害；1945年春，又发生旱象，至入夏以后，雨水仍太稀，部分麦苗冻死、枯死，当年麦子产量一般减收五成，部分减收七成。为此，淮海地委和行署在大生产

运动中，及时作出了关于备荒工作的决定，并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而斗争。《淮海报》也发出《备荒》社论，分析灾情，提出措施，动员人民抗灾。1945年6月下旬，行署主任吴觉在地委扩大会议上代表地委、行署提出了具体而得力的措施和要求：一是保护粮食，严禁粮食出口，限制饼类出口，严格取缔走私现象，限期禁止酿酒造糟，同时严密粮食保管，减除虫咬、鼠吃、腐烂等损失；二是开展备荒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储藏量；三是加强日用品与军用品的生产，力求自给自足，减少或不再以粮食向敌伪区交换；四是普遍组织备荒委员会；五是机关工作人员节约办公用品和节省公粮，带头备荒等。由于地委的号召和动员，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淮海区战胜了灾荒，也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

第七节 文化教育发展

淮北、淮海根据地相继开辟后，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推进抗日文化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揭露日伪反动罪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提高民族气节，发扬民族自尊心，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抗日工作。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淮北的教育事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比较薄弱，有小学238所，日军入侵后遭到严重破坏，仅存30所小学。1940年3月皖东北根据地正式建立后，抗日民主政权即开始恢复、发展和改造教育事业，恢复和兴办各级学校，大力整理教育款产，大量吸收本地和外地的教师、农村知识青年和旧知识分子充任小学教师，举办小学教育研究班，培训小学和私塾教师，从而使小学教育突飞猛进地开展起来。1941年9月淮北行政公署成立后，确定了边区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普及小学教育；

推进抗日文化运动，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抗战胜利信心和不胜不休之决心，提高民族气节，发扬民族自尊心，开办各种训练班，培植抗建人才，实行教育经费独立，救济各地失学青年，改善小学教师待遇。”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淮北行署召开了边区教育行政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开展国民教育的计划、任务、教材、经费等决议案，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和管理，使教育事业迅猛发展。1943年11月，全边区共有小学740多所。还开办了行政学院（培训干部）、建设学院（培训中学师资）、卫生学校、职业学校，以及淮北中学、淮泗中学、泗五灵凤中学、泗阳公学等。1944年春，在第七次边区教育行政会议上，淮北行署对学校教育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一是要群众化，参加社会活动，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民主管理，推行社会教育；二是要劳动化，学校进行生产，推动群众生产，培养劳动习惯，进行生产教育；三是要战斗化，适应战争环境，参加战备活动，发扬战斗作风，进行军事教育。1944年12月统计显示：淮北路东地区共有小学806所、教职员1952人、学生5.31万人，有中学8所、32个班、教职员148人、学生1863人；全边区共有民校1830个班、学生66383人。

淮北区党委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始终坚持教学为抗战民主事业服务和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教学与社会、教学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泗南县中潼村小学校长夏陶然在教学实践中实行师生结合、学用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法，被区党委誉之为“夏陶然的道路”，在全边区推广。淮北区把愿意为抗战民主教育服务的知识分子聘为教师，号召敌占区的知识青年和师资到根据地任教，并给予他们及其家属优惠的生活待遇。为使教师安心教学工作，淮北行署大力改善薪资待遇，规定中学校长每月工资50元，小学教员为50千克粮食，实验小学校长为57.5千克，初小教员为47.5千克。对从敌占区带家属来的教师，每月津贴其家属20千克至35千克粮食，对优秀教师，另津贴10千克粮食。这与当时上海小学教员每月薪金只能买13千克粮食相比要高几倍，与过去淮北农村教师每月工资几元相比要高十倍。教师待遇改善，不仅

招揽大批知识分子任教，而且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淮北行署将各地公产、庙田产及房屋划为公学款产。行署每年从政府经费中拨出占全部地方经费支出的25%作为教育经费，以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

淮北中学是淮北区党委和淮北行署领导的一所干部学校，全称为“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这所学校的创办是为了更广泛地吸收根据地内外的各阶层青年参加根据地的抗战和建设。该校于1941年春夏之交开始筹建，9月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泗南县杨景庄（今泗洪县境内）。淮北行署成立后，淮北中学就作为行署的一个直属单位，由行署及教育处领导。学校的经费和师生的生活费都由人民政府供给。学生大部分来自根据地的小学毕业生和失学青年，部分来自需要补习文化的地方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游击区、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地方干部，除了开设史、地、文、数、理、化等课程，还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列宁主义基础》等课程，同时开设时事政策课。淮北中学在4年时间内先后为淮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部门和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2000多名干部，对建设和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淮海根据地教育事业恢复于1940年秋。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淮海地区教育较为发达，自各城镇沦陷后，学校停办，文化教育事业被摧毁殆尽。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淮海区迅即建立文教机构，始设文教科。1942年3月，文教科改为文教处，同时行署明令各县健全文教机构，配备有关文教人员，还规定了小学教师的津贴办法，号召知识青年及开明绅士协助办学。在此期间，各地小学恢复百余所，东灌沭中学、淮涟中学、沭阳中学、沭宿海抗日中学以及涟水抗战公学、泗沭中学等也相继创办。

1942年5月5日至15日，淮海行署在沭阳陈圩召开规模空前的全区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有关教师生活、教育行政、教育办法等提案30余件，对淮海根据地教育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会议还决定在泗沭县吴圩创办第二中心县委学校，隶属泗沭县委领导。办学工

作得到新四军独立旅支持。9月初，学校在吴圩正式开学，有3个班，学生来源主要是地方上送来的青年干部，还有一部分是革命烈士后代。1943年3月后，根据地局势转稳，学校分在吴圩和乔王尚两处上课。同年夏，经淮海行署批准，学校改称为泗沭中学。同时为适应根据地巩固、发展形势需要，又招收两班初中生和1个师范班，共有6个班级，约有学生300人，集中在吴圩和单圩上课。1944年初，淮海区革命斗争形势更加稳定发展，全区又相继创办了几所初级中学，淮海行署决定将泗沭中学升格为区立淮海中学，作为全区的完全中学，属淮海行政公署领导。区立淮海中学的办学宗旨，首要的是为战争服务，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同时进行必要的教学改革，为胜利后的建设事业服务。淮海行署主任李一氓为淮海中学写了校歌：“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成长。劳动、民主、纪律，我们是新青年的榜样。”同年暑假期间，淮海行署在淮海中学召开全区中学教育工作会议，李一氓参加了会议，研究批准了淮海中学教学改革设想和工作计划。教学改革的要点，是将淮海中学办成一所混合型的学校，实行分科制，设普通科（普通中学班），采取四年一贯制，不分初中、高中，四年毕业，相当于三三制的普通中学；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减去某些不必要的循环；设置互助合作科，开设农业相关课程，培训农业技术人才。同年秋开学，班级16个，学生600多人。为锻炼学生社会工作能力，学校将学生救国会改为学生自治县，县设县长、秘书，并设军事、民政、司法、文教、财政等科，班组设区，县长、区长、科长都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县的任务，一是实验民主制度，学习民主管理，研究和制定自治法规；二是组织学生讨论时事，办讲座、辩论会、问答会，提高政治觉悟；三是宣传群众，组织一个业余剧团，自编自演，经常到地方和机关、部队演出；四是安排生产劳动和体育活动，学校有13多公顷土地，学生都有劳动任务，参加生产劳动。抗战胜利后，淮海中学迁校沭城，解放战争初期北撤山东，后复课于沭阳徐大庙，淮海战役胜利后重返沭城。淮海中学办学8年，于1949年秋完成使命，一部并入淮阴中学，一部并入沭阳中学。

同时，淮海根据地冬学运动普遍开展，各地自上而下成立冬学委员会，以村为单位，以更房、民房为课堂，以成年农民为主要对象，以小学、中学教员和合格的“小学生”为教师，以统一编印的《冬学课本》为教材，以抗战常识、民主简义、反“扫荡”须知等为教学内容，基本上做到每个农救会员认识500个左右的常用字。1944年7月，淮海行署为了整顿中等教育，统一各学制课程，专门召集中等教育会议，重点讨论学制课程、教育实施大纲、训育方针等重要问题。1945年5月，淮海行署抽调各县在职小学教师，成立小学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写出普及国民教育的统一教材。6月，淮海地委还作出《关于县委宣传部、县立中学、县政府文教科组织领导的决定》，把中学作为教育、宣传和开展文化活动的基地，并规定学校除负责对学生的教育工作，还负责党内教育、党报通讯、党外宣传及组织群众演唱、识字、读报等活动。通过贯彻淮海地委的这一决定，各地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全区中小学更加努力地为抗战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根据地巩固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文化事业的发展

淮北根据地和淮海根据地从创建开始，就十分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展文化宣传工作，着手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创办报纸刊物，编印通俗读物，开办农村俱乐部，推进戏剧运动，大力宣传抗战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成就，揭露日伪军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活跃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在淮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边区文化协会、边区戏剧协会、边区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边区小学教师联合救国会，还组建各县中学生联合救国会和小学生联合抗日救国会等抗日文化团体。第四师部队和边区都成立了文艺工作团，有新四军第四师的拂晓剧团、第九旅的奋斗剧团、第十一旅的创造剧团、抗大四分校的生活剧团，以及地方上的人民剧团等。此外，各县都成立了文工队、农村剧团、民间艺人演唱队等。这些文艺团体以戏剧、话剧、活报剧、快板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演出，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边区还设有拂晓

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大众出版社，出版各种报刊和通俗读物。出版有新四军第四师的《拂晓报》和《军事杂志》，第九旅的《奋斗报》，淮北区党委的《人民报》《党内通讯》《人民通讯》《拂晓杂志》《人民画报》，淮北行署的《政府工作》，文化协会的《大众半月刊》，淮北中学的《淮北青年》等。还出版了《大众小丛书》等通俗读物。这些报刊的出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他们的抗日决心和信心。

《拂晓报》是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8年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誓师东征前夕。初期，为油印四开，不定期出刊。1941年5月，报社随新四军第四师到达皖东北后，又分别出刊《拂晓电讯》《拂晓丛刊》《拂晓增刊》。1942年，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指示，第四师党委和淮北区党委决定将《拂晓报》与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报》合并，成为淮北区党委的机关报，仍命名为《拂晓报》。另出刊《拂晓报》部队版在军内发行。1944年秋，第四师收复淮北津浦路西宿县、永城一带地区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报社又出刊了《拂晓报》路西版。由于油印设备改善和刻印技术提高，一张蜡纸可以印到4000份以上，套印彩色达三四种。到1945年春，报纸由手工刻写改为铅印四开。与此同时，在新华社淮北支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华社淮北分社，分社兼任报社采访部。从此，《拂晓报》一身两任，担负起报纸和新华社淮北分社的任务。此时，报社拥有近百名工作人员，设有编辑部、采访通讯部，有收发新闻电讯的电台，有设在洪泽湖芦苇丛中木船上的“水上印刷厂”，资料室也有了分类剪贴的资料和近千册参考图书，报纸发行量达五六千份。

1939年12月，《拂晓报》出版四开12版的一周年纪念专刊。在第一版正中，用红色通栏套印毛泽东为报纸的题词“坚持游击战争”；第二、三版上分别刊登了王稼祥、谭政、左权、滕代远等同志题词。不久，毛泽东亲笔给彭雪枫和陈云写信，信中说，延安的同志们听到我军不断胜利的消息和看到《拂晓报》都很欢喜，称赞

《拂晓报》办得好，希望大家努力。信中还提到，派人送来《论持久战》的样本，要求拂晓报社翻印，并认真校对，连一个标点都不要错，还嘱咐报社，书印好后分送附近各抗日根据地。报社遂加班加点，完成了《论持久战》一书的刻写、印刷、装订工作。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拂晓报》的扩大发行工作十分关心，直接领导了该报公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发行，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当100期纪念专刊发到重庆时，大公报的一位老报人看后，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愿和拂晓报社的同仁共同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拂晓报》曾为一位反法西斯的国际友人带往国外，举行展览。

第四师的拂晓剧团成立于1938年11月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途中，开始时由一批13岁到16岁的杞县大同中学的男学生组成，不久又调来4位女同志，从此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局面。1940年春，开封孩子剧团9名小演员，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加入拂晓剧团。此时，剧团编为3个分队，在演出和宣传时，既明确分工，又相互协作。剧团先后演出了《参加新四军》《保卫麦收》《军民一家人》《傻小子打游击》《赛西施送郎》《刺寇》《三江好》等剧目。在艰苦的敌后环境里，现编现演，配合形势，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根据地的新人新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1年5月，拂晓剧团随部队转移到皖东北地区，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剧团不断成长，演出了以改造抗日部队内游击习气为主题的话剧《流寇队长》，反映根据地建设的《丁赞亭》，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鱼水深情的《鸿福临门》《云二姐》，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的《风雨之夜》，还演出了曹禺的名著《日出》《原野》《雷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淮北抗日根据地后，剧团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战争服务的总方针，既演出了大型话剧《前线》《铁血将军》，也编排了一些为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小型民间艺术形式的节目，如河南坠子《良女劝母》，大型秧歌剧《反攻依靠谁》，淮北民间流传的跑旱船、花挑子、打花棍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拂晓剧团改编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所属的文艺工作团。

《拂晓报》和拂晓剧团是在彭雪枫的倡导下创办的，并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当时人们广为传颂，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部队中有3件宝：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

在淮海根据地，为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淮海区党委于1942年夏在沐阳陈圩召开了首次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会，淮海地委、行署领导同志金明、李一氓等在会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利用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文艺形式，组织起来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8月，淮海文工团成立，分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四组。10月，淮海文工团贯彻精兵简政指示，划分为淮海军分区文艺工作队和淮海宣教团两个小组，分属淮海军分区和淮海地委领导。1945年2月1日，淮海地委和行署结合整风改进工作，制订了《淮海区文艺工作队伍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县文工队属县委宣传部领导，以协助该县的社会教育和指导农村文化娱乐工作为宗旨，每队以25人至30人为标准，办公费、杂志费开支每月1000元。《条例》公布后，全区文艺工作队伍于春夏之交集中在泗沭县北裴圩、里仁、前庄圩、后庄圩一带进行整顿和集训，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全面反攻、进军城市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艺术上的准备；组织各县文工队伍观摩演出和汇报演出。集训期间，淮海地委作出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各县不再设专业文工队，统一整编为淮海地委宣传大队，下设干部大队、宣传大队和戏剧大队。经过整顿和集训，全区文艺工作队伍更加精干，同时提高了思想修养和艺术水平，为抗战胜利前夕面临的新任务提供了良好的服务。5月，淮海地委为宣传欧洲反德、意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和配合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要求学校、文工团、农村剧团等迅速开展以形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全区掀起了新的宣传热潮。

原苏皖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报》于1940年10月8日移至沭阳县三尖子、张圩一带出版，并于次年11月7日更名为《淮海报》，由陈毅题写报头。该报是淮海区宣传党的政策，传达党中央、华中局和淮海区党委指示的一个重要喉舌，也是淮海区人民及时了解抗

战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及工作任务的又一重要工具。1942年冬，日伪军发动大“扫荡”，报社向泗宿边界转移，于第二年元旦后转移到周集区的小徐圩，以后又移至六塘河北岸的小孙庄。此时改为油印版，并由四开二版扩为四开四版，印数由四五百份增加到千余份。1943年10月，在山东《大众日报》及《淮南日报》的支持下，《淮海报》恢复铅印。报社设在泗沭县三庄乡小更庄，以后一直在这个地区出版发行，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多种文化艺术团体的成立和专业队伍的壮大，淮海根据地文化艺术活动呈现了活跃、繁荣的景象。1942年春，东灌沭中学抗日救国演剧队排演了由汤增桐编写的抗日小剧《三星落》，对淮海小戏的改革和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对淮海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出戏在各地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出现了《攒碗》《小板凳》《未婚》《双喜临门》《二把扇子》等一批较为成熟的剧本。1944年春节期间，为鼓励文艺创作及提高文化水平，淮海行署颁布了奖励群众文艺创作的办法，并号召凡有条件的县要结合春节文娱活动，举行春节文娱大赛，通过深入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淮海区各县文工队和农村剧团都把本地区流传的各种艺术形式加以改造和利用，如快板剧、说书（淮海锣鼓）、拉洋片、童子戏、江淮小戏、京剧、柳琴、唱麒麟、小放牛、打莲香、旱船、踩高跷等，每逢节日或庆祝某一战斗胜利、劳军等，利用白天或晚间穿插演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月英寻夫》（又名《大后方的黑暗》）、《风雨之夜》、《照减不误》、《谁养活谁》等剧目，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和中心任务，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政治热情。

1944年春，经淮海地委同意，以演唱京剧为主的淮海实验剧团在泗沭县北裴圩成立。成立后便立即投入排演李一氓编写的25场京剧《九宫山》，把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从胜利进京直到失败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九宫山》先在淮海根据地公演，然后又先后到盐阜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和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进行汇报演出，都收到了强烈的教育效果。

第九章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开展局部反攻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已经垮台，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连续失败，岌岌可危，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也逐渐失利。日军为了应付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形势，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在苏北战场上抽调了部分兵力，补充太平洋战场的力量，同时加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依靠伪军进行“蚕食”和掠夺。由于日军战线拉长，加之兵力、财源、物力不足，因而面临着顾此失彼的严重局面。

敌我形势正在向有利于根据地军民方面转变。在此形势下，淮北、淮海根据地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日伪军不仅受到了重大打击，而且被抽走了部分机动兵力，力量更为削弱。于是，日军开始调整部署，确保重点，收缩防备，变原来面的占领为点线的占领，以便有效地控制海郑（徐淮段）、淮（阴）沐（阳）、沐（阳）宿（迁）等几条公路干线和运河、六塘河等交通线。在当地的伪军和伪组织中，除了少数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者外，大多数是本地人，看到依附的后台日军每况愈下，士气低落，都感到日子难混，人心惶惶。为了加强对伪军的控制，日军对伪军据点又进行频繁的调防、撤换，这就更加剧了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发动对伪军政治攻势的一个有利条件。

一、淮北根据地的局部攻势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人民抗战方针，从1944年开始，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进行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为了策应中原正面战场的作战，破坏敌军调兵计划及配合淮海、山东等地反“扫荡”，淮北苏皖边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在根据地人民支援下，从3月21日起，沿边区周围各重要交通线，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首先从津浦路线开始，在横宽数百里的战线上，协同作战，对日伪军据点同时发动了猛烈进攻，开始进行春季攻势。

在宿迁地区，第九旅二十六团于4月5日切断泗宿公路，在连续攻克河涯徐、新关、老韩圩敌据点后，为配合民兵围困归仁集敌据点，将至埤子集的公路破坏。15日凌晨，30多名日军乘着两部汽车向埤子撤退，当其行至侍卫圩子附近时，遭到第九旅二十六团和第四师骑兵团一部的伏击，被全部歼灭。归仁集敌人闻风丧胆，遂于第二天晚趁夜色逃跑，该据点不攻自破。同一天，第九旅二十五团一部在仓集附近埋设地雷，炸毁敌汽车多辆。26日夜，第九旅二十六团一部及泗宿县总队一部趁伪淮海绥靖军第三路蔡介石加修蔡圩据点时，出其不意地冲入圩内，大获全胜。次日，继续挟余威围攻双蔡圩。5月1日，双蔡圩之敌趁围攻部队阻击宿迁增援之敌时突围逃走，该圩遂被收复。3日，凌城、埤子、三棵树日伪军分三路进攻杨圩区，第四师步、骑兵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打击其中一路敌人，将睢宁伪第三区队大部歼灭，其他两路敌人闻风丧胆，赶紧逃掉了。

在运河沿线，第四师部队于4月不断向伪第二十八师驻地七堡、洪庙、和尚庄等地袭击，并向伪华北支队韩雄部发动了有力进攻。27日，又连续攻打伪第二十八师潘干臣部。当晚，第九旅二十六团一部攻下冯庄据点，全歼伪军第一〇一团二营。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分别袭击了武墩、余坝、史炮楼等地，伪第二十八师在第四师部队沉重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

淮北根据地整个春季攻势到5月5日止，历时45天，共进行大小战斗6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6处，毙伤日军官兵523人，俘虏伪官兵1296人，缴获长短枪近2000支，根据地军民大获全胜。春季

攻势的胜利来之不易，泗阳县县长兼总队长谢骥、大队教导员陈彬等 91 名指战员牺牲，团政治处副主任周吉一、营长尹瑞九等 292 名指战员负伤。春季攻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有力地声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以及淮海、山东解放区的反“扫荡”，解放了大片国土，并开辟了 5 个行政区，10 万群众获得解放，使泗宿、泗灵睢、灵北、宿北各县完全连成一片。在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敌人只能孤守在若干点线上。

就在淮北根据地发起春季攻势期间，日军于 4 月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 30 万人不战而退，37 天丢城 38 座，失地千里。为了开展河南敌后抗战，中共中央于 7 月 25 日发出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部署，命令新四军第四师进军津浦路西地区。8 月 15 日，彭雪枫、张震、吴芝圃率第四师主力从泗南县半城誓师西征。20 日，越过津浦铁路，与阻止第四师西进的国民党军作战，连战皆捷。9 月 11 日，第四师西进部队在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歼灭了国民党第二十八纵队李光明支队千余人。在这次战斗中，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壮烈牺牲。9 月 13 日，党中央电示华中局，决定调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任第四师师长，第九旅旅长韦国清任副师长，继续指挥作战。1945 年 2 月 5 日，淮北军民近两万人在第四师师部驻地半城镇的大王庄举行悼念彭雪枫大会，并将他的灵柩安放在半城镇。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的挽联：“二十年艰苦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山河，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张爱萍主持追悼大会，代表第四师全体指战员致悼词，邓子恢发表了墓前演说。张爱萍、邓子恢号召边区全体军民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努力工作，英勇作战，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作好向日军反攻的一切准备。

为适应淮北根据地形势发展需要，1944 年年底，淮北区党委重新调整各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在全边区设立 3 个地委、3 个专署和 3 个军分区，其中路东设立第一、第三地委、专署、军分区。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指导解放区战场举行局部反攻，驱逐日军出中国。1945年4月中旬，淮北军区对边区周围的伪军据点发起猛烈的春季攻势。战斗首先从海郑公路线上发起，4月17日至19日，第一、第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第四师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分别对海郑公路洋河至众兴段与灵宿公路展开大破击，并强化对淮河封锁。同时，以围困强袭战先后攻占众兴西熊码头、泗阳城及灵宿公路线上的日伪军坚固据点大店，并袭击三棵树、埠子集等日伪军据点，第一阶段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第四师主力部队继续在津浦路东西，向睢宁、涡北等日伪军发起猛攻。历时一个月的春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计经过大小战斗25次，攻克日伪军据点20多个，毙伤日军川上小队、伪总队长官兵以下550多人，俘伪团长孙家钊官兵以下1500余人。春季攻势不仅解放了3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数万群众，淮北根据地第一、第三两军分区连成一片，而且孤立了灵璧、泗县、睢宁的日伪军，使之处于根据地军民重重包围之中，便于日后对敌作战。

二、淮海根据地的局部攻势

1944年元旦，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发出号召：“动员与组织根据地一切力量，粉碎敌伪‘扫荡’‘蚕食’，准备反攻敌人，是今年党政军民的光荣任务。”春季，淮海地委确定以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结合军事肃清敌伪的方针，提出“加强敌伪军工作，加紧瓦解、破坏工作，造成敌伪本身困难”的任务。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淮海地区成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各县委普遍建立和健全了敌军工作部，以负责政治宣传攻势，进行瓦解敌军工作。在地、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均组织武装工作队，主要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针和利用伪军中的封建家庭观念以及“安清帮”等帮会的关系，在伪军中建立各种工作关系，争取伪军反正。在日伪据点内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伪军家属写规劝信，宣传反正政策。此外，为进一步瓦解伪军，淮海行署于1944年秋颁布了《红黑点簿登记办法》，对抗日做好事的伪军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

点，并以此奖惩。各县政府也按此办法处理案犯，并在各地普遍开展红黑点簿登记工作，取得明显效果。有部分伪军想为自己留条后路，设法打听新四军的红黑点簿里，他的名下有多少红点、黑点，打听做什么好事才能红点多、黑点少。有一个伪乡长向民主政府请求说，只要给他机会，就从此不敲老百姓一文钱，不碰一个抗日同志。8月，各地政府对伪区案犯一律按红黑点登记簿的记录处理，兑现办法，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各地人民向政府与新四军秘密检举日益增多，而作恶多端的汉奸、坏分子以及伪军日渐恐慌，纷纷反正。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造成对日伪军更加强大的攻势，1945年1月10日，淮海地委发出了冬季政治攻势的指示，提出：第一，加强与深入对伪军、伪组织有关系的人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并进行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攻夺城市交通线起义内应的思想酝酿；第二，必须对逃亡地主以政治争取为主，争取逃亡地主回到根据地来；第三，必须给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以有力的打击。指示还确定了从农历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二十日为淮海区政治攻势的时间；各县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县委书记兼任委员会书记，统一筹划冬季政治攻势的进行。通过贯彻这个指示，淮海区各地把组织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与实行宽大政策结合起来，使伪军纷纷反正、逃亡地主纷纷归来。2月26日，宿迁县伪永庆镇镇长黄文之携带步枪5支、白布20余匹投诚，受到当地抗日民主政府的热情款待。

淮海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不仅揭开了淮海局部反攻的序幕，而且为后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在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新四军和各地地方武装、民兵，对极少数顽固不化、不愿放下屠刀的日伪军，不断开展季节性的攻势，有重点地拔除危害较大的据点，逐步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配合了全国展开战略反攻的大局。

1944年秋，淮海军分区各支队开展一系列进攻，淮海区日伪军在新四军重大胜利震撼之下，基本上采取了守势状态，但在沭（阳）（东）海、淮（阴）涟（水）、灌（云）沭（阳）等一些地区，敌伪势力仍十分猖獗，进行“蚕食”、抓丁、抢粮活动。淮海区各支队

针锋相对，开展斗争，配合民兵，巩固边缘区。沭（阳）（东）海地区民兵和县总队在仲湾、周沟等地截获前去“扫荡”的敌伪军；灌（云）沭（阳）地区县总队在高沟以北、陆沟以南地区实行奔袭、清剿，获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至8月，淮海区各支队连克数十个据点。这些胜利显示了主力实行地方化后，地方武装已日益强大，开始独立作战，攻克敌伪据点。

1944年9月6日至9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发起了规模较大的林宫渡战斗。林宫渡位于宿迁县东南15千米，北靠运河，南200米处即为废黄河堤，是宿迁、泗阳二县水陆交通要点。日伪军为维护宿迁县水陆交通并切断苏北与淮北的联系，于8月29日派遣驻宿迁县的日军第七十二旅团第一三五大队金井中队88人，以及伪宿迁县保安队第十一中队、泗阳县第四区汉奸武装90余人，侵占了宿迁县运河线上的小张庄，并设立东西长120米、南北宽约50米的据点，控制了林宫渡。第十旅事先对敌动向作出了正确判断，并作了充分准备：详细绘制地形要图；动员群众拆除圩墙，埋藏粮食；将旅主力调至沭阳以南集结，佯作向盐河运动，诱敌向林宫渡冒进。待敌进入林宫渡后，第十旅即在林宫渡东北30千米的北裴圩、里仁集一带集中主力，进行政治动员、战术演练和战前攻击准备。9月6日黄昏，第二支队攻击部队连夜奔袭，于7日拂晓前渡过运河，突然将敌据点包围，并将指挥所设在废黄河堤上。8日，各攻击部队在炮火配合下发起总攻。经穿墙打洞，逐屋争夺，近战肉搏，至9日拂晓前，第十旅主力胜利拔除了林宫渡据点，击毙日军金井中队长以下66人，生俘日军5人，毙俘全部伪军9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给当地人民以极大鼓舞，几万名群众夹道欢迎部队凯旋。从此，敌伪军只好固守在淮阴、沭阳、泗阳、宿迁几座孤立的县城内，再也无力出来“扫荡”。

林宫渡战斗胜利后，淮海区各支队又趁势展开一系列反攻。在宿迁县境内，第一支队在宿东伏击敌军200余人，第四支队在宿迁县东永平村击退300余名日伪军。这一系列胜利，沉重打击了运河、盐河和各公路沿线的敌人，把在宿迁县西北边沿方面的日伪军压

向陇海铁路。此后，陇海铁路百余地段的日军处在淮海地方武装和民兵经常打击之下。

1945年春，淮海地方武装经过时事与任务教育，士气更加旺盛，掀起了向敌伪进攻的热潮。从2月开始，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在淮海地区频频发起攻势，连续攻克数十个日伪军据点，切断了敌淮阴、涟水、沭阳、宿迁、泗阳等县之间联系。叶圩子战斗是其中重要的一次歼灭战。叶圩子在沭阳城西南22千米。1945年2月7日，驻沭阳城日军为恢复沭宿公路交通，扩大伪化，派出米森小队70多人、伪保安队200余人，在此重新设据点。该据点长宽各80米，有房屋4座。敌在据点周围筑有高1.2米土圩1道。墙外有宽5米、深2米的外壕。壕外设有纵深15米的鹿砦，上系集束手榴弹。西北角有铁丝网。日军防守据点南半部，伪军防守北半部。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正确分析了该据点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2月11日，第一支队在第三支队以及淮阴、涟水、沭阳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由杨庄出发，次日2时抵叶圩子南面悦来集、吴圩地区，遂发起战斗。指战员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特长，与敌人白刃格斗，逐屋争夺。经过8个小时激战，共歼敌270余人。当部队凯旋时，沿途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自动送菜、点纸烟等慰劳士兵。这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盐阜区反孙良诚伪化的斗争，断绝了淮阴、沭阳、泗阳之间的交通，使淮海区敌伪军陷入孤立，战斗意志更加动摇。

第二节 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大反攻。5月8日，德国法西斯投降；7月26日，苏美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进军中国东北，迅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日本的失败

已成定局。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宣告抗日战争已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

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布战略大反攻的命令，命令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军发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接着，党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指示，分析形势，指出问题，强调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向日军展开战略大反攻的信心和决心。但是，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也发出了命令，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令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针对蒋介石疯狂抢夺地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发动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美蒋、日伪合流势头，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各解放区抗日军民在毛泽东的号召和朱德命令下，进一步向日军及其占领地区展开了战略大反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8月11日发出致华中各地日军通牒，命令华中日伪军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驻地听候处理，派代表到就近新四军部队接洽。8月12日，陈毅代军长指示，江北新四军部队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巩固占领津浦线，并指示由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负责占领徐州。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8月10日起，苏北军区指挥各地方武装，向苏北残存的日伪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攻。淮海根据地各县警卫团以沐阳、泗阳、宿迁、东海、灌云、涟水等县城为目标展开反攻，东面经高杨战斗，恢复了六塘河西岸地区，淮海、盐阜已连成一片；北面在潼西把边沿斗争向前推进到陇海路；西北面切断海沭、宿沭、淮泗以及海郑（众兴到洋河段）公路，并在淮涟地区发起攻势，完全控制了淮沭公路南北要道和运河线，使众多县城处于四面楚歌的

孤立局面。8月13日，众兴镇日伪军向淮阴城收缩集中，众兴镇率先被新四军主力收复。8月16日，沭阳城日伪军连夜向新浦方向逃遁。8月17日晨，沭阳县大队和泗沭县警卫团进入沭阳城。8月18日，宿迁县城日伪军向北新安镇逃遁，泗宿县总队进驻宿城。

在淮北根据地，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关于“接受伪投降并歼灭拒降敌伪”的命令和陈毅代军长指示，主力和地方武装沿运河以西，直抵商亳公路，在纵横250多千米的淮北路东、路西地区向日伪军举行大反攻，至10月31日止，两个半月时间，计进行较大战役及战斗21次，相继解放宿迁、泗阳、五河、泗县、灵璧、永城、萧县等地。

全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拥有400多万现代化装备军队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准备大规模内战，派出美械装备的5个军抢占东北、华北。为了夺取控制东北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9月23日，新四军第三师奉党中央命令进军东北。9月28日，第三师第十旅所属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原第一支队）、第三十团（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团）和旅直属队、特务营等8000余人，加上新二团2000余人，随后还有第七、第八旅、独立旅等，计3.5万余人，告别了并肩战斗5年的淮海根据地人民，踏上了向东北进军的征途。

第三编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后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以七大政治路线为指针，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力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为此，毛泽东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于1946年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进行全面战略调整，并在解放区大力开展惩奸反霸、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群众运动，以巩固解放区。

日本投降后，华中解放区遵照中共中央决策，坚决从日伪手中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至1945年9月收复两淮（淮阴、淮安），苏皖解放区连成一片。针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抢占东北、华北，加紧准备大规模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10月，华中新四军主力一部北调山东，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亦由淮阴北移山东临沂。

194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华中山东应分别组织野战军以支持战局》的指示，指出：“如现有华中地区不能切实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的形势和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根据这个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另组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指示，将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四块解放区合并，重新编组华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10月25日，经中

中共中央批准，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在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成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曾山、粟裕、刘晓6人为华中分局常委，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新四军留在苏皖边区的部队组建成华中野战军，由粟裕和谭震林分任司令员和政委，隶属华中军区，担负保卫华中的任务。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和骑兵团等编成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四师师部编为华中军区机关。

1945年10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向中央请示，提出为统一苏北、苏中、淮南、淮北4块解放区的行政领导，加强财政管理，建议组建苏皖解放区最高行政机构。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成立苏皖行署或边区政府统一行政”。10月29日，苏北、苏中、淮南、淮北4块解放区的参议会领导人、行署领导人和地方开明绅士代表，在淮阴城举行联席会议。当场推举李一氓为主席，第一副主席刘瑞龙，第二副主席季方，第三副主席韦恽，第四副主席方毅，以上5人组成主席团。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清江市（今淮安市清江浦区）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撤销苏北、苏中、淮南、淮北4个行政公署，统一调整苏皖边区行政区划，建立8个行政分区，分设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原淮海抗日根据地设立华中第六地委、苏皖第六专署和华中第六分区；淮北路东地区设立华中第七地委、苏皖第七专署和华中第七分区。淮北区党委、淮北军区、淮北行署和淮海地委、淮海军分区、淮海专署撤销。此时，苏皖边区北达陇海铁路，南临长江，西迄涡河线，东滨黄海，地跨苏、皖、豫三省，辖8个行政区、70个县。宿迁地区各县分属两个行政区：沭阳、泗沭、宿迁等县属第六行政区；泗阳、淮泗、泗宿、泗南等县属第七行政区。此后，宿迁地区在华中第六、第七地委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行新的斗争。

苏皖边区紧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招降纳叛，调兵遣将，抢先控制交通要道和主要城镇。在苏皖边区周围，伪江苏省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其部队改编为“京沪卫

戍总队”，驻沪宁一线；伪苏北绥靖主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被委任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所部驻苏中、盐阜地区；伪淮海省省长、徐州绥靖主任郝鹏举被委任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所部驻淮海、淮北地区；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被委任为“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所部驻淮南地区。1945年9月，国民党军汤恩伯部进占沪宁沿线并担任“苏北地区之绥靖”；10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迁还镇江。何应钦指挥新六军等部，分兵四路从仪征、明光、固镇、符离集进犯淮南、淮北解放区。李品仙部亦抵达徐州，并控制津浦线。驻新海连^①地区的段霖茂第八十九军，亦收编周法乾、刘大水等伪匪，不断侵扰解放区，残害人民。12月，顾祝同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以4个军分驻津浦路徐（州）宿（县）段和陇海路徐（州）海（州）段。汤恩伯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率6个军分驻沪宁线和扬州、南通地区，并在扬州设前线指挥所。至1945年年底，国民党统治集团以12个军以上的兵力，形成对苏皖边区的包围。同时，在江苏境内重置9个行政督察区，力图恢复政权，加强统治。在国共和谈期间，则不断挑起军事冲突，妄图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图谋，1945年10月中旬至1946年初，山东野战军发动了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歼敌2.8万人。为配合此役，华中野战军组织陇海路东段战役，控制大许家至白塔埠铁路100余千米，使华中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又发起高邮战役，歼日伪军近万人，控制了扬州以北的运河线。苏北地区除南通、扬州、泰州、海州、徐州等城市为国民党军控制外，其余地区均为解放区军民收复，呈现了相对稳定的局势。

^① 今连云港市。

第二节 惩奸反霸与减租减息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强调“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巩固苏皖解放区，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惩奸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增资运动。1945年11月29日，华中分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指示》，指出“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依靠群众实为当前急务”，要求在新解放区，“应首先集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过去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基本群众翻身抬头，统治压迫群众的汉奸封建势力打垮，才能有真正的革命秩序，才能顺利进行巩固与建设”。要求各新解放的城市及农村目前“应展开群众的反汉奸叛国罪犯的运动”。同时，“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增资的运动必须认真进行”。在具体做法上要求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突破一点，迅速推动全盘。“首先集中于一保一镇，然后及于全市全乡全区”，“首先集中于反少数汉奸叛国罪犯，然后迅速展开普遍的改善民生运动”。并要求及时在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组织群众团体，建立武装组织，逐步改造政权，建立党的组织。与此同时，苏皖边区政府先后颁布《惩治叛国罪犯（汉奸）暂行条例》《没收汉奸土地放领办法》和《苏皖边区土地租佃条例》等。随后，一场广泛深入的惩奸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在苏皖边区全境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6年1月，华中群众工作会议（华中第一次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以后，斗争进入高潮，整个运动至5月胜利告一段落。

自1945年10月，宿迁地区先后开展惩奸反霸运动。10月13日，泗阳县由副县长杨道南主持，在仓集区河西庄召开党员、干部、民兵、基本群众7000余人大会，公审汉奸头目王其可等一批汉奸。县委书记林源在会上作报告，公审后当场枪决王其可等五人。10月16日，沭阳县在塘沟区金庄召开塘沟、张圩、钱集三区群众大会，对坚决附敌、蹂躏地方群众的伪区大队长张茂轩进行公审，执行枪决。1946年3月21日，在曙红区^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曾杀害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团长江曙红的刽子手王叙五，押到高庄东边的汤曙红烈士墓前当场枪决。同一天，沭阳城也召开万人大会，枪毙伪县长兼维持会长张秉志和大汉奸曹乾汉等。至5月，沭阳全县处决汉奸、恶霸500多人，斗争汉奸2100余人，开公审大会550多次，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万人次。1946年2月17日，泗沭县政府接受群众要求，由县长王业奎、宣传部长王颖、众兴区委副书记陈同轨组成审判委员会，并组成特别法庭，联合泗阳县各界人士，在众兴东门外召开2万人公审大会，公审伪县长陈升儒。陈升儒曾任泗阳、高邮、宝应等县教育局长，在日军占领众兴后，投靠日军，出任伪县长，经常带领伪军在葛集、顾集、史集等地烧杀抢掠，杀害民众，公开杀害抗日军民多人。公审后，对陈升儒执行枪决，使泗沭县惩奸反霸斗争达到了高潮。惩奸反霸运动深入到区、乡、镇，汉奸恶霸在群众的检举揭发控诉斗争中，按罪行情节依法受到惩处。一般伪职人员纷纷坦白悔过，登记自新，并动员外逃人员家属，敦促其回归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在斗争中，没收的汉奸财产，用作社会救济，其土地则廉价放领给贫苦农民。惩奸反霸动摇了封建势力基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

在惩奸反霸运动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及时引导新解放区群众对地主展开以“二五减租”为原则的减租减息增资斗争。老解放区则进行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1946年春季，宿迁地区广大工农群众，

^① 今沭阳县李恒乡境内。

在华中分局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伸冤、算账、说理斗争，狠煞封建地主势力的威风。据不完全统计，至1946年4月，第六行政区共逮捕汉奸恶霸4035人，公审枪决941人；清算地主3000余户；减租减息得粮近1000吨，土地49万余亩，钱财折华中币2000余万元，34万余人受益。第七行政区清算汉奸恶霸2136人，通过说理而减租的地主820户，2.8万农户得益，计得土地7.1万余亩，粮食2500吨，华中币5100余万元。

在惩奸反霸、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中，宿迁地区广大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类救国会重建为工、农、妇、青联合会。在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充实了党的基层组织；健全了民兵自卫组织，取消了旧政权的保甲制度；经过民选，改造了政权，加强了民主建设。虽尚未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制度，但广大贫苦农民在清算斗争中扬眉吐气，得到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建设和保卫解放区的斗争积极性，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实行土地改革和保卫解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战胜灾荒与发展生产

1945年3月底至6月中旬，宿迁地区特别是北部一带严重干旱，粮食收成锐减。6月中旬至8月初，暴雨成灾，河水泛滥，农田顿成泽国。至1946年春，第六行政区灾情已遍及全区9县，受灾土地面积达450万亩，50万人口中缺粮者占85%，急需救助者达120万人，其中断炊者达65万人。其中，宿迁县全县灾民约14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0%以上。

面对历史上少有的严重灾荒，华中第六地委认真贯彻华中分局关于灾区“自力更生，发动群众，自救救人，互助互救，与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救灾方针，在继续开展惩奸反霸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同时，大力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的艰苦斗争。1945年12月5日，第六行政区召开县长会议，专门讨论生产救灾问

题。16日，又召开各机关团体代表会议，商讨救灾问题。会上成立了以第六专署专员吴觉为主任委员，吴月波、李广仁为副主任委员的生产救灾委员会，加强对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党政领导亲自动手，调动全区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可行手段，全力以赴抓生产，领导人民度灾荒。1946年2月5日，第六地委发出《关于举行义赈救济春荒的指示》，提出“救命如救火”“救灾人人有责，劝募人人尽力”的口号，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必须召开群众会议，报告灾情；各级干部应以身作则，带头捐款献粮，以推动劝募运动。第六分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响应号召，率先开展节约劝募活动，共节约口粮500吨，捐款近200万元（华中币）。其间，宿迁县委、县政府机关从1946年1月起，每人每天节约粮食3两，菜金2角，至5月底计节约粮食7.5吨，菜金1000多元。潼阳县实验小学师生募捐粮食500余千克、华中币7000元；沭阳塘沟区绅士共捐献新币20100元，钱集镇15位商人捐助新币1880元，送专署转发受灾人员。

金融财贸部门调动一切手段，大力支援生产救灾。为支援1946年春耕，华中银行第六分行发放农贷900余万元，8万余农户受益，解决了20万亩土地所需种子和4万亩土地的肥料。第六专署还拨粮1400吨，其中550吨救济灾民，其余作为农贷。同时，华中银行第六分行两次发行救灾公债，计900万元，以支援生产救灾。货物管理部门则加强进出口管理，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以粮酿酒，鼓励粮食进口。至5月份，第六行政区进口粮食28吨用于平糶，有效地控制了粮价。

为发展生产，发挥集体抗灾自救的优势，第六行政区大力推行互助合作。至6月份，全区有8.6万户农民参加，组织1.1万个互助组，占全区农户总数15.26%。1946年5月，召开互助合作英模与干部会，会上交流经验，表彰英模。泗沭县王维德互助组和王业久合作社的经验再次得到肯定和推广，推动了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仅泗沭县即新发展互助组1800个，为原有互助组的11倍，占全区互助组总数的18%。

1946年的大生产运动中，苏皖边区普遍发展了纺织生产。3月，苏皖边区政府从盐阜和苏中调拨棉花500吨，以支持第六行政区发展纺织生产。为提高纱布质量，调剂纺织供销，促进资金周转，便利纺织生产，第六行政区各县普遍设立了花纱布交换所和纺织合作社。为鼓励纺织生产，禁止外地细布进口，部队和机关干部一律供给土布服装，并拨棉贷款23万元，支持农民纺织生产，而以低于市价回收。由于政府大力扶助，纺织合作社遍布全区。第六行政区除有县联社外，还有区社14个，乡、村社1019个。1945年冬，有纺车10.3万架，织布机1066架，到1946年已发展到纺车3万架，织布机4500架，仅沭阳县日产土布就达6600多米。

为提高抗灾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并以工代赈救济灾民，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大力兴修水利，开通公路。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整修经过宿迁地区的京杭大运河邳县至高邮段，共投资5000万元，沿岸13个县3.8万人投入春修，至6月8日结束。此项工程加固了多年失修的堤坝，疏浚了河道，改进了农田灌溉，使苏北25个县受益。宿迁、泗宿两县工段从皂河镇以东至仰化集复隆镇以北，运河东岸由宿迁县施工，西岸由泗宿县和宿迁市施工。宿迁县参加民工一万多人，由副县长陈秉恭任督工所主任。3月初，运河东西两岸同时开工。为了按时完成任务，陈秉恭身先士卒，每日深入工地，往返路程10多千米，不顾疲劳，堤上堤下细心察看，检查工程质量。他和民工一起吃高粱、煎饼卷豆饼，有时喝不上开水，就手捧运河水喝。在陈秉恭影响下，干部、民工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区与区、乡与乡、组与组之间展开劳动竞赛。当年4月底，宿迁县就提前完工。陈秉恭由于积劳成疾，于5月22日以身殉职。

第六行政区于1946年初成立以吴觉为主任委员的水利委员会，除参加运河春修工程外，还重点疏导沂河、沭河，拆除长期为患的“五河六坝”（即五障河、龙沟河、义泽河、六里河、东门河以及五河上的六道拦水坝），浚河复堤690万立方米。苏皖边区政府批准此计划后，加拨工赈粮和水利贷款粮1000吨，以助施工。各县都成立水利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境内河道进行疏浚整修。第六行政

区修复运河堤 67 万余立方米，发放工赈粮 340 吨，各县疏浚河道 23 条，总计工程 109 万立方米，民工 9 万余人，发放工赈粮 300 吨，水利贷款粮 260 吨，受益土地 812 万余亩，数十万灾民以工代赈度过春荒。

交通建设方面，苏皖边区以淮阴为中心，修复公路 1064 千米，其中，北经沭阳与陇海铁路衔接，西经泗县至津浦铁路。所有工程都是以工代赈，第六行政区 10 万民工共得工赈款新抗币 232 万元、粮食 1450 吨。公路的开通为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灾民从运粮、运盐中获利甚多。同时，苏皖边区以淮阴为中心，增设邮电局 120 余所，架长途电话线路 1250 千米，恢复和扩展了邮路 3851 千米，可与苏皖边区全区通邮，还可与山东、华北解放区通邮。

第六地委和第六专署领导生产救灾工作成效显著，于 1946 年 5 月获得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通令嘉奖。宿迁地区各县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战胜了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第四节 开展土地改革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指示要求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应有区别；对地主中汉奸、豪绅、大地主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以及抗日军人和干部家属亦应区别对待；要保护民族工商业；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5 月上旬，随邓子恢赴延安汇报工作的华中分局常委曾山回到淮安，主持召开了华中分局委员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并研究贯彻方案，决定立即组织工作队，

先进行土地改革试验，然后全面展开。5月28日，华中分局发出《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指出“中央土地政策新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于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在于取消解放区残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6月9日、16日，华中分局又两次强调在分配土地时“力求其平”“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的原则，并对清算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5月23日至24日，第六行政区在沭阳县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五四指示”，并部署贯彻措施。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出席会议，并作了时势报告。会后，地委书记万众一和沭阳县委书记徐禹民率40余名干部，在沭城东区进行了20天土地改革试验。6月，第六行政区展开一场以清算斗争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改革运动。6月底和7月上旬，华中分局连续发出要求加快完成土地改革的指示，一再强调“土地改革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争取时间完成”，“无论环境多么严酷，战争动员如何紧张，后勤任务怎样繁重，都必须加紧土地改革”。在内战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第六行政区加速土地改革步伐。全区除东北边缘地区30个乡外，600余个乡、94%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约45%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由于战争形势紧迫，至8月，全区全力转入支前，土地改革告一段落。

两个月的土改斗争，狠狠打击了封建势力，初步摧毁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平分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普遍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迅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田保家，为后来坚持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由于时间紧迫，土地改革中也存在一些简单求快、分配不公、侵害部分中农利益等问题。属于第七行政区的泗阳、泗宿、泗南各县，则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土地改革仅处于试验阶段，未能普遍展开。

第五节 调整机构与区划

正当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刻，国民党统治集团加快内战步

伐。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借口“苏北威胁京沪”，加紧进行进攻苏皖边区的部署。中旬，侵占第四行政区全境（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并派飞机到边区首府清江市和淮城市（今淮安市淮安区）侦察扫射。6月初，大举进攻第三行政区（淮南津浦路东地区）。苏皖解放区大规模内战爆发在即，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恢复苏中军区、苏北军区和淮北军区，并以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以利指挥作战。

5月28日，第六地委在沭阳城召开备战动员大会，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做形势报告，号召淮海区广大军民提高警觉，坚定斗争信心，加快土地改革，保卫胜利果实。会后，为便于对敌斗争，第六行政区调整了区划，将原属沭阳的沭新公路以东地区划归东海县，六塘河以东高沟、杨口一带划归涟水县，南六塘河以南划归淮阴县。

6月10日，华中分局发出《关于目前自卫战争的指示》，指出华中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要求各地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充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疏散机关，改造地形，准备粮食；抓紧进行土地改革，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做好自卫战争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26日，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爆发。7月1日，为有效支援主力作战，搞好军事后勤，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发出战时后勤工作指示，要求各分区和县成立后勤司令部，区组编后勤大队，规定后勤司令部的任务，即组织民兵参战团，护送民工、伤员，看管俘虏，打扫战场，通信联络，镇压敌特等。7月1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皖边区，内战至此全面展开，苏皖边区军民奋起自卫反击。

宿迁地区各县广大翻身农民在“保家保田”口号下，掀起了参军热潮。第六行政区于8月、10月两次补充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计1.6万余人。第六军分区贯彻《关于建立地方兵团，准备转入敌后坚持》指示，组成淮海独立团补充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又组建直属第四团，使第六军分区直属主力保持3个团的兵力。原淮海军分

区主力4个支队整编为第三师第十旅和独立旅北上后，第六军分区重组直属主力第一、二、三团。1945年11月，第三团调归新四军军部指挥，担负陇海路守护任务。8月，第三团归建，遂以第一、二、三团组成新第十旅，第六军分区兼旅部，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万众一（兼），副司令员张克辛、赵海风、朱国华，副政治委员谢振华、吴觉（兼），参谋长尹捷峰，政治部主任陶励。

8月30日，第六分区发布紧急动员令，宣布全区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广大军民以百倍警惕，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9月初，华中军区成立以第六行政区为主的北线后勤指挥部，由第六专署专员吴觉兼任司令员，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中分局委员、民运部长刘瑞龙兼任政治委员，负责动员和指挥第六、第七行政区及第五行政区北部各县（市）的军事后勤工作。9月，根据抗日战争对敌坚持斗争经验，第六地委决定分散领导，建立3个中心县委，以地委委员、民运部长李广仁兼任第一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东（海）灌（云）沭（阳）地区的斗争；以地委委员、组织部长李干成兼任第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淮（阴）涟（水）地区的斗争；以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章维仁兼任第三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潼（阳）宿（迁）泗（沭）地区的斗争。同时，以军分区直属第四团为基础，组建第一、二、三支队（初各支队仅1个营，后发展为3个营），分属3个中心县委为基干武装，一面负责协助各县恢复和建立县区武装，一面担负本地区坚持斗争的作战任务，一旦地区被敌分割，可以独立坚持，机动作战。各县陆续恢复和发展了民兵组织和县区基本武装。由于建军和支前工作成绩卓著，第六地委和第六军分区获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通令嘉奖。第六地委还以会议和训练形式，对全区党员进行初步审查，调整各级部分领导干部，初步改造了支部。

在第七分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级党组织加紧进行备战。1946年5月8日，第七地委书记赖毅在县委书记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原地斗争，武装自卫的任务，一切工作均应进入战斗状态。6月，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工商各界纷纷集会，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7月中旬，国民党调集12

个旅兵力向淮北发动全面进攻。8月，泗南县建立县支队，军分区派刘凯顺为副支队长。泗宿县建立县总队，副县长傅茂如兼总队长。为加强领导，便于开展游击战争，9月，第七地委决定成立两个工委，即泗灵睢工委，李任之任书记；泗五灵盱工委，杨毅任书记。并派分区独立二团配合泗五灵盱工委，在泗南、五河、盱凤嘉三县开展游击战争。泗南、泗宿县委根据本县具体情况，也相应划分了工委。泗南县划分鲍管、陈滩两个工委。泗宿县委成立东、西工委，东工委负责金锁镇、朱湖、闸塘、苏圩等区；西工委负责潘山、归仁、刘圩、汴河等区。除将老弱病残及家属作了妥善安置外，所有精干人员组成若干武工队，分别由县委书记柏瑞秀、副县长傅茂如和邱勇前等领导，开展游击活动。

第十一章

奋起自卫和恢复解放区

第一节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集中31个旅、27.2万人，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多路进攻苏皖解放区。31个旅分3个集团配置，分别进攻苏中、淮南、淮北，矛头直指苏皖解放区中心城市淮阴。其中，徐州绥靖公署指挥的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第二十八、第六十九、第五十七师集结在徐州周围及新海连地区，共12个旅，约10万兵力。其战略意图是首先侵占苏皖解放区，消灭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迫其北撤山东，迅速结束长江以北苏皖战事，保障京沪安全。继而利用津浦路、运河线、通榆线畅通，集中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最后消灭人民军队，解决整个华东。

为占领津浦线，5月中旬，国民党军先后进攻并占领苏皖边区淮南路西地区全境和淮南路东地区的来安县城。7月上旬，山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率领下隐蔽进入淮北，已编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的淮南第五旅返回淮南。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统率下，经扩编充实后亦集结于苏中地区，严阵以待。

国民党军队预谋于7月15日在苏中发动大规模进攻，沿运河和通榆公路北犯，策应淮北之敌进攻淮阴。华中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指示，集中兵力先机制敌，于13日发起苏中战役，至8月27日，取得七战七捷胜利，

歼敌大量有生力量，严重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乱敌进攻苏皖解放区的部署，阻滞了对淮阴的进攻。在苏中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队于7月16日大举进犯淮南路东解放区。至7月28日，华中军区决定淮南部队转移苏中、淮北，由淮南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率第六旅十六团留淮南并指挥地方武装游击坚持。

苏皖第七行政区隔运河与第六行政区相望，据此可直接威胁淮阴，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另一重要方向。7月18日，国民党军以5个整编师由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分三路向东大举进攻第七行政区，企图在苏中沿运河线北犯之敌的配合下侵占淮阴。7月25日，中路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主力进至淮北苏皖交界处的朝阳集地区，进而企图东犯睢宁、宿迁。27日晨，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在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配合下，一举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九十二旅全部及第六十旅一部，计5000余人。朝阳集战斗后，右路敌第七军乘虚进占灵璧、泗县、五河，向泗阳方向推进，以策应苏中、淮南北犯之敌。8月7日，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八师及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发起泗县战役，歼敌3000余人，但由于兵力不足及气候恶劣影响，未达预期战果。9日，主动撤出战斗。8月底，撤至泗阳东北休整。此时，国民党军队增调整编第七十四师及第二十六师四十一旅加强淮北战场，相继占领灵璧、泗县、睢宁、宿迁，第七行政区遂全部陷入敌后坚持斗争。由于形势日益严峻，11月下旬，第七行政区党政军干部、战士、家属近万人被迫撤到洪泽湖边龙集、界集、山子头、唐莫圩狭小地带。24日夜，第七地委率党政机关及军分区主力抢渡运河，退到运东第六分区。由于撤退仓促，造成组织混乱，千余人牺牲或被俘，损失严重。除少数干部和武装退入洪泽湖坚持外，第七行政区全部被敌占领。

在此期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安峰山事件。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在苏中和两淮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华中野战军主力转移山东之后，国民党黄伯韬兵团向北推进。安峰山一带自抗日战争以来便是苏鲁交通要道，形势恶化之后，仍有华中和山东干部往来其间，而且常有东海、潼北部分武装在此活动。国民党军二十八师视之为

心腹之患，早有出兵合击的意图。

淮海区各县大批干部群众北撤山东之后，淮海区党委成立以邵幼和为主任的后方“办事处”（简称“后办”），负责安排北撤干部。不久，又成立以淮海区民兵副司令员罗清渠为主任的“淮海区驻鲁前方办事处”（简称“前办”）。“前办”负责将老弱妇女及不适宜坚持敌后斗争的人员送往“后办”安排，将能坚持原地斗争的干部加以整顿，护送回路南。

1947年1月底，为尽快恢复并加强淮海区各县的工作，专员吴觉指示“前办”主任罗清渠，限定20天内将能回去坚持斗争的干部全部护送南下。罗清渠接指示后，未提交“前办”党总支讨论，又为私事耽误了几天，错过了趁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消灭郝鹏举之时过路的有利时机。苏皖边区政府再次催促淮海干部分批南下，罗清渠在既没有和路南潼阳、东海两县坚持原地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也没有大部队武装护送，又没有统一组织和保密措施的情况下，安排各县干部队悉数分两批浩浩荡荡南下。一路人喊马叫，将南下动向完全暴露在敌人耳目之下，给正在蠢蠢欲动的敌二十八师以可乘之机，于是发生合击安峰山的事件。

2月18日，宿北县干部和宣慰大队（淮海区文工团）800多人，由路北武装交通队护送过路，当夜到达安峰山附近，停下休息。2月19日夜，又有沭阳，灌云、东海、潼阳等县干部队及地专机关干部一千多人，由路北东海县大队一个排护送南下，凌晨时分到达安峰山下休息。在此期间，坚持在安峰山一带斗争的潼北工委李铁民等已得到情报，知道敌二十八师已北进至万匹，有合击安峰山地区的动向，于2月18日在安峰区驻地杨圩召开茆圩、房山、安峰三个区区委书记会议，决定由李铁民负责告知已到安峰的南下第一批干部，叫他们赶快离开此地。2月19日下午，李铁民通知正在安峰山休息的宿北县干部队和宣慰大队，要求他们迅速向颜集方向跳动。但是，他们没有听从，当晚未走。20日凌晨，第二批南下干部又到。南下干部和潼北干部共二千五六百人全部集中在安峰山周围的村庄。

从2月19日傍晚开始，敌二十八师倾巢出动，对安峰山两侧进

行钳形包围。天色大亮时，敌人将安峰山团团围住，并不断缩小包围圈。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各县干部队依靠现有武装组织突围。宿北县一个武装连在王树林指挥下，于安峰山东与敌展开激战，将大批敌人吸引过来，使宿北县干部队分散向北冲出包围圈。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太大，这个连大部分壮烈牺牲。沭阳县干部队由县长江剑农率领先向青伊湖方向突围，未得成功。江剑农提出向北拼死突围，并率领一个班在后面掩护，全体干部奋勇冲杀，结果从牛山附近向路北突围成功，损失极小。潼北联防大队分散向北跳出包围圈，第二天安全转移至路北。潼北留守干部队八九十人亦突围出去。

但是，在突围过程中，也有部分干部惊慌失措，造成严重损失。宣慰大队领导人临危慌乱，叫各自分散突围，损失很大。潼阳县南下干部队，带队者逃走，人员损失严重。

安峰山合击之后，各县干部被打散者甚多，国民党军四处搜捕。在各县散失干部面临绝境的严重关头，安峰山周围很多群众挺身而出，营救、掩护干部。有的把伤员藏在自家的山芋窖里，有的连夜躲过敌人的岗哨，把干部送到较安全的村庄，有的老人把青年人认作自己的儿子、闺女，有的妇女把外地人认作自己的丈夫。

安峰山事件发生后，办事处立即派人在铁路北的大齐庄，将突围出来的干部群众收容安排，淮海银行拨发衣服和日用品给突围人员。但“前办”领导人又耽误多天，未能及时发给，使突围归来的干部群众受冻挨饿。

安峰山事件损失惨重。在突围中牺牲干部群众四五百人，被俘300余人，同时损失了大批枪支和物资，丢失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不少重要文件，泄露了党的机密。安峰山事件使淮海区的干部情绪受到沉重打击，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动用宣传工具蒙蔽群众，蛊惑胁迫被俘人员叛变自首。

安峰山事件发生后，中共华中局第六地委专门组织调查组，对事件中涉及到的人和事进行较详细调查，对在关键时刻表现突出、英勇善战、勇敢突围的同志分别给予记功、表扬，对一些经不起考验、政治脆弱、贪生怕死的干部给予相应处分。其中，沭阳县县长

江剑农在遇到敌人合击时，不顾年迈体弱，提出了顽强战斗的口号，并亲率一个班在后掩护突围，使全队损失较小，地委给予表扬并记大功一次。为教育广大党员，对事件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前办”负责同志，决定撤销其职务，并当众给予警告处分。安峰山事件以烈士鲜血为代价，换取了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教训。

第二节 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亦称宿北大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于1946年12月，在宿迁境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从12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宿迁以北全歼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以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至11月，以损失10万余人为代价，占领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召开了伪国民大会。为在政治上配合伪国大召开，蒋介石要“在两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决定调集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

12月上旬，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建议发起宿北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陈毅建议并电示在盐城伍佑的粟裕星夜赶往华中军区驻地，和陈毅共同指挥宿北战役。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集结在山东省郯城县西南地区的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八师，集结在沭阳县境内的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七师（欠第十九旅）等部共25个团，迎击由宿迁出犯的国民党军。同时，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3路敌军。13日，以华东野战军名义发出战役预备命令。

12月中旬，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25个半旅，分4路向鲁南、苏北解放区进攻，对华东解放区进行半包围，企图先占苏北，消灭分别集结于峄县以东和盐城、涟水地区的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或迫使其北撤，然后与其在山东境内决战。其中，第三

路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编第十一师、第六十九师等部共6个半旅兵力，组成宿新兵团，从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攻。

12月1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进至晓店子、嶂山镇，整编第十一师进占曹家集，并东犯来龙庵阵地。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令其一部顽强抗击，拉开了宿北战役序幕。13日上午8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约一个团兵力分3路向第九纵队七十五团来龙庵阵地进犯。战至下午2时，迫敌全线溃退。同日，整编第六十九师四十一旅一部北犯人和圩，与第九纵队七十三团一部激战至黄昏，侵占该地。随后，敌整编六十九师师部移驻人和圩。14日，敌增加兵力将来龙庵阵地工事大部摧毁。整编第十一师一一八旅以逐次跃进方式，改全线进攻为重点突击。第九纵队守卫指战员顽强奋战，击退敌十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15日8时许，敌第一一八旅倾全力对来龙庵、小牌坊阵地发起攻击。来龙庵二营阵地地堡工事被敌炮火摧毁，二营全体指战员与敌展开英勇搏斗，打退敌多次进攻，终因伤亡过大、敌我力量悬殊而于14时转移。至此，来龙庵阵地被敌全部占领。

至14日止，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已全部展开：预备第三旅旅部附第七团位于晓店子，其第九团（欠一个营）位于嶂山镇，第九团一个营附山炮两门守峰山；第六十旅主力位于刘圩子、罗庄、傅家湖，一部位于安仁集；第四十一旅主力位于邵店、苗庄及其附近地域；其师部率第二七六团位于人和圩。整编第十一师主力位于井儿头、曹家集一线，其第一一八旅展开于来龙庵南北地区。

第九纵队在来龙庵、五花顶阵地的英勇阻击，迟滞了敌行动，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机动赢得了时间。根据野战军指挥部命令和部署，第一纵队于14日晚由马圩子南下进至新店子以北暖房、棋盘子以南一带；第二纵队于13日从涟水地区奉命北调抵达韩集、保安圩、泰山集一线；第七师五旅及师特务团于13日黄昏自沭阳颜集出发，进至桥北镇、土城子一带；第八师于14日越过陇海铁路，进至小冲子、杨庄地区集结。各部均于1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

15日，陈毅、粟裕等已查明由曹家集向来龙庵进攻之敌为整编

第十一师，向五花顶、邵店方向进攻之敌为整编第六十九师，当日定下决心，除以一部切断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联系，并阻击整编第十一师外，集中3倍于敌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之整编第六十九师于宿迁、沐阳、新安镇三角地区，而后乘胜扩大战果，伺机寻歼整编第十一师。

15日下午，第一纵队各部奉命由西向东插向井儿头、曹家集以北地区，截断敌第六十九师之退路，与第二纵队一起共同割裂敌两个师的联系。16日4时，已经穿插至曹家集的第九团参谋长俞慕耕，查明曹家集系敌第十一师师部，果断决定率二营向曹家集发起攻击，一举突入曹庄，歼敌工兵营、骑兵营大部，俘敌600余名，并将敌炮兵团击溃，径直打到距敌十一师指挥所仅二三百米。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部遭突然打击，便利用圩子进行顽抗，并急调其十八旅分两路向二营阵地反扑，均被二营击退。在战斗中，俞慕耕中弹壮烈牺牲。在打垮敌人多次进攻后，二营估计情况已发生变化，便组织突围，仅剩40多人冲出重围。同时，第八团三营于拂晓进至冯庄一线，8时与敌第十一师一个团兵力展开激战。至15时，第八、第九团全部撤出战斗。第八、第九团的穿插分割，重创并打乱了整编第十一师的指挥部署，迟滞了敌军的行动，为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创造了条件。

峰山为整个战场制高点，拿下峰山，就拦腰斩断了嶂山镇之敌与晓店子之敌的联系，为整个战役胜利奠定基础。15日22时，第八师二十三团奉命对峰山守敌发起攻击，但3次攻击未果。16日5时20分，第八师命令二十三团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下峰山。担任主攻的第一营重新组织突击力量，将尚能参加突击的40多人进行重新编组，由副教导员张明率领主力绕至敌翼侧，实施主要突击。其余兵力由三连长指挥，担任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经顽强战斗，张明率领3名战士首先爬上沟崖，夺取了峰山的制高点。与此同时，第二十四团一部也从北侧对峰山之敌发起攻击，攻上了山顶，终于在拂晓前占领峰山，全歼守敌1个加强营。为夺回峰山制高点，16日10时，敌以第六十旅、预三旅各1个团，在飞机、炮火掩护下，

从峰山东、南两个方向发起反击。坚守峰山的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各一部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整营整连的集团冲锋，战斗极其激烈。在第二十二团一部配合和第七师的有力策应下，牢牢地控制了峰山阵地。

为继续完成割裂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联系任务，第一纵队于16日晚从峰山以南、晓店子以北地区再次插入敌人纵深之地。经一夜穿插，一纵各部在敌心脏夺取了18个村庄，控制了一块长约六七千米，宽约一二千米的三角地带，构成向北、向西、向东南的三面防御，给敌人以严重威胁。17日8时起，第一纵队各部遭到敌强力攻击。激战至15时，在遭敌三面夹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纵队首长毅然按预定计划提前约1个小时实施反击。整编第十一师在突然猛烈打击下，全线溃退，第一纵队坚守住了阵地，为分割敌第六十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5日黄昏开始，华东野战军经过两昼夜浴血奋战，完全切断了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联系，并将整编第六十九师分割成晓店子、罗庄、苗庄、人和圩等四大块，从而完成了分割合围任务，为歼灭整编第六十九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7日15时，敌第六十旅从刘圩子突围南窜，被第七师和第九纵队歼灭大部。同时，罗庄之敌第六十旅一部亦向西突围，遭反击后被迫退至罗庄、李圩等地固守。17日18时45分，第八师对晓店子之敌预三旅发起攻击，仅用3个小时即全歼该敌。18日拂晓，第一纵队对困守罗庄之敌第六十旅发起进攻，激战至16时，部队始突入庄内，开始巷战。第六十旅不支，旋即分散突围，被歼于野外。敌第六十旅被全歼。

17日14时许，野战军指挥部命令第九纵队归第二纵队指挥，尽快全力解决人和圩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各部即奉命展开，开始接敌行动。到18日零时，野战军指挥部严令务于18时拂晓前坚决攻下人和圩。4时，各部仓促发起攻击，未能奏效。至6时，第二纵队遂令各部停止攻击，就地监视敌人。18日白天，经深入准备，于22时30分开始总攻。敌遭南北夹击，于19日2时退守圩东北角，被

包围全歼。敌第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于绝望中自杀，副师长饶少伟、参谋长张东彝等被俘，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19日上午，苗庄之敌四十一旅一部向南突围，被一纵堵击并全歼。大部向北夺路逃窜，除旅长董继陶以下3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至此，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全部被消灭。宿北战役胜利结束。

宿北战役是一场人民战争。战役期间，战场周边的宿迁、宿北、沐阳、潼阳、平邑、郯城、滨海等县人民群众，在华中北线支前司令部和鲁南、滨海地区党政机关组织领导下，先后动员民工达41万人，及时完成转运伤员、筹集与运送粮弹、物资的繁重任务，有力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在宿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代价，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指挥的3个半旅等计2.1万余人，其中俘虏1.3万余人，开创了一次歼敌1个师部3个半旅的范例。12月18日和20日，毛泽东在延安代中央军委起草贺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陈毅赋诗庆祝宿北大捷：“敌到运河曲，聚歼复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1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指出宿北大捷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七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伟大胜利”“对于今后的战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宿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宿迁地区革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第三节 敌后坚持和反“清剿”斗争

1946年12月中旬宿北战役胜利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于年底前北移山东，参加鲁南战役，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十纵队

留在苏北坚持斗争。鲁南战役进行之中，驻涟水的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北犯，于1947年1月20日侵占沭阳县城，同时，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占陇海路东段，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第六分区各主要城镇全部被国民党军侵占，地区被分割，苏北与鲁南交通严重阻滞，全区转入敌后坚持时期。敌军在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同时，以17个正规旅的兵力，并以熟悉当地情况的保安团、“还乡团”配合，其中所谓的“苏北还乡团”就达到35个大队、101个中队共2万人，对苏皖解放区实施大规模的“清剿”，企图迅速在占领区恢复其反动统治。国民党军对苏皖解放区“清剿”重点分为3个地区，其中，宿迁地区分属两个重点地区：一是北线沿陇海铁路的东海、灌云、沭阳、潼阳、宿迁等地；二是中线沿运河的泗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江都等地。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制定了《绥靖区乡镇保甲纵横连坐办法》，对人民群众实行严格的保甲统治。国民党军还在交通要道大量构筑据点和碉堡，对解放区实施封锁和分割，在宿迁县即筑碉堡504座。国民党军队从城镇和据点出发，日夜出动，多路合击，以求达到消灭解放区人民武装力量的目的。

1946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对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华中游击战争必须使其有力坚持，必须留置必要的部队。华中分局委员必须有一二负责人留在华中（率轻便之领导机关），各区党委及地委之负责人亦必须大部留在华中坚持。华中分局不必宣布立即取消。”

华中党政军领导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真总结自卫战争爆发以来的情况，研究部署坚持敌后斗争工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原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领导第五、第六和第十一军分区各级武装敌后斗争；以原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2个团和骑兵团及地方武装3300余人组成淮北挺进支队，重返淮北敌后开展斗争。1947年一二月间，留在苏皖敌后坚持斗争的各部队经过休整后，分头南下敌后地区，淮北挺进支队于1月下旬到达洪泽湖地区。

针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清剿”，宿迁地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就地坚持、分散游击”的方针，领导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开

展敌后武装游击斗争，积极配合主力打击敌人。

此前的1946年9月8日，陈毅进驻泗阳县众兴镇时，约见泗沭县县长王业奎和众兴区区委书记聂大鹏及区长张其俭、副区长刘捷军等，阐述了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方针，表明军队准备主动撤退，指示泗沭县委要坚持敌后斗争。陈毅还介绍了红军时期坚持苏区斗争的经验，并谆谆嘱咐：“只要各地地方干部都能就地坚持斗争，就能拖住敌人很大力量，争取反攻时间早日到来。”当国民党军队大举侵占宿迁地区后，境内各县委按照“就地坚持、分散游击”的方针，充实扩建地方武装，将民兵总队改为县大队或独立团，组建区乡游击队、联防队、武工队，坚持原地斗争，做到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主动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敌人，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作战。

1947年1月，华东军区成立，驻华东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辖12个纵队，原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改编为第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第六分区新第十旅奉命改编为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仍兼第六军分区），所属第一、第二、第三团改为第一〇三、第一〇四、第一〇五团。此时，敌以8个整编师跟踪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主力，一面窜进，一面大肆“清剿”，为时月余。第六分区集中支队以下武装挺进敌人侧后，全面展开向“还乡团”及土杂武装进攻。第一支队于陇海线南侧反复打击和镇压敌人；第三支队攻克运河线陆集、仰化集据点，各县武装亦在敌军过境时，不断打击敌人，均有缴获。

3月，敌在淮阴成立以张雪中为主任的“淮海绥靖区司令部”，纠集敌整编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以及孙良诚等部7万余人，又进行连续性全面“清剿”，达3个月之久，斗争异常残酷频繁。沭阳县被“清剿”达1485次，泗沭县达1587次，各县平均在千次以上。在“清剿”期间，敌“还乡团”等土杂武装乘机跟进配合，捕杀干部党员，破坏基层政权，恢复保甲，建立反动政权，拔田倒租，反攻倒算，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面对极其残酷严峻的局面，第六行政区各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点线之间灵活跳动，机智穿插，重点打击敌土杂武装，严厉镇压与人民为敌的反动

分子，不断打击、削弱敌人，坚持原地斗争。

3月19日，第三十五旅在淮海区第一支队配合下，一举拔除沐（阳）赣（榆）线中心据点万匹，恢复了第一中心县委根据地，重新沟通了苏鲁交通，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第六分区人民的斗志。各县武装和民兵组织在“就地坚持、分散游击”方针指导下，也纷纷主动出击敌人，拔除据点，消灭国民党土杂部队。

宿迁县来龙区在土地改革中，当地农民400余人组织翻身队，保家保田，与地主“还乡团”斗争。陆集区联防队配合县大队先后拔除罗桥、单圩、丁庄等13个据点，陈集庄战斗歼敌副区长以下50余人，来龙、塘湖二区配合主力一部拔除马窑据点并粉碎驻晓店之敌4次“扫荡”，顺河区战斗30余次，拔除据点4个，歼敌区长以下约150余人。宿迁县刘集区徐华光是佃农出身，从小受地主虐待，生活很苦。1940年家乡解放时，他毅然参加新四军独立旅部队，转战苏鲁两省作战数十次，表现英勇，由战士升为班长、排长。后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于1945年复员回家。1947年春宿迁转入敌后坚持时，徐华光自告奋勇带领民兵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展开斗争。短短半年时间内，游击队作战44次，毙、伤、俘敌109名。徐华光本人打死打伤及俘敌13人。为此，宿迁县委、县政府联合通令嘉奖并为他记特等功一次，号召全县军民向徐华光学习，坚持斗争，争取更大胜利。

在泗沭县，县委充实县大队约400人，并组建武工队，同时组建众（兴）八（集）游击队300余人，并划出河北几个乡作为史集游击队基地。众兴、史集两支游击队常于夜间渡河打击敌人。泗沭县庄圩区大队在大队长庄洪宝和副大队长潘干带领下战绩卓著，坚持有力。1947年1月至9月间，全区12个乡队、3个联防队对国民党大小战斗共480次；毙国民党正规军61人、土顽51人，其中，国民党军少校1人，土顽三乡联防主任、“还乡团”大队长1人；伤国民党正规军45人，土顽90人；俘国民党正规军90人，土顽15人；收容投诚国民党军82人；镇压汉奸、恶霸36人。拔除敌据点2个。摧毁地下室4个，缴获小炮2门，压弹机1架，长枪17支，子弹

7050发，战马5匹，军衣22套，雨衣2件，军大衣13件，军毯5条，色布7匹，面袋21条，军用帆布1匹，电线9.5千克，刺刀15把，手榴弹105枚，文件2箱，皮鞋15双，手电筒9把，伪币25000元，银元1950块，粮食3.25吨。战斗中庄圩区队牺牲39人，受伤9人。

1947年初，沭阳县章集区按县委指示组建联防队，打击和镇压恶霸、土匪和“还乡团”的复辟活动。联防队经常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活动。到敌据点周围放冷枪、摸岗哨，袭击外出活动的敌人，使敌提心吊胆，日夜不得安宁。2月9日至14日，章集区联防队教导员张汉三带领民兵缴获过境蒋军加拿大机枪1挺，毙、俘敌6人。中共沭阳县委、县政府特联合嘉奖，号召全县民兵向他们学习。四五月间，第六地委第一中心县委印发了题为《镇压及时，坚持地方有力》的通报，介绍了章集区坚持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并颁发嘉奖令，表扬区委和联防队。

4月，敌整编第四十四师3个团以及商巡总队徐继泰部共4000余人，在柴米河两岸地区反复“清剿”。4月15日，第十二纵队为配合第六分区反“清剿”斗争，对准（阴）沭（阳）路发起攻击。第三十五旅两个团围攻胡集并打钱集援敌，另一个团配合第三十四旅打十字桥援敌。激战至16日晨，攻克胡集据点，歼敌500余人，控制了淮沭路南起五里庄，北至十字桥地区。钱集、徐溜守敌闻风逃窜。敌对柴米河两岸的“清剿”遂告失败。其间，东灌沭3县集中千余民兵，全力支持配合作战，万余干群踊跃抢破公路，4天内挖路800余处，使敌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东灌沭三县民兵集中作战300余次，较大战斗10次，克复八集、棋盘二据点，消灭国民党乡公所5个，拆毁汤沟、汤涧、徐大庙、西河拐、小陈集、南岗等临时据点树枝圩8处，收复柴米河北岸20余千米广大地区的200多个村庄。毙俘国民党军253人，缴冲锋枪1支，步枪161支，子弹3600发，电话机5架，夺回被抢劫去的猪羊300余头。6月，第六分区开展保卫夏收武装斗争，继续打击敌人，收复和巩固地区。在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采取“记红黑点”、“一封信运动”等

方法，及时展开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敌人。第六分区这一阶段作战3325次，歼敌7600余人，争取瓦解国民党土杂武装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84处。

由于斗争环境严酷，战斗频繁，苏皖解放区在反“清剿”斗争中损失很大。据统计，第六分区在1947年上半年中被敌杀害和战斗牺牲者共有2.5万余人，均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骨干。1947年1月底，共产党员魏其虎、陆红等先后牺牲。泗阳人魏其虎英勇善战，被称为“魏老虎”，敌人闻之即胆战心惊。他在与国民党军激战中腿部中弹，牺牲前高声喊道：“告诉你们，我就是淮宝县副县长魏其虎，如今虎落平川被犬欺。狗东西，有种的来吧！”陆红是宿迁县苏圩区人，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坚定地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沭阳县周集区妇联副主任兼德方乡妇救会长、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王华，4月28日被敌人逮捕后，受尽酷刑，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残忍杀害。周集区军民数千人集会哀悼，中共华中六地委（淮海区党委）追授王华为“刘胡兰式英雄”。6月16日，沭阳县章集区仲湾乡公所遭敌偷袭，乡指导员章杰新等17人和住河堤东北角宋家的屠文生等11人，与敌激战持续6个小时，毙伤敌20多人，章杰新、仲伟成、葛恒兴、杨如成、毛尚柱、纪士林、仲跻玉七位同志壮烈牺牲。战后，华中第六地委号召全区开展学习七英雄活动，并将仲湾乡更名为七雄乡，追认章杰新烈士为中共模范党员。泗阳县八集乡朱圩乡妇救会长、共产党员董振英在众八区游击队被敌偷袭包围后，留下来负责掩护大队突围，大队成功突围，董振英打死敌3人，被捕后坚不屈服壮烈牺牲。烈士们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宿迁人民心中。

第四节 湖上斗争和重返淮北

1946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占领苏皖第七分区淮北中心区青阳、半城、金锁、洋河等地，第七分区党政机关及家属被迫撤至成

子湖边界集、山子头、唐莫圩一带狭小地带。11月24日至25日，在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接应下，第七分区党政机关及分区武装主力4个团撤到运河以东第六分区。由于撤退仓促，造成混乱，领导机关和武装主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大肆“清剿”屠杀，第七分区境内除洪泽湖外，各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仅泗南县，被敌人吊打、枪杀、活埋者1200余人。洪泽湖周边陆地全部被敌人占领，拥挤在湖上的各类人员2000余人，互不隶属，人员混杂，船少人多，加之天气寒冷，生活困难，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加强领导，确定斗争行动方针，留在洪泽湖上的第七地委敌工部长姚克，洪泽县委书记王化东、县长谢楠，泗南县委书记洪沛等在罗嘴会商，决定武装长期坚持洪泽湖的斗争方针，并组成中共洪泽湖临时工委，推姚克为书记，王化东、洪沛和谢楠为委员。工委成立后，立即精简疏散老弱和非战斗人员，统一组编武装，成立军事指挥部，任命洪泽县总队参谋长魏存平为指挥，泗南县支队副队长刘凯顺为副指挥，盱风嘉武装编成一、二连，代号“绿山”“青山”，后改为“长江”“黄河”；以洪泽县干部和武工队编成第三连，其他各县干部编成第四连，代号分别为“淮河”“成湖”，后改为“丹山”“溧河”，按“四四”编制，每连约有190人。各连均有小炮、机枪和钢板划子。指挥部另有直属队和鸭枪队。主力第一、第二连多是洪泽县富于水上作战经验、又熟悉湖上情况的战士，而第三、第四连多是富于斗争经验的干部，是一支政治素质好，机动灵活的水上游击队。在工委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部统一指挥湖上武装，使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并利用湖面广阔、滩多水浅、芦苇葑草丛生、机动船只不便航行的特点，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斗争。

12月上旬的一天早晨，驻临淮头的敌军1个营，强抓50多条小船，强迫渔民撑船，分两路向湖上扑来。指挥部事先已获情报，把90条钢板划子在外河口摆好阵势，严阵以待。被敌人拉来撑船的渔民心向共产党，故意把船踩得摇摇晃晃。趁敌人胆战心惊之际，魏存平命令出击，猛烈攻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此后，敌再

不敢轻易进湖。

军事“围剿”失败，敌军便用毒辣手段迫害陆上家属，以动摇湖上指战员坚持的决心。仁和集陈邦炉的母亲被“还乡团”抓去，被活活打死；盛立富连长（后在战斗中牺牲）的爱人被逼逃亡，他12岁的侄儿被国民党保长吊打致残；田吉余副连长的妻子被逼交出丈夫，被打得皮开肉绽，活活折磨而死。淮河区委书记陈一石的老母亲被敌管镇镇长抓去，老人说：“我儿替人民办事没罪！”结果被关在猪圈里，折磨而死；其4岁的女儿躲在亲戚家，也被国民党保长搜出，棒打脚踢，4天后死去。与此同时，敌人还利用各种关系，对指战员劝降策反，使个别动摇分子开了小差。洪泽湖工委和军事指挥部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对内加强思想教育，严惩动摇分子，巩固部队；对外主动出击，镇压顽固反动分子，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缴获枪械弹药食品，改善军需。同时把一些敌乡长、保长抓来，警告他们：不得再迫害我方家属。此举收到良好效果。

时值隆冬，湖上奇寒。指战员们缺吃少穿，坚持战斗。1946年12月20日，在湖上坚持出版《拂晓报》，刊出了宿北大捷的消息，年底又收到了毛泽东《新年祝词》和朱德的元旦广播讲话。党中央的声音和胜利的捷报，极大鼓舞了湖上坚持的斗志。他们历经艰难险阻，机智出击10余次，取得了多次胜利，还多次派出人员与上级联系，盼望主力早日打回来，收复解放区。

1947年1月初，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于宿北颜集（今属沭阳县）主持召开淮北撤退检讨会，会议检讨了仓促撤退的错误，讨论决定了恢复淮北解放区的斗争方针。此时，鲁南战线已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华中分局决定组建淮北党政军委员会（淮北工委）和淮北挺进支队，趁机西渡运河，打回淮北，以洪泽湖为依托，坚持敌后，进行恢复淮北解放区的斗争。淮北党政军委员会由饶子健、赵汇川、王学武、王烽舞、张灿明、陈元良、李任之组成，饶子健为书记。并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抽调第七十七、第八十一团和骑兵团第一、第三大队及部分淮北地方干部组成淮北挺进支队，由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赵汇川任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学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烽舞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1月18日，阴云密布，大雪纷飞，天气骤冷。傍晚，淮北挺进支队3300余人顶风冒雪进到运河东岸的李圩子，准备强渡运河。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和刘瑞龙代表华中分局前来送行，勉励部队团结战斗，顽强坚持，在斗争中牵制敌人，削弱敌人，恢复政权。当日晚8时，部队开始从宿迁北皂河和窑湾之间抢渡运河。侦察队和第七十七团先头部队首先过河，占领对岸村庄，打掉附近5个敌乡公所，控制了渡口。由于船少人多，当晚未能渡完。19日9时许，两架敌机发现挺进支队渡河行动，轮番俯冲扫射，挺进支队边打边渡河，直到黄昏，全部过河。

淮北挺进支队是在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胜利后不久开始行动的，敌人一时摸不清支队的企图，龟缩据点，不敢妄动。20日拂晓，部队到达睢宁东北袁圩、朱海子一带宿营，睢宁敌仍不敢接近。黄昏时，挺进支队决意丢开敌人，夜行40千米，向洪泽湖边猛插。21日，在戚圩、泮山一带打掉敌4个乡公所，就地处决3个残杀干部群众的反动分子，并开仓济贫。22日，挺进支队进到泗阳县双蔡圩以南，骑兵团一部进剿金锁镇驻敌，毙俘10余人。时驻宿迁敌孙良诚1个团尾随支队到双蔡圩，下午发生战斗，相持至天黑，挺进支队避免与敌纠缠，主动撤出战斗，继续向南挺进。23日，包围朱湖敌据点，守敌突围逃跑，骑兵团于旷野雪地中，奋力砍杀逃敌40余名。此战对敌震动甚大，迫敌从界集、龙集驻地撤退。

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三），淮北挺进支队进至洪泽湖边谢嘴、太平集、运集一带，派人与坚持湖上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打破了敌人对洪泽湖的围困封锁，使洪泽湖58天坚持胜利结束，并依托洪泽湖，坚持敌后斗争，为恢复和重建淮北解放区打开新局面。

此时，敌人在徐州、蚌埠、淮阴驻有重兵，泗阳一线驻有敌第六十旅和第六十一旅；宿迁一线有孙良诚部3个团，泗县、青阳一线有桂系第五十八师，睢宁有冯治安部驻扎。保安队及“还乡团”等土杂武装则遍布各县、区、乡。“还乡团”拔租倒账，残害群众，

建立反动政权，白色恐怖笼罩淮北大地。淮北挺进支队处在敌强我弱、四面被围的环境中。据此，淮北工委决定原随军行动的泗阳和邳睢铜干部留在湖上，参与洪泽湖武装肃清成子湖西岸和北岸敌土杂武装，巩固洪泽湖区。支队以洪泽湖为后方，在淮北广阔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与敌周旋，待机歼敌，打击国民党土杂武装，开辟地区，恢复和重建淮北解放区。

1月25日，敌第六十旅和孙良诚部3个团尾随挺进支队，在朱湖一线分两路向挺进支队攻击。挺进支队击退该敌，毙伤其80余人。当晚，为调动敌人，减轻湖边压力，挺进支队挥戈西向，挺进敌交通命脉津浦铁路。时值“四九”严寒，风紧雪大，地冻路滑，战士们跌倒了，爬起来继续顽强行军。28日，西进至灵北，横扫国民党土杂武装。当日东返，在张场与泗县出动的桂系第五十八师一部遭遇，激战一天，毙伤敌200余人。晚，敌撤退，支队继续东回。2月4日，回到洪泽湖边界集以东的戚圩子。5日，孙良诚部紧跟来犯。挺进支队留伤病员于湖上休养所，第八十一团副政委王健堂率第一营进入泗阳、淮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续歼敌9个乡公所，恢复成子湖边龙集、界集和南新集区乡政权。第八十一团二、三营进入泗宿、泗灵睢地区，接连摧毁敌人十余个据点，有力牵制了敌人。挺进支队第七十七团及骑兵团再次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向西转移至外线，分头机动作战。2月下旬，部队在石集会合后经石子头到淮泗休整。

为了巩固洪泽湖基地，进一步打开局面，淮北工委决定主动出击崔集，然后相机攻取半城。为了出奇制胜，部队隐蔽地从淮泗乘船渡湖至临淮头登陆。3月1日晚9时，第八十一团团团长吴忠泰指挥第二营实施攻击，经激烈战斗，攻占敌据点，歼敌保安团1个中队。第二天拂晓，饶子健率第七十七团两个营到达崔集，决定乘胜攻击洪泽湖畔重镇半城。当即以第七十七团两个营和第八十一团第一营攻击半城。吴忠泰率第八十一团第二营在青（阳）半（城）公路埋伏打援。4日晚，攻克半城。同日下午，在孙园击溃青阳来援之敌，俘敌70余人。5日，敌徐州绥靖公署补充第二团5个连和泗县保安

大队两个中队，向半城增援，被第七十七团和第八十一团二营围歼于高圩子。此役共歼敌 600 余人，缴获枪支弹药甚多，使部队得到很大补充。此战是淮北挺进支队打回淮北的第一个大胜仗，震慑了敌人，鼓舞了部队斗志，提高了坚持淮北敌后斗争的信心。此战之后，挺进支队乘胜收复泗南、泗阳、泗宿等县广大地区，重建了 12 个区 60 多个乡民主政权。至此，进入淮北两个月来，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挺进支队在淮北敌后初步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跟。

为了总结进入淮北以来两个月的斗争经验，明确今后斗争方针，3月17日、18日，饶子健在泗阳县香城主持召开淮北党政军委员会扩大会议，全体委员和县、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王学武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虽在淮北敌后站住了脚跟，但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未改变，斗争任务仍很艰巨。赵汇川作了军事工作报告，总结了两个月来敌后军事斗争的经过和基本经验。会议认为，当前淮北敌后局面虽初步打开，但尚未完全站稳脚跟，敌在弄清我方兵力和意图之后，定会调整部署，加强对我军围堵“追剿”，今后斗争会更加艰苦紧张。为此，会议确定今后斗争方针应是以洪泽湖为依托，稳步前进，有阵地的的发展。在军事上要继续坚持避广（国民党桂系正规部队）打土（国民党本地土杂武装），避实击虚，敌进我进，在可能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一部，扩大战果。会议还要求淮北挺进支队和地方全体人员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要戒骄戒躁，团结战斗，迎接更加艰险的战斗任务。

4月17日，华中分局指示，撤销淮北党政军委员会，成立中共淮北地方委员会和淮北军区，饶子健任地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李任之任地委副书记。为利于江淮地区的坚持和恢复斗争，4月下旬，淮宝县划归淮北地委和淮北军区管辖，并由淮北地委组织部长张灿明任县委书记。

4月上旬，第七十七团在淮南支队杨效椿部配合下，攻克敌淮宝重镇高良涧。29日，攻克顺河集，打通了淮泗与淮宝的联系。5月6日，为进一步打通与淮南的联系，第七十七团主攻蒋坝，歼敌70余人，因盱眙、马坝敌增援，主动撤出了战斗。但第一营第二连

因插入敌纵深，失去联系，被敌包围于洪泽湖石工堤，他们在营教导员郭一萍、连长陈继农、指导员王布的率领下，从清晨坚持到夜晚，击退10倍于我之敌的8次冲锋，毙伤敌数十人，终于趁夜色抬着负重伤的教导员突围回到营地。战后，淮北军区发出嘉奖令，表彰该连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命名为“石工堤连”。

为加强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实行主力地方化。5月中旬，以第八十一团第一营加强淮泗县总队，该团团长吴忠泰任总队长。战斗至6月，淮泗县先后建立了黄圩、新袁、顺河、李口、营门、吴集6个区政权。同时，以第八十一团第三营加强淮宝县总队，由该团参谋长龙昭贤任副总队长。淮宝县总队成立后，在淮南支队配合下，迅速打开浍河以北地区局面。接着淮泗县和淮宝县发动群众，开展惩奸运动和土地改革，巩固了已恢复的地区，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给，成为坚持和恢复淮北和淮南的斗争基地。

1947年5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为保障其后方及交通线安全，淮北驻敌常集中五六个团以上兵力，加紧“围剿”淮北分区武装，“扫荡”已恢复的地区，对挺进支队和地方武装前堵后追，分进合击，形势甚为紧张。淮北敌后坚持斗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阶段。

4月上旬至5月，敌集中兵力“清剿”泗南管、鲍套子和泗阳龙集解放区，先后重建青阳、双沟、半城、管镇等据点。驻尚嘴的挺进支队后方机关遭敌袭击，损失严重。湖区陆上地方武装退至湖上，骑兵团撤回运河以东第六分区。淮北地委和淮北军分区在淮北广阔平原上，领导军民和敌人“拉锯”“兜圈子”，机动灵活，不断打击削弱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和“扫荡”。

5月20日，敌整编第四师一七七团、第六十旅3个营和孙良诚部3个团，从洋河、众兴、顺和集等地，分进“围剿”淮北地委驻地淮泗地区。淮北地委决定饶子健率军分区机关及第八十一团一部在淮泗、淮宝地区就地坚持掌握全局，赵汇川和王学武率第七十七团插向外线，调动敌人，保护湖区基地。战斗至27日，敌一无所获，被迫撤回。6月4日，部队在淮泗会合。

6月4日，孙良诚部3个团和敌第六十旅再次进犯淮泗地区，企图歼灭挺进支队主力。淮北地委副书记李任之率第八十一团一部留淮泗坚持，饶子健、赵汇川、王学武率主力跳至外线，忽东忽西，和敌人兜大圈子，连续行军8昼夜，在极度疲惫的状况下，于6月20日在泗阳朱家岗伏击尾追之敌，歼敌正规军桂系第五二二团1个连，缴获机枪5挺、六〇炮1门。4月至7月是恢复淮北斗争的最艰苦时期，但淮北地委率领淮北支队和地方军民顽强坚持斗争，在和敌人“拉锯”“兜圈子”游击运动中，选择有利时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或歼敌一部，或打掉敌人区、乡公所，积小胜为大胜。

第五节 解放区的恢复

1947年7月，刘邓大军^①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苏北战场为我军南线重要侧翼战场，开始了“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战斗历程。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苏北、淮北地区也主动发起攻势，为收复失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运河以东的第六分区，为适应苏北地区的新形势，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旅脱离第六军分区，在覃健、谢振华率领下，东进第五分区作战（后编入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三十军为第八十九师）。张克辛接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赵海风，参谋长钟玉祥，政治部主任雷铁鸣。8月，万众一调任苏北区党委副书记，吴觉接任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8月上旬，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协同收复第五分区及其周围地区，歼敌7000余人。苏北形势逐步好转。第六分区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将从第五分区调回的第三十五旅一〇五团充实到3个支队，并集中成为分区机动作战的主力，以支持各县发展武装，打击国民党土杂武装，开辟新区。在苏北区党委统一部署下，各地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和整党工作，在新收复区开展反“倒田”、反“倒租”清算运动。通过运动，进一步调动广大贫

^① 指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军队。

雇农参加和支持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反攻的战斗力。

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加强和统一华中地区党政军领导，华东局于1947年9月12日决定组建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中工委），陈丕显任书记，同时组建华中行政办事处，曹荻秋任主任，贺希明、陈国栋任副主任；军事上成立华中指挥部，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陈庆先任副司令员，姬鹏飞任副政委。11月10日，上述组织正式成立，苏北、苏中区党委和苏北、苏中军区同时撤销。

10月，华中指挥部所属部队进入第六分区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第十二纵队于18日重克南新集镇（今灌南县城），清除武障河等据点，歼敌1500余人，牢固控制了盐河线；第十二纵队于25日攻克五里庄、丁集据点，歼敌2000余人，收复淮（阴）沐（阳）路两侧60千米地区，从而打破了敌人对第六分区的分割局面。12月，第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各县武装挺进敌区，开辟新区。各地武装纷纷订出“杀敌立功计划”，掀起收复失地热潮。在一致向前进击的形势下，盐河线之敌龟缩涟城，不敢渡河西犯；淮阴、泗沐两县协同战斗，恢复六塘河南两个半区；西线则驱敌于运西，打通了淮北交通；北线之敌亦被压缩至陇海线。

1948年1月15日，第六分区趁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南犯盐阜之际，集中三支队2个营的兵力，一举拔除敌宿北中心据点陆沟。此战为恢复宿北创造了条件，同时有力地策应了南线的反“清剿”斗争。为此，获华中指挥部通令嘉奖。

此时，国民党在全国战场已由“全面防御”转入“分区防御”。在苏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统一的“总体战”，进行更加残酷的“重点驻剿”和“机动清剿”。

3月14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加强苏北武装斗争，策应中原和山东战场，并为而后渡江作战准备条件，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山东南下抵达阜宁羊寨地区，与第十二纵队会合，与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合编为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姬鹏飞任正、副政治委员。苏北兵团具体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华中指挥部

撤销，另成立苏北军区，辖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九军分区。此时，第六分区3个支队改称直属第一、第二、第三团。面临攻势，国民党军误以为第二纵队将南渡长江，慌忙放弃沭阳、阜宁，收缩兵力，加强苏中和沿江防御。第二纵队、第十二纵队乘机于3月19日发起益林战役，歼敌7000余人。第六分区亦于3月初收复了盐河线南新集镇、龙沟、武障河、张店地区和沭新线沭阳城、庙头、阴平、高流、十字桥等地区。

四五月间，苏北部队结合地方土地改革复查、整顿审干运动，开展了以“诉苦”和“三查三整”^①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加强了团结，军心振奋，士气高涨。

5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15个团和1个机动装甲大队兵力，兵分两路，大举“清剿”第六分区。一路自新集镇沿沭新路南侵，一路由丁集、渔沟沿淮沭线北犯，企图合击歼灭第六分区主力和党政机关沭阳。20日，第六分区主力主动撤离，敌占沭阳空城，别无所获。潼阳、沭阳、泗沭、淮阴县地方武装在敌侧翼不断袭击侵扰敌人，歼敌300余人。敌到处挨打，被动畏缩，“清剿”行动仅4天时间即被迫结束。

5月27日，驻沭阳城敌军第五十五团、大伊山两个营、桑墟第四四九团进占汤涧、李恒庄、白皂沟、丁庄巢、韩山等地，再次图谋合击第六分区党政机关和主力。时第六分区第一团已进入沭城东北郝庄一带。双方交火后，敌第五十五团一部又由汤沟北犯吴集，企图切断我军退路。战斗到上午10时许，第一团毙伤敌200余人后，掩护机关顺利转移，敌人“清剿”计划再次落空。

5月底，为充实主力，第六地委紧急动员1500人补充第二纵队，第六分区直属第三团上升第十二纵队三十六旅为第一〇七团。各县大队均扩编为独立团，加强了反攻力量。此时，张克辛调任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赵海风接任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吴大林任副司令

^① 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员。6月3日，第六分区再次收复沭阳城。

6月中旬，为策应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苏北兵团乘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第七十二师西调中原战场之机，发起陇海路东段攻势，第六分区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战斗，解放了陇海路以南、沭新公路以东、通榆公路以西广大地区，歼敌总计5500余人，击毙了曾杀害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团团长汤曙红的敌灌沭联防指挥周法乾，打通了苏北与山东的交通。至此，第六分区进入全面收复失地阶段。7月11日，泗阳、泗沭地方武装配合第二纵队一部解放众兴镇，全歼敌2200余人，同时江淮部队收复洋河、临河。12日夜，驻宿迁城的国民党守军及党政机关向睢宁逃窜，宿迁县武工队当即入城，次日泗宿县部队接管宿迁城。8月，宿迁独立团于沂河东岸歼敌400余人。至此，宿迁地区基本恢复，第六分区与淮北区连成一片。

在运河以西的第七分区，1947年夏秋之间，敌军开始调动、收缩，泗县城以东已无敌正规部队。淮北地委和军分区抓住有利战机，迅速集中并加强两个主力团，在各县地方武装配合下，主动发动攻势。七八月间，先后攻克金圩子、吕集、香城敌据点，接着战新行，克曹庙，攻归仁，打金锁，连战皆捷，共歼敌500余人，国民党土杂武装望风而逃，泗阳、泗宿局面进一步打开。

9月14日夜，在通过内线摸清管镇据点敌情后，第七十七团第一、第三营和地方武装，在洪泽湖大队协助下，隐蔽渡湖，突袭管镇，全歼驻敌泗县保安队及“还乡团”180余人，收复管镇、鲍集，双沟之敌不战而逃，洪泽湖西泗南县大片土地收复。9月下旬，第八十一团配合泗阳县地方武装收复龙集、界集两区，然后向北发展。

9月30日，第七十七、第八十一团会合包围皖东北重镇青阳。10月1日晚发起攻击，至次日拂晓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泗县保安大队3个中队及“还乡团”600余人。青阳战斗震慑了泗东之敌，泗宿县乘胜收复金锁、归仁、朱湖、重岗、刘圩、汴河等大片地区。

11月中旬，华东野战军主力破袭津浦路徐州至固镇段，以切断敌交通线。苏北第十一、第十二纵队转战淮海，控制盐河线和淮沭

线。在此形势下，驻泗县敌桂系正规军全部撤走，仅留泗县保安大队守城。淮北地委决定乘机解放皖东北重镇泗县。11月21日晚10时总攻开始，当夜突入城内，全歼敌保安大队8个中队666人。这是淮北军分区部队首次攻克县城，受到华中指挥部来电嘉奖。至此，泗南、泗阳、泗宿基本连成一片。

1947年7月以后，第七分区各县武装主动配合主力积极出击。8月5日，洪泽县总队在谢庙全歼敌洪泽湖大队第三中队。之后，第一中队投诚，第二中队瓦解。9月，泗阳、泗南两县武工队300余人，驾驶40只钢板划子和小帆船，直捣高良涧湖面敌匪刘四老巢，俘百余人，船60余条，敌伤亡惨重。此时淮北敌土杂武装和“还乡团”已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实施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集团被迫采取分区防御方针，加强绥靖区，实行“总体战”，集中兵力防守战略要点和交通线。敌徐州“剿总”抽调4个团兵力，加强淮北。1948年2月初，敌重占泗城、青阳等地，多次进行“清剿”“扫荡”，寻找淮北主力作战，但均未得逞。

淮北两个主力团在春节以后，开展了整军运动，通过练兵和诉苦，激发斗志，提高战号力。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于3月17日至18日发动了泗东战役。此役攻击目标为青阳，采取攻坚打援，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战役力量配备，以第七十七团主攻青阳，以第八十一团、骑兵团和第七纵队三十三团打援。3月17日傍晚，叶道友和孙朝旭率第七十七团包围了青阳。同时第八十一团、骑兵团、第三十三团迂回进至泗青公路之间的马公店、上塘一线隐蔽，严阵以待。17日晚，第七十七团对青阳发起攻击。战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火网，不顾汴河河阔水冷，向镇内突进。镇内守敌逃向驻有1个营兵力的镇东小圩子，小圩子驻敌用机枪封锁通道小木桥，后面第七十七团又猛烈射击，结果逃向小圩子的敌土杂武装纷纷遗尸桥上。16日拂晓，驻泗县敌暂编第二十四师六旅二团团长沙率部前来增援。当敌进入马公店地区第八十一团伏击圈时，第八十一团以猛烈火力予

敌突然射击。第三十三团和骑兵团即迂回包围，切断敌人退路。敌遭突然射击，阵脚大乱，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混乱中被骑兵团砍杀消灭一部，残敌溃逃马公店西南的陈圩子，固守待援。下午4时，第八十一和第三十三两个团从四面围攻陈圩子全歼逃敌。与此同时，第七十七团开始强攻青阳镇东小圩子。“石工堤连”冲在最前面，在敌第二道防线，与疯狂反扑之敌展开肉搏战。“石工堤连”连长陈继农负重伤，一营营长周道信、八连指导员江树元牺牲。在打退敌3次反冲锋后，分割包围敌人，全歼敌1个营。泗东战役共歼敌1914人，其中，击毙500余人，俘团、营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甚多。收复了青阳、马公店、上塘等地，使泗东、泗北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此役后，敌人再也不敢分散兵力进犯，土杂武装已无作战能力。至此，淮北军民经数百次战斗，歼敌万余，恢复了9个县政权，取得了辉煌胜利。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3月28日，淮北军分区与津浦路西的豫皖苏三分区合并成立淮北军区，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淮北地委书记，向明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罗占云任副司令员，赵汇川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王烽舞任政治部副主任。淮北支队扩编为独立旅，叶道友任副旅长，王学武兼政治委员，原第七十七团改为第一团，第八十一团改为第二团，新建的警卫团改为第三团。6月4日，为统一淮北、淮南地区领导，在泗南张塘成立江淮区党委和江淮军区。曹获秋、陈庆先率原第十二纵队三十四旅由苏北进入江淮。曹获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李世农任副书记。陈庆先任军区司令员，饶子健、梁从学任副司令员，杨光池任副政治委员。此后，恢复淮北的斗争走向全面胜利。

第六节 解放区的各项建设

一、土地改革复查运动

1946年的土地改革是在“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战争环境

下进行的，运动不够深入、彻底，第七分区的土地改革仅停留在试点阶段。针对存在问题，华中分局于1946年9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土地改革已经分配完毕的地区，应即从下而上、从上而下进行复查”。复查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调整阶级关系，完成组织的发展与改造，以及新的工作的动员。9月22日，又在《关于淮阴撤退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中强调，“已完成土地分配的，应即进行复查，追出老契，正式成立新契”，“务使基本群众真正获得土地实利，中农利益被侵犯者，应即补偿，以加强农民本身团结”。由于形势紧张，未能落实。

1947年2月17日，苏北区党委发出《关于土地复查与生产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区普遍进行土地复查。3月，华中第六地委发出相应指示，要求各县以坚持生产和土地改革复查为主要工作，在中心区消灭赤贫，补偿中农，消灭明分暗不分现象；边区开展反拔田倒租斗争，巩固和保卫土地改革成果。此后，第六地委组织调研组，在斗争环境较为稳定的地区先后进行土地复查试点实验。经过20天工作，整顿了干部思想，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分配不公平和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差。四五月间，在反“清剿”斗争的间隙，其他较稳定地区也进行此项工作，边缘区则组织一些反拔田倒租的斗争。此时由于敌人“清剿”不断，党员和干部队伍尚未清理，因此这一阶段的土地复查工作规模不大，收效不多。五六月之交，华中第六地委召开各县民运部长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土地复查工作，以团结广大农民进行反蒋保田的斗争。

6月20日，华中分局发出《对土地复查的指示》，要求在土地改革复查中，“必须拿出地主全部土地，必须拿出富农之多余土地，使无地、少地之贫雇农得到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及必要的牲口、房屋、粮食等，但同时必须保证中农与劳动起家之新富农的土地财产不被侵犯”。各地的土地改革复查运动迅速展开。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正在召开，华中解放区的土地复查运动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7月中旬，苏北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前一时间土地改革复查是在战争空隙进行的，仅在中

心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而没有深入普遍地发动群众去解决土地改革遗留问题，因而要求各地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复查。8月，第六地委召开会议，贯彻苏北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华中分局和刘少奇关于土地复查的指示，布置各县深入开展土地复查工作，明确今后以此为中心任务，要动用85%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用3个月时间完成。9月1日，华东局发出《对贯彻土改复查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土地改革复查中，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干部包办代替和命令主义，区别对待各式地主与各式人物，克服右倾和“左”倾错误。不久，苏北区党委也发出《关于掌握土改复查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土地复查各种政策补充规定》。此后，土地复查运动在全区普遍开展。

土地改革复查工作首先从组织干部公开进行民主检查开始，克服右倾思想，调整干部队伍，改善干群关系；然后组织贫雇农开展诉苦运动，挖穷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培养积极分子，进而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地主、富农，追分浮财；最后调整土地，确立新的产权。群众发动起来，斗争异常激烈，特别是追浮财斗争中，一些积极分子手持“翻身大棍”和地主、富农进行说理斗争，棍上写着“翻身大棍五尺长，专打地主和流氓，打死不抵偿”的口号，地主被斗后，家中土地、房产、钱财、首饰、家具、衣物以及粮食等统统没收，扫地出门，有的沦为乞丐，有的被逮捕关押。封建地主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这一阶段斗争，农民分得大量浮财，据淮阴、沭阳、东海、灌云、宿北5县统计，农民分得粮食2000吨、衣服5.6万件、布匹16.67千米、牛驴3600余头、猪羊3000余头、银元14万块、黄金80余两。泗沭、宿迁、潼阳等县大部分乡村根据“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抽肥补瘦，调整了土地，不但抽出地主、富农土地，干部多占的地也退了出来，补偿给贫苦农民。在新收复区，开展了反拔田倒租的斗争。沭阳县韩山区周庄、白云等乡，先后召开千人大会，斗争复辟地主，夺回了翻身果实。这一阶段，在运动猛烈发展的过程中，已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许多地方发生了不给地主生活出路，甚至乱打、乱杀的现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制订的战斗纲领。华中解放区由此进一步掀起土地改革复查的高潮。11月10日，华中工委为贯彻土地法大纲，发出《关于执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强调在政治上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势力，在经济上把地主阶级剥削所得的土地和一切财物，除按照政策留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没收，分给贫雇农，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第六地委坚决贯彻上级指示，成立新农会筹备委员会，新农会有领导土改复查、审查党员干部和监督党政组织的一切权力。11月，淮海新农会发出《告淮海农民书》，号召全区广大农民团结一致闹翻身，向封建地主作坚决斗争。各县也相继成立新农会，土地改革复查全面进入平分土地阶段，运动更加广泛，斗争更加猛烈，即使是军事斗争频繁的边缘地区也不例外。经过这一阶段斗争，彻底斗垮了地主、富农，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在运动中，“左”倾偏向也有严重发展，在斗争中不恰当地强调“一切权力归农会”，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甚至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任意扩大打击面；同时，更多地侵犯中农利益和工商业，造成中农恐慌，工商业萧条。

1948年2月至4月，华中工委召开土地工作会议，总结华中各地土地改革的业绩和经验，检讨土地改革复查中的错误偏向，研究进一步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明确今后土地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此后，第六分区土地改革复查中“左”的错误有所纠正。由于发生严重春荒，全区中心任务转向生产救灾，因而纠偏不彻底，亦不能完成平分土地、确立产权的任务。至6月，第六分区各县又抽调近千名干部，经学习培训后，组成土地改革复查工作队，到11个区106个乡继续开展土地改革复查运动。至8月，基本完成调整土地、确立产权工作，同时补偿中农在以往土地改革复查中的损失，大力克服“左”倾错误倾向。11月，淮海战役开始，全区中心任务转向支前，土地改革复查工作中止。第六分区多数地区未能完成平分土地、确立产权的任务，直至1949年春，才完成此项任务，结束土地改革复查工作。

泗宿、泗南和淮泗等县在恢复解放区的斗争中，也依据各地具体形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华中第七地委于1947年11月初在全区普遍开展土地平分运动。经4个月斗争，泗宿、泗南和淮泗县各村完成了平分土地任务。

二、整党审干运动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主要研究整党和土地改革两大问题。会议认为，“五四”土地改革不够彻底的原因，除政策本身不彻底外，主要是党内思想、组织不纯和官僚主义作风所致。因此，决定在土地改革中进行整党审干工作。规定整党审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目的是克服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并把党内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组织，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任务。整党的基本方针是说服教育、治病救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10日，华中工委发出《关于执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指示》，指出党的组织“如果不在组织上、思想上加以彻底改造，要贯彻土改是不可能的，要想巩固党的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也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土改中改造干部、改造组织，把干部改造、组织改造与土改密切结合起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自上而下，从高级到低级，从干部到党员开展‘三查’运动，务求在党内清除地主、富农思想，肃清阶级异己分子，保证各级领导机构的纯洁性”，“农村支部中如有地主、富农党员，无条件清洗出党”，“地主、富农一律不得参加农村支部、农会、民兵等组织”；在整党审干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保障农民协会审查、批评、撤换、监督一切干部的权利”。12月28日，华中工委又发出《关于继续开展反地主富农思想斗争，彻底完成平分土地与整党任务的决定》，强调“整顿党的组织是贯彻平分土地、贯彻土改的重要关键”，“开展三查运动是整党的具体实施”。这些指示对于充分发动群众，纯洁党和其他革命组织，

改进党员和干部思想作风，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制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由于过分强调贫雇农成分和农会的权力作用，以致在实施过程中普遍出现“左”的偏向。

华中第六地委在1947年6月初召开的各县民运部长联席会上，就提出了认真改造干部作风，严肃纠正干部在土地改革中利用职务多分多得的偏向，以便开展土地改革复查，动员团结广大农民进行反蒋保田、保饭碗的斗争。7月底，根据刘少奇对晋绥土地改革的有关指示，又召开了地委扩大会（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再次布置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同样强调开展土地改革复查，首先要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组织干部公开地进行民主检查，克服右倾情绪，调整干部队伍，改善干群关系，在此基础上，完成土地改革复查任务。会后各县均召开县委扩大会，县、区委领导干部带头检查右倾思想，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有所转变，并调整了干部队伍。

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第六分区的整党审干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第六分区和所属各县均成立了新农会筹委会，对各级政府和干部实行监督，以“三查三整”为中心内容的整党审干工作进一步深入展开。整党审干运动中，党的组织及其各类革命组织均重加整顿，清除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流氓地痞分子，一大批在土地复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和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整个干部队伍的阶级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1947年7月前，雇贫农成分的干部在各县县委委员中占7%，区委委员中占30%，乡干部中不足50%。通过整党审干，到1948年夏，雇贫农成分的干部在县委委员中达21%，区委委员中达43%，乡干部中达70%。

第七分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各县党组织和政权机构遭到破坏。在恢复斗争中，党的组织逐步恢复或重建，但很弱小，且存在严重不纯问题。1947年8月，随着武装斗争形势好转，地区逐步稳定，整党建党的工作便逐步展开，并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经过平分土地的地区，党的组织发展较快，且经过“三查三整”，洗刷了大批自首分子和投机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到1948年8月，淮北7个县已有党员4700余人，其中泗宿788人、淮泗728人、泗南529人、泗

阳 443 人。

通过整党审干，清算了一部分党员干部长期存在的地主、富农思想，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转变了思想作风，纯洁和健全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战斗力，有效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并为尔后反攻决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力量。

这一时期整党审干运动，是和土地改革运动紧密结合进行的，是直接为土地改革服务的。整党审干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同时存在着“左”的偏向。由于对党内存在的地主、富农思想估计过于严重，过分强调农会的作用，在提倡群众审查干部时，甚至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农会凌驾于政府之上，结果出现了种种偏差。尤其是对党内干部不作具体分析、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2 月 22 日发出《关于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后，这种“左”的偏向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三、财政工作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宿迁地区各县承担着苏皖北线军事后勤的重任，人力、物资消耗极重。1946 年，第六行政区全年公粮 4 万吨及第五分区运来的大米 1500 吨已消耗殆尽，机关部队的物资财产也撤往山东解放区。华中币贬值，银元每元可兑换华中币数万元至 10 万元。财政机构解体，税收丧失。失陷地区干部家属撤出，脱产人员增至两万余人，扩大了供给开支。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局面，华中第六地委调整和重建财政机构和财经制度，颁布货物管理法令和确定新税率，同时号召全党动手，清理现存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另组建驻鲁后方办事处，统一管理北撤物资，保证留鲁人员的供给。为克服财政困难，还成立了财力动员委员会，号召各机关部门献出物资，降低生活供给标准，厉行节约，除口粮外，停发菜金，仅供给少量黄豆佐食。办公费也大为削减，津贴待遇和日用品均取消供给。1947 年二三月间，遭国民党“清剿”，损失物资近 2 亿元，税

收萎缩，存款告罄。3月，采取紧急措施，举办粮食公债2500吨，发行10亿本钞，进一步整理财政，贯彻统筹统支，清理资产，动员财力4亿至5亿元。在此基础上，重建贸易机构，稳定华中币；重整税务，每月回收1.5亿元组织生产出口，派人到山东领取夏衣万套、华中币8亿元。4月，敌又“清剿”，现有物资遭受损失，印钞未能完成，从山东仅领回2.72亿元、4000套单衣、5万发子弹及少量药品。财政空前艰窘，机关伙食几乎难以维持。6月，第六地委决定进一步加强财政建设，组织财经委员会，加强财政领导，确定增粮办法，夏季征得公粮6415吨、田赋6.6亿元。此阶段共收入粮7650吨、草1.1万吨、华中币18.5亿元，财政开支得以勉强维持。

1947年下半年，第六分区由于武装坚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地区有所恢复，华中币有所提高，群众情绪较为稳定。秋季征粮6900吨、田赋3.5亿元，夏秋两季共征粮1.33万吨，除抵消公债及上半年透支，尚存7000吨。12月份又从第五分区运回1000吨，口粮勉强可以维持。夏秋两季在自然灾害严重情况下，仍征得田赋11.3亿元，税收每月约1.5亿元，但每月需支出经费3.6亿元，财政仍很困难。因此，第六地委决定继续贯彻全党当家的方针，加强财政领导，保证财经政策、计划和制度的贯彻，继续发行华中币12亿元，召开金融和货物管理会议，研究业务，整理乡村财政，向边缘区征粮，扩大收入，同时大力精简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财政勉强维持，但仍很困难。

至1948年，第六分区连续性自然灾害全面加重，财政又十分困难。第六地委决定停止土地改革复查，以组织生产救灾为中心工作。灾区全力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非灾区和轻灾区进行财力动员，发行公债公粮2350吨，实收入账救灾公债500吨，动员脱产人员节约粮食200吨，精简党政人员5600余人投入生产（占原有人数约36%），上级拨来农贷和赈粮6725吨，现金10.5亿元，棉55吨。终于克服了财政危机，度过了灾荒。

淮北第七分区在1947年1月淮北挺进支队重返淮北时，上级拨给几十两黄金和几千银元以应急需，此外军需依靠向群众借粮借款

和战斗缴获，以及没收地主“还乡团”财产。3月，武装斗争初步打开了局面，淮北工委（后为第七地委）为解决财政问题，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饶子健兼书记，王烽舞具体主持，及时加强和统一领导财经工作。财经委下设财政局，财政局下辖财政、税务、粮食3个科和金库。财经委于3月10日、20日、23日连发3个指示，对解决财政困难作了部署：大力开展税收工作，组织筹款，要求在夏收前通过税收、罚款以及战斗缴获和拍卖反动分子财产，筹3亿元（法币）的经费；各单位筹粮除自留外，上缴250吨；厉行节约，保证部队最低供给。并规定了征税、筹款、筹粮的具体政策和制度。4月下旬，淮宝县划归淮北以后，财政收入明显改进，五六月份仅淮宝一县经土地改革分田斗争，就征粮200吨。

淮北地区在整个坚持恢复斗争中，战斗不断，敌人破坏搜刮，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自然灾害严重，因此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但在华中第七地委领导下，制订了符合实际的财经政策，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克服了财政困难，保障了供给，为恢复地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四、组织生产，战胜灾荒

解放战争爆发后，第六分区连续3年发生水灾，1947年的水灾为30年所未有。宿迁、沭阳、泗沭等县被洪水淹没，运河以南泗阳也被洪水淹没三分之一。因粮食歉收，加之敌军“清剿”和抢劫严重，土地改革复查中又损害了部分中农和工商业的利益，以至粮食市场有价无市，缺粮者借贷无门。至1948年春，全区灾民高达100万，占第六分区人口63%，其中断炊户达34.7万人，占第六分区人口32%。

为战胜灾荒，第六地委于1947年8月召开地委扩大会，布置生产救灾，号召广种蔬菜、荞麦，以补粮不足，但因发生虫灾，蔬菜收获不大，因霜来得早，荞麦也歉收。8月底，开展土地改革复查，第六地委号召土地改革复查与秋种相结合。各县农民在斗争中分得的麦子都留作麦种，按时完成秋种，播种面积也有增加。11月，土地改革复查进入平分土地斗浮财阶段。第六地委号召斗浮财与发展

副业相结合，但因“左”倾情绪泛滥，党的领导严重削弱。12月底，第六地委决定灾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工作，非灾区则仍以土地改革复查为主，结合开展救灾工作。但在实际贯彻中，仍以土地改革复查为中心，忽视生产救灾工作，因此未能遏止灾情。更由于一些地方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缺粮户未发急赈，致使二三月全区先后饿死灾民150余人。同时，在灾情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国统区和游击区灾民纷纷拥入解放区求食。面对严重灾情，第六地委于1948年2月底决定中止土地改革复查，全党全民集中全力生产救灾，动员非灾区和轻灾区群众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援助灾区流入的灾民。一面有计划安排就食，一面及时组织疏散，发放急赈粮给无力生产的老弱病残灾民，杜绝饿死人现象。鼓励中农、富农和地主挖出存粮，保证粮食自由贸易，发展各类副业生产，组织挖野菜等，生产自救。机关干部进一步发动节约捐粮运动，每日三顿稀饭，月节约粮食200吨援助灾民。在非灾区和轻灾区发行公债、公粮2350吨，安插灾民近10万人，举办运粮、运油、运盐、纺织和修水利等工赈。加上上级和友邻地区的支援，至麦收时，终于遏止了灾情，战胜了前所未有的灾荒。据统计，第六分区群众在土改复查斗浮财中分得粮食3000吨，挖野菜等1.75万吨，各类副业生产盈利折粮1250吨，群众献粮和公债粮2900吨，机关部队捐粮188吨，政府赈粮2541.8吨，生产自救粮食占灾民总生活量91.4%；上级拨粮及友邻支援粮771.5吨，占灾民总生活量的8.6%。

第七分区灾情同样很严重。1946年和1947年连续两年发生水灾，加之敌人抢劫掠夺，“还乡团”反攻倒算，武装斗争激烈，地区不够稳定，因此，群众生活极为困难。1948年春，又发生严重春荒，泗宿县朱湖区12个村受灾，几乎户户断炊；周庄乡有120户断炊。2月22日，第七地委发出“关于生产救荒，精简节约”的指示，要求各县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的多余粮食分给农民，还从淮宝、泗南调粮到重灾区救灾。4月，第七专署发放救灾急赈款2亿元（华中币），其中，泗宿6000万元，泗南5200万元，泗阳4800万元，淮泗3000万元。另拨耕牛贷款3000万元。同时，党政机关大

力节约口粮，每人每日仅发6两粮食，一日两顿稀饭，粮食不够就挖湖藕、采野菜充饥，并精简人员参加农业生产。3月底连降暴雨，地委机关、交通局和拂晓报社3个伙食单位将节约的口粮冒雨用牛车运到泗阳龙集、界集救济灾民。泗宿县大力筹集高粱种1万千克，协助灾户完成春种，度过灾荒。朱湖区小楼村一农民编了一段快板：“敌人占青阳，百姓遭灾殃。牛驴被拉去，粮食全抢光。青阳解放后，群众见太阳。帮助我耕种，放钱又放粮。凭心说句话，多亏共产党。救命大恩人，一辈不能忘。”

五、宣传文教工作

1947年1月，主力北移山东，宿迁地区转入敌后，局势紧张，但《淮海报》仍坚持油印，供干部阅读，对鼓舞斗志、树立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后，形势渐趋稳定，第六地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各县健全宣传组织，配备宣传干部，组织“红五月”、七一、七七宣传周，对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对敌发动5月、10月、年关3次政治攻势，散发宣传品22.7万份，建立广播台235处，对瓦解敌人、争取回归发挥了作用。为配合党员教育，党内在七一进行党史教育和党性检查，配合土地改革复查和整党，编印时事教材和支部教材，恢复党刊7种，并恢复出版《淮海大众》和《淮海画报》。《淮海报》也恢复铅印，并开展全党办报的“八一三”通讯运动，建立508个通讯组，发展2403个通讯员，培养了模范通讯员229人、模范通讯组30个。到1948年上半年，配合生产救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了适应土地改革复查中提拔大量贫雇农干部的需要，第六地委还开展了工农通讯运动，组织乡村干部成立黑板报委员会，提倡黑板报、读报组、通讯组和识字组四大结合，培养和发展通讯员1.46万余人，其中工农通讯员占半数以上，发展读报组868个。7月，又开展“七一村报运动”，共建立乡村黑板报1138处。第六分区文艺工作也有所恢复，重建了淮海文化协会，团结和组织广大艺人和文娱骨干，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评出优秀剧本60个、鼓词15种，发展农村剧团97个，文艺小组95个，艺人组7个。到1948年上半年，农村剧团已有207个，文娱骨干

3946人。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宣传了党的政策，反映了群众斗争，鼓舞教育了群众。

淮北地区的《拂晓报》坚持在洪泽湖的船上编印。报社编辑人员利用一部只能收不能发的发报机，收听新华社的新闻广播，出版“电讯”，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和《解放日报》的社论，给坚持恢复斗争的指战员极大的鼓舞。1947年7月，淮北解放区局势好转，淮北地委为加强宣传工作，成立党报委员会，以地委副书记李任之为主任，决定《拂晓报》转移到陆上出版，但湖上仍备有船只，一旦敌人“扫荡”，形势紧张，便仍回船上出版。该报原来只登电讯，为了发挥报纸的指导作用，改为刊登地区斗争的政策言论为主，在淮北恢复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教育工作方面，主力北移时处于停顿和自流状况。至1947年四五月间，第六行政区始恢复中学2所、区村学校610所，有学生1.86万余人。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劳武结合”的办法，灵活进行教学。有的地方教师带枪备战，学生担任交通情报员，随联防队分散游击教学。7月，第六专署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各县全面整顿国民教育工作，重建教育领导机构，动员大量贫雇农子弟入学。第六分区的区、村学校达到819所、教师428人、学生3.5万余人。1948年上半年，结合生产救灾，第六地委提出“教育与生产结合办学”的方针，各类学校普遍组织生产小组，学生每天以一定时间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以解决学习费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办学方针，第六分区教育事业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学由2所发展到6所，区村学校发展到1113所，教师增至1859人，学生数增为5.9万余人。1948年下半年，第六地委提出在巩固普教的基础上，开展干部群众的识字运动（扫盲教育），教学方法上普遍推行“小先生”制，发动广大学生教育成人识字，收到显著成效。沭阳县、泗沭县分别有干部5396人和群众4405人参加学习。至1948年底，第六分区已有中学7所，教职员97人，学生1154人；区村学校1661所，教师2600人，学生8.2万余人。

在淮北地区，教育事业也随着地区局势的稳定而逐步恢复。

1948年6月4日，中共江淮区党委在泗南县张塘成立。为了尽快培养出大批干部，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江淮区党委于7月在泗南县宋庄创办江淮公学。同年11月，为纪念彭雪枫师长，江淮公学改称雪枫中学，校址迁泗宿县蔡破圩子，1949年3月迁至泗县，同年6月停办。学生大部分是来自解放区和游击区的知识青年，学校设高研、高师、普师、简师等部（班），在校生近千人。其任务主要是为解放区和前线培养革命干部，教学工作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同时传授一些必要的文化、专业知识。该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第十二章

宿迁人民迎解放

第一节 宿迁全境解放

1948年6月中旬，苏北敌整编第八十三、第七十二、第二十五师因华东野战军发起豫西战役被迫西调，华中部队乘机发动攻势，收复失地。第六分区军民积极配合主力，全面出击。至7月中旬，不到1个月时间，即收复陇海路以南、淮阴以北大片土地，控制了运河线、淮沭线和连云港以南的盐河线。

8月底，第六分区地方武装奉命协助第五分区解放了盐区重镇陈家港，开辟广大盐区。9月，为迎接全面反攻，充实地方武装主力，第六分区组建教导团，不久改为直属第三团。10月间，以第一、第二、第三团编为独立第六旅。11月，又组建分区特务团。11月初，独立第六旅奉命配合淮海战役，解放了苏鲁门户新海连，收复了盐场，开辟了财源，在军事上有力配合了淮海战役，在经济上支援了解放战争。新海连解放后，独立第六旅奉命移交防务给山东滨海地区，于11月10日挥戈南下，布防泗沭县、淮阴县、涟水县一线，监视阻击可能自窑湾突围西窜之敌第六十三军，以保障华东野战军侧后安全。12日晨，敌第六十三军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22日，黄伯韬兵团被彻底解决。独立第六旅完成监视阻敌任务后，即挥师南下，收复并保卫了淮阴城，为苏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继泗阳、宿迁、泗洪境内于1948年下半年相继解放后，12月底，包括沭阳在内的第六分区全部解放。至此，宿迁地区全境解放。

宿迁地区全境解放后，第六地委根据 1948 年秋党中央西柏坡会议精神，为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指示各县用一个半月时间，以举办训练班形式，轮训村以上党员干部，培养教育大批党员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9 年 4 月中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撤销，苏北区党委、苏北行署和苏北军区相继成立。5 月，调整了地县的行政区划和机构，华中第六地委改为淮阴地委，书记李广仁，副书记黄以干；第六专员公署改为淮阴专员公署，专员陈亚昌，副专员江剑农、刘锡九；第六军分区改为淮阴军分区，司令员赵海风，政委李广仁（兼）。下辖淮阴、涟水、泗阳、沭阳、宿迁、灌云、新安、睢宁、邳睢、淮宝 10 个县。各县大体恢复了原县治。同月，安徽宿县地委决定将泗南、泗宿以及泗阳、洪泽湖管理局部分地区合并，成立泗洪县。区划和机构的调整，有利于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二节 全力支援前线和江南新区

1948 年 9 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山东和苏皖解放区除少数点线外，大片土地已经恢复。10 月，解放陇海线重镇郑州和开封。11 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指日可下，毛泽东指出再有一年时间，即可夺取全国胜利。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鼓舞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斗志昂扬，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被迫收缩兵力，加强点线，实行“重点防御”。在华东战场，炮制“守江必守淮”战略计划，以 4 个绥区、4 个兵团 60 万兵力，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线、津浦线和运河线上，妄图“巩固江淮，屏障京沪”。在此形势下，宿迁地区成为华东战略决战主战场的一部分和重要的侧翼战场。宿迁地区军民在战略决战中，积极主动配合主力作战，竭尽全力支援前线，做

出了重大贡献。

宿迁人民有着光荣的支前传统。早在1946年8月，为了保障主力保卫苏皖解放区，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就成立了北线后勤司令部，以吴觉为司令员、刘瑞龙为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和领导以第六分区为主的苏皖北部各县的军事后勤工作。此时，第六分区灾荒严重，但人民群众仍奋力支前，保障了主力部队的后勤供给，取得了涟水、宿北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南线撤退、主力会师两淮后，整个华中军事后勤任务全部由北线后勤司令部承担。1946年12月1日，刘瑞龙在华中野战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做关于北线后勤工作的总结时指出，在3个月内，第六分区及第五分区有50余万人直接参加了前线后勤服务，共出担架3.4万余副，小车3.6万余辆，船万余只。其中，第六分区占多数。尤其是两淮弃守、敌占涟水后，后勤任务几乎完全落在第六分区人民身上。第六分区一方面要担负主力部队的后勤供给服务，一方面要保障华中后方党政机关向山东的安全转移，基本上做到了不丢伤员，不遗物资，不缺粮草，不误弹药。地方供应部队充分及时，群众负担后勤公平合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后，为保障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9日指示华东、华北、中原党政领导“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以实现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计划。11月13日，中共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华中行政办事处联合发布《华中支前总动员令》，号召华中全体党政军民“紧张动员起来”，“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22日，成立了淮海战役华中支前司令部。23日，第六分区支前司令部成立，华中第六地委书记吴觉、第六行政区专员章维仁分别兼任政委和司令员。与此同时，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支前总队，区、乡分别成立支前大队和中队，均由同级党政负责人担任领导工作。支前成为地方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几乎所有青壮劳动力（包括部分妇女）都编入了为期半年的常备支前队，随时应调，脱产服务。年老体弱者则随时准备参加临时支前任务，许多后勤任务，如磨面粉、做军鞋、看护伤员都是群众在家

里完成的。

宿迁地区西北部为淮海战役正面战场，东南部又紧连淮盐和苏中，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不但要征集、囤存、加工和运输本地区的粮草等军需物资，运送、护理、安置伤员到后方，而且还要转运淮盐、苏中地区的支前物资，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各地党政主要负责人领队，共产党员积极带头，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加，因此，上级布置的各项支前任务都按时超额完成。1948年12月，华中支前司令部要求第六分区组织3000副担架，在4天内到达宿迁县泰山集，赶赴前线运送伤员。各县立即按照要求准时到达。在淮海战役支前中，第六分区3次组织担架共计5724副，担架队员总计35280人。在前线，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抬着担架，长途跋涉，日夜兼程，运送伤员，50多千米路程有时一昼夜要往返两趟。第六分区组织的运输队，仅向皖北黄桥方向运输的民工就有6.1万余人、小车4万辆。各县至黄桥路程约150至250千米，共计运粮2900吨，超额完成任务900吨。转运到宿迁的粮食计3900吨，到睢宁的有2200吨。运输队员们顶风冒雪，推小车，赶毛驴，长途运输，昼夜不停，途中自备干粮，甚至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动一粒支前军粮，及时把粮食送到前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运输英雄”、泗沭县民工杜效东，在运输队中总是超载快运开头车。在他的带动下，泗沭运输队提前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受到第六分区支前司令部的通令嘉奖。宿迁县大兴区支前运输队被首长称赞为“一支钢铁运输队”，队长彭广桂、教导员盛九思、分队长朱永兰受到华中第六军分区支前司令部嘉奖。大兴区王青云夫妻双双参加运输队，在20千米长途运输中表现突出，被人们誉为“支前模范夫妻”。

为了保证支前运输道路通畅，第六分区于1948年8月至11月，动员10万民工架桥修路，修筑13条公路，总长650千米；修筑2条牛车道，总长125千米。在路上修建9孔以上大桥15座，小桥、涵洞数十座。河流的重要渡口经整修并设有渡船133艘。长期被战争破坏的交通干线全部修复并有了发展，有力地保障了军事后勤的运输供给。

妇女在后方承担田间主要生产劳动，同样争先完成各项支前后勤任务，真正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在淮海战役支前中，第六分区后方共有60万妇女参加磨面工作，加工粮食500吨；有5.8万妇女参加运输队，运粮3500吨。还有2826名妇女参加担架队。更多的是在后方护理伤员，还通过做军鞋、洗衣服、缝被套、纺纱织布等支援前线。广大妇女在生产、支前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全区有1.05万妇女成长为革命干部，其中，区、乡级干部有1100人。在淮海战役中，第六分区8个县（不包括地处前线的宿北县）共动员支前民工35.6万人，运粮9000吨，全区所有青壮劳力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

在淮海战役支前中，江淮二分区提出“全力全面、全心全意地一切为了支援前线”的口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全区共计动员常备民工10万余人参加支前，组织担架6739副、小车3万余辆、大车993辆、挑子1.8万余副、牲口7080头，另有17万人参加短途转运，组织担架3757副、小车3.3万余辆、挑子7万余副、大车3716辆、牲口3.8万头、船1873艘。加上参加筑路修桥民工，总计动员30万余人参加支前，仅运送面粉就达7230吨。泗宿县常备民工1.12万人，短期出勤2万人，担架2293副，运粮3500吨。泗南县常备民工及短期出勤共计4万人，担架1600副，运粮1130吨。

1949年1月，第六分区参加淮海战役常备民工复员时，由于渡江战役需要，有3980名常备民工没有复员，继续参加渡江战役支前工作。此后，第六分区又组织一支为期6个月的常备支前民工队，并抽调部分船只支援渡江战役。泗沭县组建800人淮海常备民工团第六营随军支前，渡江作战。泗沭县民工营随军过江，参加解放上海、杭州等战役，一直打到福建。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泗沭民工营才于8月复员回乡。宿迁县由500名人100副担架组成担架民工第七营，跟随人民解放军主力渡江作战。1949年3月，又根据华东野战军江淮支前司令部决定，宿迁县与泗南县联合组成担架运输第三团，共1600人编为3个营，随军南下，直至安徽省南

部，5月奉命返回。

1948年年底，为支援江南新解放区，华中工委决定从苏北老区抽调大批干部赴江南新解放地区工作。1949年3月，第六地委和两淮市委从各县抽调2000余人，组成市、县、区整套班子，在第六地委书记、两淮市委书记吴觉率领下，随军渡江南下，分别奔赴常州、苏州、无锡等地，参加接管工作。同时，抽调一批干部西渡运河，支援安徽省淮北地区。泗沭县委确定县委书记纪乐天、组织部长李世传、宣传部长王颖等为应调对象，另有各级干部共60余人，并从县独立团抽出1个连武装部队近140人作警卫连，主要担负保卫新解放区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任务。宿迁县以县委书记陈云龙、组织部长王文友、宣传部长王士化等为应调对象，他们带领县独立团一连共240名地方干部和指战员，南下支援新区。沭阳县分两期抽调县长陶逸飞、县委副书记严超和组织部长尹王岚以下各级干部共240人赴新区开辟工作。

第三节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宿迁地区全面解放后，尚有少数匪特和反动道会门分子为非作歹，残害人民，散布谣言，搅乱人心，煽动策划暴乱，妄图变天。特别是苏、鲁、皖三省结合部，暗藏特务纠集散兵游勇和惯匪，利用淮海战役散落的枪支弹药，武装抢掠民财，袭击乡村政权和经济部门，残害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形成严重匪患。

为巩固新解放区社会治安，确保胜利渡江作战，1949年4月21日，苏北军区下达了剿匪命令。第六分区重点清剿灌云云台山地区和新安县以西、瓦窑以东地区，捕获匪特500余人，缴获步枪60支、短枪5支、子弹千余发。由于邳睢、睢宁一带匪情严重，6月，苏北军区成立苏鲁边区清剿指挥部，淮阴军分区调特务团两个营、淮阴独立团3个连、宿迁独立团和泗阳县总队各两个连以及新安、邳睢两县武装，重点清剿邳（睢）睢（宁）新（海连）地区；东

(海)灌(云)沭(阳)边境地区由沭阳、东海和灌云三县武装负责清剿。22日拂晓,各地同时开始清剿,通过7天时间清剿,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巩固了新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

淮海战役结束后,宿迁地区各县农村工作重点由支前转为生产救灾和恢复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1月,第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指出老区做好确立土地产权工作,以结束土地改革复查;新收复区则组织农民复田反倒租斗争;新解放区则发动群众先实行“二五减租”,继而按“中间不动两头平”原则进行土地改革。为了组织广大农民生产防荒,决定向农民借粮5000吨,其中3000吨为公粮,1750吨作为救灾贷款粮,以帮助灾民生产自救。1月25日,第六专署发出加强生产防荒的指示,要求各县“在不妨碍支前任务和达到生产自救救人的原则下,保证不饿死一个人”。4月,先后拨救济粮1327吨,救济灾民和作为以工代赈组织运河春修工程用粮。因准备较早,措施得力,终于渡过春荒。

1949年4月,京杭大运河宿(迁)淮(阴)段春修工程开工。苏北行政公署在泗阳众兴设立运河北段春修工程处。宿迁县委、县政府组织民工3678人,在南起泗沭县西郭圩、北至宿迁县的车路口全长约40千米的河堤进行修复。工程从4月27日开工,5月20日竣工,共完成工程34490立方米。宿迁县采取以工代赈,发给民工工资粮57.13吨。

1949年春夏间,沭阳县连续降雨,许多河道尚未整修,大片麦苗被淹。县委、县政府组织区乡干部和群众排除积水,抢救麦苗,大大减轻了灾害。8月中旬,沭阳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决口倒堤200余处,早中秋作物大部分被淹没,受灾面积达五分之四。县委、县政府组织农民防汛抢险,生产度荒。全县共动员45761名民工抢修柴米河戴圩、六塘河的荷花塘等936处险工险段,抢种胡萝卜146.67平方千米、荞麦15.33平方千米、蔬菜16平方千米。9月4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区、乡干部会议,要求组织全党全民大力种菜、割草养牛、秋耕、积肥,准备种麦,开展副业生产,战胜灾荒,多捋山芋叶子,确保生产度荒,迎接新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宿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第六分区地方武装（不包括民兵游击队和升为主力后的战斗）从1946年6月至1948年底，共作战1537次，歼敌2.6万余人，瓦解敌军5550人，缴获各类枪万余支、炮143门，解放土地2万平方千米，人口270余万。据不完全统计，有5011位烈士为了第六分区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

解放战争时期，宿迁人民踊跃参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兵力。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宿迁地区在内的原淮阴地区为主力部队提供了6万余名兵力。基本上是由淮海子弟兵组成的第十二纵队，在1949年2月全军整编时，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三十军。这支英雄部队在解放苏北的众多战斗中建立了卓著功勋，在整编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解放江南和上海战役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宿迁地区连年灾荒严重。宿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但战胜了灾荒，坚持了生产，而且武装坚持了地区，全力支援了战争，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宿迁地区各县人民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勤劳勇敢的宿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后 记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们谨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第一卷（1927—1949）奉献给全市共产党员和广大读者。该书历经 6 年编纂，经中共宿迁市委批准，现正式付梓出版。

2014 年，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启动《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第一卷（1927—1949）、第二卷（1949—1978）、第三卷（1978—1996）编纂工作，约请李明建、朱伯俭、赵连军参与初稿编写工作。其中的第一卷（1927—1949）先后由李明建、赵连军拟出初稿。全书由孙正龙统改定稿。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宿迁历史》第一卷（1927—1949）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并提出指导意见。在编纂过程中，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主任郭家宁、副主任马新文对初稿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也对本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江苏人民出版社宿迁分社社长、总编辑罗绪永亦对书稿进行了审改。在此，谨向所有为本书编纂出版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及资料所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